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目 录

中俄关系七十周年

- 3 张德广 / 中俄关系：回顾与前瞻
16 鲁桂成 / 亲历中苏边界谈判

俄罗斯外交政策

- 30 波波·罗 / 普京的外交政策
58 初智勇 / 中俄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的形成机制及特征——兼析其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的表现

俄罗斯民间文化

- 94 林精华 / 大众文学在俄国的起源和发展考
143 赵婷廷 / 阿尼奇科夫的民俗学遗产
171 刘雅悦 / 民间东正教的“圣经”——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鸽书》的结构与思想分析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万青松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8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9 年第 4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н Дэгуан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3)

Лу Гуйчэн

Опыт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16)

Бобо Л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утина..... (30)

Чу Чжисюн

Механиз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партнёр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Анализ их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в «свободе судоходства США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58)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Изучени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популя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94)

Чжао Тинтин

Фолькло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Е.В.Аничкова(143)

Лю Яюэ

«Библ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Анализ структуры и идей русск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стиха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171)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9 年第 4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ng Deguang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In Retrospect and A Look into the Future (3)

Lu Guicheng

Experiencing Sino-Soviet Border Negotiations (16)

Bobo Lo

Going Legit? The Foreign Policy of Vladimir Putin..... (30)

Chu Zhiyo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Russian Mutually Beneficial Strategic Cooperation: also on its Manifestation 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8)

Lin Jinghua

On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r Literature in Russia..... (94)

Zhao Tingting

Heritage of E.V. Anichkov in Folklore Studies (143)

Liu Yayue

The “Bible” of Folk Orthodoxy: Analysis of Structure and Thoughts of Russian Religious Poesy *the Dove Book* (171)

中俄关系七十周年**中俄关系:回顾与前瞻**

张德广*

【内容提要】我们回顾中俄关系发展史,研究中俄关系发展史,有助于树立我们对中俄关系的信心。苏联解体以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方向。在两国领导人推动下,中俄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两国摒弃了非结盟即对抗的冷战思维,体现了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这不仅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对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我们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保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并坚定不移地深化这种高水平的战略协作关系。

【关键词】新时代中俄关系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4-0003(13)

2019年是中俄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年份——新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在这样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我们有必要回顾两国关系的风雨历程,这有助于我们观察和评估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进而预判未来的发展走向。

* 张德广, 历任外交部苏欧司中苏谈判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外交部欧亚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名誉院长。

一、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

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开始了十几年友好包容的阶段,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关系开始恶化,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当时,两国的执政党在国际形势、共同命运以及本国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并展开了大论战。中方曾发表过九篇评论文章(简称“九评”),其中包括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领域争论,逐渐扩大到双边关系的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64年苏联援华专家大批撤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呈非正常发展态势,最终形成严重对抗,甚至发生过军事冲突(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1982年3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曾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苏联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方对此表示重视。随后,中苏两国重启磋商,不断摸索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权后,提出了一些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原则,对于军事冲突对峙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加快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89年,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邓小平同志举行了会晤,双方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同志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名言宣告了中苏两党争论、边境摩擦的结束,宣示了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句话平实而简洁,意义却深远而重大。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随之解体。而在此之前,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并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后来与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共同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于能否成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中国的关切,除此之外,还包括中俄能否延续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特殊的转变——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已经消失。1992年,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中俄双

方在“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继承国”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实现了平稳过渡。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等所有国际组织中的法定地位。中国对此表示支持，很快将中国驻苏联大使转变为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联邦，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意味着双方不仅是相互友好国家，还在此基础上升级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4年之前，中俄两国在军事关系、军事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很少，甚至在有些方面根本没有起步。自1994年以后，双方关系在各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首先，1995年的中俄边界谈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在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后，有幸以边界谈判代表团中方团长的角色，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边界谈判工作由若干个工作组共同进行，其中就包括“外交与军事工作组”。在该工作组的努力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就边境地区^①加强军事领域信任达成一致，五国副外长草签了协定文本。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除世界范围的纪念外，俄罗斯举行了伟大卫国战争的纪念活动，江泽民主席应邀出席了此次活动。虽然中俄双方都十分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但此前沟通较少。西方常常贬低、甚至歪曲苏联在二战时期的贡献；而中国坚持尊重历史的原则，肯定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苏联牺牲了两千多万鲜活的生命，以沉重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处于“蜜月”阶段。即使西方数度未兑现援助，并在一些经济会议上刻意冷待俄罗斯，俄罗斯依然对西方抱有幻想，一些俄罗

^① 该边境地区原为中苏边界，苏联解体后，变成了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边界。原中苏边界长度7500多公里，后变为中国与俄罗斯边界约4000公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约1500公里，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界约1000公里，中国与塔吉克斯坦边界约1000公里。边界总长度依然约7500公里，但谈判对象由一国变成了四国。

斯官员忽视与中国的关系，甚至在此次纪念活动中未等江主席发表讲话就收起了麦克风。叶利钦总统亲命工作人员重新放置麦克风，请江主席像克林顿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一样发表了讲话。中俄两国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动。江泽民主席在此次访问中向叶利钦总统提出访华邀请，叶利钦表示下半年成行。9 月，我陪同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正式访问俄罗斯，与俄方商定了叶利钦总统访华时拟发表的《联合声明》文本。

叶利钦总统因健康问题使原定 1995 年下半年的访华计划推迟到 1996 年上半年。1995 年 11 月 23 日，俄罗斯总统特使、外交部副部长潘诺夫访华，与我方就南斯拉夫问题以及中俄两国领导人互访规划进行了磋商。其间，潘诺夫对叶利钦的健康状况与推迟访华的原因作了解释。南斯拉夫问题是当时联合国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西方一些国家^①在苏联解体后主张肢解南斯拉夫，而中国和俄罗斯所持立场与观点相近，即，维护南斯拉夫的主权与独立。俄罗斯关注南斯拉夫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同为斯拉夫民族，又有相似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该地区处于巴尔干半岛，占据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存在分歧，希望与中方达成一致，并获得中国的支持，这也是 1996 年叶利钦访华的重要背景。

二、中俄关系稳步发展

1996、1997、2001 这三个年份对中俄关系发展而言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意义。1996 年，两国政府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决心发展“面向 21 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 年，两国政府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升级。2001 年，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彻底摒弃了非结盟即对抗的冷战思维，体现了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

在这里，我要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主要的中俄外交官作一点简要介绍，这有助于我们在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工作中查找相关言论和

① 当时的德国某外长曾积极主张南斯拉夫分裂。

文献。1993年夏，我奉调从哈萨克斯坦回国，担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1995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对俄罗斯、中东欧和中亚事务及政策研究司、新闻司等工作。当时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对华关系的副部长为潘诺夫和卡拉辛，第一亚洲局局长为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驻华大使是罗高寿（伊格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等。中国在不同时期负责对苏/俄关系的，有国务委员戴秉国以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田曾佩等。他们都是中俄关系的专家，有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一起工作。他们曾在国家关系对抗时相互抗议、争吵，随着国家关系温度的变化，两国外交官也成了好朋友。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为中俄关系发展献计献策的重要力量。

（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年伊始，我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参加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与同来参会的俄罗斯副外长潘诺夫就接下来的叶利钦总统访华时间、日程安排以及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2月28日至29日，我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副外长潘诺夫再次磋商。4月2日，我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俄罗斯，在此期间，我与潘诺夫举行了单独磋商，双方商定了叶利钦总统的访华日程（拟定于1996年4月24日至26日），以及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的安排。作为这两项重大国际活动的东道国，中国做了许多努力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尤其是边境协定的签署，不仅无先例可循，又关涉地区安全等重大问题。叶利钦总统访华与边境协定这一历史性文件的签署，都是中方高度关注的重大事件。

中方曾考虑在叶利钦总统访华时两国领导人率先签署协议，然后派特使递送其他三国，但这容易造成大国决定、小国照办的不良印象。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国家，经济相对落后、长期对外封闭^①，这使得他们对国家尊

^① 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驻苏联工作期间去过现在的中亚五国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这里甚至见不到外国人，民族情绪重，十分封闭。

严尤为敏感。中亚五国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原苏联外交部的干部。边境协定签署过程中的国家平等问题，是我国外交人员必须敏感而重视的政治问题。大国决定、小国照办，会使协定签署的利好大打折扣，不利于国家关系的平等、平衡发展。最终，我们商定的方案是：叶利钦总统访问中国的相关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结束后，4月25日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分别飞往上海；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这一历史性文件。《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的签署过程十分顺利，开启了通向区域合作的新征程，也使上海成为一个以我国城市命名的新型国际组织的发祥地。

而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前日，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正是在这一事件中诞生了如今我们熟识的中俄两国“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原本。1996年4月23日上午，我接到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罗高寿的来电，他向我转达了叶利钦总统关于《联合声明》的重要修改意见，并传来了相关方案。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翻译工作，经过专家反复推敲才最后确定了译文，即“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就是现在新闻报道中常常提到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原本。至此，中俄关系不仅仅是坚实的合作关系，已经上升为跨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对于1996年的中国而言，对于冷战后不与任何国家建立战略、结盟关系的中国而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是一个新的外交概念，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决定。这个重大决定从表面上看是对一次突发外交事件的积极回应，实际上该事件也有其历史必然性。2001年，我出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其间拜访了俄罗斯工商会主席普里马科夫，证实了外界关于普里马科夫提议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传言。普里马科夫对我说，该提议是他提出的，得到了叶利钦总统的首肯。苏联解体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

代上半期，俄罗斯在许多外交场合没有得到欧美的平等相待^①，因此，“平等、信任”是俄罗斯最关心的外交实践关键词。据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阿法纳西耶夫回忆，1996年4月23日，叶利钦总统一行乘专机从莫斯科前往哈巴罗夫斯克，时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的潘诺夫和第一亚洲局局长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哈巴罗夫斯克接机。总统一行一下飞机，时任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就让他们尽快联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与中方商谈修改《中俄联合声明》文稿事宜。4月24日，叶利钦总统的专机从哈巴罗夫斯克飞抵北京，总统一行透过舷窗看到了罗高寿高高举起的文件，便明白他已与中方协同修改了声明，十分高兴。我的理解，“平等、信任”是俄罗斯基于它与西方关系的实践而发出的强烈诉求。“面向21世纪”和“战略协作”是俄罗斯提议中另外两个重要的关键议题。首先，1996年是接近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年头，世界各国都在为自身在21世纪的新定位忙碌着，中俄关系也需要“面向21世纪”。实践证明，当时提出“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有远见的，当我们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基点上回望历史，依然可以感受到其强大的生命力。另外，俄方当时提出的“战略协作”而非“战略合作”，为双方国家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二）《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

1996年，中俄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大大加深了双方对世界形势的理解与共识。1997年的中俄关系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定位的基础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联邦，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该文件直到现在依然具有指导和启示意义。1997年4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克里姆林宫同俄、哈、吉、塔四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五国的第二个协定——《关

^① 1996年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任命普里马科夫为俄联邦外交部长。就任后的普里马科夫反对北约东扩，谴责西方背弃了在解决德国统一问题时在苏联从德国撤军问题上作出的承诺。在一次与美国国务卿会谈的过程中，美国国务卿态度傲慢，教训俄罗斯要学会与刺猬共眠。俄罗斯已经感觉到北约及一些西方大国不再把俄罗斯当作伙伴，在战略上不断挤压俄罗斯的空间，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略安全。

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1997年的《中俄联合声明》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两国学术界和外交界依然存在争议的世界多极化趋势，阐述了中俄两国关于冷战后一系列国际问题的一致立场。该声明提出了当时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再是美国从克林顿时期一直强烈推行的单极世界，不再是美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所宣布的历史终结的状态，不再是世界建立统一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由世界制度、美国独霸世界的情势，而是迅速发展的多极化进程。江泽民主席访俄结束后，中俄两国副外长分别发表文章，我的文章是《共筑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主要内容是解读1997年《中俄联合声明》所阐述的冷战后中俄两国对世界格局变化的看法和主张；明确表示两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平等对话；主张各国拥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武装干涉，主张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建立公正、合理、民主化的国际新秩序。时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的卡拉辛也高度评价了《中俄联合声明》，认为这是冷战后世界上第一份站在如此高度上观察国际形势的文件。世界各国对于中俄关于世界格局的看法广泛地予以评论。

1997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不仅对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友好伙伴关系有重要意义，也对21世纪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影响。中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两国对几十年来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发展特点重新把握，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不结盟、不对抗的国家关系。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经验建构新的国际秩序无疑是更加深刻、更加进步的认识。卡拉辛强调：“两国关系已经清除了过去的积垢，对于未来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尽管仍然有人不时地企图把俄中接近描绘成某种长期的反西方、反美国的同盟。但严肃的分析家否定俄中两大国结成战略同盟的可能性，因为这将危及他们同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现行架构，而这种关系对两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和俄罗斯不结盟、不对抗的新型伙伴关系，一方面可以防止结盟可能给中国、俄罗斯同美国和西方关系带来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世界多极化潮流。这不仅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对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有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2011年，中俄两国决定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双方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增加了“四个相互坚定支持”：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振兴；坚定支持对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俄两国希望对方发展，不把对方的发展当成威胁，而是视为机遇。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升级，这是基于1996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本质定位发展起来的。这进一步说明，1996年和1997年的两个《中俄联合声明》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对这段中俄关系史的回顾，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俄关系的理解。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背景和意义，对于未来中俄国家关系的发展有指导作用，对于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也有积极意义。

三、中俄关系研究中的综合性思维

目前，我国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国际关系问题十分关注。有观点指出，俄罗斯这样的大国GDP总量仅相当于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认为这是制约中俄经济合作的原因。而按照我个人的观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作为一个大国它有很多优势，观察一个国家的前景不仅要考察企业、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国家治理能力、管理能力、发展路线，还要运用综合性思维来判断它的发展前景，包括俄罗斯自身的发展现状、发展战略以及它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纯进行GDP的比较是不专业的，更是片面的。

（一）俄罗斯的GDP与资源储量

将俄罗斯和广东省的GDP相比较仅仅能够证明经济发展是俄罗斯的短板，但是GDP不能诠释俄罗斯的发展轨迹，更不能代表俄罗斯的总体实力。例如，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淡水和森林资源中蕴含的国家实力并没有统计在GDP中。但这些资源却是国家实力。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本身就是资源。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与广东GDP的比较毫无意义。另外，俄罗斯的奶制品、肉制品很丰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间接

促进了俄罗斯的食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俄罗斯也是世界上优质耕地资源最多的国家，现在的粮食产量达到了 1.3 亿吨，人均约 1 吨，相当于苏联时期的最高产量。

俄罗斯经济存在短板，这是由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能源和资源这样的结构导致的。但俄罗斯的经济不至于衰退，而是呈缓慢增长态势。俄罗斯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开始重视经济发展。

（二）俄美关系

目前，俄美关系几乎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外交官遭到驱逐，军事条约被废除……美国通过退出一系列条约和部署反导系统的方式企图在战略威慑方面占据制高点，获得优势。俄美之间缺少军事、政治领域的互信，经贸关系几乎为零，对话以隔空喊话居多，缺少坦率沟通。在历史上，美国对于俄罗斯的认识就是有成见的。美国视野中的俄罗斯民族往往与侵略、扩张、不民主、专制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苏联时期，美苏争霸加剧了两国的仇恨心理；长期以来，美国把俄罗斯当作它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置于首位。近几年，美国把它的战略竞争对手调整为俄罗斯和中国，尤其是 2019 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位的竞争对手。美国希望俄罗斯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中站队美国，虽然未来的发展动向难以预测，但是中国乐见俄美关系的改善，并且不认为俄美关系紧张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对中俄关系有坚定的信心。历史上的中国没有过侵略扩张，例如郑和下西洋，不仅没有霸占别国领土，还传递了和平的信息。向往和平也是当代中国的愿望，而世界对中国温和、中肯的评价既是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肯定，也是对中国在世界和平事业中所做贡献的肯定。

俄美关系紧张的原因除了民族历史和民族性格方面的差异外，还包括两国对“多极化”认识的差异。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希望俄罗斯作为西方的一员，完全听命于西方。而对于俄罗斯而言，民族性决定了绝不能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2019 年年初，苏尔科夫（В.Ю. Сурков）写作了一篇题为“长久的普京之国”的文章^①，他认为，普京的治国理念会长久地存续下去，并明

^①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确指出，“俄罗斯民族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会充当跑龙套的角色”。这意味着在世界舞台中央表演——参与世界历史的书写——是俄罗斯民族始终不会放弃的使命。然而，这恰恰为美国所反对。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以及支持叙利亚、伊朗的行为，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多极化”问题的深刻认识。而美国认为，俄罗斯的上述行为是在挑战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俄美互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现状，以及两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三）俄欧关系

俄欧关系目前也相对僵化，但与俄美关系不同，至少俄罗斯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关系还是有些亮点的。例如，俄罗斯和欧洲的合作项目“北溪2号”，整个欧洲对此持积极态度。但美国持反对态度，并向欧洲施压，这成为美德关系的重要分歧。

另外，在防务费方面，美国希望欧洲每个国家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致使欧洲承担的防务义务增多。美国和欧洲在防务问题上的分歧造成了双方的信任裂痕。每个国家在表达国家意愿或采取国家行动时都必然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有合作的契机，这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矛盾；欧洲的奥地利、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同俄罗斯关系良好，但受欧洲整体制裁的约束。因此，在欧洲内部，国家间也存在分歧。以上这些矛盾与分歧将影响俄罗斯的国际关系，但同时也会为俄罗斯提供机遇。

（四）俄乌关系

俄乌关系目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首先，克里米亚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乌克兰看到了该问题的解决难度，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克里米亚问题又是乌克兰不能放弃解决的问题。其次，乌克兰会逐渐意识到，继续与俄罗斯对峙会使自己成为东西方冲突的牺牲品。西方不会为乌克兰发动对俄战争，对乌克兰的援助也会逐渐减少。乌克兰要寻找出路，仔细思考俄乌关系是必要的。乌克兰新总统就职后，有观点认为俄乌关系存在缓和的机会。尤其是西方既没有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支持和援助，也没有满足过俄罗斯的愿望，甚至激烈反俄。但俄乌之间的克里米亚问题始终是短期内难以

解决的问题，使得俄乌关系好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双方均有缓和的意愿，采取什么方式还有待商榷。

（五）俄罗斯北极问题

相对于芬兰、丹麦、挪威等国而言，俄罗斯的国家实力更强，因此在北极投入相对更大，致力于开辟北极航线。另外，俄罗斯凭借自己拥有的强大破冰能力，已经在北极建立了基地。美国和加拿大对此有所担忧，但难以遏制。俄罗斯是北极领土最多的国家，许多北极地区的海上通道均属其领海，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俄罗斯提供了开发北极、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平台。俄罗斯必然会向北极地区倾注更多精力，投入更多的力量。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开辟航线符合我们的“一带一路”理念。如果北极通航，运输距离将大大缩短，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另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问题也必然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问题。

目前，中美贸易磋商进入了关键的阶段，俄罗斯又受到了西方的严厉制裁，中、美、俄三国关系的发展受到了广泛关注。我们回顾中俄关系发展史，研究中俄关系发展史，有助于树立对中俄关系的认识 and 信心。在中俄建交 70 周年之际，我们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保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并坚定不移地深化这种友好关系。无论中俄与美国、西方关系如何发展，我们都对中俄关系自身的发展逻辑抱有充分的认识 and 信心。

【Abstract】 Review an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our confidence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uch issues as ideology and social system have not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Led by leader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has entered a new era. Both countries abandoned the Cold War mentality of non-alignment, embodying a new type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based on mutual trust for security and mutual benefits for cooperation, which not onl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of thes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has irreplaceabl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 new world order and for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s well.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e remain more optimistic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and will unswervingly deepen this high-level strateg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a New Type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 Аннотация 】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и изучая историю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только укрепляем веру в данные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времён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акие вопросы, как идеолог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не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Благодаря содействию лидеров двух стран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тупили в новую эру. Обе страны отказались от менталитета не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времё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оплотив собой новый тип стремящихся к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основе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на основе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что отвеч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интересам кита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но и оказывает незаменимое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овый тип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нов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По случаю 70-й годовщины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мы сохраняем ещё более оптимистич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развитию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неуклонно углубляем э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артнёр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овая эр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овый тип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责任编辑 崔珩)

亲历中苏边界谈判

鲁桂成*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边界问题一直是困扰中俄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导致两国兵戎相见。从苏联时期到新世纪初期，历时三十余年、经过三轮折冲樽俎，中俄两国终于完成了边界谈判，从而为新世纪以来中俄关系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苏边境冲突 中俄边界谈判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4-0016(14)

中俄建交 70 年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走过了别样的风雨历程。边界问题，复杂而敏感，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隐患甚至导火索。三次边界谈判，几代外交人的付出，使百年难题最终获得解决。笔者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四十余年，有幸研究并部分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希望通过本文介绍亲历边界谈判的所见所闻。

边界谈判的艰苦准备

1975 年 2 月，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分配到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当时中苏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领导通知我过几天作为“观察员”参加谈判。刚参加工作就能够参加国家级的外交谈判，我真的有些兴奋。我花第一个月的部分工资买了一双很讲究的皮鞋，并从外交

* 鲁桂成，原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历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驻白俄罗斯大使。

部公家仓库借了一套西服，穿在身上，照照镜子，心里美滋滋的。

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外交部宾馆举行。会场设在一个大厅里，大厅内放置了一张很长的条桌，桌上铺着墨绿色天鹅绒台布。条桌中央摆放着中苏两国国旗，双方谈判人员分坐两边。

谈判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中间安排了两次茶歇。休息时，双方人员可喝茶、品咖啡、吃点心，自由交谈。谈判中，双方团长发言都很长，老同志们个个聚精会神地听，认认真真地记，会场非常肃静。当时的我很茫然，因为大部分内容听不懂。一是俄语不行，一听就懵了。二是发言中说的事不明白，有一些地名根本不知道。一坐几个小时，挺不是滋味的。第一次参加外事谈判，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次下马威，是一个打击，在大学里的那一点自信一下子便荡然无存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看来，要适应工作，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谈判，主要是干些“打酱油”的活，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有关中苏边界业务的学习和研究上。

起初我学习中苏边界的沿革历史，阅读大量史书与资料。首先是边界条约，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开始，到1915年《沿霍尔果斯河划界议定书》，一共24个。其中涉及中段，即现在的苏蒙边界，有4个：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1727年《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1727年《中俄色楞额界约》和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涉及东段的，除《尼布楚条约》外，还有6个：1858年《中俄璦琿条约》、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1886年《中俄琿春东界约》及其附件——《中俄查勘两国交界六段道路记》和1911年《中俄满洲里界约》。涉及西段的条约有13个：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中俄科布多界约》、1869年《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1870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82年《中俄伊犁界约》、1882年《中俄喀什噶尔界约》、1883年《中俄科塔界约》、1883年《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1883年《中俄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1883年《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和1915年《中俄沿霍尔果斯河划界议定书》。

上述这些界约有不同版本，有中文本，有俄文本，中文本还分满文本与

汉文本，有的条约还有拉丁文本。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不同版本的表述还有差异。这些差异在研究边界线时一定要加以注意。同一个地段，先后有多个条约规定，这些条约有的是前后约关系，有的是母子约关系，它们的规定有时是矛盾的，这就要按照“后约大于前约，母约优于子约”的原则确定边界走向。24个界约中，14个界约有附图，10个没有附图，有的界约文字与附图关于边界线走向的规定不一致，这在谈判中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除了条约外，还有许多参考书籍也是需要认真阅读的。比如，签约人当时的奏折和回忆录，有关边界问题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实践，中外历史地图，当代人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研究成果等等。有人说，工作忙起来很苦。其实，学习也很苦，是另一种苦。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天天看这些带有灰尘的书籍和地图，感到非常枯燥，非常单调，非常烦恼。一坐就是八年，没有出国，没有晋升，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受煎熬的。说实话，我思想上也曾动摇过，并向领导表达想离开外交部去读研究生的想法。外交部的一位领导知道我的思想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中苏边界问题是一个没有封口的课题，它对于两国关系意义重大，但是目前真正全面透彻地了解中苏边界问题的人凤毛麟角。外交部把你招进来，是想把你培养成专家，将来参加解决边界问题，为国效力，从而也实现自己的价值。外交部有丰富的资料，身边又有熟悉边界问题的老同志，这是多么不可多得的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把我说服了，我放弃了读研究生的念头，继续啃那些沾满灰尘的老古董去了。

学习边界历史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熟悉边界地理。中苏边界全长7600多公里，边界线经过的界河、界山、界碑都要求记住，新疆边界上的一些地名很多是少数民族语言，很难记，而且名称很长，背下来真不容易。东段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600多个岛屿也需要记住，不但要记中文名，还要记俄文名，不仅要记岛名，还要熟悉其所在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恰好部里组织边界考察，领导让我也参加，希望通过实地考察加强对边界的熟悉与理解。我们的边界考察从东段开始，主要是考察界河及河中岛屿。我们包了一条船，从兴凯湖出发，顺乌苏里江而下，途经抚远水道，再逆黑龙江而上。一路上吃在船上，住在船上，工作在船上。每

天围着岛子转，有时还上岛看看。珍宝岛上发生过严重的武装冲突，我们决定上去考察一番。当地人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当时的斗争过程，并告诉我们，珍宝岛仍然属于争议地区，但自从那次冲突后，苏方再也没有来了。考察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了不少关于在界河中维护我边民生产生活利益的有趣故事。工作一天后，晚上我们年轻人就下江撒网捕鱼。界江里鱼真多，网网满满当当，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月色中，站在轮船甲板上，望着滔滔江水，眼前浮现出当年沙俄驱赶、枪杀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的悲惨情景。

第二年，我们考察西段边界，即新疆与苏联的边界。新疆是我国西部的宝贵领土。早就听人说，不到新疆就不知道祖国多么辽阔。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先去北疆，开车行驶在广袤的戈壁滩上。一路上景色没有任何变化，有时开几个小时看不见一栋房子，遇不到一个人，甚至看不见一只鸟，一棵草木，也没有路，任你横冲直撞。进入边境地区后，路况就坏起来了。一会儿是搓板路，就是一道一道沟，把我们头上颠得大包小包。一会儿是洋灰路，尘土飞扬，我们出车后脸上都是灰，谁也不认识谁。后来路上全部是沙子，车开不动了，我们只好下车，脚踏进很深的沙子里，走路都很困难，还要推车。现在新疆边境地区的路非常好了，但当时条件真是差啊，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我们累得不行，好不容易到达边防站，身子一下子瘫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上山考察。鉴于当时中苏正处于敌对状态，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换上了军装，骑上马，装模作样巡逻起来。我们一行多数人以前都未骑过马，上马后出尽洋相，有的还摔了跤，最后大家都还是骑着马回营了。新疆边境地区人烟稀少，一路上没有地方吃饭，我们只好自带饮水和干粮，天天饥一顿饱一顿。这时我才感到，干边界这项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我第一次到新疆，对那里的水土有些不适应。有一天我得了急性胃肠炎，又吐又拉，发起烧来，同事把我送到当地医院。医院条件不好，设备十分简陋，护士技术很差，给我扎静脉针就像纳鞋底一样，一连三次都未扎进去，最后还是医生扎进去的。我住的医院就在县镇上，这个县镇规模很小，看上去还不如内地一个乡镇。街面破破烂烂，商店货物稀少。听当地人讲，这里常被苏联边境学校作为反面教材对学生进行教育。我问大夫，县里为什么不好好建设一下呢？大夫说，建什么？反正边界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打起来，建了也

白搭。看来，边界问题不解决，耽误很多事。心里真理解和同情边民。我在医院住了三天，拉肚子止住了，烧降下来了，我立马让当地司机送我追上同事们，继续进行考察。

东北和新疆两次边界考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7600 多公里的边界上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实地看到了什么是界山、界河和界碑，学到了不少边界知识，加深了对边界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为我后来参加边界谈判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一次边界谈判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苏友好结盟，亲如一家，不分彼此，根本没有边界意识。到六十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边界就不平静了，双方三天两头在边界上掐。最有名的一次是 1960 年夏天的博孜艾格尔山口事件。那一天，中国牧民像往常一样去那个地区放羊，突然来了几个苏联边防士兵，说他们越界了，进入苏联领土了。中国牧民说，我们历来就在这里放牧，我们祖坟都埋在这里，怎么越界呀？怎么是苏联领土呢？苏联边防士兵不听，赶他们走。他们不走，苏联士兵就驱赶、捆绑，甚至殴打他们。他们就报告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报告北京，北京就向苏方提出交涉。而苏方则反过来抗议中国边民越界侵犯苏联领土。这样，边界问题就提到两国国家层面上来，并成为中苏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中苏边界全线都有条约规定，明确的边界线在哪里呢？当时建国时间不长，百废待兴，加上两国关系好，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去关心研究这个问题。有鉴于此，根据中央指示，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简称“边办”，负责研究边界问题并准备与苏方进行谈判。

边办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启动的。首先没有资料。边办的同志们跑遍了全国各大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北京、上海、南京、哈尔滨等城市各大图书馆的史籍及大量中外图书，还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在当地购买了一批外文资料和地图。另一方面，他们分组奔赴边界地区访问边民，实地踏勘。当时边境地区条件十分艰苦，他们风餐露宿，经常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有时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边办的同志们以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中苏边界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完整系统的梳理，并做了深入分析和研究，编辑了大量材料，绘制了大比例尺的地形图，提出了我们对边界线走向的主张，并编写了每一块争议地区属于中国的论据。这些为以后的边界谈判，争回属于我们的领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经双方商定，1964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方代表团团长是边防军司令泽里亚诺夫上将。双方还有多位顾问和专家。

这次我们确定的谈判方针是：第一，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与当前边界有关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这是历史事实，这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伤痛。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对子孙有一个交代：不要忘记这段屈辱史，不要忘记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和启迪，这就是落后就会受欺负。

第二，为照顾现实情况，不要求收回过去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确定边界线走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呢？我们认真研究过苏联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态度。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先后于1924年和1926年向他们提出过关于废除不平等边界条约的意见，他们坚决不同意。俄罗斯人是在领土问题十分敏感的民族，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它得到的领土让他吐出来，那是难上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私下打探过，能不能把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归还给中国，被他们一口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宣布不承认这些条约，那就意味着中苏之间不存在法律边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就没有约束，就会爆发战争。战争的结局总是弱者吃亏，失败者再次割地赔款。从当时中苏双方实力对比看，我们不可能做出这样不明智的选择。另外，通行的国际法也规定，一国政体改变或政府更迭，可以废除前朝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但边界条约除外。边界条约必须继承，否则天下大乱，世界永无宁日。

第三，沙俄和苏联违背有关条约、占去和划去的领土，要无条件归还中国；由于条约规定不清楚或者矛盾而造成的争议地区，双方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解决。这一条是双方举行边界谈判要解决的问题。如果

我们不解决当时苏方控制的这些争议地区问题，对方就会继续控制下去，我们继续吃亏。如果不解决上述争议问题，这些问题就会成为定时炸弹，随时引起边境武装冲突。1969年珍宝岛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以上就是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有关背景。应该说，中方对中苏边界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是极其宽宏大度、无可挑剔的。没有想到的是，苏方在谈判一开始就全盘拒绝了。苏方不承认与目前边界有关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方认为，历史上沙皇俄国与中国并不接壤，两者之间是无主土地。后来双方相向扩张，彼此靠近，最后形成了边界，然后两国用条约把这条边界线固定下来。说不上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两国之间从未有过任何不平等条约。

对于边界历史，中方本来是点到为止，挂账而不想算账。而苏方一上来就矢口否认历史事实，一下子把中国人的满腔怒火点燃了。中方开始撰写大批判稿，在全体会议上，中方团长引经据典地阐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原本是中国的，这是有1689年尼布楚条约作为依据的。中方团长指出，中国的西部疆界原来在巴尔喀什湖。这不仅有大量中国官方文件的记载为证，就连沙皇俄国和苏联的许多著作以及历史地图也都是确认了的。接着列举了一大串具体的书籍和地图，有的被摆到了谈判桌上。

中方团长用大量的篇幅揭露沙皇俄国利用十八世纪中国内忧外患的困难局面，落井下石，偷偷摸摸侵占1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然后不择手段地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罪行。为强化批判稿的分量，中方还指出：1858年马克思在评论《中俄璦琿条约》时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同年，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应该讲，当年中方代表团的秀才们撰写的发言稿是相当有水平的，材料翔实，逻辑缜密，文字漂亮，朗朗上口。后来我阅读这些记录时心情都还蛮振奋，感到很痛快，很解气。

苏联人不是吃素的，对中国人的大批判，他们也作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驳，还提出了一些荒谬的观点，说什么明朝的长城、清朝的“柳条边”，就是当

时中国的边界，认为 1689 年《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的，等等。

这次谈判双方共举行了 8 次全体会议，10 余次团长会议，30 多次顾问专家会议。这次谈判虽然没有签订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但双方提交了地图，标明了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并就各自主张的边界线交换了意见，没有展开讨论，但起到了摸底的作用。

第二次边界谈判

第二次边界谈判是在中苏两国处于严重对抗的背景下举行的，起因是珍宝岛事件。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中的一个小岛，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岛的形状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元宝，所以中国人取名为珍宝岛，苏联人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岛不大，但也是领土。双方对它的归属有争议，苏方说是苏联的，中方说是中国的。双方边防军都上岛巡逻，互不相让，经常发生冲突。1969 年 3 月 2 日，双方都有备而上，见面就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对方边防哨长“瘸腿”上尉被打死。苏方吃了亏，决心寻机报复。3 月 15 日，苏方出动众多武装人员，由一名上校军官指挥，气势汹汹，乘坐坦克和装甲车向珍宝岛开过来。那天，中方事先就做好了埋伏，稳、准、狠地打退了对方的进攻，击毙了苏方最高指挥官，缴获了一辆当时最新式的坦克。这辆坦克现在还放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

这次珍宝岛流血事件之后，苏联紧急调兵遣将，在边界上陈兵百万，并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中方积极备战，严阵以待。一时间，边界上狼烟滚滚，战云密布，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

当时，苏联图谋称霸世界，主要对手是美西方，现在与东邻中国闹到如此程度，恐怕也是其没有想到的。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乃兵家大忌。刚好 1969 年 9 月 2 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主席逝世，苏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会见中国领导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9 月 1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贵宾室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见。会谈持续了 3 个多小时，达成以下共识：第一，双方同意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第二，双方同意举行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第三，双方

同意边界问题解决之前，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第二次边界谈判 10 月 20 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和余湛。余湛 1921 年出生，湖北省英山县人，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善于提出问题，喜欢即席讲话。苏方代表团团长先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后改为伊利切夫副外长。伊在赫鲁晓夫时期曾出任苏共中央书记，身份很高，勃列日涅夫时期被降职使用。伊是哲学博士，能说会道，出口成章，被称为谈判高手。

由于当时两国处在敌对状态，这次谈判气氛非常紧张。双方态度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用语十分尖刻。“抗议”一词频繁搬到谈判桌上来。谈判一开始，双方对落实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就吵得一塌糊涂。苏方甚至不承认有什么两国总理谅解。在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双方立场南辕北辙。

第一，要不要签订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中方指出，中苏边界上有些地区的归属双方有争议，双方武装力量都进入巡逻，双方巡逻线甚至犬牙交错。同时，在这些地区，还有居民活动。这种状况容易引起边界冲突。因此，中方建议，双方边民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还在那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但双方武装力量不进入有争议的地区，原驻在这些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原则上全部撤出，避免武装冲突。上述措施不影响双方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对此，苏方坚决反对。因为绝大部分有争议的地区都在苏方控制之下。苏方声称中方建议是为谈判设置先决条件，是要在边界走向问题解决之前就改变现存边界线，是要苏方单方面从自己国土上撤出军队，把苏方置于不平等地位。苏方不同意，维持边界现状协议签不了。

第二，承不承认争议地区。中方提出，在中苏边界上有一些地区，由于条约规定比较笼统，有些规定相互矛盾，有些条约版本表述有差异，造成双方对具体边界线走向有不同看法，也就是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这就是争议地区。

1964 年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就是争议地区，我们谈判就是要解决这些争议地区领土的归属。对此，苏方坚决不同意。苏方指出，条约签订后，苏联（以前是俄国）边防军一直守卫着一条明确的边界线，双方从来未出现不同意见。近百年过去了，现在是

中方随便在地图上画出一些不同边界线，标注一块块所谓争议地区。苏联方面认为，不存在争议问题，这是中国单方面臆造出来的“发明”。这就像在生活中，你在城里有一套私宅，你爷爷住过了留给你爸住，你爸住过了留给了你住，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敲门，告诉你这是他的房子，让你承认有争议，强迫你搬出去，你干吗？对这种奇谈怪论，中方当然又进行了一番批驳。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谈判进入死胡同。

在这里，我还向大家介绍一点谈判的花絮。有一次，苏方团长说中方发言中对苏方立场的评论是“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向对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说苏方才是精神病。苏方团长感到莫名其妙，表示坚决不接受中方的抗议。双方大吵起来。后来发现是翻译出了问题，把“过度反应”翻成了“病态反应”，一场误会才消除了。

还有一次，伊利切夫团长发言，余湛团长笑了一下，伊就不干了，很不高兴地说：“余湛同志，我发言，你笑什么？这很不礼貌！”余说：“我笑你听不懂道理。一个简单道理，中方讲了好几遍，今天你又提出来了，总是听不懂。”伊睁大眼睛，大声吼道：“余湛，当你还是小孩时，我就懂很多道理了。”余湛也不示弱，蔑视地说：“你不要倚老卖老！有人越老越聪明，有人越老越糊涂。”那天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第二次谈判历时8年，一共举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156次。由于双方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甚至压根就没有讨论边界线走向。但这次谈判开始以后，两国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下来。两国贸易额增加了，边界上比以前平静多了。偶尔发生摩擦，马上提到谈判桌上来，很快得到了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讲，谈判本身就有意义。

我参加了1975年2月至1978年6月的边界谈判，虽然是“观摩”性质，但仍然学到了不少东西。

第三次边界谈判

1987年，我在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一天，领导告诉我，外

交部通知，调我回国另有任用。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服从是天职。我马上订好机票，收拾好行李，很快回到北京。第二天向主管领导报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热烈欢迎边界问题专家回朝。”主管领导见到我先开了个玩笑，并示意我坐下，递上一杯水，然后告诉我，第三次边界谈判将于2月在莫斯科举行。他还向我介绍了有关背景情况。

这次谈判与前两次相比，有明显不同。双方都有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都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边界问题。从我们国家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周边环境。苏联是我国最大邻国，需要改善当前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国家关系，首先要解决边界问题，清除边界冲突的隐患。中央首长指出，改善中苏关系，不能着急，光我们有意愿不行，还要苏方有这个愿望，我们着急了，容易被对方利用。因此，我们就密切观察等待。

古人云，做大事，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时机是第一位的。我们等待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终于来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霸气十足的苏联国运不济，三届最高领导人短时间内连续去世。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逝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逝世，差不多一年走一个。这对苏联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及时安排“葬礼外交”，派高官赴莫斯科吊唁，规格一次比一次高。苏方呢，表现也不错，接待一次比一次热情，并多次明确地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最突出的一次是1986年7月28日苏联新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他宣布，苏方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黑龙江边界。过去苏方一直坚持黑龙江以中方岸边划界，江中岛屿全部都属于苏方。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中我方提出，黑龙江是通航河流，应按主航道划界，苏方表示可考虑，但未达成协议。这次苏方领导人公开确认这一立场，还是第一次，可以认为这是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明确信号。双方马上商量，举行第三次边界谈判。

对这次边界谈判，中方的方针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争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后来实践证明，中央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谈判在友好合作的气氛中顺利进行。首先，双方再次交换了地图。与1964年交换的地图相比，

这次西段地图的比例尺大多了。1964年版是50万分之一，这次换成了10万分之一。这样，地形、地貌、边界线都清楚多了。另外，我们对主张的边界线也做了一些小的调整，争议地区由原来的19块变成了25块。东段边界采用的64年版地图原本就是10万分之一，这次未变。

第二，双方同意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进行谈判，各自阐述对边界线的理解及理由，尊重和听取对方的主张及论据。这与前两次大批判、大吵架相比，确实“文明”多了。我发现，经过前两次较量，苏联人知道当今中国人不好惹，开始放下大国沙文主义架子，学会了平等待人。现在大家退休了，当年的对手成了好朋友，并成立了中俄老朋友俱乐部。这是后话。

第三，双方同意，凡是明显违背界约规定和国际法准则的地方，原则上无条件更改过来。苏方完全同意东段黑龙江、乌苏里江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界，并以此划分了除黑瞎子岛外的所有岛屿的领土归属。这样，中方收回了对方控制了几十年的部分争议岛屿（包括珍宝岛），面积为315平方公里。另外，在吉林省与苏方交界的一处山区，条约规定以山为界，但实际上界碑立在了山坡上。苏方同意更改，将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给中国。

第四，双方同意，根据“互谅互让”的精神解决那些因条约规定笼统或相互矛盾的争议地区。比如，西段边界上有不少地方是以非通航河流为界，而每条河都有两条以上河源，但条约只笼统规定以河为界，并未指明哪条河源为界。这样，双方从本国利益出发，将位于对方的那条河源划为边界，形成争议地区。怎么办？中俄需要互谅互让，或将一块争议地区大体平分，或将两块争议性质相同、面积又差不多的地区进行对等交换。这样，不少争议地区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第五，双方同意，采取先易后难、分期签约的办法履行法律手续。谈判前几个回合，双方选择那些面积较小、情况简单的争议地区进行沟通，反复交换方案，最终取得一致意见，并在工作层面上草签有关协议，然后提交两国政府代表签字。于是，第一批边界协定问世了——1991年5月16日签订《中俄国界东段协定》，1994年9月3日签订《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4年4月26日签订《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国界协定》，1996年7月4日签订《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国界协定》，1999年8月13日签订《中国同塔吉克斯坦

国界协定》。

第六，领导人政治决断，推动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之间的第一批国界协定签订后，还剩下 8 块争议地区：中俄之间是黑瞎子岛与阿巴该图岛，中哈之间是察汗鄂博地区与夏尔希里地区，中吉之间是乌宗图什河河源地区，中塔之间是喀拉杂克山口地区、乌赤别克山口地区和帕米尔地区。上述地区面积较大，情况复杂，解决起来难度较大。双方代表团向各自政府做了汇报。我国领导人亲自先后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当面沟通，最后共同做出政治决断，同意既考虑历史因素，又注意现实情况，兼顾双方利益，彻底解决边界问题。

这里，我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黑瞎子岛问题。为什么叫黑瞎子岛呢？因为当地人经常看见黑瞎子（黑熊）在那里出没，故取此名。苏方称为大乌苏里岛和塔拉巴罗夫岛。该岛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冲击而成的三角洲，面积 335 平方公里。中俄双方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有争议。中方认为，该岛位于黑、乌两条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应属于中国；而苏方认为，1860 年北京条约附图红线明确把该岛划给了俄方，不存在争议。为此，双方多年谈判未果。1929 年苏联占领了该岛，此后该岛一直在苏方控制和管辖之下，那里没有中国人。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领导人和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就该岛归属问题交换意见，最后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大体平分黑瞎子岛，中方划得西部 171 平方公里，俄方划得东部 164 平方公里。2004 年 10 月 14 日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先后解决了剩余的争议地区归属，并签订了相应的国界协定。至此，第三次中苏（后来为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界谈判结束，漫长而复杂的边界问题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三次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始终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艰苦地从对方四国控制的争议地区挣回了约 4300 平方公里的领土。通过和平谈判取得这样巨大的成果，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少见的。

【Abstract】 The border issue has long been sensitive for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which has historically led to war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Soviet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three round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China and Russia finally completed border negotiation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since the new century.

【 Key Words 】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Sino-Russian Border Negotiation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 Аннотация 】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вопрос о границе был деликатным вопросом, препятствующим развитию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 истории приводившим к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С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до начала нового века, после более 30 лет и трёх раундов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наконец заверши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границе, тем самым заложив про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улуч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новом век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пограни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崔珩)

俄罗斯外交政策**普京的外交政策***

波波·罗**

【内容提要】2018年5月，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第四次连任俄罗斯总统，确立了其在后苏联时代的主导地位。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会得以延续。而在莫斯科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即，俄罗斯外交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功，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尽管俄罗斯信心十足，但仍时常表现出谨慎甚至焦虑。在国际环境日渐动荡和不可预测的背景下，普京认识到战术灵活性的重要性。普京还深知俄罗斯外交政策收益的脆弱性以及可逆的可能性，因为在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中，寻求成为规则制定者的俄罗斯面临诸多阻力。很显然，普京所展示的形象是复兴大国的铁腕人物、坚定的多边主义支持者，以及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解决者。一些时候，莫斯科显得相对乐于助人，而其他时候，它又表现出武断，甚至带有攻击性。但普京坚定不移地追求其核心目标：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权威；助力俄罗斯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国，没有俄罗斯，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安全。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 普京外交 俄罗斯内政 大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4-0030-(28)

* 本文原文系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Analysis)2018年9月17日的一份分析报告。感谢作者波波·罗以及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授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翻译并发表其研究成果；中文版本有所删节。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a Lowy Institute Analysis paper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17 September 2018,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e translation is that of the Center for Russia Studies at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is not attributable to the Lowy Institute or the author.

** 波波·罗(Bobo LO)，独立评论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非驻所研究员。

引言

2018年5月^①，普京再次连任总统，成为后苏联时代的领袖。在过去的18年里，他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权力和政策的代名词。如今，人们不仅谈论“普京体系”(the Putin System)或准意识形态特性的“普京主义”(Putinism)，而且谈论“普京的俄罗斯”——一个领导人与自己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许多观察人士预测，普京总统的现任期将是他的最后一届。普京要想在接下来的六年后继续执政，就只有修改宪法，或者重复“王车易位”(Рокировка)的策略。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这一策略让普京得以继续担任总理，而其助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担任总统。尽管以上两种状况皆有可能，但到2024年举行下届总统选举时，普京终究已满72岁。尽管普京声称放弃做终身总统^②，这可能是担心把自己与苏联解体前的老迈领导人进行有损形象的比较。然而，在一个几乎不知道如何进行权力自愿转移的国度里，放弃总统职位也是违反直觉的。^③

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以及外界对普京下台后谁将是继任者的大量猜测，二者之间的张力，在未来几年可能真正定义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普京的上一届总统任期已经引发了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化。2014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评价俄罗斯仅是一个地区强国，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表现了其软弱而非实力。^④不过，这种说法，特别在美国，已经被否定。而关于“新冷战”甚至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可能的军事对抗的讨论，

① 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投票率为67.54%，而普京获得其中选票的76.69%，赢得总统大选，TASS, 23 March 2018, <http://tass.com/politics/995729>. 毫无疑问，普京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但该政权一直担心，民众的冷漠可能导致投票率低。最终，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取选票”运动、工作单位施压、激励措施(比如在投票站提供免费食物)等导致了高投票率。

② “Vladimir Putin press conference”, 18 March 201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57085>

③ 虽然1999年12月鲍里斯·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但当时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病得很重，无法再行使权力。关键在于，与普京达成的继承协议还包括保证叶利钦及其家人和他们的财产不会被碰触，并得到普京的保证。

④ “Barack Obam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March 25,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QUzeZbLEs>

却越来越多。^①2017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初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确认俄罗斯连同中国一起成为美国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威胁。^②莫斯科的决策者谴责妖魔化俄罗斯，但却沉迷于这样一种认识：俄罗斯又返回世界舞台中央，一些人不喜欢它，但没人能够忽视它。

在这种背景下，普京面临关键的战略选择，即，是否还会坚持采取挑衅、有时甚至对抗的政策，使俄罗斯的形象升至后苏联时代的新高度，并增强其民意合法性？或者，是否会采取一种更宽容的态度，相信俄罗斯不再有被轻视的危险，从而试图减轻自己高风险行为的负面后果？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东西方双头鹰策略，或者是继续以西方为中心。一种可能的路线是，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心转向非西方国家，尤其是聚焦中国，但也会把重点放在印度、土耳其和所谓的大欧亚地区。更为雄心勃勃的是，已经走向全球的俄罗斯，可能会把自己定位为21世纪后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制定者。

本文分析认为，普京的外交政策将凸显战略上的坚定性和战术上的灵活性，并辅以一种相对自信感，尽管也有一定的谨慎甚至焦虑。这是基于对俄罗斯、西方和国际秩序的长期观察基础上的判断。诚然，俄罗斯存在一定问题，但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普京要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尊重和合法性，但他的本质目标将保持不变，所以，任何改变都只是风格上的，而不是变革性的。与普京以往的总统任期一样，无论是对国际事件、俄罗斯国内环境，还是对其他国家的行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制定都将奉行机会主义，且在战术上保持警惕性。

^① David Majumdar, “Stumbling into a War with Rus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6,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tumbling-war-russia-25089>. 著名记者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早在2008年就提出“新冷战”一词，但被批评夸大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最近，这个词变得更加普遍。

^②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断言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同样，美国国防战略声称，“美国繁荣与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是，重新出现修正主义国家的长期战略竞争。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希望塑造一个与其威权模式一致的世界”。<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一、普京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

未来几年，塑造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将有如下四个因素：普京对国家利益的个人解读、意识形态和身份观念、俄罗斯战略文化和对事件的即兴回应。

（一）普京利益

自沙皇时代以来，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以对国家利益的清晰认识为指导，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①然而，国家利益的概念本身就充满争议。首先，这些利益是什么？诸如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等这些根本目标几乎是抽象的，既可以无限延伸和拓展到几乎任何东西却又虚无缥缈。我们所谈论的到底是谁的利益？普京的？那些统治精英中的特殊群体的？还是俄罗斯人民的？

客观的民族甚或国家利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尤其在今天的俄罗斯更是如此。在普京主政的个性化威权体制中，他是国家利益构成的终极判定者。与自由民主国家不同，在俄罗斯，相互矛盾的解释要么受到压制，要么被边缘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京是受到无私和完美的国家利益愿景所激励的。与许多领导人一样，他的议程既有个人因素，也有政治和国家因素。

从乌克兰事件中可以看出普京利益与俄罗斯国家利益之间的区别。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以及随后对顿巴斯地区的军事干预，在很多方面都适得其反。莫斯科上述行动既疏远了基辅，又促使乌克兰进一步融入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②，并赋予北约新使命，也增加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依赖，还招致西方制裁，从而加剧了俄罗斯的经济困境。

① 普里马科夫被许多人视为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元老，曾说过“俄罗斯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in *Ministr, kotorogo ne rugaet oppozitsiya* [The Minister whom the Opposition Does Not Abuse], Interview in *Obshchaya Gazeta*, No.37, September 19-25, 1996, 4. 这是普里马科夫对 19 世纪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的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我们有责任维护这些利益。”）修改后的引用。“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Vol.97, Col.122, March 1, 1848,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48/mar/01/treaty-of-adrianople-charges-against#column_122

② 了解俄罗斯对莫斯科的乌克兰政策失败的冷静评估，可参见 Dmitri Trenin, “Russia and Ukraine: From Brothers to Neighbors”, Carnegie Moscow Center, March 21, 2018,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5847>

然而，从普京最看重的个人尊严和政治权威的标准来看，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行动传达出“强大的俄罗斯”这一信号是正确的。至关重要的是，普京成功地将个人利益与俄罗斯国家利益融合在了一起，以至于在许多人眼里，二者难以区分。而且俄罗斯公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俄罗斯政府的说法，即吞并克里米亚既是国家复兴的行动，也是对西方颠覆、乌克兰无法无天以及北约扩张威胁的必要回应。^①同样，克里姆林宫也是通过精心策划的鲜明说辞，来看待西方制裁：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嫉妒俄罗斯，并试图削弱它。真相和国家利益都出自普京的判断。以克里米亚为例，其他方面也一样，普京的信誉已经与俄罗斯密不可分，俄罗斯随后的“胜利”巩固了他在民众中的合法性。

显然，普京低估了西方对乌克兰事件的回应力度，以及大西洋两岸就制裁达成共识的韧性。然而，考虑到未来会有与2014年类似的情况发生，没有理由相信普京会有所改变。鉴于以往一系列事件的演变，也许其对德国和法国的蔑视姿态会有所降低，其行为也会更加谨慎。但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继续主要基于普京的利益，并以维持该政权的稳定为前提，这是所有其他目标必须追随的最高利益。只要普京还待在克里姆林宫，这种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高度个人化就会一直存在，而且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二）意识形态与身份观念

当今流行的说法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去意识形态化。苏联被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世界观价值体系之间史诗般的斗争所驱动，而“实用主义”成为莫斯科处理当今国际关系的特征。按照这种观点推理，要为意识形态入侵而承担罪责的话，那么，恰恰是西方的普世使命和道德傲慢破坏了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②

事实上，基于克里姆林宫对国家利益的清醒认知，这种认为俄罗斯外交

① 2018年3月，俄罗斯列瓦达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认为与克里米亚统一对于俄罗斯有很大帮助；只有15%的人认为，会对俄罗斯造成伤害，参见“Crimea”，Levada Center Press Release, April 17, 2018, <https://www.levada.ru/en/2018/04/17/crimea-2/>

② Sergei Karaganov, “The West’s Unilateral Cold War”,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20,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est-and-russiano-new-cold-war-by-sergei-karaganov-2018-03>

政策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然而，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组具有社会群体或个人特征的信仰”^①或“一组先天影响因素”^②，那么，普京对待国际政治的立场比大多数人更受意识形态的驱动。这也许不存在类似于苏联救世主义的宏大传教使命，而且除了作为突显西方的双重标准的工具以外，几乎没有多少俄罗斯人信仰普世准则和价值观。然而，与其说俄罗斯外交政策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不如说是重新意识形态化，其灵感来源也是相当具有选择性的。^③

普京的外交政策受到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信仰体系的影响，例如，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年至1855年)的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民族性的三位一体原则。^④这些概念在今天的俄罗斯几乎和在19世纪中期一样具有影响力。一些机构甚至称普京为“领袖”(Вождь，在现代俄语中主要用来指代共产主义领导人——译者注)，意指拥有非凡权力和权威的统治者。^⑤俄罗斯东正教比一个世纪前更为突出，它所宣扬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已经变得无处不在，尤其是，这些主张也体现在俄罗斯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声明中。在复兴的历史叙事、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众动员中所展现的民族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政治和文化现象。

有鉴于此，克里姆林宫对西方关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观念抱有极大的怀

① “Definition of ‘ideology’ i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ideology>

② 有关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的更全面的讨论，参见 Dmitri Trenin, Bobo Lo, *The Landscape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Moscow: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05, pp.14-16.

③ 参见 Marlene Laruelle, “The Kremlin’s Ideological Ecosystems: Equilibrium and Competition”,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493, November 2017, <http://www.ponars.org/memo/kremlins-ideological-ecosystemsequilibrium-and-competition>

④ Iver Neumann, *Russia and The Idea of Europ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25.

⑤ 俄罗斯媒体机构RT的主管玛格丽塔·西蒙尼扬把普京形容为“我们的Вождь”，这个术语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参见 Fred Weir, “With Russians Feeling Besieged, Some Give Putin a Loaded Title: Vozh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 2018,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8/0402/With-Russians-feelingbesieged-some-give-Putin-a-loaded-title-vozhd>. 我感谢约翰·贝塞梅勒斯提醒我关注西蒙尼扬(Simonyan)的评论。

疑，甚至将其视为生存威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反击。^①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冷战意识形态对抗已不复存在，而被一场新规范斗争取而代之，并发生在保守的民族主义与自由的国际主义之间。普京把自己定位为不仅是俄罗斯价值观，而且还是欧洲文明精髓的捍卫者。^②

普京标榜的保守民族主义，是基于俄罗斯特有的两个核心假设。一是俄罗斯的“特殊性”，这个术语意味着其独特性和与众不同。^③在外交政策的语境中，这可转化为俄罗斯坚定地相信自己不但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且拥有属于自己的文明，更是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它不能仅是规则的接受者，尤其是在其他大国，主要是美国对“普世”规则和标准采取一种例外主义立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普京坚信俄罗斯有资格与美国平起平坐。^④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从历史命运的视角看，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增长乏力，或者根据一些指标衡量，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排名很低，但这都不重要，它仍然是一个强国。俄罗斯人认为，衡量经济表现和技术成熟程度的标准，不及天然大国意识、历史传统、地理位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强大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能力，以及目标的独特性等因素重要。这些因素可能在“二十一世纪”里已经不具

① 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 (Andrei Kolesnikov) 在《冰冻的风景：2018 年总统大选前的俄罗斯政治体系》一书中写道，普京政权正在进行一场永久性的反反击，Carnegie Moscow Center, March 2018, p.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Kolesnikov_Consensus_Article_March2018_WEB.pdf

② 参见“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September 19, 201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243>, “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拒绝他们的根源，包括构成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否认道德原则和所有传统身份：民族、文化、宗教甚至性观念。”

③ 俄罗斯记者兼政治评论员康斯坦丁·埃格特 (Konstantin Eggert) 恰到好处地解读了俄罗斯这种独有的自我认知：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但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独特。俄罗斯的这种特殊性思想浓缩在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属于第三种文明的理念之中。参见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олукровк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1 апреля 2018.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19490>

④ 与美国一样，俄罗斯也有自己版本的普遍主义和救世主意识，体现在“神圣的俄罗斯”提法之中，参见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Россия и мир в XXI веке. М., 2015. С.115.

有代表性，但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公众——对此却毫不在意。^①

俄罗斯的大国身份是其帝国历史的持久性遗产之一。尽管苏联解体已近30年，但俄罗斯认为帝国魅力犹存。政治评论员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指出，“现代俄罗斯不是一个帝国，但该国的政治体制还有帝国欲望”。^②这不是依据征服或夺回领土的行为，而是如何实现一些基本权利的手段：事实上扩展了原苏联的势力范围（波罗的海国家除外）；对原苏联各共和国主权的严重实际限制；基于文化、语言和历史，强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共同认同。^③

克里姆林宫的后现代版帝国主义^④明显体现在其对乌克兰的立场上。普京无意吞并该国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因为此举在乌克兰既不受欢迎，又代价高昂。相反，俄方试图利用这场冲突达到该地区动荡和未来不确定性这一更广泛的目的，以此向基辅施压，并削弱西方对它的支持。普京这样做的部分动机是出于地缘政治和对安全因素的考量——身处欧洲大陆的乌克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意识形态因素是其核心。普京坚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同族和同文明^⑤，并且拒绝承认存在明确的乌克兰身份。

在普京本任期内，通过利用特定的身份和文明概念来实现自身利益的神圣化，最重要的是相信俄罗斯是特殊的，可以自由行事，或者更确切地说，

① 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49%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强国，另有35%的人认为俄罗斯将在未来15至20年内成为强国。据悉，表示支持这一观点有如下主要因素：战斗有效和装备精良的军队(26%)、人民的意志力和精神(22%)和一位优秀且强有力的总统(17%)。参见“Russia Is a Great Power”，VTsIOM press release, May 21, 2018, <https://wciom.com/index.php?id=61&uid=1540>。列瓦达(Levada)的一项调查发现，82%的受访者同意俄罗斯应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说法。

② Kolesnikov, “Frozen Landscape”, p.4.

③ 参见Alexander Gabuev, “Russian-US Flashpoints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The View from Moscow”, Carnegie Moscow Center, February 23, 2018, p.2, <https://carnegie.ru/2018/02/23/russian-u.s.-flashpoints-in-post-soviet-space-viewfrom-moscow-pub-75631>

④ 有关后现代帝国概念的更详细讨论，参见Bobo Lo, *Russia and the World Disorder*, London; Washington DC: Chatham House and Brookings, 2015, pp.101-105.

⑤ 参见“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September 19, 201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243>。最近，普京对乌克兰立场更加明确：我相信我们是几乎没有丝毫不同的一个民族。存有一些文化差异，而且语言也有一些不同，但本质上我们是一个民族。参见“Q&A at the Lebedinsky GOK”, July 14, 2017, <http://en.kremlin.ru/events/präsident/transcripts/55052>

按照其统治者的意愿行事。因此，理念和意识形态将继续影响普京的外交政策，并发挥至关重要的合法化作用。有时，莫斯科可能会选择淡化传统信仰，转而强调更国际化的主题，例如俄罗斯融入 21 世纪全球化社会。^①然而，无论作为投射权力的工具，还是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仰，或是作为代表政权动员人民的工具，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仍将令人瞩目。

（三）战略文化

地缘政治占据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培养了几代领导人的俄罗斯战略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现实主义假设的基础上，相关假设至少在精神上借鉴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等人的思想。这种思想相信，硬实力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②国际政治不是一场人气竞赛，最终的目标不是被别人喜欢，而是无论如何都要赢。这种态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方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动，但对莫斯科几乎没有影响。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和公众)只看到普京能够实现他的许多目标，这与他的前任，——在国际上更受欢迎但却毫无作用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形成了鲜明对比。^③

自苏联解体以来，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得到了强化。在过去的 25 年里，有种官方说法不断发展壮大，即，强调西方的忘恩负义和背信弃义，而俄罗斯的善意有时甚至到了被无视的境地。冷战刚刚结束时，俄罗斯对于给予它平等地位的新世界秩序充满信心。但现实恰恰相反，西方列强利用了其弱点，通过休克疗法改革摧毁了其经济，将

① 马琳拉·吕厄尔(Marlene Laruelle)把俄罗斯对全球化、多元文化和多边主义的依恋，视为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生态系统之一。参见 Laruelle, “The Kremlin’s Ideological Ecosystems: Equilibrium and Competition”.

②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 年在位)成为某种世俗偶像并非偶然，其名言是：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参见“Putin Agrees with Emperor that Russia’s Only Allies are Army and Navy”, TASS, April 16, 2015, <http://tass.com/russia/789866>

③ 列瓦达 2017 年 10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受访者，你喜欢弗拉基米尔·普京什么？前两个（共 20 个）给出的理由是：“果断、男子气概，坚定，意志坚强，坚强，冷静，勇敢的，明确的，自信的，一个真正的男人”和“外交政策，反对西方，受到世界各地尊敬，不受人摆布，军队支持，持续高地位。参见“Vladimir Putin’s Work”, Levada Center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1, 2017, <https://www.levada.ru/en/2017/12/11/vladimir-putin-s-work/>

北约扩张到东欧，并普遍将俄罗斯视为一个被击败的大国。从那以后，莫斯科曾多次试图与美国和欧洲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但每次都无功而返。^①

这种说辞的根据是否充分另当别论，但西方背叛的这一主题已成为普京外交政策的信条。该主题还被用来说明一个“真理”：在一个无情的世界里，胜利属于最坚定和最果断的人，而失败是那些被幻想所欺骗之人的命运。^②这种心态揭示的不一定是零和博弈，因为它承认，有时不止一方可以在强有力的双边关系、大国“协调”或多边论坛中获得收益。但对克里姆林宫而言，关键在于依靠实力进行谈判，利用现有的杠杆，做好承受痛苦而不是屈服于他人的准备。这还意味着需要充分利用俄罗斯的主要资产，尤其是其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俄罗斯于2018年举行了“东方-2018”等大型军事演习，其首要目的是传递俄罗斯拥有强大实力和自信的信息。

结果是，这种外交政策将意识形态偏见与冷酷算计混为一体。普京的行动基于如下先入为主之见：对俄罗斯永远“伟大”（greatness）和独特身份的坚定信念、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社会保守主义，以及对民主情结的不信任。然而，他也认识到，俄罗斯必须在一个日益动荡和不可预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远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说俄罗斯会更灵活地去适应环境。有时放下意识形态是有好处的，例如在管控军事冲突或缔结核裁军协定时。然而，在其他时候，意识形态和战略考量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俄罗斯方面所强调的“俄罗斯特殊性”，反映了俄罗斯的真实信念和自我意识，也促使俄方认为，自身的利益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特别考虑——无论是在乌克兰、中东，还是在全球层面上。

尽管俄罗斯拥有这种自我优越感，但是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仍然充满了怀

① 前外交部长伊万诺夫 (Igor Ivanov) 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西方的想法就是利用俄罗斯或希望俄罗斯受到伤害。参见“Russia’s post-Election Foreign Policy: New Challenges, New Horizon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28, 2018, <http://eng.globalaffairs.ru/book/Russias-Post-Election-Foreign-Policy-New-Challenges-New-Horizons-19458>

② 正如俄罗斯著名评论员卢基扬诺夫 (Fyodor Lukyanov) 所指出的，自由世界秩序凸显一种正和游戏，以相互依存而不是竞争为傲，但是对于莫斯科来说，经济超越安全的事实从未被认真对待。参见“Trump’s Defense Strategy is Perfect for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anuary 24, 2018, <http://eng.globalaffairs.ru/redcol/Trumps-defense-strategy-is-perfect-for-Russia-19312>

疑和矛盾。一方面，俄罗斯要求被平等对待，即与美国和中国平等；另一方面，它几乎没有表现出想要成为像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决定性力量的愿望。莫斯科言辞和行动上的“自信”，掩盖了对俄罗斯实力有限的担忧。克里姆林宫之所以谈及俄罗斯所面临的威胁，部分原因是为了调动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①然而，这也是对其真正弱点的过敏反应，而不仅仅是对北约进一步扩大或导弹防御部署威胁的回应。

指望普京这一代政治人物的战略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是不现实的。俄罗斯的战略文化，已然固化——诉诸传统权力和影响力的使用；建立在对西方深深的不满之上的民族羞辱情结；俄罗斯是天然的全球大国信念^②；持久的不安全感——这些将要持续几十年。

（四）对事件的即兴回应

虽然俄罗斯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文件——《外交政策构想》和《国家安全构想》——揭示了俄罗斯长期的战略思想，但是不可预见的各类事件往往是决策的真正驱动力，这就导致相当大的即兴发挥。例如，在 9/11 之后，普京就看到了同一直充满敌意的华盛顿实现和解的机会。他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外国领导人，希望把俄罗斯定位为美国的全球合作伙伴。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他震惊于俄罗斯经济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并加强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2014 年，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被推翻，促使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采取行动。尽管应急计划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但只要基辅有一个亲莫斯科的政府，应急计划就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在普京看来，影响乌克兰的行为比占领其领

① 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特别提到了后克里米亚时代的负面共识，“Frozen landscape”，p.6.

② 将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视为民主象征的许多西方人士往往忽略了一点，即，他和他的那些更为反动和民族主义的对手一样，都对俄罗斯伟大这一理念念念不忘。

土更重要。但是时过境迁，俄罗斯的政策也随之改变。^①

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也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影响。2012 年以后，普京强调民族爱国主义主题，并不像一些评论人士声称的那样，是对北约和欧盟扩张、导弹防御以及西方在后苏联地区干预的必然回应。最重要的原因是，在 2011 年底和 2012 年初，俄罗斯几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之后，普京需要巩固其国内地位。^②

更广泛地说，经济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破坏了普京十多年来建立的合法性的主要基础。所谓的“社会契约”，即该政权确保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进而换取公众的政治默许。^③当这一契约开始出现裂痕时，普京只能寻求其他正当化的来源：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在外交政策上给予人民胜利，以及利用反西方情绪，尤其是反美情绪。^④

所有的这些案例——对 9/11 的机会主义回应；克里米亚和西方制裁后优先考虑中俄伙伴关系；在反普京抗议活动之后的民族主义转向——克里姆林宫将自己的决策包装成代表长期的国家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它说服了西方和俄罗斯的许多观察人士，让他们相信，看上去（现在也是）像是战术上的即兴回应，却是战略洞察力和坚定原则的产物。

我们不应该被欺骗。普京似乎是制定该计划的创始人，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实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临时和被动。尽管决策受到核心理念和战略文化的影响，但即时发生的事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扭曲了更为理性的外交政策选择和事先意图，而且还不断提醒克里姆林宫，在追求战略目标时，需要战术上的灵活性。

① 正如詹姆斯·谢尔指出的，要是亚努科维奇成功坚持住，俄罗斯将没有明显理由兼并克里米亚或煽动顿巴斯叛乱。参见“Geopolitics and Security”，in *The Struggle for Ukraine*, Chatham House Report, October 2017, p.18,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ations/research/2017-10-18-struggle-for-ukraine-ash-gunnlough-lutsevych-nixey-sherr-wolczukV5.pdf>

② 美国政府公开支持抗议者，加剧了普京的不安全感。参见 Will Englund, “The Roots of the Hostility between Putin and Clinton”,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8, 2016.

③ “Putin for the Fourth Time: The State of and Prospects for Russia (2018–2024)”, Center for Eastern Studies, Warsaw, March 20, 2018, p.19, https://www.osw.waw.pl/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utin-for-the-fourth_net.pdf

④ 在这方面，普京并非独一无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民族主义样板——菲律宾、土耳其，甚至波兰和匈牙利等欧盟成员国。

矛盾的是，事件不可预测性的本质，可能会加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现有趋势。该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持续的挣扎与困顿^①，预示着普京将继续站在民族主义平台上。这样做的主要优势包括军事力量、俄罗斯特殊身份和历史、在世界舞台上的伟大，以及利用美国这个“有用的敌人”角色。^②当代国际环境的易变性，同样增强了对战略稳定性的吸引力，即继续押注于相对确定的因素（例如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和自然资源）和主要伙伴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

二、21 世纪的俄罗斯

普京的个人利益、意识形态先入为主、战略文化和对事件的即时回应，导致了我们看到今天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在追求其目标的过程中所彰显的特征——自信和毫不妥协。莫斯科的行为一直受到西方的嘲笑，甚至非西方对其看法也常常是负面的。^③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普京有要改变当前俄罗斯外交政策轨迹的打算。

坚持目前路线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他坚信这一路线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这不仅是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治精英的看法。一些对该政权持批评态度的自由派人士、公众和许多西方评论人士也持同样看法。俄罗斯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其自身，而尤其体现在中东和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方面，这与西方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更突显了俄罗斯的成功。在美国领导力退出留下的真空中，俄罗斯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存在，而且普京本人已经获得

① 俄罗斯经济已恢复增长，但预计仍将保持温和增长，中期增幅在 1.5%左右。参见 Andrey Biryukov, Anna Andrianova, “Russia to Lower Forecast of Economic Growth”, *Bloomberg*, June 27,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6-27/russia-said-to-lower-view-of-economic-growth-on-planned-tax-hike>

② “Russia’s Biggest Enemy is US — Poll”, *The Moscow Times*, January 18, 2018, <https://themoscowtimes.com/news/russias-biggest-enemy-is-us-poll-60146>

③ Margaret Vice, “Publics Worldwide Unfavorable toward Putin, Russia”,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August 16,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2017/08/16/publics-worldwide-unfavorable-toward-putin-russia/>

了全球玩家的称谓。^①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真实而显著的成功，但仍未完成任务。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战略路线可能已经确定，但最近取得的进展充满脆弱性且具有可逆性。因此，未来几年，有必要关注俄罗斯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举动：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与美国和欧洲的互动、扩大其在亚洲的足迹，以及巩固其在中东的地位。

（一）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

俄罗斯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如何将自我重塑为规则制定者。显然，这是一项长期进程，远远超出了当前总统任期的时间框架。然而，在克里姆林宫看来，这一进程已经开始：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西方正在失去对普世准则和价值观的垄断；世界事务的重心正在转向非西方国家。所有这一切正在创造一种环境，使俄罗斯真正有机会重新包装自己，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公民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者，换句话说，成为当今正统（标杆）国家。

然而，在实践中，实现这种转变的障碍是巨大的。尽管普京成功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但对其声誉造成的损失也不容小觑。这里的问题不是西方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为，尽管莫斯科将这些谴责理论化为“恐俄症”^②，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几乎没有表现出比破坏者更多的实力。俄罗斯可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明显的就是美国的，但它很少能够实施自己的积极计划，更不用说在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与中国对比，也是不尽人意。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 21 世纪挑战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进入了曾经属于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后苏联时代的欧亚大陆、中东

① Iv an Krastev, Gleb Pavlovsky (普京多年首席政治技术专家) 声称“正是普京，而不是俄罗斯国家恢复了一个大国的地位”。参见“The Arrival of post-Putin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2, 2018, <http://eng.globalaffairs.ru/book/The-arrival-of-post-Putin-Russia-19399>

② 参见“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s interview with Stephen Sackur on the BBC HARDtalk program”, April 17,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41whNgR0>

和北极。

因此，普京在第四个任期内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这一政策赤字问题。关键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赤字问题。过去两年，莫斯科一直在推动建立一个从太平洋延伸至欧洲的大欧亚构想。部分原因是，面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影响力（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要保持其对后苏联地区的部分控制。^①大欧亚构想的重点与其说是欧亚大陆的发展，不如说是关于建设（俄罗斯）主导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的非西方国际秩序。^②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框架已经尝试过。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框架因缺乏灵活性而难以令人信服，而且受到中印战略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的掣肘，所以，多少有些令人失望。鉴于金砖国家组织对俄罗斯具有象征意义，莫斯科不会放弃它——俄罗斯是推动其从高盛（Goldman Sachs）的理念转变为结构化模式的背后驱动力，但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的重点正转向大欧亚地区。

总体而言，莫斯科将在全球治理方面采取双轨思路。一方面，俄罗斯将加强与多边机制的接触，这些机制既有成熟的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 P5），也有正在崛起的大欧亚（Greater Eurasia）。另一方面，它将通过欧亚经济联盟（EEU）、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和上海合作组织（SCO）宣扬区域多边主义的优点。它还将宣布严格遵守各项国际协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朗核项目的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CPOA）。^③

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将继续优先发展双边关系。这与它长期以来信奉国家行为体处在国际政治中的首要地位不谋而合，因此，大欧亚计划聚焦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叙利亚冲突的政治解决，取决于俄罗斯与地区主要国家伊朗、

① 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详细分析，参见Peter Cai,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owy Institute Analysis, March 22, 2017,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belt-and-road-initiative>

②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呼吁欧亚大陆成为更公平、更稳定的世界新秩序的摇篮，取代摇摇欲坠的旧秩序。“From East to West, or Greater Eura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25, 2016, <https://eng.globalaffairs.ru/pubcol/From-East-to-West-or-Greater-Eurasia-18440>

③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决定美国全面退出伊核协议，送给克里姆林宫一份大礼，凸显了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和致力于多边合作的俄罗斯之间的差异。随后，2018年8月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制裁，这只会强化这一差异。

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单独关系，而不是 2016 年 12 月启动的作为日内瓦谈判替代方案的阿斯塔纳多边和平进程。在西方问题上，俄罗斯认为，北约和欧盟只是西方大国的工具，莫斯科对这两个组织内的单个国家的关注远远超过它们本身。

尽管人们都在谈论一个“多中心的新世界”^①，但莫斯科方面仍在寻求回归传统架构，诸如事实上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Great Powers）等。与 19 世纪的协调政策相比，如今的大国协调有着显著不同，尤其在构成方面。^②然而，其基本原则仍在延续：大国制定国际制度的规则；“尊重”彼此的切身利益；虽然大国相互竞争，但也共同努力维护全球秩序。^③在莫斯科设想的二十一世纪版本中，多边机构将设定一个合法的框架，将大国的决定载入其中，而中小国家知晓自己位置，并接受对其主权的含蓄制约。

在当今日益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这样的协调理念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切实际，而且相对于美国甚至中国，俄罗斯的体系建设能力相当有限。不过，如此的现实虽难以改变克里姆林宫以强权为中心的世界观，却能预示莫斯科的手段将更加多样化。普京的目标是成就自己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复兴大国的铁腕人物、坚定的多边主义者，以及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解决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将坚定不移地努力把俄罗斯提升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国，没有俄罗斯，世界就不会有地缘政治平衡或真正的安全。

（二）稳定与西方的关系？

展望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显性特征将是分裂。对克里姆林宫来说，

① 参见“Russian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full text translation, December 31, 2015, <http://www.ieee.es/Galerias/fichero/OtrasPublicaciones/Internacional/2016/Russian-National-Security-Strategy-31Dec2015.pdf>

② 最初的“协调”政策——欧洲协调，起源于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其主要目标是在拿破仑战败后重建整个欧洲秩序，镇压革命民族主义，保持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

③ 普京称赞 1945 年签署的雅尔塔（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协议是大国合作、确保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典范。参见“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September 19, 201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243>. 有关协调政策的优点，参见 Sergei Karaganov, Elisabeth Hellenbroich, “Russia’s Victory, New Concert of Nation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31, 2017,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Russias-Victory-new-Concert-of-Nations-18641>

西方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和规范实体。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西方国家，大多数都很弱小，而且都致力于追求自私目标。这种看法使莫斯科更加聚焦双边互动，特别是把重点放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下的美国给俄罗斯带来麻烦不断，但也带来了重大机遇。一方面，敌对的华盛顿有能力对俄罗斯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美国的军事实力强于俄罗斯，而且完全有能力摧毁俄罗斯。因此，双方之间持续不断的龃龉关系到普京的生死存亡。^①另一方面，特朗普当选总统对跨大西洋联盟、美国的国际声誉以及自由世界秩序理念造成巨大损害，大大增加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回旋余地。这在中东地区最为明显，同时在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例如，2018年7月，特朗普几乎使布鲁塞尔北约峰会远离既定轨道^②，而他随后在访问英国期间羞辱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证明了他所声称的美英特殊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说法是虚假的。^③这种破坏性的行事方式不但强化了“后美国世界”这一状态，也受到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欢迎。

2018年7月16日，普京与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举行峰会，预示着未来几年克里姆林宫可能会与美国接触。普京提议建立各种双边机制：专家委员会、美俄商业论坛、两国国家安全负责人之间的定期对话，以及反恐和网络安全联合工作组。他还建议在顿巴斯举行公投，以打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僵局，并提出在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和遣返难民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还建议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在2021年到期后再延长5年。

普京的提议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试图在两国关系中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尽管成效不明显。特别是发展新的双边机制，可以为合作奠

① See Foreign Minister Lavrov's interview on BBC HARDtalk, April 17,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41whNgR0>

② Ewen MacAskill, "How Trump's Nato Summit Meltdown Unfolded", *The Guardian*, July 12,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jul/12/how-trumps-nato-summit-meltdown-unfolded>

③ Peter Walker, "The Highest Level of Special: Trump Praises US Relationship with UK", *The Guardian*, July 13,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jul/13/the-highest-level-of-special-trump-praises-us-relationship-withuk>. 访问期间，特朗普公开批评了这位英国首相相对英国与欧盟进行脱欧谈判的处理方式，并声称最近离职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将成为一名出色的首相。

定更好的基础，并一定程度上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

其次，这些提议，以及克里姆林宫故意透露提议内容，意在展示俄罗斯的强大和建设性，致力于为以前的棘手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俄罗斯争取道德和政治制高点的努力尝试，更多的是针对美国的盟友和更广泛的国际受众，而不是针对美国。

从上文来看，赫尔辛基峰会对普京来说简直是不能再好了。拉夫罗夫外长也给峰会结果极高评价，并重点强调会谈和联合记者招待会所营造的气氛。^①在现场，与特朗普不同寻常的温顺相比，普京似乎完全掌控局面，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令人生畏。相反，在俄罗斯干涉美国民主进程的问题上，特朗普明显倾向于相信普京，而不是自己的情报机构，这表明他是普京的傀儡。^②

至少在目前，普京将保留他的选择。他将寻求与特朗普保持私人关系，希望（而不是期望）美国总统能在自己的政府和国会中遏制鹰派。但是，即使特朗普无法兑现承诺（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普京也可能选择表现出战略耐心，因为他知道，特朗普的行为已经在盟友和伙伴眼中大大败坏了美国的声誉。^③

然而，这种相对默契是脆弱的。矛盾的是，两国总统之间的不平衡如此明显，以至于导致了美国政策的强硬，似乎是在弥补特朗普未能要求普京对

① “Putin-Trump Talks Were Better than Super, Says Russian Top Diplomat”, TASS, July 16, 2018, <http://tass.com/politics/1013439>. 对于峰会，拉夫罗夫所表达的公开热情在莫斯科得到了广泛认同，参见“Russian Officials Hail Putin’s Success at Trump Helsinki Summit”, *The Moscow Times*, July 17, 2018, <https://themoscowtimes.com/news/russian-officials-hail-putins-success-trumphelsinki-summit-62268>

② 参议员麦凯恩多次说，“特朗普在赫尔辛基的表现是美国总统最可耻的表现之一”。参见Dan Mangan, “Sen John McCain Says Trump Gave ‘One of the most disgraceful performances by an American president’ at Putin Summit”, *CNBC*, July 16, 2018, <https://www.cnn.com/2018/07/16/john-mccain-says-trump-based-himself-before-putin-at-summit.html>. 甚至支持特朗普的知名人士也对其持批评态度。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特朗普在联合记者会上的讲话是他总统任期内最严重的错误。Meg Wagner et al, “Fallout after Trump-Putin Meeting”, *CNN*, July 17, 2018, https://edition.cnn.com/politics/live-news/trump-putin-helsinki/h_40500a225df3ce482d7d70a5af6e061e

③ Tatiana Stanovaya, “Two Trumps in Helsinki: Russia’s Approach to the US President”, *Carnegie Moscow Center*, August 2, 2018,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6962>

俄罗斯的行为负责。^①普京和特朗普之间的“兄弟关系”破裂，以及两国政府之间不断扩大的政策分歧，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发展。例如，如果共和党在（2018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保持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克里姆林宫无疑将继续努力，与华盛顿建立一种功能性的关系。然而，如果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崩溃，或者他输掉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那么普京可能会得出的结论是，在乌克兰、中东和北欧加大赌注，他不会有什么损失。^②这将大大增加俄罗斯和美国/北约部队之间发生对抗的概率。对特朗普政府最后希望的破灭，还可能导致俄罗斯网络攻击和其他形式的信息战急剧升级，也包括对未来美国大选的直接干预。

在欧洲，普京将把俄罗斯描绘成一个务实的、迄今被误解的伙伴。他已经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公开支持极右翼（和极左）政党，转向重新与巴黎和柏林的政治主流接触。法国总统马克龙成为出席2018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相当于俄罗斯的达沃斯）的贵宾。克里姆林宫还加强了对德国政府的游说，以确保通过波罗的海的北溪二号（Nordstream II）天然气管道项目早日完工。

在这两种情况下，外部环境的变化预示着新的可能性。马克龙希望把法国塑造成一个全球参与者，这可能会提高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最终和解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欧盟逐步放松制裁，并为在后冲突时代的叙利亚分担经济负担铺平道路。同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2017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后地位日趋削弱，迫使德国为了自身利益而最终放弃道德原则的可能性加大。尽管德俄关系据说不太可能恢复正常，但有迹象表明，德国精英阶层对俄罗斯的立场正日趋软化。^③此外，意大利和奥地利出现了

① Matthew Bodner, “How Russians Saw the Helsinki Summit”, *The New Republic*, 17 July 2018,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9950/russians-sawhelsinki-summit>; Fyodor Lukyanov, “Shadows over the Putin–Trump Summit”,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ly 19, 2018, <https://eng.globalaffairs.ru/redcol/Shadows-Over-the-Putin-Trump-Summit-19687>

② Bobo Lo, “An 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 Trump, Putin and the US–Russia Relationship”, Lowy Institute Analysis, Sydney: Lowy Institute, 2017,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accident-waiting-happen-trump-putinand-us-russia-relationship>

③ 正如约翰·洛夫（John Lough）所指出的，德国对俄政策能否保持2014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和势头，现在还难以确定。参见“Germany’s Russia Challenge”,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Zürich, March 2, 2018, 12, <http://www.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articles/>

一些态度良好的政府，从莫斯科的角度看，前景似乎很有希望。

克里姆林宫瓦解大西洋两岸和欧洲统一的愿望能否实现，在两可之间。无论怎样，我们都可预期，即便面临挫折，俄罗斯仍将坚持对西方采取随机应变的方针。例如，对于法国在 2018 年 4 月参与针对阿萨德政权的报复性空袭，俄罗斯的反应相对温和，——或许是因为俄罗斯奉行现实政治传统，它将法国视为西方列强中最理性的一员。与此同时，它在同德国政界人士和商界打交道时将继续寻求妥协。

莫斯科对西方国家实施逐一突破的战术表明，良好或正常的双边关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有在增进俄罗斯的具体利益时才有价值。获取法国和德国的支持，将确保欧盟为叙利亚在冲突后的重建提供资金，从而巩固俄罗斯的战略成果。同样，在乌克兰问题上，按照莫斯科的条件达成政治和解的任何希望，都取决于在明斯克进程中俄罗斯与法国和德国进行某种程度的建设性接触。俄罗斯这样做的目标不是和平本身，而是意在培育出一个易受俄罗斯压力影响、对西方伙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的软弱的乌克兰。^①相比之下，正如斯克里帕尔（Skripal）事件所突显的事实，克里姆林宫对冒犯英国并不以为然。脱欧后的英国既被视为无可救药的敌对国家，又被视为越来越无足轻重的国家。

总而言之，普京不会动摇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立场，也不会向西方政府做出任何让步。克里姆林宫在争取更广泛的和解方面，几乎不会做出任何主动尝试，更不用说双方达成一项重大的协议。莫斯科关注的是那些意图与俄罗斯进行务实接触的欧盟/北约成员国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有两个难以估量的因素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美国-俄罗斯武器控制机制的崩溃，从美国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开始，扩展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再续约。^②如果这个

article.html/fc72f896-819d-4763-b72f-7a442c7a694c/pdf; 也参见 Markus Wacket, Thomas Eschritt, “Merkel’s Tougher Russia Stance Meets Resistance in Germany”, *Reuters*, April 16,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russia/merkels-tougher-russia-stance-meets-resistance-in-germanyidUSKBN1HN1XU>

① Sherr, “Geopolitics and Security”, p.22.

② Steven Pifer, “Arms Contro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US–Russian Relations”, Valdai Paper No.78, November 17, 2017, <http://valdaiclub.com/a/valdai-papers/arms-control-security->

机制瓦解，那么接下来的军备竞赛将会引发幂数效应的许多其他危机，使美俄关系更加恶化。从根本上说，它将摧毁世界上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最后仅存的有限共识。^①

第二个难以估量的因素是，个别武装事件——乌克兰、中东和波罗的海地区——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多年来，普京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其正从前两个总统任期(2000年至2008年)所持的基本谨慎的态度转变为另外一种心态，似乎把边缘政策视为一种美德和一种武器。^②日益流行的“升级到降级”(escalate to de-escalate)的概念^③，表明俄罗斯对外政策有严重的赌博倾向。鉴于可能的对抗性，普京很可能会选择直面西方领导人，因为他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坚强、更聪明、更坚定。

(三) 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接触

未来几年，俄罗斯将显著扩大其在亚洲的存在。部分原因是普京认为亚太地区是21世纪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熔炉。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俄美关系低迷、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欧洲持续存在的困境，让莫斯科别无选择。尽管与亚洲国家和组织的全面接触，可能仍与俄罗斯精英阶层的直觉相悖，但即便是最狂热的亲欧派也承认，这对俄罗斯的未来前景至关重要。

普京将继续特别重视中俄伙伴关系。原因有很多，包括威权主义的同理心、共同的威胁认知、经济互补性，以及两位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融洽。^④然

cooperation-and-u-s-russian/

① 尤金·鲁默(Eugene Rumer)指出，军备控制的终结，将对俄罗斯更广泛的“与西方在冷战后的安全安排和远超军备控制替代安排的修正主义计划”提出“根本性挑战”。参见“A Farewell to Arms ... Control”,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18, p.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Arms_Control-Rumer.pdf

② 在前两届总统任期内，普京曾多次表现出大胆和自信，例如，他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的外交政策，<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2008年正式卸任总统后，他批准了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军事干预。尽管如此，2012年之前普京相对谨慎的态度，与2012年之后他更加自信、有时更具进攻性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③ 升级到降级是基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理念，即，选择性的军事升级可能迫使另一方因担心灾难性后果而作出让步，从而实现冲突的降级。

④ 参见Bobo Lo, “A Wary Embrace: What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Means for the World”, A Lowy Institute Paper, Melbourne: Penguin Random House Australia, 2017.

而，其主要的动机是将俄罗斯和普京个人提升为全球玩家。尽管莫斯科方面对中俄关系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持谨慎态度，但与和世界下一个超级大国建立联系所带来的好处相比，这种担忧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只有同中国合作，俄罗斯才有希望颠覆美国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 and 西方的规范主导地位，并推进其建立后西方世界秩序的核心目标，即在这个秩序中，俄罗斯是作为一个独立而“平等”的大国存在。事实上，中俄伙伴关系已成为普京全球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

不过，即使中国持续作为俄罗斯与亚洲接触的基石，普京仍会寻求在其他地方的发展选择。在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俄罗斯与欧洲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与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功能性稳定。在地区层面上，这意味着俄罗斯在亚洲的关系要多样化——主要是与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但也包括与韩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并深化其对多边结构的参与。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这将转化为关注俄罗斯作为核大国和中亚地区卓越安全提供者的相对优势。支撑所有这些举措的原则是，以战略灵活性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既不受制于任何一方，又不放弃多种选择。正如普京拒绝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一样，他也将拒绝被降格为习近平的忠实助手。

当然，说易行难。俄罗斯在亚洲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后苏联地区和近东，恢复俄罗斯所期望的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基辛格三角关系的愿景，仍是空中楼阁。^①中俄伙伴关系的日益不对称削弱了莫斯科追求真正独立外交政策的能力，更不用说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扮演一个“左右逢源”（swing）的角色了。在美俄关系无法出现重大改善的背景下，习近平仍将在中俄伙伴关系中占有主动，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给普京留面子。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把欧亚大陆设想成一个联合企业，但现实是，如果这个计划能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将按照北京方面的条件成型。

①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全盛时期发生在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之后。前提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接触中国抗衡苏联，维护美国日渐下滑的战略财富（当时在越南战争和苏联核武器增加的压力下），削弱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被广泛视为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尽管他本人也认为，尼克松具有战略智慧，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分歧之上。参见 Chapter 28, “Foreign Policy as Geopolitics: Nixon’s Triangular Diplomacy”, in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p.703-732.

普京还将努力使俄罗斯与亚洲的关系建立在更加平衡的基础上，但他把中俄伙伴关系明显地作为优先选项，限制了俄罗斯与日本和印度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也限制了俄罗斯在朝鲜^①、西太平洋海上问题和反恐问题上奉行独立政策的能力。从“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活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外交政策日益自信，这促使新德里向华盛顿靠拢^②，从而阻断了莫斯科希望出现一个不结盟、但偏向己方（俄罗斯）之印度的目标。

普京将急于避免亚洲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即一边是中国和俄罗斯，而另一边是美国和亚洲主要大国。这样的局面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不受欢迎，而且会招致危险纠葛的可能，以及俄罗斯被夹在有着潜在冲突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风险。^③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战升级、围绕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台海局势紧张，以及朝鲜半岛未来的不确定性背景下，这些担忧已经变得更加具有相关性。^④

尽管困难重重，但普京仍将坚持对亚洲的“全方位”（all-fronts）政策。他将加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以及其他亚洲领导人的接触。俄罗斯将更加积极地参与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多边架构。莫斯科方面将努力把大欧亚理念从事实上的中俄共管扩展为更大范围、更具包容性的理念，这样，中国的影响力将被其他主要参与者部分稀释。^⑤俄罗斯国有企业将继续在整个欧亚大陆兜售武器、石油、天然气和核技术。随着俄罗斯寻求将自己定位为战略供应商的选择对象，食品和水安全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所有这一切都将继续下去，并不是期望俄罗斯将很快成为亚太地区一支真正的力量，而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这对俄罗斯作为一个正在复苏的全球

① Artyom Lukin, “Why Russia Is Still Playing Second Fiddle in Korean Geopolitics”, Valdai Club, August 21, 2018,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second-fiddle-in-korea/>

② Evan Moore, “Strengthen the US-India Relationship,” *National Review*,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18/02/india-united-states-relations-trade-military-strategy-alliance/>

③ Timofey Bordachev, “Main Results of 2017: Energetic Russia and the Greater Eurasia Communit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9, 2017, <https://eng.globalaffairs.ru/book/Main-Results-of-2017-Energetic-Russia-and-the-Greater-Eurasia-Community-19276>

④ 邀请中国参与俄罗斯的军事演习是一回事，比如“东方-2018”；在北京与美国的双边争端中，向北京提供积极的军事（而不仅仅是外交）支持是另一回事。

⑤ Karaganov, “From East to West, Or Greater Eurasia”.

大国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

（四）全球俄罗斯与中东

普京很享受其中东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俄罗斯作为局外人，几十年之后又一次成为核心玩家。在叙利亚，普京实现了自己的主要目标，同时暴露出了西方决策的软弱。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是在与该地区主要参与者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保持良好或合理关系的同时，成功地取得这些成就的。俄罗斯已经重新确立了在利比亚和埃及的影响力。^①它利用中东系列事件，凸显自己是该地区的良好公民，并成功地通过阿斯塔纳进程促进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俄罗斯还与沙特和其他产油国合作，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偶尔也会遭遇挫折，例如，2018年2月在叙利亚东部的代尔祖尔地区，有200名俄罗斯“雇佣兵”被打死。然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中东取得真正影响力尚未遭遇阻力，而且还将一路顺利。

既然普京认为叙利亚战争已经胜利，他正试图巩固俄罗斯的收益。首先，这意味着要完成军事行动，尤其是消除北部伊德利卜省反阿萨德的最后一块重要飞地。长期而言，巩固意味着全面的政治解决和大规模的经济重建，后者主要由其他国家提供资金。这里的合作也可能为与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正常化提供额外通道。普京将暂时支持阿萨德，当然不会因为西方的压力而放弃他。然而，俄罗斯对阿萨德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阿萨德对伊朗人过于感激，激怒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或者干脆不听俄罗斯的建议，俄罗斯的支持可能会减少，甚至撤回。

更广泛地说，普京的目标是扩大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但会谨慎行事，并尽可能降低成本。莫斯科在很大程度上将采取观望、然后做出回应的立场。其回应的程度和策略，主要是取决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以色列、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各种对抗以及这些对抗将如何

① Nikolai Kozhanov, *Russian Policy across the Middle East: Motivations and Methods*,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February 2018, pp.23-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ations/research/2018-02-21-russian-policy-middle-east-kozhanov.pdf>

② Ibid, p.19.

演变。所以，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的是，俄罗斯采取灵活的游戏管理政策，而非试图实现一个宏伟愿景。莫斯科将努力避免卷入该地区更广泛、更长期的冲突。它将寻求利用可能的商业和安全机会，特别是在武器销售和能源基础设施开发等方面。最重要的是，它将努力与所有缔约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谨慎地不向任何一方做出过度承诺。

这种由事件驱动的、相对保守的做法表明，普京中东野心的有限性。他热衷于利用日益增多的俄罗斯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机会，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从而强化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全球权力中心的地位和负责任的国际公民的主张。然而，考虑到这样一份事业的成本和过度扩张的风险，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有任何意愿取代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过去 15 年美国决策引发的灾难是一个有益的教训。不过，中东地区事态发展瞬息万变，普京可能又无法掌控，如果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爆发冲突，那么其推进中的最佳方案可能也会化为泡影。^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俄罗斯将被迫承担额外的外交和军事承诺，否则会面临失去其为之付出艰苦努力的前景。

三、普京之后

当普京最终离开这个政治舞台时，他如何看待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呢？到目前为止，莫斯科的行动画面有些令人困惑，——既有公开招摇，也有谨小慎微；既有宏大设计^②，也有即兴回应；既有对尊重和“面子”的渴望，也有对名誉受损近乎漫不经心的蔑视。

但在一片嘈杂声中，却有几个主题依稀可见。首先，普京政权的最高外交政策目标侧重国内，也就是自我保护。这个目标不但恒久而且包罗万象，并且被神圣化。对普京来说，国际关系，无论好坏，终将是国内政治和其个人利益的延伸和附属。

其次，比以往任何时候，普京的合法性都更加与近乎伟大神秘的俄罗斯

^① “Putin for the Fourth Time”, p.39.

^② Dmitri Trenin, “Russia Has Grand Desig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Moscow Times*, October 24, 2017,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russias-formative-plan-c-foreign-policy-59357>

理想密切相连。国家和人民之间用物质繁荣换取政治默许的旧社会契约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契约，其基础是在面对俄罗斯的敌人时调动民族自豪感和自我信仰。普京就是这种理念的化身，既是其象征，也是其信使。

第三，备受讨论的普京遗产，概念歧义颇多。这就意味着普京准备离开，而实际上毫无迹象表明他会离开。显然，近年来围绕普京的个人崇拜变得更加明显。他被塑造成不可或缺、甚至是绝对正确^①，近乎等同于俄罗斯命运的领导者。^②尽管普京曾否认自己不想成为终身总统，但不管作为总统，还是作为某种形式的国父，普京认为自己代表俄罗斯的未来。^③

诚然，仍有许多未完事业。然而，有证据表明，至少在外交政策方面，普京认为他已无须再证明自己了。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俄罗斯现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和有影响力的国际角色。在与西方的较量中，俄罗斯掌握了主动权。克里姆林宫对外交关系的管理得到了国内的大力支持。复兴的民族主义已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支柱之一。^④俄罗斯的敌人已处于一片混乱。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也已自我引爆，开辟了更有利于莫斯科的国际体系的一条新路。

简而言之，就普京而言，俄罗斯已经做到了。基本面是健康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剩下的工作就是在此基础上再生产、打磨、保护这些成就，并确保其他国家承认这些成就。俄罗斯外交政策是一个有机体，需要不断地关注和频繁地修改。但对普京和政治精英来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而不是原

① 一次，普京被问及是否对自己的任何行为或错误感到后悔时，他回答说：“我想不起任何类似的事情。在神的恩典下，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后悔。”“Interview with Il Corriere della Sera”, June 7, 2015, http://www.corriere.it/english/15_giugno_07/vladimir-putininterview-to-the-italian-newspaper-corriere-sera-44c5a66c-0d12-11e5-8612-1eda5b996824.shtml?refresh_c-e-cp

② 2014年，时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现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有句名言，“如果没有普京，就没有今天的俄罗斯”。“No Putin, No Russia, Says Kremlin Deputy Chief of Staff”, *The Moscow Times*, October 23, 2014,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no-putin-no-russia-says-kremlin-deputy-chief-of-staff-40702>

③ 或者正如安德烈·科尔斯尼科夫所说，普京正由这个国家的国父过度到祖父，佛朗哥晚年就曾这样说自己。参见“Project Inertia: The Outlook for Putin’s Fourth Term”, Carnegie Moscow Center, January 25, 2018,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5339>

④ Andrei Kolesnikov, “History Is the Future: Russia in Search of the Lost Empire”, Carnegie Moscow Center, February 15, 2018,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5544>

则性或战略方向问题。

因此，在未来几年里，俄罗斯外交政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时，莫斯科会显得相对包容和务实。在其他时候，它将采取强硬和对抗的姿态，并使用一系列手段，包括传统手段(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和新手段(如网络能力和社交媒体)。普京将沉湎于在战术上搞突然袭击，不但为了实现具体目标，而且也便于操作实践。在既没有节制(中庸思想)，又没有睿智的世界里，普京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位国际政治家，发出包涵节制又睿智的声音。

然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起伏波动，在俄方自己的眼中，总是合理的。当然，假以时日，可能克里姆林宫对自身正义的信念会被冲淡，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开放的认知。但只要普京仍然是俄罗斯的核心政治人物，这就不会发生，至少在当前的总统任期内肯定不会发生。

(杨辉译)

【Abstract】 Vladimir Putin's re-election for a fourth presidential term in May 2018 has enshrined his position as the dominant personality of the post-Soviet era. Over the next six years, there will be few major changes to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re is broad consensus in Moscow that this has been outstandingly successful, and that Russia has emerged as a formidable power. But alongside an overall sense of confidence, there is also caution and even anxiety. Putin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tactical flexibility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s increasingly fluid and unpredictable. He is also aware that Russia's foreign policy gains are fragile and potentially reversible, and that the country faces considerable obstacles in its quest to become a rule-maker in a new, post-American world order. Putin will aim to be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 strongman of a resurgent great power, committed multilateralist, and regional and global problem-solver. At times, Moscow will appear relatively accommodating. At other times, it will be assertive and even confrontational. But Putin will be unrelenting in the pursuit of core goals: the consolida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t home; and the promotion of Russia as an indispensable power, without whom

there can be no real security in the world.

【Key word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Putin's Foreign Policy, Russian Domestic Affairs, Great Power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В мае 2018 год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 четвёртый раз был переизбран на пос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и утвердил своё доминирую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В ближайшие шесть лет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без изменений. В Москве сложилось общее мн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достигла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мощной державой.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сё чаще ощущается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 и даже тревожность. В условиях растущей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и и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Путин признаёт важность тактической гибкости. Путин также хорошо знает о хрупк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её обратимости, так как в новом мировом порядке после США Россия в своих устремлениях стать утверждающей правила державой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о многими препятствиями.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имидж Путина — железная фигура в возрождении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убеждённый сторонник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и разрешител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глоб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В какие-то мо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оказать помощь,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в других случаях она выглядит своевольной и даже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Однако Путин неуклонно преследует свою основную цель: консолидировать сво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в стране, помочь России стать незаменимой державой, без которой у мира не будет ре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Путина,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俄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的形成机制及特征 ——兼析其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的表现*

初智勇**

【内容提要】从逻辑演绎角度来说,中俄战略合作从松散到紧密的程度变化,体现为在无合作和军事同盟之间的连续曲线。中俄美战略互动形成的国际权力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博弈结构,是中俄战略合作程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美国与中、俄之间的战略冲突和相互依赖,以及中俄之间的战略平行与分歧等。就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而言,中俄战略合作仍将处于利益交换状态,并将在中俄基于美国“航行自由”问题的互助过程中有所表现。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应努力消除俄罗斯的战略疑虑,强化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并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不对称结构转化,以减少双边利益互助过程中潜在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应警惕中俄战略合作向军事同盟方向升级,以免对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延续产生破坏性影响。

【关键词】中俄关系 中美俄关系 中俄战略合作 南海问题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4-0058-(36)

就国际行为体的战略合作来说,存在着两种典型的合作形式:其一,军事同盟;其二,利益互助。当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战略利益诉求高度一致并达到相应的紧迫程度,行为体之间即可能形成军事同盟。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亚太地区对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认知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批准号:16BGJ044)的阶段性成果。

** 初智勇,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中的军事同盟不胜枚举，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军事同盟类型的战略合作一般面临相对紧迫且指向一致（一般均指向国家安全）的外部压力，具有紧密性、军事互助性、强对抗性等特征，容易导致与敌对国家或同盟的冲突与战争，如一战、二战、冷战，都是由两大对立同盟挑起并参与的。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面临相对和缓且指向各异（涵盖高低不同的政治级别领域，包括安全、政治、经济、环境、生态、气候等，安全领域又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外部压力，双方因而采取“利益交换”的互助行为，双方在战略合作中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一致，基本上是通过利益互助^①的方式各取所需。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结构比较松散，军事互助性与对抗性相对淡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中的战略协作关系，如 1895 年的三国干涉还辽、1922-1932 年的魏玛德国与苏俄的拉巴洛合作、1996 年建立至今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②

从体系结构压力对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塑造作用来看，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的形成，一般需要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这一国际环境塑造的较为和缓的安全压力，也使国家利益诉求呈现分散化与多元化特征成为可能，从而为国家优先选择利益互助型而非军事同盟型战略合作预设了前提。而当国际环境形成的压力极其紧迫时，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将其比喻为房子着火且只有唯一出口，行为体的选择范围则被极大压缩，以至于成为要么选择留下要么涌向出口（要么制衡，要么追随）的非此即彼的二选一。^③当行为体的决策失去选择余地时，其决策偏好即已失去意义。军事同盟形成

①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以“Logroll”描述那些能够从扩张、军备、国际紧张氛围中获得利益的集团之间的利益互助行为，中文将其翻译为“互助”。其原意是指美国国会议员为使各自提出的法案获得通过，互相为对方投赞成票的行为。笔者在此借用这个词描述中俄之间在利益不一致情况下的利益交换行为。关于国内政治中的利益互助行为对国家对外决策的影响，参见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尽管中国方面宣称，“战略协作”在中国对外伙伴关系中独一无二。战略协作指的是不仅两国之间有普通合作，还涉及军事等核心领域的合作，而且还在国际事务上协调立场，共进退。这是中国对外所有伙伴关系中的最高层级。但“战略协作”与军事同盟尚存在较大差距，“战略协作”针对第三方的色彩较淡，通常不鼓励军事对抗。

③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4.

的环境与此接近，同盟参与者在面临紧迫安全威胁时，能够选择的应对方式大概只有参加制衡联盟，或追随强大的威胁者。在房子起火且只有唯一出口的情势下，理性的选择自然是冲向出口（制衡），如果做出留在房内（追随）的选择，行为体的体系单元属性（自主性）将不复存在，情势的严酷将使它们别无选择。^①而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的安全诉求压倒和掩盖了其他利益诉求，行为体做出的决策都是基于安全而非利益的权衡，为此付出的利益代价计算是没有资格作为决策依据的，因为安全收益是压倒任何利益代价的，行为体一旦失去基于安全之上的自主权，利益考量即失去任何价值和意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生存是大国需要优先追求的目标：国家力图维系自身主导的领土完整和国内自治。生存支配其他动机，国家一旦被征服，就再也没有资格追求其他目标。^②而利益互助形成的环境则与此不同，行为体面临的国际环境较为宽松，基本不存在生死攸关的安全威胁，其应对环境压力的选项延伸跨度较大，形成一个渐变的灰色区域。利益计算在影响行为体对外决策的权衡中占有重要地位，行为体尚有安全余裕进行利益交换和互助。

如果将战略合作的两种极端形式：无合作与军事同盟作为两个端点，利益互助即位于两个端点之间的区间。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联盟概念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国际政治行为体一般难以获得超然地位，国家几乎永远都是不断变换着成员的联盟中的一员。联盟的组成鲜有仅基于共同情感，却普遍迫于外在压力。内聚力基本随压力大小而呈规律性变化：从持善意中立，到达成谅解、组建同盟、形成邦联，或建立类似北约

①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拥有适度权力的国家将优先选择组建军事同盟，以应对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写到：“在争夺国际地位的斗争中，当一方联盟取得最后胜利之时，联盟中的弱国将被迫听凭强国的摆布，而采取均势政策则为明智之举。……权力最大化目标与均势目标背道而驰，国家追随强者，将导致世界霸权的出现。……国家关注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胜于权力最大化。……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国家将涌向较弱的一方，因为给它们带来威胁的是较强一方，如果它们加入的联盟拥有必要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敌对方的进攻，它们将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安全。”——[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134页。

②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35页。

的组织，在极度紧密与极度松散之间形成了各种过渡形态的权力模式。^①

二战后大国关系基本处于无战争的和平竞争状态。《时代》周刊国际版主编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权利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前言中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事务的突出特征是，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尽管美国和俄罗斯激烈争吵，美国和中国为争取优势而角力，但以大国冲突的常规形态——战争、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等——来衡量，没有大国冲突是当今时代具有主导性意义的地缘政治现实。冷战结束已历 20 年，日本和德国依旧是民事大国，尽管是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必然致力于军事建设，但按照历史标准看，它们显然聚焦于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增强。^②大国之间的传统安全威胁相对和缓，其紧迫程度较为有限。大国在应对彼此之间的竞争时，可以拥有较多选项，而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而在国际实践中，大国之间也常常选择灰色的中间路线，作为处理彼此关系的优先选项。^③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同盟型战略合作并非中俄处理彼此关系的唯一选择。

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常常表现出“互助”抗衡美国对中、俄两国施加的经济、政治、安全压力的一面。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认为，中俄之间的所谓“共同利益”主要是基于非物质的国家相互认同，这种认同建立在反对西方传统、彼此声援对方继承自身共产主义遗产的立场之上。^④约瑟夫·多布斯（Joseph Dobbs）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具有很多共同点。两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都日益高涨，对西方的战略遏制也都感同身受。对俄罗斯而言，

①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 (ed.), New York: Continuum, 1978, p.157.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利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四版前言，第25-26页。关于大国无战争时代以“利益交换”为核心的大国权力竞争的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参见杨原著：《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③ 其中，低政治层级的经济因素对政治的影响程度尤其突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二十世纪政治受经济问题左右的程度很高。左翼政治的一贯做法是通过再分配政策推进社会福利项目；而右翼则致力于缩小政府开支，鼓励经济自由。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2018, Vol.97, No.5.

④ Gilbert Rozman, “Asia for the Asians: Why Chinese-Russian Friendship Is Here To Stay”, 2014-10-29,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305/gilbert-rozman/asia-for-the-asians>

这种感受源自于北约(NATO)东扩。中国则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充满忧虑。“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和“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导致的乱局,令两国领导人都深感不安。^①

但是,中俄两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利益诉求通常是松散的、分离的。理查德·怀兹(Richard Weitz)认为,中、俄两国的安全关系处于战略平行状态,即两国的对外战略经常高度相似,但又缺乏交集,各行其是。中、俄两国关系整体上呈现出机会主义的特质。尽管中、俄一直在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北京和莫斯科在许多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仍然推出了极其相似而又各自独立的战略。中俄关系在某些方面得以改善,两国政府在一些特定事项上互相支持,但在另一些事项上则存在分歧,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安全合作仍然是有限的、短暂的、脆弱的。……尽管中、俄均与日本之间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北京、莫斯科与东京之间的冲突关系仍然是一对一的,没有迹象显示两国在与日本的领土纠纷、日本的安全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尝试采取协调一致的姿态。^②维护双方利益的手段往往是在国际事务上协调立场等,鲜有军事对抗色彩。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更多表现为一种选择性的利益互助。这也导致中俄之间利益互助型的战略合作,与共同面临紧迫安全威胁的大国可能选择的军事同盟型战略合作(明确针对第三方)不同,存在结构松散性、议题可选择性、承诺模糊性、行动非协调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也在中俄基于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互助过程中有所表现。

一、美国与中、俄之间的战略冲突

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安全、市场、金融领域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国际规则

① Joseph Dobbs, “Russia and China—Friends or ‘frenemies’?”, 2014-12-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9696/en?ccode=LanguageSwitch&archive>

② 理查德·怀兹:“中俄安全关系:既非伙伴关系又无热忱的战略平行状态?”,载于[美]戴维·J·罗杰森(David J. Rogerson)编:《中国与俄罗斯:竞争与合作》,夏庆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90页。

方面的塑造与主导能力，使其国家对外战略具有体系结构特征。^①而俄罗斯与中国则是除美国之外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或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在这一前提下，美国与中、俄之间在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政体选择方面的立场及其互动，已经超出单元之间的互动层次而具有体系结构意义。大国政治是国际安全研究中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驱动力，无论是冷战中还是冷战后，大国政治都主导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配置与安全走向。^②因此，中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会与美俄、美中关系矢量呈函数或回归相关性表征与变化。其中，美国与中、俄之间的战略冲突最集中地体现在，中、俄的实力增长潜力与美国维系全球霸权地位所需实力优势之间的冲突上。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冷战时期的苏联核武库具有确保与美国相互摧毁的实力，维系了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核武库的主要部分，是当今世界唯一能与美国在战略核力量上分庭抗礼的国家。此外，俄罗斯人口总数是 1.445 亿，^③领土面积为 1709.82 万平方公里。^④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作为一个陆权大国，存在易受陆路相通的其他陆权大国进攻的安全脆弱性，但一旦其取得必要的权力优势，也就拥有了控制世界最具权力资源的地缘战略板块——欧亚大陆的可能。美俄关系的症结之一，即在于俄罗斯虽然因苏联解体而处于战略收缩状态，但仍然具有在最短时间内摧毁美国的核能力。同时，其人口是除本国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德国的 1.75 倍^⑤，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种类多，储量大，自给程度高，^⑥主要自然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并拥有比较完备的工业和教育体系，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很强。

① 除自身超强军事实力外，还拥有遍布全球重要战略地区的联盟与基地体系，以及对全球主要战略资源与通道的控制。此外，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并拥有金融霸权。

② [英]巴里·布赞、[丹]琳娜·汉森著：《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导读一，第 8 页。

③ 俄罗斯联邦人口总数(2017 年统计数据)，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E4%BF%84%E7%BD%97%E6%96%AF%E8%81%94%E9%82%A6>

④ 俄罗斯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19 年 1 月)，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6x0_679112/

⑤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7 年德国人口数为 0.827 亿。——德国人口总数，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TOTL?locations=DE&view=chart>

⑥ 俄罗斯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19 年 1 月)，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6x0_679112/

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强调，即使今后数十年在内政、经济上仍然处于虚弱地位，由于领土辽阔、地下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直接邻国为数众多，核军备规模巨大，俄罗斯仍然能够位居三个战略性世界大国之列。^①这也是美国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对俄采取战略挤压政策的重要原因。^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即已出现结构性衰落。因产业升级转型，加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环保成本上升，美国在诸多传统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并被后起的日本、西欧、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亚洲四小龙、中国等）超越。^③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伊始，即面临美国投资大量外流导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巨额贸易逆差形成的收支失衡等诸多问题。面对中国在传统制造领域凭借成本优势形成的超强竞争力，以及在高科技领域从点到面的赶超式突破^④，美国国际竞争力出现相对结构性衰落已成事实，其绝对整体性衰落似也初露端倪。在此情形下，美国精英圈中开始出现质疑“自由贸易主义”国际主张之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价值的声音。福山指出，制造业从美国、欧洲向东亚等地区的稳定转移，使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逐渐失去这一产业创造的工作岗位。中国（也包括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新生代中产阶级正在取代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⑤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优势也将面临挑战。曾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研究员、格罗宁根大学

①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未来强国》，梅兆荣、曹其宁、刘昌业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施密特认为，当代三个战略性世界大国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

② 此外，不同于西方的身份认同也强化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疑虑。安德烈·P·齐甘科夫（Andrei P. Tsygankov）指出，尽管俄罗斯在文化上向往西方，但它的情感与道德满足在历史上就依靠与自己的文化共同体的关系……自1054年基督教分裂、拜占庭衰落以来，俄罗斯统治者就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有着自身特殊利益和文化特征的国家……作为一个拥有广袤领土、信仰东正教、常常担忧边界安全的帝国，俄罗斯总是感觉自己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欧洲总是很难承认俄罗斯是自己人这一事实加强了俄罗斯“不同”于西方这一身份认同。[俄]安德烈·P·齐甘科夫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③ 但在高端制造和科技、金融服务领域，美国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竞争优势。

④ 最典型、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国政府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

⑤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经济学荣休教授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如果中国GDP在 2003-2030 年之间保持 4.5%的平均增长率，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能够在某一时刻超越美国，而中国经济在 2030 年将占据全球GDP25%的份额。^①美国学者阿什利·特里斯（Ashley J. Tellis）则提出，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正数，那么国际体系权力格局的变迁将成为现实。^②

面对中国崛起的预期，美国不断从理念、规范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种种诘责，如特朗普总统的政策顾问、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W. Navarro）在《致命中国》（2011）一书中提出，中国通过操控货币和贸易，向美国倾销“仿冒伪劣”产品，抽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带走供应链条，拿走工作岗位。中国的主要倾销手法是：对出口给予违规补贴；操纵和低估本国货币；窃取知识产权，仿冒专利技术；以低环保、健康和安全生产标准获取成本优势；违规的关税、配额以及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并以此谋取对全球冶金产业和重工业的控制力；为了在关键资源市场对外国竞争者取得竞争优势，采取掠夺式定价和倾销方式，并以垄断价格侵害消费者权益；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使外国竞争者无法在中国立足。^③但中国在现有的美国一手建立并推行的国际贸易秩序中的竞争优势是无法回避的。这导致美国当今的对外贸易政策取向与其过去一贯对外宣示的“自由贸易主义”国际主张背道而驰。^④

从美国一贯对外宣示的“自由贸易主义”国际主张来看，“南海航行自由”作为一种宣示行为和举措，其目的是维护海洋贸易通道自由，反对个别

① 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Paris: OECD, 2007, p.93.

② 阿什利·特里斯：“中国大战略：对综合国力的追求及其影响”，载于[美]加里·J·斯密特主编：《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韩凝、黄娟、代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第47页。

③ 关于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的诘责的详细阐述，参见 Peter W. Navarro and 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11.

④ 实际上，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已经对“自由贸易主义”国际主张予以多次修正。面对新兴经济体的有力竞争与挑战，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大多是反自由贸易主义性质的。特朗普上台后，针对美国在产业发展及对外贸易领域的竞争力下降问题，迎合了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诉求，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乃至自己盟友的贸易保护政策。

国家或集团将其特殊化、封闭化。美国前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在香格里拉对话会（2017年）上做出如下声明：美国将在国际法许可范围内，继续在南海海域及其空域进行飞行、航行，以此表达在这一区域捍卫自身利益与国际法赋予的自由的意愿。^①西方观察家认为，对美国来说，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关系到自由主义秩序的规则与基石。^②正是在自由主义秩序所谓“国际规则”的逻辑基础上，美国强烈要求中国遵守所谓“南海仲裁案”的判决，并将其看成检验中国是否遵守国际法的试金石。此外，美国还将航行自由原则置于重要位置，将其视为践行国际法、确保自身军事优势的重要工具。^③

但在当前国际背景下，美国“南海航行自由”宣示“自由贸易主义”国际主张的可信性，已经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并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其仅存的符合正常逻辑与基本常识的解释是，遏制中国的国家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由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形成），以维护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乃至国际霸权地位。

此外，美国与中、俄之间在国际行为规范、国际安全模式、国际经贸规则、国内政治体制的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现实中体现为在上述领域存在种种摩擦。对美国创建的国际秩序来说，整合性和扩展性一直是重要的目标和议事日程，这导致该秩序虽以非歧视和开放市场为基本原则，但对其他国家来说，一旦被纳入这一国际秩序，就将被其裹挟前行而难以摆脱。此外，这一国际秩序还或明或暗地与自由民主制和人权挂钩。西方在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时候，对贸易合作条约、援助、外交承认等一系列行为都设置了政治前提，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变为一种政策工具。但必须指出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并不是促进全球发展、民主化和人

① Jim Mattis, John Chipman,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Shangri-La Dialogue”, 2017-06-03,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201780/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shangri-la-dialogue/>

② Leszek Buszynski, “Why is the South China Sea So important to the U.S.?” 2017-01-18, http://www.upi.com/Top_News/Voices/2017/01/18/Why-is-the-South-China-Sea-so-important-to-the-US/5761484751063/

③ 左希迎：“南海秩序的新常态及其未来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6期，第35页。

权，也不是与全球“共产主义威胁”对抗，而是保持国际秩序中的严重不平等以及这种全球不平等带给美国的巨大特权、权力和财富。乔治·凯南在回忆录里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不能仅从意识形态来理解，而是要理解其目标在于改变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经济格局。^①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各方面突出的实力优势使美国输出自由主义体制与价值观的意愿更加强烈。冷战时期在国际秩序中占优势地位的主权原则，受到人权、民族自决、国际规则等普世原则的强烈侵蚀。冷战后，普世原则日趋强势，近年来，所谓的“负责任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理论试图在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为人道主义军事干预提供合法性。^②国际社会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主权原则主张限制侵犯主权，普世原则坚持可以干涉主权。^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塑造并推行普世原则，中、俄两国在基本淡化或摒弃世界革命理念后，则愈加坚持传统主权观念，反对以任何理由干涉他国内政。^④

中、美就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争议出发点，即在于主权原则和普世原则两种国际秩序观念的激烈冲突。在国际社会关于主权原则与普世原则的争论中，中、俄两国立场基本接近，共同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普世原则为借口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美国认为俄罗斯的周边保护带（缓冲区）安全模式与自己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严重冲突，它使得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脱离美国的“门户开放”规则而自成一统；中国的发展模式（一部分美国精英认为以低福利、低环保标准等为主要成本优势）则对美国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及其秩序形成更为严重的冲击，它正在以“违反自由贸易规则”的方式，逐渐削弱和颠覆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在其中的竞争优势。在政治发展模式选择方面，中、俄威权式政治体制与美国领导的西方奉行的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存在

① [丹麦]李彤主编：《金砖国家及其超越：新兴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林宏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② 同上，第5页。

③ 左希迎：“南海仲裁案与南海秩序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策简报》，2016年7月，总第7期，第9页，http://nads.ruc.edu.cn/upfile/file/20160718093358_236286_53398.pdf

④ 但中俄关于国际秩序应采取硬主权原则这一共同点，显然也对中俄战略合作中存在的利益不一致问题的解决形成了阻碍。

着根本的差异。而近年来西方发展模式面临的经济危机、信用危机，^①导致威权式政治体制在全球范围内有重新抬头之势，这使得美国部分精英倍感焦虑。^②

二、美国与中、俄之间的相互依赖

二战结束后，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在美、苏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同时，美、苏分别对自身阵营内外国家施加控制和影响。苏联解体后，美国拥有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凭借以自身为核心的联盟体系，对联盟内外国家予以规制和操控。二战结束至今，大国之间没有像之前时代那样战争频频，基本维持了和平局面，大国之间的传统安全竞争虽然仍在持续，但其对大国形成的安全威胁有所缓和。有学者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已经基本处于大国无战争和主权零死亡的非霍布斯文化状态。^③冷战结束后，以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为标志，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跨国犯罪、生态、气候、环境等问题层出不穷，几乎波及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形成威胁与挑战。与冷战结束前相比，安全威胁延展为两个维度：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使大国之间出现新的合作需求，传统安全威胁的缓和，使大国之间具备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

① 2001年以来，美国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法、英、美对“阿拉伯之春”运动推波助澜，导致中东乱局和恐怖主义进一步肆虐；2006年开始逐渐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通过连锁和放大效应，最终引发美国和全球范围的金融与信用危机，并严重波及实体经济；上述事件使人们对自由主义制度的信心遭受严重打击。

②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③ 参见杨原著：《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姜鹏、斯捷潘尼杜什卡·波波夫：“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传统安全问题在大国之间虽然没有发生激化，但究其原因，是国际体系文化的变迁，如由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转化，个别国家（如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或地区（如欧盟）内部的国际关系已经进入康德文化阶段所致，还是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单极优势对国际秩序的看护所致（冷战时期，美、苏共同发挥了类似作用），抑或是核武器在大国之间形成的相互威慑平衡所致，尚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议。而就主权国家所面临安全问题的威胁程度而言，显然，传统安全问题大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但也不应就此忽视非传统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美、俄、中之间的相互依赖也逐渐深化，体现为多维度、多领域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形成了美俄中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结构，而非类似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以全面对抗为特征、单纯安全相互依赖（以负向的相互威胁和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为特征）、排斥其他领域相互联系的关系结构。

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和大卫·辛格（J. David Singer）认为，互动关系的选择性增加有助于保持国际稳定。当某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同时面临自身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各种问题时，利益与忠诚关系将呈现相互交织的状态。即A国与B国尽管在某一个问题上存在矛盾，但在处理与国家C的某一问题时，A国与B国之间却存在共同利益。这促使A国与B国在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时，需要权衡的因素增多，因而诉诸冲突的概率下降。^①美国与中、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利益交织，可能有助于降低美国与之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敌对与冲突意向。

美国与中俄之间存在异常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竞争领域之外还存在多维度、多领域的合作需求与空间。这形成了中俄与之发生冲突与对抗的成本和代价叠加问题，从而在中俄与美国之间形成了有利于抑制冲突与对抗的复杂相互依赖结构。中俄在实施战略合作行动时，需要对其加以评估。而中俄之间的战略利益平行与分歧，则使双方在采取合作行为时，增加了战略收益与损失计算的复杂性。如从双方战略利益分歧的角度来看，一方对共同对手的过度抗争，是否会对对手造成影响战略平衡的损耗，从而使双方的战略利益分歧上升为主要矛盾；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己方是否会遭受影响战略平衡的损失，另一方是否会获得影响战略平衡的收益，也较有可能出现在双方的战略计算当中。对以上情况的战略考量，只有在双方共同面临紧迫的安全威胁时，才能被置于相对次要的议程，而失去对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影响作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力衰落，不再像当年作为冷战对手的苏联那样，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具有持久影响

^① Karl W. Deutsch and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1964, Vol.16, No.3.

力的大国。它仍然能够对美国追求自身核心利益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WMD）、维护中亚局势稳定、反恐、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扩散，以及诸如北极等新的国际问题领域，俄罗斯和美国具有共同的重要利益与合作空间。^①

此外，就对美国的立场和态度而言，俄罗斯视其为对立性质，但仍试图寻找机会改善俄美关系，以期参与西方发展进程，并将美国视为值得学习的榜样。面对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压力，俄罗斯并不想与其正面对抗，以免陷入新的冷战，重蹈苏联过度对外伸张的覆辙。俄罗斯希望美国能够理解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与发展困境，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争取到一个较为体面和有利的位置。俄罗斯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参与西方发展进程，成为西方伙伴关系中的平等一员，解决自身的安全与发展问题。^②因此，尽管在俄罗斯总统的言论中，作为“他者”的美国饱受诟病，但“他者”美国仍然常常被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他者”中国的经验则被视为一种十分特殊的模式，俄罗斯未必会效法。对中国“他者”的建构仍然受到俄罗斯自我认同的历史路径支配，而美国作为更重要的“他者”，则成为俄罗斯政治进程合法化的重要参照物。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俄罗斯领导人的心目中，很难用“东方”来取代“西方”这个“关键他者”。^③

至于中美关系，仅就中美之间在经贸、金融领域存在的敏感性相互依赖来说，尽管美国相对于中国并不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美国对中国廉价商品的进口需求，以及对中国购买国债等金融产品的市场需求，从长远来说似乎并非不可替代，但是，就当前国际经济规则框架和美国的选举政治制度来说，长远的“低脆弱性”，并不能直接缓解当前的“高敏感性”。除非美国决心彻

① [美]安琪拉·斯登特著：《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宋和坤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5页。

② 普京认识到，俄美之间实力差距巨大，俄无力与美全面争锋。因此，俄罗斯在对美关系上逐渐回归理性务实。不论美国对俄如何加大制裁，俄始终没有放弃改善对美关系的希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善对美关系、缓解西方制裁和围堵是2019年俄外交要务。冯玉军：“2019年，俄罗斯在寒冬中期待春天”，《解放日报》，2019年1月7日，第4版。

③ O·玛琳诺娃：“利用外部‘他者’：俄罗斯总统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表述（2000-2015）的比较分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第177页。

底打破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框架，另起炉灶。而这一国际制度重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其间遇到的各种阻力、产生的复杂后果也可能会远远超出最初的预想。而美国国内选票政治的短视效应，是与其基本政治体制紧密相连的，除非面临极为紧迫的外部威胁或在国内成功建构这种认知，否则难以排除政治领导人出于拉选票的目的就对外关系问题做出妥协。因此，美国在经贸、金融领域对中国的“高敏感性”并非短期内能够消除或转化。从长远角度来说美国对这一问题的“低脆弱性”潜力，并不能在短期内发挥扭转局势的关键作用。^①此外，中国与美国在核不扩散、经贸、金融合作、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地区稳定、环境、生态、气候等领域都存在共同利益与合作需求。在伊核、朝核、半岛稳定等问题上，美国依然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合作与支持。^②

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观察，在中、俄联合抗衡美国施加的政治、经济、安全压力的框架内，实际上美国的介入也成为中俄关系中最重要平衡因素，俄罗斯似乎并不希望美国过度衰落，以至于国际上缺乏抗衡中国的有利因素。从中俄关系的历史角度观察，冷战后期苏中关系的改善，其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即在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开始出现影响三国战略平衡的上升趋势。而当代中国的全面快速发展，使中国相对于美、俄的实力地位处于上升区间，中俄美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实力不断上升，必然会引起俄罗斯对中国崛起方式与后果的疑虑，使中俄关系向好的外部因素遭到侵蚀。在这种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显然不认为与美国陷入冷战式对抗是明智之举，也不希望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这从俄罗斯在特朗普上台后急于与美国进行对话并改善俄美关系，也可见一斑。

① 当然，中国在经贸、金融、科技及其他相关领域同样对美国存在较高的敏感性，甚至脆弱性。

② Графов Д.Б.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я и США в связи с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м спором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США-Канада.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литика, культура. 2018. №9.

三、中俄之间的战略关系

从中俄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框架观察，双方利益诉求不一致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战略利益平行与战略利益分歧。中俄之间的战略利益平行系指，中俄面临的外部问题分属不同政治层级的不同议题领域，而即使均处于高政治层级的国家安全领域诸议题，也分别位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区域。如中国面对的安全问题主要存在于东亚-太平洋地区，俄罗斯需要应对的安全挑战则基本来自于其西部与南部周边地区，包括东欧、波罗的海、巴尔干、高加索、中亚、中东等地区。中俄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系指，中俄均为所在地缘政治板块的陆权大国，由于中俄之间的力量发展不平衡，加上地缘临近与历史恩怨，在军事技术合作、远东开发、能源贸易、中亚关系等领域，俄罗斯对中国存在一定的疑虑和排斥心理。

（一）中俄之间的战略平行

从国际权力结构与国际秩序规则角度来看，美国既反对俄罗斯建立势力范围的地缘抱负，视其为旧日帝国的死灰复燃与余孽；也反对中国通过国家力量整合资源，获取、维持并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对俄罗斯的顾虑是，现实的核能力和潜在的经济能力；对中国的顾虑是，现实的和潜在的经济能力与军事能力。美国仍然对俄罗斯究竟是敌是友存在疑惑^①，对俄既有核武库对美国的毁灭能力心有余悸，并试图通过遏制战略，挤压俄经济与地缘空间，使其维持一个软弱无力的地位或进一步分裂和衰落，使其发挥地缘影响力、维持核武库和发展军事能力的资源枯竭。^②而中

① [俄]И.А·萨夫兰丘克：“美国专家界对俄罗斯的基本战略观体系”，《俄罗斯学刊》，张健荣译，2017年第1期，第48-57页。

② 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遏制和挤压可以概括为外部围堵与内部颠覆。外部围堵包括：北约东扩，并在属于原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推动颜色革命，在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中，支持格、乌反俄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在叙利亚战争中，则试图支持反对派推翻亲俄的阿萨德政权；联合欧盟、日本等对俄实施经济孤立与制裁，以遏制其经济发展；利用俄维持和发展核武库的经济能力不足，退出《中导条约》，以谋求对俄核战略优势。内部颠覆主要是利用国际话语权，针对俄威权政体进行宣传战，并伺机利用俄国内反对势力与驻俄非政府组织，对俄发动颜色革命；支持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使其进一步分裂。

国则是当前自由贸易体系的受益方，力图维持自由贸易体系的现状。针对中国，美国主要是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修改自由贸易规则乃至重组世界贸易体系^①，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抽干中国未来提升军事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潜在经济资源。利用美国的巨大市场形成的不对称相互依赖优势，培养中国制造的替代者，并联合多边或单边实施修改既有国际贸易规则，提升美国的竞争地位，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对中国既有和潜在的军事能力提升的遏制，除了通过经济打压枯竭中国军事能力的未来发展之源，主要是通过构建和整合围堵中国的联盟体系^②，强化亚太地区军事部署，保持并扩大针对中国的前沿军事优势。

而对中俄关系产生干预作用的主要外部因素，是两国都面临来自美国的遏制，但美国对中俄的遏制方向与方式并不一致。对俄罗斯，主要采取向其视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地理区域推进和渗透的方式，压缩其影响力施展空间，体现为地缘维度的挤压，重点方向在地缘政治层面，包括东欧、波罗的海三国、巴尔干、中东、高加索、中亚等政治地理区域。而对中国，则主要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修补贸易规则，乃至重构贸易体系的方式，重新确立国际贸易秩序，削弱和瓦解中国的竞争优势，体现为规则维度的制约，重点方向在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层面，包括规则修订、秩序重构、体系重组等不同层次的国际行为规范方式。从美国对中、俄实施军事威慑角度来看，针对俄罗斯，主要是在其西部和南部周边地区对之进行围堵；针对中国，主要是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亚太同盟体系，加强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对美国来说，针对中、俄的遏制政策在地理部署上分为东西两翼，虽然分别针对中、俄的军事部署使美国的军力有所分散，但中、俄针对美国的

① 如美国利用基于国内立法的“301条款”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在重新签订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限制其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意指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毒丸”条款，并试图以此作为与其他经济体签订自贸协定的范例等。参见“中方认为美国‘301条款’挑战多边贸易体制”，新华网，2018-04-28，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28/c_129861762.htm；青木、郭伟民、于文：“美欲推广‘毒丸条款’孤立中国 中国驻加使馆回应”，环球网，2018-10-08，<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10/13199627.html>

② 如拉拢印度加入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加强跨同盟成员之间的多边互动（如美日同盟、美澳同盟成员美、日、澳等国的多边互动）等。

军事威慑进行反制，也由于地理空间跨度过大而不易形成合力。

从全球地缘经济、政治结构来看，俄罗斯与中国分属不同的地缘经济、政治板块，俄罗斯的经济、安全联系，主要指向欧洲地区，中国的经济、安全联系，主要指向亚太地区；俄罗斯的主要战略着眼点在于其周边地区，中国的主要战略着眼点已经超越周边地区，指向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国际秩序调整。中俄即使在反制美国问题领域内的利益方向和战略诉求也不一致，俄罗斯的主要目标是试图将美国势力从其周边地区驱离，^①并与欧洲建立排斥美国影响的一体化合作共同体；中国则试图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秩序。

从中、俄对国际秩序模式的偏好差异来看，俄罗斯理想中的国际秩序模式是 19 世纪的欧洲协调（亦称“维也纳体系”），其特点是建立在现状和均势基础上的大国协调。由大国来决定国际政治的安排和规则，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大国也要加以遵守。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威胁现状或是打破均势……大国间不彼此干涉内政。而安全——至少是大国的安全——是集体的（collective）和不能分割的（indivisible）。大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并彼此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②当前俄罗斯的优先对外目标仍然是建立具有经济、安全排他性的特殊利益范围，以适应俄罗斯的实力、资源与地缘特性。^③俄罗斯也不反对其他大国这么做，希望大国之间维持足以保证各自独立地位的大致均势，在彼此尊重对方在自身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利益”的前提下，共同治理国际体系。这与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秩序模式存在差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强调中美关系在国际体系与秩序中的突出意义，反对霍布斯式的零和思维模式，坚持超越霍布斯式想象^④的合作

① 但中亚地区，特别是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俄罗斯周边的侵扰及向其北高加索地区的渗透，使俄对美军在阿富汗及中亚的存在，也在一定时限内、一定程度上持容忍态度。

② 波波·罗：“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69-70页。

③ 这突出体现在俄罗斯将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后苏联空间视作自己具有特殊利益的地区，防范其他大国“过分”染指其间。

④ 霍布斯式想象，系指以霍布斯式的生存竞争视角观察国际政治事务。关于“霍布斯式想象”，参见波波·罗：“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

共赢理念，并反对以政治军事手段制造排他性利益范围和贸易壁垒。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项目负责人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r Gabuev)指出，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俄罗斯不被西方大家庭所接受，但在历史上，俄国精英一直将他们的国家视为欧洲国家。欧洲中心论有其深厚的基础，俄国数个世纪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主要来自西方。冷战时期，作为俄罗斯关注中心的美国也只是被纳入其精英世界观的西方范畴之中，并延续至今。1991年以后，新的精英阶层唯一的愿望就是将俄罗斯(和他们自己)整合进西方。^①

由于美国与俄罗斯始终存在战略分歧，冷战后美俄关系的重启屡遭失败。俄罗斯也试图对西方阵营采取分化策略，以排斥美国的方式融入欧盟主导的欧洲地区发展进程，为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寻求出路。1997年3月，叶利钦表明俄欲加入欧盟的意愿，强调欧洲事务应由欧洲人自行解决，倡议由俄罗斯与欧盟组成不受外来力量干预的统一的欧洲。2000年4月，俄试图通过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及对欧盟东扩的支持，消解北约东扩对俄的威胁，架空北约东扩的军事政治意义。^②从实际的双边经贸情况来看，欧盟多年来始终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俄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2018年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额为2941.67亿美元，与2017年相比，增长19.3%，其中，俄罗斯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28.3%，从欧盟进口增长了2.7%。欧盟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增至42.7%。^③

尽管俄罗斯也曾提出全方位外交的构想，欲借助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政治发展，重振其大国地位，但就目前的态势而言，其对外关系的重点仍然

①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俄罗斯对华政策：驱动力和决策过程”，《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3页。齐甘科夫指出，从历史传统来说，欧洲一直处于俄罗斯的“重要他者”地位，俄罗斯的荣誉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齐甘科夫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第4页。

②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XXI века. 2000-04-17. <http://svop.ru/public/pub2000/1263/>

③ В 2018 году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вырос на 19,3%. 2019-02-07. <https://russian.rt.com/business/news/600178-oborot-torgovlya-es-rossiya-rost>

在欧洲。^①正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CFR)高级研究员库普钱(Charles Kupchan)早前所预言的:长远而言,俄罗斯不会将中国视为可信任的伙伴,因为中国出于自身长远利益,要寻求更大的领域,要往东看,与美国和东亚邻国发展关系,这样也会促使俄罗斯往西看,寻求与欧洲发展商业和战略关系。^②尽管俄罗斯政府积极倡导“亚太战略”,试图推行东西方平衡的外交战略,但俄罗斯战略重心东移面临诸多障碍,以之替代与西方合作的可行性不高。^③

而在应对美国遏制与挤压的方式上,俄罗斯更倾向于采取搅局式的局部冲突的策略。前美国总统俄罗斯问题顾问安琪拉·斯登特(Angela E. Stent)指出,自1992年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认识到,与俄罗斯打交道的一种核心利益,始终都是防止俄罗斯在美国拥有切身利益的那些地区给它搅局,不论这些地区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大中东地区。^④而中国则高度重视全球与周边地区的稳定,力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撞,并试图通过谈判方式,与美国在协调彼此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特里斯认为,中国领导层确信中国需要逐渐地发展,即使相对其他国家和此前实力有所提高,仍需避免波动引发其他国家的妒忌、恐惧和强烈反对,从而顺利度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⑤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后,彼时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中正陷入与西方冲突状态,兹比格纽·布热津

①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如能达到680亿立方米/年,即能使俄中关系得到显著提升。但即使用这个数字与2013年俄对欧洲的天然气输出量(1630亿立方米)比较,也能够明显看出,对华天然气出口暂时还无法替代对西方的天然气出口。其他方面的主要经济指标也基本如此。1993-2012年,对俄出口仅占中国总出口量的1.83%,而对美出口却占到18.73%。俄在出口方面也对西方存在依赖。Dobbs: “Russia and China—Friends or ‘frenemies’?”

② “欧陆观察:‘普京当选 俄美关系或陷入低潮’”,参考消息网,2012-03-07,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2/0307/15758.shtml>

③ Dobbs: “Russia and China—Friends or ‘frenemies’?”

④ 斯登特著:《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前言,第3-4页。这类搅局式的局部冲突包括:拒绝因铀浓缩活动制裁伊朗、入侵格鲁吉亚并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收复”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等。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遏制与挤压面前,俄罗斯不断进行强硬的表态,也不时实施绝地反击,但这种干扰式冲突也是俄罗斯寻求引起美国关注并开启双边对话的一种战术手段,以迫使美国正视俄罗斯的实力地位与利益诉求。

⑤ 特里斯:“中国大战略:对综合国力的追求及其影响”,第41页。

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在对媒体发言中强调, 中俄不可能联手反对美国, 至少从近期来看, 稳定而非冲突更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需要进入印度洋和中亚, 再经这些地区进入西方, 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国际局势保持稳定。^①

综上所述, 就国家对外战略来说, 俄罗斯的主导策略是融入欧洲地区发展进程, 维护自身在后苏联空间的“特殊利益”, 而这二者的实现, 都需以排斥美国在当地的影响为前提; 而中国的主导策略是立足亚太地区, 维护该地区与国际局势稳定, 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及其秩序, 需要美国正面与积极地参与, 而不是将其影响排斥在外。由此可见, 除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主要关涉视野不同, 中国与俄罗斯即便在应对美国对自身所施加遏制方面的主导策略, 也基本处于平行状态。

(二) 中俄之间的战略分歧

俄罗斯至今仍然笃信霍布斯式的国际关系文化, 相信硬实力是决定国际权力结构和国家国际地位的唯一主导因素。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战略思维的教训仅是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个辅助信条, 即强大的经济竞争力与切合实际的安全战略, 能够作为硬实力得以保持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苏联解体后, 由于经济状况不振, 俄罗斯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综合国力排序每况愈下, 与其他大国 (特别是周边陆地与海上邻国) 的军事实力对比也愈来愈不容乐观, 其核武优势主要是来自苏联的遗产。但维持如此庞大的核武库, 需要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 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来看, 恐怕也难以维持长久。因此, 由离岸的相对温和的美国霸权引领国际秩序, 对俄罗斯的安全来说, 也不乏有利的一面, 特别是就大国竞争与对抗的传统安全领域而言。^②俄罗斯认为西方的衰落使自身获得了填补其留下的权力真空的机遇, 但这一机遇却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与威胁: 一旦中国取代美国取得国际霸权地位或建立与美国

^① Michael Hirsh, “Once a Hawk, Brzezinski Sees Hope for U.S.-Russia Relations: A Cold War hardliner explains why this time is very different”, 2015-11-27,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11/brzezinski-sees-hope-for-us-russia-relations-interview-hirsh-213400>

^② 如果美国的霸权进一步衰落或其退回孤立主义状态, 也不排除下述可能: 即在其霸权压制下的地区大国的安全竞争与对抗加剧, 甚至引发冲突或战争。

共治的新型国际秩序，不但会使俄罗斯重返大国地位的希望落空，还会对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形成直接挑战。而这种挑战与美国目前所施加的具有离岸防御性质的相对“温和”的遏制大相径庭，是一种陆权式的生死攸关的刚性权力竞争。^①

而从地区安全机制角度观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虽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机制建设，但中俄都属于秉持国家主权不容干涉观念（传统主权主义）的国家，双边的合作关系定位仍然囿于传统的主权国家关系层面，而非地区一体化机制建设，这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由于缺乏深刻改造双边地缘政治结构的机制与进程，事实上中俄仍然无法完全消弭双边关系中地缘与历史因素的影响。^②因此，地缘邻近及历史恩怨仍然是诱发中俄两国之间战略分歧的重要因素。从幅员、人口角度来说，中、俄均为洲级大国，也是施密特所称的战略性世界大国。^③两国拥有430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线，使两国之间存在难以回避的地缘竞争。^④历史上

① 波波·罗 (Bobo Lo) 认为，俄罗斯希望在西方衰落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获益，但中国因素对此形成潜在威胁：其一是中国可能成为新霸主，邻近中国的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使这一担忧更为加剧；其二是中美共治秩序的出现，将使俄罗斯降为类似二战后西欧国家的二流地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一旦实现，将大大加强这种恐惧。参见波波·罗：“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第81页。

② 但在外部因素（如北约、美日同盟等因素）作用下，中俄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也能够暂时搁置地缘矛盾与历史纠葛。

③ 施密特：《未来强国》，第169页。

④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总结道，对社会演变加以长期观察即可发现，国际关系中有一条普遍规律——毗邻大国彼此处于敌对状态。彼此相邻的国家是天然敌人，已是一条不言自明的政治规律。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o.6, p.33. 邻国是天然敌人，邻国的邻国则是天然盟友。天然盟友视之为防御性的外围联盟，在处于它们之间的国家眼中，则是“包围”。刘易斯·内米尔 (Lewis Bernstein Namier) 爵士称其为国际关系的“三明治结构”。L.B. Namier, *Conflicts: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42, p.14; also Namier, *Personalities and power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55, pp.111-112. 有学者认为国际体系文化的变迁，使毗邻国家之间的地缘竞争可以被“和谐共处”所取代。但既有毗邻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是否由体系文化变迁所致，尚有待证实。西欧国家变彼此敌对为倾向地区一体化的现实主义解释之一是，二战后，西欧诸国均已退出大国行列，并从整体上沦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冲区，而面临巨大的外部（特别是来自更为毗邻的苏联的）安全威胁。正如马丁·怀特所说，自1947年以来，美国致力于组建对抗苏联的西欧联盟。在来自更高层级的竞争压力下，地区竞争的动力将逐渐平息，因为二流国家已沦为大国之间

两国经历了极为复杂的恩怨纠葛。中国在近代曾长期遭到沙皇俄国的欺凌，冷战时期经历了与苏联从战略盟友到战略对手的复杂转化过程。历史恩怨不可避免地将对两国的现实关系产生潜在影响。地缘邻近与历史恩怨的作用相互叠加，为两国关系增添了潜在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历经 40 年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因国力孱弱而受尽列强欺辱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俄罗斯与中国皆为陆权大国，历史上俄国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俄罗斯精英与民众对中国的崛起未免心存疑虑。^①许多俄罗斯精英对中国存在戒备心理，还有人将中俄伙伴关系比喻成“莽兔联盟”。他们认为，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传统的中央帝国思想，并试图重建朝贡体系。^②2006 年，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尼古拉·斯帕斯基（Николай Спасский）说道：“亚洲目前发生的变化对俄罗斯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可能是最重要的挑战。”^③这种疑虑在中俄战略合作关系方面亦时有体现：中俄战略合作主要表现为联合抗衡美国的政治立场互助，而在军事技术合作、能源贸易、远东开发、中亚关系等领域却历经波折。

尽管克里姆林宫欲借向中国军售改善困窘的财政状况，但俄军方始终对面向中国的军售持异议，认为这将促使中俄军事实力对比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华军售的内容以零部件和设备为主，

的缓冲区。Wight, *Power Politics*, p.160. 美、加、墨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以美国对加、墨两国的巨大实力优势为前提的，北美三国由此实现以美国为主导的等级式和平模式。在不存在外部压力的条件下，实力相当的两个战略性世界大国之间能否“和谐”地毗邻而居，尚有待进一步观察。20 世纪 50 年代，拥有漫长边境线的中苏之间一度像美加一样相安无事，但那显然源于一种为人熟知的权力模式，即两国协同对抗对其形成的战略包围。Wight, *Power Politics*, p.165. 而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两国即陷入对抗与冲突之中，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对两国形成的压力再次大于两国彼此之间的恐惧为止。

① 与一方为海权国的情形不同，陆权国之间由于陆路相通而易受对方进攻，陆权国即使仅出于防御的目的也可能对对方发动预防性战争。关于陆权大国在安全竞争中可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相关分析，参见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美]杰弗里·曼科夫著：《大国政治的回归：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黎晓蕾、李慧蓉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年，第 168 页。

③ “Russia faces major security challenge in the East, official says”, 2006-06-06, <https://sputniknews.com/russia/2006060649101912/>

大型海、空军武器系统和平台几乎绝迹。2006 年开始，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被印度取代。^①从 2006 年起，俄罗斯曾一度以维护自身知识产权为由，几乎终止了中俄军事技术交流，并停止对中国军售。在此期间，中俄在军事技术合作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双方围绕交易价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产生一些内部性争论。同时，双方原本制度化的军事技术合作年度会议也被推迟。^②近年来中俄军事武器合作也逐渐陷入困境。随着中国崛起态势的日益显现，尤其是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俄罗斯对于向中国出售高端武器越来越谨慎，并且明确表明不愿向中国出售最尖端的武器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却不断向印度出售尖端武器。……虽然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尖端武器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印边界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印度国内对于中国的防范也一直未放松。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帮助印度强化军事能力，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的意图也会引起中国的警觉。^③俄中军火贸易在过去十年有所削弱。2004-2013 年，俄对华武器出口额比上一个十年增长 14.5%，但中国的军费在这两个十年内增长了 229%，这反倒说明俄中武器贸易密集度在这一时期明显下滑。^④

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都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俄罗斯向中国的能源出口量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对中国石油进口的贡献率仅为 11-12%，低于一些遥远的非洲与波斯湾产油国。^⑤俄罗斯在向中国发货问题上，如输油管道建设等方面，一直有意拖延。俄罗斯还试图在中、日、韩和欧盟等能源买家之间制造矛盾与竞争，以操纵能源政治实现俄罗斯利益最大化。俄罗斯的这些做法使

① 李大鹏：“苏-35 军售暴露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多个主要障碍”，凤凰网，2015-12-18，http://news.ifeng.com/a/20151218/46726771_0.shtml

② 李承红：“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93 页。

③ 彭念：“中俄关系应突破制约避免空心化”，爱思想网，2013-03-03，<http://www.aisixiang.com/data/61715.html>

④ Dobbs: “Russia and China—Friends or ‘frenemies’?”

⑤ German Gre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on right track”, 2006-09-11, <http://en.rian.ru/analysis/20060911/53751975.html>

中国对俄罗斯成为可靠的能源安全伙伴的期望值有所下降。^①2002年12月份,被业界认为已成定局的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输油管道项目遭遇挑战,然后是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的尝试无功而返。^②直至2008年及以后,中俄才在能源贸易领域取得一系列进展,这显然与国际金融危机及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的经济与财政困境有关,同时也受到新能源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国际能源供应充足的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作用推动国际能源供求进入买方市场。而就国际能源价格博弈来说,俄罗斯显然希望维持高油价,但高油价却会使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上升。

远东地区是俄罗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具有重要价值。2010年,时任俄联邦总统德·梅德韦杰夫(Д. Медведев)在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亚太国家合作会议上指出,远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恶化使该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更加严重,是俄罗斯需要应对的最令人不安和危险的问题之一。^③然而,尽管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复苏,但由于俄远东地区与中国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密度对比严重失衡,部分俄精英与民众认为,如果对远东地区的中俄经济与人员往来不施以相应限制,未来远东地区将逐步中国化。加布耶夫指出,俄罗斯从整体上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拥有文化优越感,苏联作为“老大哥”的记忆更是强化了这种优越感。这些因素创造出一种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来自西方的各种谬见代替了对中国的真实了解。例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警告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将落入中国之手,许多俄罗斯精英也就恐惧一个崛起的中国。莫斯科存在着大量扭曲清晰观察中国的因素:缺乏对中国目标的理解、1969年苏中边境冲突的遥远记忆、根植于传统的观念,即将东方人口稠密的国家视为对人口稀疏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威胁(利用19世纪兴起的“黄祸论”),以及俄远东地区和中国边疆地区不断拉大的经济和人口不平衡。^④因此,俄罗斯对远东地区中俄边境基

① 怀兹:“中俄安全关系:既非伙伴关系又无热忱的战略平行状态?”,第29页。

② 王以超:“中石油兵败俄罗斯幕后”,《财经》,2003年第3/4期。

③ Медведев Д.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о совещании п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2010-07-02.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8234>

④ 加布耶夫:“俄罗斯对华政策:驱动力和决策过程”,第143页。

基础设施建设和边境贸易，都曾实施一些限制措施，如对远东地区中俄边境能源、电力运输、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意拖延，对中国商人灰色清关行为的严厉打击及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较高关税等。

尽管中亚地区已经从苏联独立出来，与俄罗斯共同处于独立主权国家的国际法地位，但无论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还是国际威望来说，中亚地区对俄罗斯均具有重要价值，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式也使俄罗斯精英与民众对中亚存在一种特殊的地缘认知，视其为俄罗斯的后院，认为俄在这一地区具有特殊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一些俄罗斯精英认为，尽管美国在中亚强劲的存在构成了更为直接的地缘政治挑战，但中国由于其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其中亚的历史，从而在根本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①俄罗斯“原苏联地区研究中心”领导人弗拉索夫说：“针对中国崛起，各国看法不同。中亚地区也非常担心中国影响扩大，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②特列宁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缘关系方面存在竞争。”^③俄罗斯精英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损害了俄罗斯在这一传统势力范围的威望，使中亚国家有机会在中、俄、美之间进行平衡外交，降低了这些国家传统的对俄依赖与服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利益也受到威胁。为此，俄罗斯在这一地区不断加强以自身为主导的军事、政治、经济（包括金融、关税、市场、能源生产与运输）一体化进程，并试图以此抵御并削弱西方联盟或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例如，俄罗斯官员一直积极阻挠中国为获得中亚地区的能源资产的多数股权所做的努力，他们更希望这些资源仍然处于俄罗斯强大的能源公司或者中亚国家易受俄罗斯影响的政府的控制之下。俄罗斯政府还一直在尽力防止“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也反对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如果建立这个自由贸易区或统一的市场，中国的廉价商品

① 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及中亚的权力制衡：融合还是竞争？”，《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44页。

② “俄媒：俄力挺印度 削弱中国上合组织地位”，凤凰网，2011-06-16，<http://i.ifeng.com/news/hwkzg/news?aid=17206722&all=1&p=1>

③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普京不希望与美国对立”，环球网，2012-05-06，<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05/2690900.html>

就会大规模涌入中亚当地的市场。^①在前述谈及中俄不会联手反对美国的同时，布热津斯基指出，中俄在中亚地区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会逐渐提升，而俄罗斯对此却无能为力。^②俄罗斯政府仅仅在遏制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方面做出了微弱的努力，其原因之一即在于：美国介入中亚地区的事务能够降低俄罗斯对“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将会影响中亚地区的政治”一事的焦虑感。^③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针对西方联盟的利益诉求存在明显差异，俄罗斯更加关注防范西方联盟对中亚地区的势力渗透，以免对自身地缘优势形成威胁；而中国更加关注打击三股势力，以维护地区稳定，保障自身能源来源安全，防止不稳定因素对自身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形成威胁。^④

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曾疑虑重重，甚至要求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与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而非中亚各主权国家对接。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俄的战略遏制，导致中俄面临的国际压力趋于紧迫，对外战略决策的选择空间遭到压缩，从而促使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趋向于紧密，即促进中俄战略合作由利益互助向军事同盟转化。但是，美国与中俄之间基于不同政治层级合作空间的多维度、多领域的相互依赖，以及美国对中俄的战略遏制的间接性、和缓性（对于美国来说，“遏制”政策具有这样一种色彩，即当面对某种威胁而无法将其彻底消除时，在迫于无奈之下，采取以限制其消极后果进一步蔓延为目标的、带有防御性质的长期战略），导致中俄面临的国际压力趋于和缓，对外战略决策的选择空间得以延伸，又促使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趋于松散，即阻碍中俄战略合作由利益互助向军事同盟转化。中俄之间的战略利益平行与分歧，增加了双方对战略合作的成本-收益（包括其对两国之间及两国与第三方之间战略平衡的影响）计算的复杂性，促使中俄对双方战略合作由利益互助向军事同盟转化的疑虑增加，对中俄战

① 怀兹：“中俄安全关系：既非伙伴关系又无热忱的战略平行状态？”，第 73-74、76 页。

② Michael Hirsh, “Once a Hawk, Brzezinski Sees Hope for U.S.-Russia Relations: A Cold War hardliner explains why this time is very different”.

③ 怀兹：“中俄安全关系：既非伙伴关系又无热忱的战略平行状态？”，第 74 页。

④ 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及中亚的权力制衡：融合还是竞争？”，第 45-46 页。

略合作由利益互助向军事同盟转化形成阻碍。

按照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国际关系文化分析框架，^①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后联合日本、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时，推动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向深度拓展（如特朗普政府出台印太战略），标志着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攫取霸权利益，已经失去了理智的战略克制，对中俄的合法利益乃至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对美国失去理智控制的欲望（利益）与精神（地位和荣誉）追求，中俄必然产生警惕，从而使国际体系大国传统安全困境加深。如果美国仍然一意孤行，以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行为模式，处理与中、俄之间的关系，中俄对外战略选择将受制于恐惧动机而变得偏重于物理能力的整合（如组建军事同盟）。作为施密特所称具有战略性世界大国资质的中俄，不可能对美执行无条件追随政策，当其面临紧迫的外部威胁、对外战略选择变成要么制衡要么追随的二选一时，必然首先选择制衡而极可能优先采取军事结盟的应对手段。

尽管美国同时针对中俄的双向遏制政策，使中俄之间的利益互助向军事结盟转化的可能性有所上升（具体表现为利益互助的范围与层次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重返亚太之后，中俄之间的能源、军事合作又取得新进展，就中亚利益冲突管控机制也达成新的共识），但就当前及不久的将来而言，中俄之间仍存在诸多维度和领域的战略利益平行与分歧，导致中俄战略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停留在利益互助层面，由利益互助向军事结盟转化的动力尚嫌不足。正如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威什尼克（Elizabeth Wishnick）所提出的，不应将中俄关系视为一个反对美国的阵营，也不应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一个其内部完全不存在矛盾的组织。尽管中俄两国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计划高度存疑，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中亚国家之间——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利益分歧注定会妨碍中俄及中亚国家采取任何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行动。^②

① 关于勒博的国际关系文化分析框架，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伊丽莎白·威什尼克：“对中、美、俄在中亚的竞争与合作的展望：处在格鲁吉亚危机阴影之下的三国关系”，载于《中国与俄罗斯：竞争与合作》，第133页。

四、中俄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的特征 及其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的表现

在体系结构压力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互动背景下，中俄战略关系在无战略合作与军事同盟型战略合作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摇摆，而这一战略合作区间以利益互助为主要特征。就当前及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期而言，在美国针对中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印太战略^①，针对俄执行外部围堵、内部颠覆战略的背景下，中俄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存在由松散走向紧密的潜在可能性；但笔者认为，受制于前述中俄美三角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中俄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仍将表现出下面一些特征，并在俄罗斯针对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立场上有所表现，对此中国应做好相应的战略预判与应对。

（一）被动性

从国家安全及其他利益的角度观察，被动性是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特征。中俄战略利益互助的最大成果在于两国边界领土争端的解决，以及长达 4300 公里的陆地边界线的划定。具有互不侵犯条约意义的中俄边境划界协议，结束了此前双方彼此戒备的紧张状态，两国不再将战略武器指向对方，并大规模裁减了各自保卫国境安全的军队。为双方赢得后方安全的同时，在两国内陆方向，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安全成本的下降，也为两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节约了大量资源。此外，双方在毗连边境方向的防卫压力的缓解和安全成本的下降，使两国在其他方向的进攻与防御潜力得以释放和增强，为实现其他领域和安全方向的利益诉求赢得了先机。

但与此同时，两国在面临来自第三方的安全和其他利益挑战时，特别是在大国彼此竞争和对抗的传统安全领域，并未形成积极有效的高政治层级的同盟式战略协调与互助机制。作为主张与遵循传统主权主义原则与立场（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国家，至少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中俄暂不会考虑建立同盟型战略合作关系。两国面临的安全挑战的非紧迫性、双方战略利益的平行与分歧、与第三方安全和利益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性，也可能对双方战

^① 印太战略从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与强化。

略合作的积极性产生抑制效应。

（二）局限性与牵连性

由于战略利益方向的不一致，以及中俄在全球战略能力上的局限（战略能力主要局限在自身邻近地区）^①，因此，中俄利益互助存在覆盖范围错位和非直接性等特征，这与美国在全球主要战略区域对盟友的直接武力、情报或后勤支持形成明显差异和对照。中俄之间的非重合性利益互助，导致彼此战略关系更具牵连性特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全球的军事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渐式微，在东亚、太平洋地区也表现出严重的战略能力局限。从实际战略能力上来说，俄罗斯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能够给予中国的直接支持，只能是立场或姿态上的。除此之外，俄罗斯在被越南实际控制的中国声索主权和专属经济权利的海域，与越南合作开采油气资源，使俄罗斯在实际行动上，与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支持中国立场的态度，出现矛盾与冲突。因此，俄罗斯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支持中国立场的意愿和能力，可能都是有限的。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对中国立场的有限支持，也可能需要以中国在俄罗斯所面临的其他棘手问题（如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及其引起的西方制裁或其他类似问题）上，给予基本对等甚至代价更大的支持作为交换，使中国卷入与自身战略利益无直接关系的国际争端之中。

但牵连所涉及第三方（美国）的同一性，又使这种牵连所形成的战略成本降低，效果增溢。中、俄所面临的类似主要国际战略问题，均由美国制造或引起（或与其密切相关）。尽管中、俄面临的此类问题的性质、方向不尽相同，但中、俄任何一方与美国进行的战略博弈，均会牵制美国的部分战略能力与关注度，从而在客观上对另一方形成间接支持，使其所面临的战略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俄罗斯在波罗的海

^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因放弃与西方的战略对抗以及经济严重下滑，而大幅削减军事开支，将战略空间收缩到国境周边地区。尽管俄罗斯继承了部分苏联遗留的海外军事基地，但由于战略思维的转变和成本担负能力的下降，放弃了其中的绝大多数。而中国虽然近年来国际影响力和战略能力大幅提高，并在海外（吉布提）建立了保障（军事）基地，但与中、俄针对美国施加的战略压力实施联合反制所需的战略对接，尚有较大差距。

针对北约飞机抵近领海或国境侦查实施的监视、驱离行动，与中国舰艇在南海对美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实施的类似做法，起到了立场上彼此支持、行动上遥相呼应的增溢效果。

尽管支持俄罗斯抗衡美国及其主导的同盟体系的地缘挤压和经济制裁，也有利于牵制美国的力量，客观上缓解美国给中国造成的现实和潜在压力。但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不对抗、合作共赢等诉求，为了交换俄罗斯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对中国立场的支持，在与中国没有直接战略利益关联的问题上抗衡美国，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诉求存在冲突的一面。

（三）可变性

如前所述，虽然中俄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是一致的，即美国及其主导的同盟体系，但这种压力与威胁并未上升到战争一触即发、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势，即尚不存在由极端强迫力形成的严厉外部环境条件。此外，中俄分别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安全威胁，也并不具有较高级别的方向一致性。中俄面对美国施加的国际压力与安全威胁，均有除战争以外的多种应对选项，中俄在抗衡美国的应对方式选择上，并不仅限于极端外部强迫力形成的唯一“出口”。这种情境使双方在针对外部安全威胁采取制衡行动时，仍然会纠结于成本与代价或利益与补偿方面的考虑。而俄罗斯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对中国立场的支持，由于并未面临严厉到除战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国家安全威胁，显然，属于双方在非严格外部条件规定下的利益不一致情境下的互助行为，而不属于在严格外部条件规定下的利益一致情境下的攻守同盟。^①

中美、俄美关系虽然存在不少龃龉，美国也常常发出欲对中俄进一步实施战略遏制的威胁，但中俄两国与美国的关系仍不是全面对抗性质的，中俄分别与美国存在战略利益协调和互补的空间和场域，中俄与美国的关系仍然

^① 但即便双方共同面临战争威胁，基于对战争威胁来源的相对实力及其威胁程度的认知差异，也可能导致其中一方或双方实施推卸责任（绥靖）行为，但这属于认知错误导致的结果，与现实主义关于制衡与追随的逻辑分析本身无关。

处于多维度、多领域的复杂竞合博弈态势，属于竞争中有合作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

俄美、中美关系的演化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而非一定是无法调和的敌对关系。而作为中美、俄美关系函数的因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中俄之间尚存在战略利益平行与分歧（只能暂时将其视为常量），中俄之间的互助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变数。^①由于中俄战略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中美、俄美关系演化的制约与影响，因此，俄罗斯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对中国立场的支持也并非是非牢不可破或一成不变的，加上其他地缘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某种对中国不利的变化趋势，如置身事外或左右摇摆（持骑墙态度）。

同时，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两国利益不一致还具体表现为：俄罗斯在南海地区的现实利益，与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权利诉求相冲突。由于东盟各南海权利声索国海洋资源开发技术水平落后，加之资金短缺，长期以来，它们采取与外国公司合资的方式，开采中国南海权利声索地区的油气资源。其中，近30年来（2013年前），越南与俄罗斯（1991年12月以前为苏联）合作的越苏石油联营公司（Vietsovpetro），从该地区白虎、金龙等油气田累计开采石油1.93亿吨、天然气230亿立方米，两国共同获利数十亿美元。^②而中国反对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权利依据，则是本国政府历史上对南海地区的有效行政管辖，依据这种历史管辖权，中国在九段线内的南海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利，包括对南海诸岛礁及相关海域由历史形成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这与越南（其中部分开采活动与俄罗斯合作）开采南海油气资源所依据的所谓“国际规则”是存在根本冲突的。^③俄罗斯由于自身与越南合作在九段线内的南海海域开采油气资源，与支持中国在这一海域主

① 事实上，美国精英圈子内已有联俄制华的声音，特朗普对这一观点也持肯定态度，并打算在自身总统任内将其付诸实施。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纷争的搅局，这一计划未能真正付诸实施。然而就未来而言，并不能排除美国在俄美关系问题上的大幅度政策转向；而俄罗斯则始终期待能够与美国改善关系，缓解自身安全与经济压力。

② “VIETSOVPETRO”，2013-09-03，<https://vietnam.vnanet.vn/chinese/vietsovpetro/49838.html>

③ 关于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坚持的“主权原则”与越南等国坚持的“国际规则”的冲突，参见左希迎：“南海秩序的新常态及其未来走向”，第33-35页。

张历史性权利的立场相抵牾。而中国在这一海域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正是反对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权利依据。

此外，俄罗斯为摆脱西方的政治孤立及自身发展困境，正努力谋求融入东南亚地区发展进程，为自身发展和对外影响力的提升提供助力。近年来，俄罗斯与南海周边国家频繁开展战略对话，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积极融入多边对话机制和多边组织，对东南亚国家邀请其“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和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做出积极响应：提出加强地区一体化的路线图，愿意积极参与东南亚统一社会经济体建设；在 2014 年版军事学说中提出“协助亚太地区构建基于非结盟原则的新安全模式”。同时，俄罗斯与越南达成重新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的合作意向，目前，俄空天军飞机、军舰和潜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该基地。^①通过装备出口、技术合作、军工展览等方式试图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军售伙伴包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并积极开拓菲律宾、文莱等其他国家市场。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之间签署“自贸区协议”，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积极发展与越南在核电领域、与越南、印尼在航天领域的合作。

而与此同时，在共同面对美国战略遏制与挤压的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战略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16 年 6 月 10 日，俄联邦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М.В. Захарова) 在媒体发布会上声明，第三方介入南海领土争端将导致地区局势更加紧张，俄罗斯作为领土争端的非当事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也不会介入该争端，当事各方应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解决有关问题。^②2016 年 6 月 25 日，普京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对南海领土争端问题的说法是，希望保持该地区和平与稳定，但并未展开进一步的具体说明，也未提及如何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③2016 年 7 月 14 日，“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俄联邦外交部再次声明，与南海领土争端相关的协商和谈判应

① 胡丽雯：“俄媒评俄军重返金兰湾利弊得失：令地缘政治复杂”，参考消息网，2016-08-26，<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60826/1281227.shtml>

② Брифинг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В. Захаровой. Москва, 10 июня 2016 года. 2016-06-10. http://www.mid.ru/web/guest/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2313531

③ 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2016-06-25.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273>

在有关各方之间直接进行，俄不是南海领土争端的当事方，不会卷入南海争端，^①但俄方随后又与中国在南海这一地缘敏感地带进行了联合军演。^②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在访华期间，表达了对中国方面的支持。2016年9月5日，普京于G20峰会（杭州）期间表示，对中国不承认南海仲裁案的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强调俄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法律程序，而非政治立场。^③

基于此，俄罗斯在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的立场，显然也将受到其在该地区对外关系结构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中、美及其他各南海权利声索国相互对立立场的困扰中。^④

结语

从理论上来说，中俄战略合作性质的变化区间处于无合作——军事同盟之间。中俄战略合作性质的变化，受到中美、俄美冲突，中美、俄美相互依赖，中俄战略平行与分歧等变量的相对关系的影响。中美、俄美冲突促使中俄战略合作性质从无合作向军事同盟方向移动；中美、俄美相互依赖，中俄战略平行与分歧，促使中俄战略合作性质从军事同盟向无合作方向移动。就目前中美、俄美冲突加剧的国际背景而言，中俄战略合作性质具有向军事同盟方向转化的潜在动因；但受制于中美、俄美相互依赖、中俄战略平行与分歧等变量的影响，中俄战略合作性质向军事同盟方向转化的现实可能性仍然是比较有限的。笔者认为，在当前及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中俄战略合作仍将在利益互助区间摇摆，而难以越过利益互助与军事同盟之间的界限。

就目前南海形势而言，俄罗斯考虑到对美、中及地区国家的关系平衡，

① Брифинг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В. Захаровой. Москва, 14 июля 2016 года. 2016-07-14. http://www.mid.ru/web/guest/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2354135

② Учение «Мор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 2016»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о качественно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оперативной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ТОФ и ВМС НОАК. 2016-09-19. https://function.mil.ru/news_page/country/more.htm?id=12096453@egNews

③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завершении рабочего визита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саммите «Группы двадцати». 2016.09.05.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press_conferences/52834

④ 俄罗斯也可能以在中美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对美讨价还价的筹码。

针对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立场，可能仍然较为模糊和摇摆。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对中国的支持意愿与能力均较为有限。仅就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南海地缘形势演化而言，这一结论仍然是大概率事件；尽管俄罗斯对美国在北极援引航行自由原则，持否定态度，^①但在航行自由原则问题上，并未明确宣布与中国联合予以反制。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对俄罗斯所持任一明确立场的对冲制约因素较多，因此，持模糊和摇摆立场，最符合其所处的存在许多矛盾与纠葛的国际地位。尽管不排除大国对立关系激化，会导致中俄在这一问题上的结盟式合作，但这一情境出现的概率较低。

从俄罗斯针对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立场及其成因来看，为使两国的合作关系从利益互助向利益协调的方向转化，中国应审时度势，采取有效措施，在两国之间增进共识。应借助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构筑的双边政治互信，增进双边的共同利益，促进双边的利益一致性，减少因利益不一致引发双边互助过程中潜在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②同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多维度、多领域地强化双边的复合相互依赖，并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不对称结构转化与发展。

此外，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时，还应尽量减少对方的战略疑虑和误解。如在实施涉及俄罗斯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对外举措时，应充分注意和评估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经济方面的疑虑和担忧，并采取对话、磋商、合作、补偿等有效措施，使之得以缓解或消除。以免因俄罗斯对中国的疑虑或误解，影响其在南海战略方向上对中国的声援与支持，尽管这种声援与支持可能仅仅是立场与姿态上的。如对俄罗斯来说，中亚地区有着较高的地缘关系敏感度，因此，在中亚地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应重点关注俄罗斯的安全与利益诉求，尽量在有俄罗斯参与的场景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或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内，开展各项活动。

① “俄议员：俄将对犯境者严惩不怠”，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8-12-23，<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12231027186897/>

② 有中国学者指出，能源、武器等中俄传统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的潜力有限，中俄应突破传统合作领域的局限，探寻新的合作领域。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将中俄合作领域定位到地区组织以及国际组织。中俄在全球以及地区重大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中俄理应相互协调，共同应对。参见彭念：“中俄关系应突破制约避免空心化”。

而在目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且在南海存在现实利益的情况下，除了应进一步强化中俄在各个维度、领域的相互依赖以外，同时应该对中俄战略合作，由利益互助向军事同盟方向转化保持审慎态度，以免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形成战略僵局，陷入传统安全困境而失去战略弹性。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显然不利于中国尽量延长战略机遇期，以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而从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战略来看，俄也可能会对与中国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持消极立场，尽量防止与西方世界陷入新冷战格局，避免俄罗斯依托欧洲实现安全与发展目标、回归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目标落空。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logical interpretation,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from loose to close, is embodied in a continuous curve from non-cooperation to military alliance. The dual gam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geopolitics, formed by China-Russia-U.S. strategic interaction, is key factor to the change of degree of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cluding their trilateral strategic conflicts and interdependence, as well as strategic parallelism and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For the present and foreseeable future,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ll remain exchanges of interests, and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based on their approaches to the United Stat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Against this international context, China should strive to dispel Russia's strategic doubts, strengthen their bilateral interdependence and transform it into an asymmetric structure in China's favor, so as to reduce potential vulnerabilities and uncertainties during their mutual as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e wary of the upgrading of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to the military alliance, so as to avoid destructive impacts 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China.

【Key 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China-U.S.-Russia Relationship,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логического вывод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ереходит от свободного к тесному, что отразилось в непрерыв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от отсутств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 военному альянсу. Структура двойной игр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власти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м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м фактором, влияющим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епен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ключ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и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ежду США,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а такж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араллелизм и конфликты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 в обозримом будущем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останет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бмена интересами и будет проявлять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 сфере свободы судоходства США. В так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стремиться устрани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сомнения России, укрепить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и превратить её в асимметрич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приносящую пользу Китаю, с целью уменьшения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й уязвимости и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стороженно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переходящему в военный альянс, с целью избежания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н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роблемы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ря

(责任编辑 崔珩)

俄罗斯民间文化**大众文学在俄国的起源和发展考***

林精华**

【内容提要】大众文学是城市化的产物。城市化进程在世界各国各不相同，大众文学也就不是只有欧洲及其延伸——美国的模式。彼得大帝开启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引进欧洲流行的世俗文学，也就在翻译和模仿其基础上，开始了大众文学在俄国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三百多年来，无论经历帝俄还是苏联抑或俄联邦的历史变迁，由于实行书刊审查制度，使得大众文学在俄国始终以不同于欧洲-美国的模式展开：它是作为现代俄罗斯文学整体所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其中的特殊文类，并且相伴而生的文学批评，有不少是正视大众文学之存在和价值的；大众文学和俄罗斯经典文学构成互动关系，即文学批评观念变化和文学教育，是从各时代的畅销作品中筛选出经典的，造成许多得到官方倡导的文学，其影响力时常不及所谓低级的大众文学。

【关键词】俄国城市化 俄罗斯大众文学 俄罗斯大众文学批评 俄罗斯认同

【中图分类号】D851.2/I206.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4-0094(49)

论及俄罗斯文学，我们经常困扰：古罗斯文学的消失、现代俄罗斯文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剑桥俄罗斯文学(九卷本)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8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7)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项目支持。

**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的起源，皆肇始于对欧洲世俗文学的引进——当时属于流行文学，后来才被确认为经典，因为欧洲文学在 18 世纪已主要是通过图书市场而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相应地，俄国也引入了这种文学机制，哪怕把过去正教会的精神检查 (духовная цензура) 转化为世俗的书报审查 (с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机制，即意识形态经常干预文学的生产和流通，但文学消费仍然是通过图书市场才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大众文学在现代俄国发展历程中理应是存在的。这样，我们就需要知晓大众文学在俄罗斯帝国时代—苏联岁月—当代俄罗斯之真相，以及三百年来俄国是如何认识大众文学的。



彼得一世开启的俄罗斯帝国建构之路，是国家主导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并进入程。一开始引进德国的模式，同时多聘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建筑师来设计彼得堡的建造方案，1740 年代开始改为法国模式，但因为法国大革命之发生，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后期，改为加强与正加速向全世界殖民的工业化英国的联系：这样的欧洲化历程，目的乃希冀快速提升帝俄的现代化水平。也正是在这一历程中，出现了在思想观念和审美上模仿欧洲的情景，包括大量引进欧洲所确定的文学艺术经典，尤其是当时正在流行的歌剧、话剧、芭蕾舞剧、文学、绘画、音乐等；并且，伴随着城市化水平之提升，引进欧洲文学艺术的规模持续扩大，俄国大众文化市场也加速形成。不否认，当局为促进居民认同快速强大起来的帝俄，实施报刊审查制度，却仍阻挡不了城市化过程催生了官方始料不及的效果：1759 年古典主义作家苏马罗科夫居然创办面向市民的杂志《勤劳的蜜蜂》，而后更多的人加入私人编辑出版杂志行列，如 1769 年出版商诺维科夫 (Николай Новиков, 1744–1818) 创办《雄蜂》，寓言作家克雷洛夫 (Иван Крылов, 1769–1844) 先后主办《精灵邮报》和《观察家》及《圣彼得堡水手》。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后来被尊为官方史学家的卡拉姆津 (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本是以创办和编辑《莫斯科月刊》而声名赫赫的；相应地，科学院印刷所和莫斯科大学印刷所等大量刊发畅销作品，包括《彼得·兹拉德科留奇》、《波瓦·柯罗

列维奇》、《英国百万富翁乔治历险记》等流行小说，以及经法文翻译的《一千零一夜》，尤其是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等欧洲流行的历险记文类。这种情形延续到 18 世纪中后期，畅销欧洲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新爱罗伊斯》、《汤姆·琼斯》等作品也被及时俄译，成为新时期俄国的畅销书。19 世纪以来就被视为法国和世界经典作家的伏尔泰，却是 1740-1780 年代俄国流行作家，其作品在当时被大量的俄译，甚至因此被叶卡捷琳娜大帝聘任为帝俄科学院史学家。对这样的历史，《祖国笔记》的“当代图书编年史”栏目(1839)，曾刊发别林斯基对 18 世纪畅销书作家马特维·科马洛夫(Матвей Комаров, 1730-1812)之力作《英国绅士乔治历险记和布兰登伯爵弗里德里克·刘易斯故事》(1782)的书评，并现身说法，自称其文学教育是从阅读世俗印刷所刊行的那些流行小说开始的，包括《伏尔泰中篇小说集》、《美德之镜》等。^①相应地，在俄国也出现了大量模仿这些流行文学的历险记、旅行记、情感小说，如声名赫赫的В.К·特列佳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 1703-1769)，就成名于创造性地翻译法国言情小说《爱情岛之旅》(1730)。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了不少杰出的畅销书作家，如楚尔科夫(Михаил Чулков, 1743-1792)在 1760 年代就出版四卷本畅销书集(译文集)，尤其是刊行畅销书《嘲弄人的，或斯拉夫民间故事》(1766)，虽然碍于当时出版市场(书籍印刷出版昂贵)，发行量不大(多是富家购买再转手其他读者，或图书馆收藏而使有限读者接触之)，但赢得市民赞赏。第二年，他作为皇家军需官受聘于科学院，编辑出版了《简明神话词典》(1767 年刊行)，发行量为 650 册，每本书定价高达 93.95 卢布(相当于工薪阶层一个月的薪水)。使他在俄国大众文学史上获得重要地位的，是他不久后出版的《靓丽女厨》(1770)：该作堪称俄国第一部长篇小说，生动描述漂亮军嫂马尔托娜如何从军人遗孀发展成近乎妓女的过程，深得当时和 19 世纪读者的青睐。直到苏联时代初期，大众文学已被“群众文学”所取代，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В. Шкловский)还刊行《楚尔科夫和列夫申》(1933)说，《嘲弄人的》和《靓丽厨娘》虽然是和当时低级文学相关联的畅销书，如主人公的出生和受洗就令人想起俄罗斯民间传

①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839 Т. v. No. 8. С. 37.

说中的人物，叙述过程时常流露出色情成分，但人物形象塑造有多种原创性（оригинальные），并认为这是一部多么出色的女子人生历险记小说（плутовской роман），充满着对世俗社会的想象力，常用民间习惯的借代法，造成在东正教美学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情势中，读者却对其爱不释手。^①

18 世纪流行文学远不止是这些：仅次于楚尔科夫的是费多尔·艾明（Федор Эмин, 1735-1770）的《厄内斯特与多拉福尔信札》（1766-1768），以及其儿子尼古拉·艾明（Николай Эмин, 1767-1814）的《命运游戏》（1789）等。这对父子作为 18 世纪中期著名畅销书作家，创作各深受卢梭《新爱洛依丝》和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之影响，成为促成俄国文学走向叙述俄罗斯问题的感伤主义之先驱。当然，18 世纪最为流行的作家及其作品，除了科马洛夫《英国绅士乔治和勃兰登堡侯爵弗里德里克·路易斯历险记》（1782）之外，还有《万卡·卡因》（1779）、被普希金所提及的列夫申（Василий Левшин, 1746-1826）的《俄罗斯故事》（1780-1781）等。这类流行文学在 18 世纪后期更具生命力，如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在成为著名学者之前，不仅仿照欧洲旅行记而写了文坛津津乐道的《一位俄罗斯旅行者信札》（1791-1792），而且创作了《可怜的丽莎》（1792）和《当代骑士》（1802）等感伤主义小说——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

18 世纪诸如此类的流行文学现象，当时争议很多，如同样也热衷于翻译欧洲文学的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等古典主义诗人，就视之为低级作品，但著名出版商诺维科夫所编辑的俄国首部文学词典——《俄国作家历史词典》（1772）则相反，却收录了特列加科夫斯基、楚尔科夫、艾明父子等翻译或创作的流行文学作品。就是在争议中，卡拉姆津作品广为畅销起来，并因满足着 18-19 世纪之交大城市读者的审美诉求，这些旅行记和感伤主义作品，促成了俄罗斯文学的自觉意识。诡异的是，18 世纪面向市民写作的文学所引发的矛盾，尤其是否定性意见，在城市化普及程度大幅提高的 19-20 世纪初，居然作为遗产延续着：对这类文学事实，体制外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等激进的批评家，以及波列沃依（Николай Полевой, 1796-1846）、德鲁日宁（Александр Дружнин, 1824-1864）等保守主义批评家，和体制内

^① Шкловский В. Чулков и Левшин. Ленинград: писатель, 1933. С.107-116.

学者之作一样，多是否定的，如曾任莫斯科大学校长的基霍恩拉沃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равов, 1832-1893)及其五卷本《俄罗斯文学和古迹编年史》(1859-1863)、国家档案馆古籍部主任和俄罗斯文学史家别卡尔斯基(Пётр Пекарский, 1827-1872)院士及其两卷本《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的科学与文学》(1862)，以及从中学俄语教师晋升到莫斯科大学语言学教授和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布斯拉耶夫(Фёдор Буслаев, 1818-1897)及其《俄语历史语法概论》(1858)、彼得堡大学文学教授米列尔(О.Ф.Миллер, 1833-1889)在 1770 年代所发表关于俄罗斯文学史演讲、科学院通讯院士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Д.Н. Овсян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1853-1920)及其《俄罗斯知识分子史》(1906)，尤其是出版多种研究莎士比亚等欧洲经典及其在俄国传播之作的莫斯科大学教授斯托罗任科(Николай Стороженко, 1836-1906)、历史文献图书馆教授温格洛夫(Семён Венгеров, 1855-1920)及其《当代俄罗斯文学史》(1886)、莫斯科大学教授和国家艺术学院院长柯岗(Пётр С. Коган, 1872-1932)及其三卷本《当代俄罗斯文学史概论》(1908-1911)和《从古至今的俄罗斯文学史》(1927)等，无不把书刊审查制度转化为文学批评标准，或以俄罗斯民族认同程度而否定性地对待俄译欧洲流行文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模仿性畅销文学，或以贵族精英意识轻视满足市民审美需求的大众文学。

不过，历史发展到 19-20 世纪之交这个能平视欧洲文化的时代，以及藐视西方的苏维埃政权初期，日益自信的俄国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正视了 18 世纪大众文学存在。弗拉基米洛夫(Пётр Владимиров, 1854-1902)这位 1880 年始任基辅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教授的著名学者，其《俄罗斯语言艺术史导论》(1896)赞赏翻译欧洲流行文学及其对标准俄语之确立和发展的意义。^①帝俄科学院院士佩平(А.Н. Пыпин, 1833-1904)在其四卷本《俄罗斯文学史》(1898-1899)第三卷中，着重论述 18 世纪文学，谈及此期间俄罗斯文学发展和俄译欧洲文学之关系时，没有回避特列加科夫斯基的《爱情岛之旅》，视之为讽喻-讽刺爱情小说。著名文学史家奥希波夫推出的几部重要文学史著作，如《俄罗斯长篇小说断代史：18 世纪〈万卡卡恩〉》(1902)、两卷本《俄罗斯文学史概论》(1910)等，皆涉及 18 世纪流行文学，承认当时

① Владимир П. 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словености. Киев, 1896.

翻译的流行文学之重要性。尤其是，痴迷于象征主义的著名批评家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Чуковский, 1882-1969), 在白银时代结束之后仍严肃考察 18 世纪大众文学的历史, 他的《马特维·科马洛夫》(1929)和《楚尔科夫和列夫申》(1933), 就专论 18 世纪流行文学的经典作家。尤其是, 苏联科学院第一部《俄罗斯文学史》第三、四卷(1941、1947), 专论“18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大量涉及这些作家及其作品, 其丰富的史料价值远超出了思想之不足, 并且声称, “1760 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美学观, 在俄罗斯文学中立即呈现出两种趋向, 首先是出现了费多尔·艾明、楚尔科夫、卢金等平民知识分子作家。一开始他们就确定了与古典主义传统之格格不入的立场, 因为在他们眼中, 古典主义是与贵族传统、上流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 而他们则不是来自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圈、沙龙、书房, 是来自生活没有保障的底层市民, 相应的, 他们并不去搜寻纯粹理性的古典主义, 而是感兴趣于人性、小人物、民间文化、那些没有高深学识的民歌、保存在市民阶层和农民中的日常生活, 这些是被贵族上层所抛弃的。在这个基础上, 平民知识分子群体锻造出了早期俄罗斯感伤主义和前期浪漫主义”; 更重要的是, 在第二、三章中集中论述 18 世纪后半叶许多流行小说因为报刊审查制度而未能及时刊行的问题, 以及与此同时, 学习欧洲城市化所带来的出版印刷便利、刺激图书市场繁荣, 导致所谓“通俗文学”盛行, 如在欧洲广泛流行的法国天主教神学家费奈隆(La Mothe -Fénelon Fénelon, 1651-1715)《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之影响了, 赫拉斯科夫(Михайл Херасков, 1733-?)创作了政治小说三部曲《努美阿, 又名繁荣的罗马》(1768)、《卡德姆和加尔莫尼亚》(1786)、《波利多尔, 又名卡德姆和加尔莫尼亚》(1794)等流行小说, 还设专章论述艾明、楚尔科夫、科马洛夫等, 称精力旺盛的艾明“有广泛的读者市场, 一部接一部地发表系列小说”, 而且对特列加科夫斯基所译的《爱情岛之旅》及其引发的纷争、诺维科夫对世俗文学流行的诸多贡献等, 都有详尽的描述。^①更有甚者, 在解冻思潮之后, 为了彰显苏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文明和最民主的制度, 有意识强调帝俄文学发展中的“民主”因素, 重视发掘 18 世

^① Гуковский Г и Десницкий В.А.(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0 томах. Т.IV.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I века. Ч.2. М./ Л.: АН СССР, 1947. С.35, 78-80, 257; Т.III, Ч.1. 1941. С. 215-263.

纪以来那些流行文学遗产：苏维埃作家出版社刊行讽刺性喜剧作家迈科夫（Василий Майков，1728-1778）《选集》（1967）；大学文学教育课程重视这种文学，如科科列夫选编的《18 世纪俄罗斯文学选读》（1952）不仅收录古典主义诗歌和悲剧，还包括楚尔科夫《靓丽厨娘》、《痛苦命运》、《珍贵的狗鱼》等^①；1979 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再版 19 世纪初畅销小说家布尔加林全集和文集，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扎帕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ападов，1907-1998）的《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1770-1775 年文选》（1979）则收录费多尔·艾明《1765 年一月显现的梦》和《厄内斯特与多拉福尔信札》；1987 年苏维埃俄国出版社再版《嘲笑人的人》。有意思的是，期间美国石溪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Gary Marker，1948-）的两卷本《出版、刊行和俄国知识分子生活之缘起，1700-1800》（1985），也专门讨论 18 世纪图书出版问题，涉及流行文学及对当时帝俄社会的影响等，如考据特列加科夫斯基翻译和出版《爱情岛之旅》的历史——他先向帝俄科学院印刷所提出申请，很快得到应允，印刷所甚至要求同时要刊行他在巴黎创作的若干世俗化诗歌，这是俄国首部私人资助的图书——得到了首任帝俄驻法国大使鲍里斯·库拉金（Борис Куракин，1676-1727）公爵的大力支持。^②鉴于 18 世纪流行文学如此重要，苏联末期，重视对这些流行文学之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历史真相更成大势，如开放大学出版社重版著名出版商古列维奇（Исаак А. Гурвич，1860-1924）的《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畅销作品》（1991）：第二章特别梳理 18 世纪畅销书创作和出版的情况，包括翻译文学，并特别指出卡拉姆津作品在出版方面极为成功，声称《可怜的丽莎》在发行量上是一部神奇的小说。^③在后苏联俄国，重新肯定大众文学，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从发掘 18 世纪流行文学遗产开始的，如“苏维埃俄国”出版社率先重版“色情小说”《靓丽厨娘》，许多出版商大量刊行 18 世纪通俗小说。

可见，在 18 世纪俄罗斯文学遗产中，不是得到官方扶持的古典主义戏

① Кокорев А.В. (сост.).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8 века. М.: Гос. Учебно-педа, 1952. С.560-610. 1961 年修订版和该版本相差无几。

② Gary 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1700-18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1.

③ Гурвич И.А. 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ткрыт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1. С.20.

剧和诗歌，而是面向读者大众市场的历险记和旅行记、感伤主义小说，更受读者青睐，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帝俄和苏联时代文学史家的关注。

二

在 18 译介欧洲的经典和流行文学过程中，出现了模仿这些文学的潮流，逐渐孕育出历险记、书信体和日记体等流行文学。这些被后来批评家屡屡诟病的文学，其魅力却是官方推崇的古典主义文学所不及的，并未因下列历史事件意外改变文学进程而有所减弱：1812-1814 年卫国战争及其胜利，激发了俄国民族的自信心，促成了俄国人从心理上摆脱对欧洲的依赖，因而不再生模仿欧洲文学；1825 年十二月党人起事失败，从精神上启示俄国精英，在俄国复制欧洲尤其是法国启蒙思想是不会成功的，这又反过来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俄国人对欧洲流行思想和审美的警惕，并催生了对俄国走欧洲化之路的反思。就是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卡拉姆津从流行的书信体和旅行记作家、感伤主义作家，转化为杰出的史学家，推出了堪与《史记》相媲美的《俄罗斯国家史》(1803-1826)。殊不知，该作意外为 19 世纪初凸显民族认同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俄国演化为强调俄罗斯帝国之伟大的历史小说，提供了历史资源。由此，俄国社会步入了俄罗斯民族认同之确立时代，俄罗斯文学围绕如何建构国家认同而展开，使包括大众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学，不再非遵循欧洲文学经验不可，改变了 18 世纪一定要通过译介或模仿欧洲流行文学才会声名鹊起的状况。新时代需要自觉的力量去推动俄罗斯文学成熟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普希金适时地创作了一系列投当时读者所好的抒情诗、故事诗、叙事长诗、中篇小说、戏剧等，并通俗易懂地表达对俄罗斯帝国的深切认同，从而成就其被尊为现代俄罗斯文学奠基人的基础。

这样就意味着，普希金不是孤雁，而是在期间大批畅销作家中鹤立鸡群，并因其创作更契合俄罗斯认同所需，得到读者和批评家的普遍认可，成为期间畅销文学——所谓浪漫主义之代表。

的确，在 19 世纪初广为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中，当时甚至有比普希金更为畅销的诸多作家，如扎果斯金(Михаил Загоскин, 1789-1852)。他

发表了包括《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又名《1612年的俄罗斯人》)(1829, 1838)、《1812年的罗斯拉夫列夫或俄罗斯人》(1831)、《车站演习》(又名《为好人服务》)(1845)等著名历史小说。别林斯基多次发表书评予以赞赏,如在长文《〈冯维津全集〉和扎果斯金〈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1838)中,肯定这类通俗化叙述俄国现实生活或历史之作,赞誉扎果斯金的这部作品“不乏巨大的诗情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作品在史学上有着重大的价值”^①。并且,扎果斯金借助其声名显赫的大众文学创作,得以成为莫斯科剧院经理、莫斯科军械局局长、皇室封赏的正式五品文官。其畅销小说的创作甚至传播到欧洲,如英国小说家夏米尔(Frederic Chamier, 1796-1870)将《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英译成《一位莫斯科青年,又名俄国的波兰人》(The young Muscovite, or The Poles in Russia),于1833、1834年在伦敦、纽约出版。神奇是,除1919-1954年间由于苏联意识形态原因未刊行扎果斯金作品之外,其作品是各时代,并且在19世纪初、19-20世纪之交、21世纪他的作品属于最为畅销行列,如《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又名1612年俄罗斯人》和《罗斯拉夫列夫,又名1812年俄罗斯人》的单行本,就分别再版了55次和28次,前者甚至在苏联时期再版了13次,以至于苏联解冻思潮与开禁再版这些作品不无关系:1955-1959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政治出版社和真理出版社,就五次再版这两部作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读者对扎果斯金更是青睐有加——出现多部讨论19世纪初流行文学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大量涉及扎果斯金的创作,如邵欣娜(Анастасия Шохина)在国立下诺夫哥罗德大学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司各特和扎果斯金小说中历史进程之艺术体现》(2010)。

更有甚者,1830年代升任俄罗斯帝国新闻出版文委员会官员的布尔加林(Фаддей Булгарин, 1789-1859),本是1820-30年代最著名畅销书作家之一,以《关于西班牙的回忆录》(1823)、《伊凡·维日金》(1829)、《阿尔希普法捷伊奇的气球,又名对内心痛苦之安慰》(1830)等历险小说,和《真实的谎言,又名在二十四世纪世界漫游》(1824)、《极为离谱的无稽之谈,又

^①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名去地球中心之旅》(1825)、《2028年私人生活片段》(1828)等科幻小说,以及《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和土耳其之战的情景》(1830)等历史小说而享誉文坛。1824年2月,普希金从敖德萨致信在彼得堡的布尔加林说,“您属于这样的少数文学家之列,无论是批评(порицания)或夸奖(похвалы),都可能且应该是受人尊敬的(уважаемы)”。^①作者正因有居高不下的声望,才被政府邀请合作担任文学审查官,并由于其文学趣味和声望,在事实上反而促成大批优秀作品问世。意味深长的是,布尔加林这些显示出俄国市民美学趣味之作,在当时就被翻译成法、英、德、西、意等欧洲语言。可惜的是,因为担任过书刊审查官并由此和国家安全部门有业务上的合作关系,布尔加林就一直不被苏联时代的文学史家所正视,从不把他纳入文学史正面讨论,由此苏俄著名图书目录专家(俄国艺术图书馆副馆长和《新文学评论》书目栏主编)列伊特波拉特(Абрам И. Рейтблат, 1949-),在苏联解体之际著述《卖艺者的外在样子:一种文学声望的历史》(1990),呼吁重视对布尔加林的研究,认为其文学遗产不能再由外在原因继续被埋没,需要重新发掘。^②

令人惊奇的是,参加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流放到雅库茨克的有为青年军官别斯图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естужев, 1797-1837),本乃著名的俄罗斯拜伦派(байронист)的浪漫主义诗人,当时更是以笔名“马尔林斯基”(Марлинский)而畅销文坛的小说家:在该笔名发表了《罗斯古城扎莫克温登》(1821)、《弗雷加特·娜捷日达》(1830)、《阿马拉特-别克》(1830)、《命途多舛》(1831)、《1824年高加索之水夜话》(1830)、《野营之夜》(1823)、《野营第二夜》(1823)、《达吉斯坦来信》(1834)等25部中短篇小说集,巧妙地把德国“狂飙与突进”运动的激情,变成主人公的心理暴风雨,其作品风格被誉为“别斯图耶夫之血”(бестужевских капель)。1832-1837年刊行8卷本《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格列奇印刷所)、1838-1839年彼得堡出版了其十二卷本全集,并且别林斯基针对《马尔林斯基全集》(《祖国纪事》1840)发表书评指出,阅读马尔林斯基作品成为当时市民的生活方式之一,因为马尔林斯基是促使俄罗斯文学摆脱模仿欧洲文学而成熟起来的卓

① Пушкин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10(Письма).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79. С.66.

② Рейтблат А.И. Видок фиглярин//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0. №.3. С.73.

越作家，他有巨大的禀赋，无须如其他作家那样用学生腔式的姿态去写作（即他成熟到用不着模仿欧洲文学），极力汲取活生生的生活语汇，扩大了文学语言的资源，尤其是不再遵循法国古典主义诗学，从而成为“被称为浪漫主义者而登上俄罗斯文坛的天才”，他的昙花一现不是因江郎才尽，而由于生命的仓促结束，并且还预言“马尔林斯基将长久地拥有读者和崇拜者”^①。无独有偶，屠格涅夫《文学与生活回忆录》（1868）也回忆说，在他青少年时代，马尔林斯基作品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很时尚，许多年轻人热衷于讨论、效仿之，又因其小说使用隐喻和华丽语言的叙述风格大大革新了俄罗斯小说，甚至在 1830 年代马尔林斯基比普希金更为流行。神奇是，1850-60 年代，许多政治活动家还争相效仿其作品中的某些细节，读者仍视他为超级浪漫的小说家，虽然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已不再流行，他的作品依然风行。在苏联时代，除 1918-1931 年没有再版外，到 1990 年，其各种作品再版超过 50 次。相应地，也被西方斯拉夫学界重视，怀俄明大学现代和古典语言系教授巴戈比（Lewis Bagby, 1944-）在著作《亚历山大·别斯图耶夫—马尔林斯基与俄罗斯浪漫主义》（1995）中，详细论述了其作品在当时俄国畅销的情形和诗学特点。^②岁月沧桑，未妨碍索契保留着“马尔林斯基大街”、“马尔林斯基公园”。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在俄国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和《北方邮报》创办者之一布尔加林的声望相当，1834-1847 年任《读者文库》月刊（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主编森科夫斯基（Осип-Юлиан Сенковский, 1800-1858），本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彼得堡报刊审查委员会官员（1828-1833），却因大量放行未必政治正确的文学作品，被迫离开这个职位，但他更以笔名七等文官“巴拉姆别乌斯男爵”（Барон Брамбеус）发表《巴龙勃拉姆别乌斯幻想之旅》（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Барона Брамбеуса, 1833）而享誉文坛，成为那个时期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正因为如此，推崇写实主义文学的别林斯基，其《文学的幻想》（1834）却正视作为事实存在的森科夫斯基和马尔林斯基等人作品，甚至在 1841-1847 年间发表年度俄罗斯文学述评

①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集》第二卷，第 183 页。

② Lewis Bagby, *Alexander Bstuzhev-Marlinsky and Russian Byronis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别林斯基也常肯定流行文学及其价值。有意义的是，他和上述其他流行的畅销小说家一道，使 19 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及时被俄罗斯化为广为流行的小说，表达了对帝俄的强烈认同。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森科夫斯基小说及其主编的杂志广为流行不久，以市场化运作的《现代人》杂志，也成为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文学刊物。该杂志最初是由普希金创办的季刊(1836)，在文化市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普希金去世后，维亚泽姆斯基公爵(Пётр Вяземский, 1792-1878)和彼得堡大学著名教授普列特涅夫(Пётр Плетнёв, 1791-1956)接手经营了七年，但发行情况始终不佳。1846 年，诗人涅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Некрасов, 1821-1878)和批评家巴纳耶夫(Иван Панаев, 1821-1862)收购该刊，别林斯基受邀负责该杂志的批评栏目，自此办刊风格改变：按市场化运作，既热衷发表讨论时尚论题的稿件，包括城市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就业、人口等问题的政论、文学批评，又热心刊发通俗文学作品，如后来集结成文集的《彼得堡生理学》不少就先行刊于《现代人》，从而使该刊成为当时的流行读物。正是得益于其变成畅销刊物，1855 年发表纳尔斯卡雅(Нарская)或格尔斯卡娅(Е. Горская)的《初识人间》(第 6 期)、《叶琳娜》(第 10 期)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第 12 期)等中篇小说，作者立即赢得名声，三年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两姐妹》(1858)：《现代人》由此把莎莉科娃(Наталья Шаликова, 1815-1875)公爵小姐，培养成了俄国第一位女性作家-新闻工作者纳尔斯卡娅。相应的，《现代人》刊物也因能满足大众要求，发行量不断飙升，声誉高涨。

正是有繁荣的大众文学和日益成熟的文化市场机制作为基础，后来被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的写实主义小说，才得以繁荣起来。仅仅是中学毕业生的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1809-1852)，只身离开乌克兰，去彼得堡讨生计，在那里谋得低级公务员职位不久，就尝试用流行的讲故事文体去叙述乌克兰民间故事和彼得堡城市生活，在流行杂志发表系列短篇小说，深受读者青睐，集结成《狄康卡近乡夜话》(1829)和《彼得堡故事》(1840 年代)，再度成为畅销作家，其生存境遇得到很大改善，由此影响到其最具声望的被称为“史诗”(поэма)的作品《死魂灵》(1842)——实际上也是采用 1740 年代以来所

流行的历险记(похождение)文体——完整的书名《乞乞科夫历险记,又名死魂灵》。这种遵从大众审美趣味的文学活动,深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肯定,他在《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现代人》杂志 1855 年第 12 期,1856 年第 1、2、4、7、9-12 期)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看法。同样,后来成为俄国经典作家的屠格涅夫(1818-1883),其父亲崇拜法国,法文讲得甚至比俄语还流利,但他们家和官方诗人茹科夫斯基保持密切联系,也和流行小说家扎果斯金过从甚密,这就导致屠格涅夫本人最初的文学活动起步于模仿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只是因别林斯基在对其处女作《巴拉莎》(1843)的批评中,提到了其中的写实性细节,他才转而从事写实性小说的创作。此后,写实主义小说在俄国持续兴盛,是因为俄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相应的思想解放,推动着大众文学的不断繁荣,尤其是在 1861 年改革之后,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加深,市民的文化消费更趋于成熟,出现了把写实主义文学当作流行小说的潮流,这使受益于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出版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诸多创作明显带有大众文学痕迹,如《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叙述的正是杀人与行侠正义之通俗故事题材。并且,通过市场而实现文学价值,日趋成为俄罗斯文学生产的机制,不仅仅成就了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类出身低微的文学家,也使家产丰厚的大贵族托尔斯泰获得了成为伟大作家的制度性保障——成为版税最多、声誉最大的文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奥斯特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1886),针对市民受众群所关心的转型时代问题——采用欧洲释放生产力的模式(人口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推动城市化,进行 1861 年改革,这种强盛俄罗斯帝国的发展战略,却孕育出传统庄园制度和斯拉夫价值观遭遇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冲击,他由此创作了《穷新娘》(1852)、《大雷雨》(1859)、《一个老朋友胜过两个新朋友》(1860)、《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艰难糊口》(1874)、《富家新娘》(1875)等畅销戏剧,剧作家本人由此名利双收。

可以说,从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到 19 世纪中后期现实主义,是通过面向市民的图书或艺术市场而推动的,期间重要作家之力作无不广为畅销,作者也由此成为文坛甚至社会名流,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俄国成为文学大国,则因得到认同俄罗斯帝国的文学艺术消费群之趣味变化,使作家们把欧洲各

国建构自己民族认同的浪漫主义，转化为积极叙述帝俄问题的历史小说，欧洲呈现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社会问题的写实主义，转化为俄国现实主义小说。

三

如此情形发展到 19-20 世纪之交，更成大势所趋。资本主义改革三十年之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13 年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工业经济大国、1891-1916 年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农业发展达到了苏联阶段始终未能超越的水平），俄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人口规模、市政建设、社会治理等，已跻身于欧洲著名都市之列；华沙、诺夫哥诺德、基辅、明斯克等也受益于资本主义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欧洲重要城市。尤其是，斯托雷平强力改革传统庄园制度，进一步刺激市场经济，给积极上进的农民进一步摆脱斯拉夫村社、走向城镇、成为新市民，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支持。期间，官方教会的影响力持续降低，图书市场活跃，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在事实上失灵良多，这些方便了俄国知识界与欧洲的互动：一方面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去欧洲变得更加自由，另一方面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的作品被及时译介。这种情况，进一步促使思想开放、图书和艺术市场更加活跃，以至于任何作者无论是否以知识分子身份写作，皆自觉投身于城市化大潮：面向持续扩大的市民消费群体而写作、出版。如此一来，所谓俄罗斯文艺复兴的白银时代，实际上形成于面向大众市场的文化之生产、流通和消费机制之中，期间现代主义文学方兴未艾、东正教神学转型为基督教哲学，仅仅是其中的文化景观之一，女性文学、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等更是引人注目，具体包括：

当时出现了大批低价报纸，如《光》、《彼得堡清单》、《莫斯科清单》、《一戈比报》（Газета копейка）、《莫斯科公报》、《俄罗斯文字》等。并且，这些热衷于刊发通俗文学作品的报纸，如同《福尔摩斯探案集》俄译本和《平克顿侦探故事》等著名畅销书一样，在 1907 年售价在 15-20 戈比之间，发行量达 5000-10000 份，1908 年开始降价至 2-3 戈比后，发行量上升到 5-6

万份,《俄罗斯言论》报在1916年发行量近76万份。^①这些报纸主编和编辑有服务大众读者的意识,如《光》的主编尼古拉·帕斯图霍夫(Николай Пастухов, 1822-1911)确定面向市民读者连载流行小说的办刊模式,由此使该报为通俗小说之普及提供了重要平台。康斯坦丁·别洛夫的历史长篇小说《刽子手》(1893-1894)及其续集《弟子》(1896)、《教训》(1896),情节是读者所期待的,结构上与读者的期望不冲突,读者爱不释手,发行量分别超过10万册;另外,其系列小说《普基林,一位俄国侦探英雄》(1908)和《特列夫,俄国第一侦探》(1910)、《俄国著名冒险家科尔涅特·萨维诺夫的异乎寻常之历险》(1909)等,每种作品发行量各达及38万册。

尤其是,这个时代进一步释放了作家的文学生产力。身为军医的鲁宁(Виктор Лунин, 1838-1914),1887年退役后开始创作通俗小说,终其一生,发表了150多部小说,仅1893-1910年就在莫斯科多家出版社出版了56种作品,包括《因为不幸而不幸》、《儿子在发达时不浪子回头》、《好同志》、《两个女对手》、《工厂美女》、《痛苦的命运》、《往日时光》、《在千年之前的罗斯》等。1910-1914年间,莫斯科巴拉绍夫(Балашов)出版社先后刊行亚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1860-?)的作品28部之多;巴拉古尔(Фома Балагур)作为这一时期知名的小说家,出版《魔鬼与硬坚果》(1902)、《小提蓝里的小鬼》(1910)等十三种畅销小说集(лубочных рассказов);1879-1915年间伊文(Иван Ивин, 1868-1918)以笔名“卡希洛夫”(Кассиров)出版了31种作品,包括反复印刷达40次的军人历险小说《关于勇敢、强健、大无畏的武装打扮的陆军少尉》(1889)、刊行超过20次的《关于健硕、可爱和勇敢的勇士鲍韦—科洛列维奇及其漂亮妻子德鲁热夫涅公主》(1891)。1910-1915年流行的畅销小说家舒赫敏(Христофор Шухмин, 1870-1917),在巴拉绍夫等出版社出版《致命的订婚戒指》(1911)、《游泳者之梦》(1910)、《1914年战争和马克西姆·卡舍瓦洛夫的英雄功勋》(1915)、《没有透气之地的生活》(1915)、《早逝,或者观众宠爱的红人》(1915)等20种作品;1901-1916年间沃尔金(Вячеслав Волгин, 1879-1962)出版《哥

^① Jeffrey Brooks, *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 Literacy and Popular 1861-191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38, 142.

萨克首领库兹马·拉辛》(1901)、《哥萨克首领利维诺耶谢尔德采》(1908)、《巫师与武士》(1911)等12种作品;1905-1911年,佐托夫(Михаил Зотов)在莫斯科巴拉绍夫出版所和菲拉托夫出版所刊行《二十世纪流浪汉/流氓谢米亚宁》(1905)、《同志,不要变化》(1906)、《充满恶意的分手》(1909)等15种作品。尤其是,出现了韦尔彼茨卡娅(Анастасия Вербицкая, 1861-1928)和纳戈洛茨卡娅(Евдокия Нагордская, 1866-1930)等女性作家的畅销小说:前者以《时代精神》(1907)、《幸福钥匙》(1908-1913)、《爱的束缚》(1914)等享誉文坛,后者则以女艺术家日记体方式叙述的《酒神之怒》(1910)而著名,并且她们就像创作《三个星期》(1907)的英国著名女性畅销书作家格林(Elinor Glyn, 1864-1934)那样,面向大众写作而不考虑美文。对此,批评家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Чуковский, 1882-1968)认为,那些受美国平克顿侦探小说和韦尔彼茨卡娅女性小说影响的工人,是相信无产阶级艺术的。^①此外,还有畅销小说家恰尔斯卡娅(Лид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Чарская, 1875-1937)、马尔(Анна Мар, 1887-1917)等流行的女性文学。

正因为如此,构成俄国文化白银时代的,远不只是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繁荣,更有大众文学的流行。别尔嘉耶夫在自传《自我认识》(1949)中作为当事者就已指出,所谓俄罗斯文艺复兴时代,主要是知识精英推动的现代主义文艺和基督教哲学,但影响力有限,因为其脱离当时业已形成的图书出版机制、艺术市场和公共文化交流平台。的确,当时的文化繁荣远不限于现代主义文艺和宗教哲学圈子,并且相对于有更广泛读者群的科幻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象征主义和阿克梅主义等更多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圈子。相应的,这类大众文化发达的事实,导致期间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对大众文学发表意见,如彼得堡大学教授和科学院院士(始于1877年)维谢洛夫斯基在其杰作《历史诗学》中就声称,“当代学术让我关注大众,虽然迄今为止大众一直是位居身后、失声的,而当代学术注意到其生命力、运动,所有这些不易察觉的现象,是在更大的时空中发生的;在此,我们要寻找由于随着历史进程所产生

^① Речь. 1911.

的秘密”。^①进而，他在《西方对新俄罗斯文学之影响：历史比较概论》(1896)中系统梳理西方流行文学在俄国的译介和流行情况，以及18-19世纪现代文学在俄国的成长历程，断言普希金和果戈理等经典，无不深受西方流行文学之影响。^②尤其是，温格罗夫(Семен Венгеров, 1855-1920)这位毕业于塔图大学(原名尤里耶夫大学)历史语言文学系的文学史家，其《20世纪俄罗斯文学：1890-1910》(1914)确定了后来学界特别推崇的这一时期现代主义文学、东正教哲学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之重要性的格局，但同样关注到维尼茨卡娅(Александра Виницкая, 1847-1914)及其《黎明》、《老熟人》、《未获承认的艺术家》等回忆录作品，以笔名“米库利奇”(Микулич)而著称的维谢丽丝卡娅(Лидия Веселитская, 1857-1936)等女性畅销书作家，以及阿尔志跋绥夫及其流行小说《萨宁》等畅销情况，还论及《上帝的世界》(Мир Божьи)、《俄罗斯财富》和《新时代》、《俄罗斯思想》等畅销杂志对这期间文学发展的影响。^③奇怪的是，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这些客观上直接彰显大众民主意识成长的通俗文学，居然迅速被查禁，所幸学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公开讨论文学史上的大众文学问题，如著名文学理论家日尔蒙斯基(Виктор Жирмунский, 1891-1971)的《文学理论》(1924)就声称，“文学传统的诸多问题，要求我们广泛研究大众文学”，并且经常提及俄译法国文学作品、谢维里亚宁(Игорь Северянин, 1887-1941)等未来主义诗人之作的畅销情形，并谈及勃洛克论述和回忆阅读流行作品的情形。^④同样，1924年秋季，艾亨鲍姆和蒂尼亚诺夫等形式主义批评家在国立艺术史研究所组织研讨班，着意去发掘叙事类文本对于俄国大众文学诗学的价值，如艾亨鲍姆认为，“在19世纪末的作家和批评家看来，卡拉姆津、维亚泽姆斯基、马尔林斯基、森科夫斯基、达理和韦尔特曼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人物，他们已成为天真幼稚的符号，过时的英雄”，哪怕维亚泽姆斯基曾声

①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Л.: 1940. С.44.

② Алексей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Западное влияние в нов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ко-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е очерки. М.: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ое «Русское Т-во печатного и издательского дела», 1896.

③ Семен Венгеров (ред.).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1890-1910. Т.2. М.: Изд. Дом XX век-согласие, 2000.

④ Жирмунский.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этика, стилистика. Л.: 1977.

言“在智慧活动的周期性循环中，旧的会成为新的，新的则是旧的”，实际上文学史家无视了这些作家作品在历史上极为畅销的事实。^①更有甚者，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并很快出任该校杂志《国际文学》主编的基纳莫夫(Сергей Динамов, 1901-1939)，其《当下的历险记文学》(1925)肯定历险记这种文学类型在20世纪初俄苏之存在及其意义。^②尤其是，来自白银时代的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其《楚尔科夫与列夫申》(1933)主张，需重新发掘18世纪大众文学，并把楚尔科夫与另一位流行小说家列夫申(Василий Лёвшин, 1746-1826)进行比较，高度赞许他们的创作，认为楚尔科夫这位属于第三阶层的平民知识分子、演员、新闻工作者，是与商人阶层相关联的小官员、商业技术顾问、后来拥有产业的新贵族，作为“第三等级”作家，他的创作显然不同于古典主义。^③令人惊讶的是，因积极投身内战而失败、不得不流亡并寓居在英国的米尔斯基公爵(Дмитрий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1890-1939)，所幸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担任斯拉夫学教职，其《现代俄罗斯文学》(1927)也不回避18世纪以来现代俄罗斯文学的生产和流通机制问题，特别论述在他所经历的白银时代中，契诃夫、高尔基、安德烈耶夫等作家怎样受到读者青睐的情形。

可见，在白银时代文学中，面向大众文化市场的文学更有影响力，连象征主义也试图突破同仁圈，转化为在诗句表达上趋于通俗或直白的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更追赶时尚，许多流行的报刊和出版机构青睐畅销作家之作。这种流行文学潮流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的激进革命年代仍有余波。

四

随着内战结束，尤其是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大幅改造了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制度，即按意识形态写作，就会得到体制支持。与此同时，因为布

① B. Eikhenbaum, "Preface", in *Russian Prose* ed. by B. Eikhenbaum & Yury Tynyanov, trans. & ed. by Ray Parrott. Ann Arbor: Ardis, 1984, p.13.

② Сергей Динамов. Авантю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ших дней// Красная молодежь. 1925. №. 6-7.

③ Шкловский В. Чулков и Левшин.

尔什维克领导人深知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不断尝试建立体制化的文学认知范式，强化审查制度，终止帝俄时代那种许可存在学院外的文学批评，与学院内对文学史的建构和文学教育并存的格局，使帝俄并不以体制方式直接践行皇室意识形态的做法，转化为通过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来指导文学艺术实践。就是在这种停止引进当代欧洲文学艺术的背景下，虽然苏俄试图避免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现象出现，推行打压体现西方价值观的审美活动，在文学理论的建构上，把不能入围高雅文学框架的大众文学，归之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范畴，但布尔什维克不少领导人是有欧洲生活经验的，亲身体会到欧洲科技发达于苏俄，如列宁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布尔什维克稳定政权、建设新国家的重要政策。在政府大力投入下，科学技术在苏俄高歌猛进，并辐射到城市化进程上来，如大力发展电影和电视事业、创办科普刊物《知识就是力量》。如此情形，意外地使大众科幻类的大众文学艺术繁荣起来：体现科学技术进步力量的科幻类电影，迅速成为大众艺术。1924年由著名导演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执导、梅日拉布彭-罗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艾莉塔》(Аэлита/Aelita, 1924)，改编自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1923)，作为无声片时代最优秀的科幻电影之一，首次把先锋派风格融入银幕艺术，叙述苏联宇航员奔赴火星发动革命、建立火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幻故事，幻想性结构中穿插了至上主义、构成主义等先锋艺术具体情景。该片在当时许多城市引发万人空巷的景观。相应地，科幻小说在苏俄也迅猛发展，苏联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еляев, 1884-1942)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叙述头颅移植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1925年先刊于《工人报》)，一经问世便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全球侦查员》杂志接着连载，1937年《接班人》和《环球》杂志连载，1938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书)；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发表《死船岛》(1926-1927)、《亚特兰提斯的最后一批人》(1926)、《水陆两栖人》(1927)、《永恒的面包》(1929)、《空气销售商》(1929)、《水下农夫》(1930)、《找到自己面孔的人》(1940)等50多部科幻小说，成就了其“苏联科幻之父”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不能正常进行形式主义理论探索之后，仍留在苏俄的蒂尼

亚诺夫(Юрий Тынянов, 1894-1943)和什克洛夫斯基等,与流亡到欧洲的同仁特鲁别茨柯依(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 1890-1938)和雅克布逊(Роман Якобсон, 1896-1982)等继续探索语言诗学批评方法不同,转向创作通俗历史小说:蒂尼亚诺夫创作了关于普希金皇村中学同学和十二月党人寇赫里别克(Вильгельм Кюхельбекер, 1797-1846)的传记性畅销小说《寇赫里别克》、关于剧作家格里鲍耶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боедов, 1795-1826)最后时光的爱情和生活之作《瓦兹尔—穆赫塔尔之死》(1928),以及关于《普希金》(1928)的传记;什克洛夫斯基创作了《马可·波罗》(1936)、《米宁和波扎尔斯基》(1940)、《画家费多托夫的故事》(1956)等人生历险记之作,以及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它们成为未被官方意识形态挤压的另一种畅销文学。

遗憾的是,科幻类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学的繁荣,并未改变苏共对文学的认知方式,它依然坚持以体制方式在文学艺术中践行国家意识形态,即建立统一的文学理论。苏共的意识形态断言,苏联乃人类文明的崭新阶段,不仅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与俄罗斯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因而对欧化的帝俄及当时出现的大众文学现象,自然也要重新审视。在这样的格局中,帝俄时代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不同程度上正视的俄罗斯大众文学,承认大众文学是市民社会形成和发展之产物的现象,到了苏联时代,整体上走向反面,以至于即便重视 18-19 世纪文学研究,却对其进行符合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阐释。出生于敖德萨工程师之家的著名文学史家古科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Гуковский, 1902-1950),在为《十八世纪文学选》(1937 年初版、1938 年第三版)所写的长篇导言中称,出生于下层的文学商人费多尔·艾明所创作的历险记,代表了 18 世纪中叶资产阶级的美学观,这和他本人所主张的“商业即国家的灵魂”相一致,其《埃内斯特与多拉福尔信札》剔除了卢梭《新爱洛依丝》中的民主思想,以捍卫俄国的君主专制、庄园制度和教会,并不在意资本主义改革,只是关心商业。^①由此,在这本洋洋洒洒七百余页的著作中,仅收录了楚尔科夫《靓丽厨娘》的片段(第一部分);第二年修订版,却删除楚尔科夫作品选段。与该文选相配套的《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33),把 1760-1770 年间的文学说成是反对贵族文化的潮流,谈及艾明、

^① Гуковский Г.А(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 Худо. Литге, 1937. С.хvii, ххv.

楚尔科夫和波波夫等，则说这是“第三等级”即平民知识分子反对贵族古典主义，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流行文学的经典。^①

然而，产生诸多科幻小说和历史小说的苏联，在如何对待大众文学的认知上，官方话语却未能充分掌控整个学界。一些来自帝俄时代的学者，有时巧妙利用意识形态，积极论述与古典主义颂诗和戏剧不同的18世纪俄罗斯流行文学，认为从翻译欧洲流行文学到模仿流浪汉小说，发展出了俄罗斯历险记、旅行记、感伤主义等，这是在审美倾向上符合民主诉求的文学趋势。古科夫斯基与毕业于下诺夫格罗德神学院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文学教育家杰斯尼茨基(Василий Десницкий, 1878-1858)合作主编的科学院首版《俄罗斯文学史》第三、四卷(1941、1947)，就大量论述楚尔科夫、艾明父子、马特维科马洛夫等人创作，认为他们率先叙述世俗生活中普通人所发生的普通事件，指出“彼得改革时期叙事文学所反映的，首先是贵族阶层的、其次是商人圈子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发展之变革”，当时的公务员、官兵、市民、商人、识字的农夫等都热衷于阅读这类不同于基督教故事、古典主义诗歌的通俗文学：这样的文学在18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②这样的论述，在此前古科夫斯基的两卷本《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概观》(1937-1938)、《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1939)和《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选读》(1937年初版、1938年第三版)中，以及在布拉格伊(Д.Д. Благой, 1893-1984)院士(1968)的《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45)中，均可见到，并普遍认为，随着出版业扩大而兴盛起来的通俗文学，异于直接彰显帝俄之伟大的俄罗斯贵族文学——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或前期浪漫主义等，它确切表达了民主因素在俄国的生长。

这种矛盾情形，在二战期间变得隐秘起来：斯大林为了鼓励国民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许可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合法化，鼓励苏联爱国主义等，通俗易懂的群众性文学艺术由此勃兴起来。但随着苏美对峙时代的快速到来，面对西方普遍流行的爵士乐、好莱坞电影、通俗小说等大众文学艺术，苏共再度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导向，强化审查制度，以限制甚至否定大众文学，进而导致苏联无法正视大众文学艺术的存在。到斯大林后期，苏联没有电影

① Гуковский Г.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8 века. С.: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3. С.182.

② Гуковский Г.А и Десницкий В.А(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3. М./ Л.: Изда. Академиинауки СССР, 1941. С.117.

俱乐部，没有电影节，也没有电影艺术研讨的平台，只有一份电影专业人士的杂志《电影艺术》。更有甚者，为对抗西方遏制苏联的战略，苏共极力批判大众文学艺术，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堕落。这种情形因解冻思潮而有所减弱，却仍存在，如莫斯科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德梅什茨(Александр Дымшиц, 1910-1975)所主编的《大众文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危机》(1974)就声称，“资产阶级大众文学概念，从根本上就不同于群众文学概念，它主要是17-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创作的，和群众创作的要求是两码事，但在民主运动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在我们今天，实事求是地说，大众文化尽管其流传甚广，但不可能熄灭民主艺术之传统，因为今天民主艺术传统的存在和发展，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紧密相连”。^①根据这样的逻辑，该书分别论述美、英、西德、意、法、墨西哥等西方国家，有着怎样的表明资本主义堕落的大众文学。这种既认为大众文学是西方内部民主诉求的显示、又断言大众文化表现出西方审美观的堕落的论断，显然自相矛盾，然而当时苏联并不以为然，如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英美文学教授和比较文学专家尼科留金(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укин, 1928-)《反文化：美国大众文学》(1973)、库兹涅佐夫(Михаил Кузнецов)《文学和反文学：为大众的文学和“大众”文学》(1975)等等，就坦然地持大致相同的看法。

可是，不严肃研究大众文化的实际问题，却否定西方大众文学，这仅是苏联对待大众文学的态度之一，实际情形比这复杂得多。战后尤其是在解冻思潮之后，苏共在恢复苏联经济的过程中，为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加速发展高科技，大力开展太空探索，如实现人类首次成功登月，并且把现代科技运用于城市化进程，同时在居民日常生活问题远未得到充分解决的情形下，却大力发展电影电视事业，促使电影电视迅速在城镇普及开来。这原本是苏共为加强对苏联人进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而采取的措施——电视蓬勃发展过程中审查力度也相当大，结果却意外地改变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电影电视激活了城市经济和都市文化，城市生活由此变得日趋活跃起来，孕育出了新型的大众文学，使科幻文学艺术再度复兴起来，辅以科技手段的侦探小说也很盛行。苏联著名导演科鲁山切夫(Павел Клушанцев, 1910-1999)

^①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ризис буржуаз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Запада. М.: Наука, 1974. С.7.

就在解冻思潮中拍摄了广受欢迎的影片《通往星星之路》(1957)。这部当时激起苏联人科学热诚的影片，是在著名科幻小说家廖普诺夫(Борис Ляпунов, 1921-1972)主导下编剧的：他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1943-1948年是苏联组建火箭和宇宙飞船研发机构的工作人员，发表了《火箭》(1948年初版、1950年修订补充版)、《关于大气的小说集》(1951)、《迎接幻想》(1957)、《揭开世界》(1956)、《从宇宙归来的宇宙飞船》(1960)、《去宇宙的人》(1960)、《在大地、在天空、在海洋》(1960)等作品。当然，科幻小说成为20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的流行文学，是由许多著名作家所推动的：1952年获斯大林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叶夫列莫夫(Иван Ефремов, 1908-1972)，此前发表有《山灵之湖》(1943)和《按老工程师之路》(1943)等科幻小说，在解冻思潮时期发表了《仙女座星云》(1957)，此后又发表《五幅图》(1965)、《公牛时刻》(1963-1968)等，成为20世纪50至60年代著名的科幻小说家。本是东方学家(以研究东南亚历史和地理著称)的莫热伊科(Игорь Можейко, 1934-2003)，以笔名布雷切夫(Кир Булычѐв)发表了七篇《出不了事的小女孩》(《冒险世界》杂志1965年连载)：此乃他为时年5岁的女儿所写的儿童科幻小说，主人公就和自己女儿“阿丽萨”同名。一经发表，杂志畅销一时，并立即出版了单行本。后来他追随女儿成长历程，相应地刊行以“阿丽萨”为主人公的十多部系列科幻小说，重印多次，发行量达300万册之巨。在这样的情势下，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在1965-1973年间出版25卷并另加补充5卷的《当代科幻小说文库》(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фантастики)，包括1952年获斯大林文学奖的科幻小说家叶夫列莫夫(Иван Ефремов, 1908-1972)的《星船》、被翻译成41种语言的列姆(Станислав Лем, 1921-2006)的《从星星归来》(1965)和《约翰·季霍的星星日记》(1953)、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即阿尔卡狄(Аркадий Стругацкий, 1925-1991)和鲍里斯(Борис Стругацкий, 1933-2012)的《星期一始于星期六》(1965)等作品；还出版8卷本《科幻小说选》和保加利亚、美国、法国等科幻小说，比较系统地展示苏联和当代世界科幻小说的主要力作。

其实，科幻小说创作兴盛、阅读科幻小说成为苏联人重要审美内容的情势，与斯大林去与斯大林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解冻思潮是一致的，是苏联社

会变革的趋势之一。这期间,《哲学问题》杂志 1954 年第 2 期刊登了讨论“大众”问题的专辑,参与讨论的包括杰尼索娃(Л. Денисова)《反对存在主义中伤大众》、布德托夫(Н. Будтов)《论大众问题》、叶戈罗夫(А. Егоров)《苏联艺术中的国民性》等:把“大众”和“群众”概念相混同,以抵抗战后西欧兴盛起来的存在主义思潮——“存在先于本质”即重视个体人的主体性价值,而非为宏大理念牺牲个体生命及其价值、尊严,但提出了此前被禁言的“大众”概念。随即,苏联学界开始关注西方对大众文化的讨论,如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出版不久,苏联意识形态部门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合作的插图本俄文版《美国》杂志(1965 年总第 103 期),就发表了其中的章节《大众文化和当代社会》之俄译;进而,《简明文学百科》第 9 卷(1978)就收录“大众文学”条目,《文学百科词典》(1986)中“科幻文学”条目承认说,“它是文学的一种变体”,作者虚构奇特的似乎不可信的现象到了奇异程度,但显示出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和人们对它的期望。^①相应地,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基伏洛娃(Ирина Никифорова),与著名印度学家和作家辛克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Сенквич, 1941-)合作的《亚非国家的大众文学》(1985)声言,“当代大众文学不是单一现象,在不同历史-文化区域,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显而易见的^②不一致;换句话说,大众文学在亚非国家远不同于西方,尽管某些范式随着时间的延伸趋向于西方模式”;^③由此对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学进行了知识性描述,首次让苏联读者正面地看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大众文学真相。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人文学界对大众文学,尤其是科幻小说,展开了严肃研究:以《通往星星之路》(1961)等而著名科幻小说的巴兰吉斯(Евгений Брандис, 1916-1985),乃苏联科幻文学研究(фантастиковедение)的奠基人,发表有《凡尔纳与科幻小说发展问题》(1955)和《与凡尔纳在一起》(1981-1985)等分析法国科幻小说经典的文章,尤其是刊行力作《苏联科幻小说》(1959)。该书开宗明义道:“近十年来,科幻类的中长篇小说成为最

① Кожевников В, Николаев П.(ред.).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Сов. энцикл., 1986. С.461.

② Никифорова И.Д, Сенквич А.Н.(ред.).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странах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М.:Наука, 1985. С.3.

为流行的文学样式之一。各年龄段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很自然地痴迷于科幻小说。论及其情节的趣味性，科幻小说以其长篇的创造性叙述，征服了青年读者，激发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尝试和渴望……苏联科幻小说，就如同我们的文学一样，植根于现实。在其优秀作品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对所向往的生活展开鼓舞人心的思考。科幻小说不仅仅是科学预测，更是诗学幻想的具体化”，“为人类揭开科学技术和社会无限进步的巨大前景，扩展了科幻小说的可能性。思想发生了相应的巨变”。^①按如是观点，该书描述了1920-1930、1940-1950年代苏联科幻小说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更有意思的是，他与苏联另一位科幻作家德米特里耶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 1908-1978)——发表过《倾销》(1931)、《死亡威胁》(1931)、《费什先生对布尔什维克生气》(1931)等，合作著述《科幻小说的未来世界》(1965)，先大量论述西方科幻小说，再讨论俄苏科幻小说，如通过分析著名小说家奥库涅夫(Яков Окунев, 1903-1932)用未来主义诗学创作的乌托邦三部曲《即将来临的世界：1923-2123》(1923)、喀山大学教授尼科里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ьский, 1878-1961)的《度过千年》(1927)、受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erbert Wells, 1866-1946)《人如神》(1923)影响的苏联科幻作家泽利科维奇(Эммануил Зеликович, 1896-1965)的《下一个世界》(1930)、别利亚耶夫的《两栖人》和《在北极的天空下》(1938)、苏联科幻小说家马丁诺夫(Георгий Мартынов, 1906-1983)的《来自深渊的客人》等等，尤其是斯特鲁加茨基兄弟(Братья Стругацкие)的创作，来讨论俄苏科幻小说对未来世界的描写。^②同样，著名科幻小说家古列维奇(Георгий Гуревич, 1917-1998)之作《幻想国度的图景》(1967)，盛赞“科幻小说首先应该是全人类的”，“科幻小说是人文主义的，应该展示未来的人和社会”^③，进而肯定了苏联科幻小说的普遍意义。这种探讨科幻小说的潮流，在1970-1980年代得到了强劲的延续：普希金之家高级研究员波利季科夫(Анатолий Бритиков, 1926-1996)之《俄罗斯—苏联科幻小说》(1970)，大篇幅谈论

① Евгений Брандис.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Ленинград, 1959. С.2.

② Евгений Брандис,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 В. Мир будущего в научной фантастике. Москва: Знание, 1965.

③ Георгий Гуревич. Карта Страны Фантазии.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7. С.2.

别廖耶夫、波格丹诺夫和叶夫列莫夫等著名科幻小说家。同一时期，切尔娜雅(Н. Черная)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当代俄苏文学中的科幻小说发展问题》(1969)在乌克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获得通过，并在此基础上修订成《在幻想和预知世界里：科幻小说及其问题和艺术可能性》(1972)；著名科幻小说家廖普诺夫，根据自己在火箭和宇宙飞船部门工作的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诸多科幻小说，先后写作并出版了《迎接幻想：科幻小说概论》(1957年初版、第二年修订版)、《沿着凡尔纳足迹：科幻小说概论》(1960)、《在幻想世界里：科幻文学概述》(1970)、《在科幻小说世界里》(1975)等研究科幻小说的力作。苏俄科学院士奥西波夫(Афанасий Осипов, 1928–2017)和同道恰利索娃(А.Е. Чалисова)选编《科幻小说阅读文献和方法论材料》(1971)，把科幻小说作为严肃的学术话题加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阿尔彼塔曼(Роман Арбитман, 1927–)以笔名“卡茨”(Рустам Кац)出版《苏联科幻小说简史》(1986)，提供了大量苏联时代科幻小说资料，深受学界重视，在后苏联修订成《苏联科幻小说史》(1993)并再版(2004)。这种情形，在苏联外省也出现了，例如国立伊尔库茨克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车尔内谢娃(Татьяна Чернышева, 1935–)先后写作了《科幻小说与世界神话》(1972)、《科幻小说的神奇性和本质之需求》(1979)和《科幻小说之本质》(1985)等，分析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类，是怎样把现代科学想象力与传统神话相融合的情形。

在这样的格局中，俄罗斯文学史观也得到了些许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正视文学史上各种大众文学作家的作品。布拉格伊的《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三版(1955)，重点当然是讨论赫拉斯科夫等古典主义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但使用了“大众文学”的概念去描述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指出影响巨大的《特勒马科斯历险记》之所以不被古典主义重视、被剔除在俄罗斯文学经典之外，是因为古典主义诗学观念培养读者崇拜的，是和日常生活语言对立的“圣言”(язык богов)，而生活语言则有抑制颂诗、悲剧、史诗的“高贵”“知性”之效力，用这类语言书写的作品却得到市民读者肯定，这样的趋势导致该时期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召唤的不仅是一些作家的个人创作兴

致,更体现了文学发展的方向。^①疑惑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梅拉赫(Борис Мейлах, 1909-1987),运用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即任何民族皆没有统一的文化而是撕裂为民主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编纂六卷本《十九世纪俄罗斯中篇小说》文选(1950-1957),却辑录了纳列仁内、波戈金、马尔林斯基、巴甫洛夫、索莫夫、维利特曼、奥托耶夫斯基、扎戈斯金、达理等18-19世纪畅销文学家之作,指出并论述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民主倾向,在客观上提供了期间大众文学信息。几乎与此同时,著名文学史家科科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окорев, 1883-1965)选编《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选读》(初版于1953年,1961年再版),也按“民主”观念拣选作家作品,分别触及世俗文学、文人创作、民歌和戏剧等方面,包括楚尔科夫的《靓丽女厨》、《爱嘲笑人的人》等,并明确肯定这类通俗文学作品反古典主义、用写实性细节描写世俗生活的贡献力,“因为它们击中了庸俗气息,贵族社会傲慢地对待它们,而那些识文断字的商人和农民则对其满怀兴致,反复阅读”。^②稍后,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古罗斯文学研究部主任库兹明娜(Вера Кузьмина, 1908-1968)主编出版了著名的论文集《古俄罗斯文学研究和资料》(1961),收录有杰出的古罗斯文学研究者杰尔查文娜(Ольга Державина, 1901-1985)对17-18世纪翻译文学的考据和阐释之作,认为翻译文学正是当时的流行文学^③;与此同时,科学院通讯院士(1960)别尔科夫(Павел Берков, 1896-1968)之作《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古典主义时代》(1964),对所论述期间的流行文学也有所涉及。尤其是,1958年任职于国立喀山艺术史研究所的佐尔卡雅(Нея Зоркая, 1924-2006),以其戏剧评论和电影学成就,于1963年成为苏联作协会员,正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争论正酣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通过答辩副博士学位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修订成《百年之交:1900-1910年代俄国大众艺术之起源》(1976),率先

① Благой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 века. М.: Уч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 1955. С.365-366.

② Кокорев А.В.(сост.).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8 века. М.:Гос. Учебно-педа, 1961. С.581.

③ Державина О.А. Переводная нвелла на русской пчве в 17-18 веках// В. Кузьмина (отве. ре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М.: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61. С.133-147.

明确描述期间俄罗斯大众文学艺术情形，并探究这种流行文学所发生的历史根据——1860年代以来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及其孕育出的新作者群和读者群：它以丰富的史料和直面畅销文学史实，成为俄国大众文学研究史上的杰作。1994年始任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66年始任俄国科学院世界文化史契诃夫学术委员会主席的卡塔耶夫(Владимир Катаев, 1938-)教授，系著名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契诃夫百科全书》(2011)主编：在苏联时代适时推出的《契诃夫相随者》(Спутники Чехова, 1982)和《契诃夫时代的作家们》(1983)，就还原契诃夫受各阶层读者欢迎的大众文学写作情境，提供了大量有关契诃夫创作畅销文学的史料。可惜的是，这些触及19-20世纪之交大众文学之作，却未改变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穆拉托夫(Аскольд Мурагов, 1937-2005)的文学观念：他为四卷本《俄罗斯文学史》(1984)所写章节“1880年代俄罗斯文学”，仍视期间为现实主义不断深化的时代，回避此乃畅销文学繁荣之事实。所幸，得益于列宁格勒大学的学术氛围，他指导的研究生巴什科耶娃(Вера Башкеева)，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1880年代亚辛斯基创作》(1984)答辩——论述白银时代著名的畅销小说家亚辛斯基(Иероним Ясинский, 1850-1931)在现实主义繁荣时代受读者青睐的诸多大众文学情形(得益于这样的研究基础，2000年她通过博士学位论文《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罗斯小说和诗歌的语言形象》答辩，并因长期专注于大众文学，现已成为国立布里亚特大学著名教授)。当然，苏联时代最为重要的大众文学研究者当属洛特曼院士：其著作《十八世纪俄罗斯启蒙散文发展之路》(1973)，大量引述楚尔科夫《嘲笑人的人，又名斯拉夫故事》中的内容，以切实说明18世纪俄国文学中的民主趋向首先体现在流行文学中^①；进而，又发表苏联杰出的大众文学研究力作《作为历史文化问题的大众文学》(1990)，从历史-文学和理论上定义“大众文学”，并呼吁正视这一文学现象。^②

这样的情势，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更趋于强劲。1984年，卡梅金娜(Людмила Камедина, 1953-)在列宁格勒大学语言文学系通过副博

① Лотман Ю.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М.: ОГИ, 2000. С.210-211.

② Лотман Ю.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Т.3. 1993. С.231.

士学位论文《马特维·科马洛夫与18世纪大众文学》答辩：从文学史变迁角度严肃讨论这位18世纪著名流行小说家创作的基本情况，包括他所处的俄国启蒙主义时代背景、市民阅读情况、与欧洲浪漫主义或俄罗斯民间文学传统相关联的矛盾性特点，着重论述其在传说基础上完成《万卡·卡因》(1779)这部历险记的复杂性——作为所谓“低水平”(первый ряд)的作家，为满足“低层次读者”(низовый читатель)，创作通俗作品(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却经由文学市场，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起到了俄罗斯帝国大力扶植的古典主义文学所不可及的作用。^①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所高级研究员科洛尼茨基(Борис Колоницкий, 1955-)发表《资产阶级大众报纸与1917年劳动人民：苏沃林<小报>与彼得格勒工人》(论文集《彼得堡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图书事业》)，深入论述了20世纪初流行报纸在底层读者中的影响力；卡拉什尼科娃(Ольга Калашникова)连续发表《楚尔科夫的<靓丽厨娘>：论俄罗斯的巴洛克问题》(《俄罗斯文学问题》1985年第1期)、《楚尔科夫<嘲笑人的人>的独特文类》(1985)等，深入讨论18世纪著名畅销书小说为何流行的诗学特点。稍后，艺术史家和画家科洛温(Виктор Коровин, 1936-1991)选编《浪漫主义时代的俄罗斯科幻小说》(1987)，虽继续称19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为“浪漫主义”，但认为其中诸多作品是幻想类小说，如乌克兰人索莫夫(Орест Сомов, 1793-1833)的《美人鱼》、马尔林斯基的《凶多吉少》、扎果斯金的《不速之客》、奥陀耶夫斯基的《活死人》等，——原本不为正统文学史家所关注的畅销书，在这里重新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事实；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车尔尼雪娃(Елена Чернышева)，长期致力于研究俄国幻想小说，其副博士学位论文《波列沃依的中篇小说：诗学问题》(1989)，就已注意到波列沃依(Николай Полевой, 1796-1846)把新闻和文学创作融为一体的书写，论述他在《幸福得要命》(1833)、《写生画家》(1833)、《艾玛》(1834)等中篇小说中，如何积极叙述来自市民阶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社会的矛盾，从而成为畅销书的情形。这类研究，相较于备受苏联官方敬重的莫斯科大学教授库列绍夫(Василий Кулешов, 1920-1986)

^① Людмила Камедина. Матвей Комаров и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8 ве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84.

之作《1870-1890年代俄罗斯文学史》(1983)、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帕鲁茨科夫(Н.И. Пруцков, 1910-1979)主编的四卷本《俄罗斯文学史》(1980-1983)之第四卷等——无视大众文学而持续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观点,更显珍贵。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大众文学作品和理论被大量引进: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刊行俄译英国畅销小说家和批评家切斯特顿(Gilbert Chesterton, 1874-1936)之作《报纸上的作家》(1984)。紧接着开始迎来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第一次高峰: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师和著名侦探小说家谢缅诺夫(Юлиан Семёнов, 1931-)开始主编季刊《侦探小说与政治》,持续到1992年(共出版20辑),大量俄译西方侦探小说力作,如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的《阿姆斯特丹的水手》、美国推理小说家哈米特(Samuel Hammett, 1894-1961)的《马耳他之鹰》等。与此同时,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24卷本的《科幻小说文库》(持续到1997年),主体是俄苏科幻小说,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科幻小说》、《1920-1940年代苏联科幻小说》、《1950-1970年代苏联科幻小说》,以及叶费列莫夫(Иван Ефремов, 1908-1972)关于未来共产主义人类的《星船》(1944)和《仙女座迷雾》(1957),卡赞采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азанцев, 1906-2002)的《热岛》等;也有国外科幻小说,如《过去几个世纪的外国科幻小说》、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威尔斯《时间机器》、《美国科幻小说》、《日本科幻小说》、《法国科幻小说》等。这部小说集辑录的多是经典科幻文学作品,除上述之外,还有《过去几个世纪的外国科幻小说》(1989)包括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的《太阳城》、法国科幻小说先驱和哲学家贝尔热拉克(Hercule Cyrano de Bergerac, 1619-1655)的《另一个世界,又名月亮国和月亮帝国》(1650)、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卡贝(Étienne Cabet, 1788-1856)的《威廉·卡里斯达尔爵士伊卡里亚岛之历险旅行》(1840)、英国基督教思想家和作家切斯特顿的《诺丁山的拿破仑》(1904)等。1990年,莫斯科“彩虹”(Радуга)出版社出版文集《怎么写侦探小说》——从英、法、德、西等语言翻译西方最重要的论述侦探小说的文章,包括柯南道尔(Artur Conan Doyle, 1859-1930)之《论福尔摩斯》、

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1890–1976) 之《自传》、博尔赫斯 (Jorge Borges, 1899–1986) 之《侦探小说》、切斯特顿之《捍卫侦探文学》、英国侦探小说家弗里曼 (Richard Freeman, 1862–1943) 之《侦探小说艺术》、美国推理小说家哈密特 (1894–1961) 之《私家侦探回忆录》等。^①这部系统介绍西方经典侦探小说家经验之谈文集的出版, 正值苏联末期, 全民处于政治狂热中, 却也未妨碍该书的广泛流行。很快, 苏联人越来越正视西方大众文学, 以至于侦探小说研究者巴宾 (Сергей Бабин, 1961–) 声称, “目前我们正处于研究国外侦探小说的传统形成阶段。众所周知, 这种广为流行的文类是不承认有国家界限的, 但对我们的读者来说, 只是从 1960 年代才开始接触的。文学研究能提供的学术清单乏善可陈”, 对国外侦探文学知之甚少。^②同样是 1990 年, 莫斯科书局出版社 (Интербук) 出版了巴宾翻译的《美国侦探小说》(1990)——属于《科幻小说文库》, 以及谢巴林 (С. Щебакин)、托米洛夫 (В. Томилов) 和伊凡诺夫 (Т. Иванов) 合译的“欧美侦探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选集》, 《欧美侦探小说集》包括以笔名“艾文·亨特” (Evan Hunter) 而著称的美国犯罪小说家麦克·贝恩 (Ed McBain, 1926–2005) 的《就让他充满邪恶吧》、布里克 (Oliver Blik) 的《诚实的小偷》、以笔名“休·五旬节” (Hugh Pentecost) 和“菲利普·欧文” (Philip Owen) 而著称的神秘侦探小说家菲利普斯 (Judson Pentecost Philips, 1903–1989) 的《听觉的城市》等, 以及《寓所谜案》、《汤姆和少女》和《藏匿宝藏》等流行作品。这些俄译侦探小说对苏联末期以来苏俄审美观之改变, 以及科幻小说在后苏联时代持续繁荣, 功莫大焉。

可见, 苏维埃时代文学繁荣虽得到体制和书报审查制度保障, 却因期间国家倡导发展科学技术并在这方面卓有成效, 从而推动了科幻小说在苏联的持续繁荣; 又因要彰显苏联人的智慧和公平正义, 使侦探小说在苏俄也有惊人的成就, 这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 是相得益彰的。相应地, 虽然苏联反映论文艺学强调现实主义, 并且文学认知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 也未能阻止苏联不同时期总有批评家会正视大众文学存在及其意义。

① Португимова Н.(ред.). Как сделать детектив. М.: Радуга, 1990.

② Сергей Бабин. Зарубежный детектив XX века (в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водах). М.: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 1991. С.3.

五

苏联末期以来的审美观之巨变，首先发生于，也主要是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后易名为圣彼得堡)、伏尔加格勒和其他各加盟共和国首府，导致这些大城市的思想活跃，使得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在这些地方失灵，最后苏共不得不取消新闻报刊审查制度，进而带动出版和媒体的私有化、审美消费方式多元化(如地铁里阅读小开本图书和流行报刊成为重要景观)。这种情势成为苏联解体快速到来的因素之一。相应地，在后苏联俄国，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加速地进行着结构性变革，促成文化产业迅速发达起来，把作家改造成文学生产者，由此造成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感伤小说、历险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等及其衍生品(如电影和电视剧、舞蹈、话剧等)，成为大众文化市场上持续兴盛的重要产品。这种生产出新文化消费者的大众文学产品，持续繁荣，并与不断引进西方畅销文学艺术的潮流同步，构成后苏联时代区别于苏联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至于在难以保持俄联邦每个州有一种地方文学杂志，即精英文学日趋萎靡的情形下，大众文学却不不断兴盛，具体形成了近三十年来如下大众文学景观：

(1) 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侦探小说家(детективщик)。最著名的，当属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79)并在内务部工作多年的马林娜(Александра Мариниа, 1957-)：其处女作《六翼天使》刊于《民警》杂志(1991年秋季号)，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年皆有新作问世，1995年甚至发表10篇作品，2018年还刊行《痛苦的冒险游戏》；并且，这些作品广受欢迎，如1995年获内务部“俄国民警活动优秀文学作品奖”，1998年获莫斯科国际书市年度奖，1999年作品开始被改编成十二集电视剧《卡缅斯卡雅》。与她相当的是，出生于文学世家的东佐娃(Дарья Донцова, 1952-)——其父乃著名作家阿尔卡狄·瓦西里耶夫(Аркадий Васильев, 1907-1972)——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长期任职于《莫斯科晚报》，1998年开始在图书市场走红，先后获2001、2002、2003年度优秀作家，2002、2003年度畅销书作家。而以笔名“普拉托娃(Виктория Платова)”而著称的索罗马季娜雅(Виктория Соломатина, 1965-)，在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俘获灰姑娘》等畅销作品，

成为享誉文坛的又一位女性侦探小说家。而乌斯基诺娃(Тагьяна Устинова, 1968-)作为成长于俄联邦的侦探小说家,则受益于其专业训练和职业——1991年毕业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航空飞行系,此后任职于电视台和电台(业务涉及科学和救险),翻译美国“60分钟”、“911救援”等节目,1997年转任ОРТ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电视台主持“人与法律”和“健康”节目,2004年之后又任职于РЕН电视台“审判时刻”栏目、主持“俄国广播”的“鲜活的侦探小说”等。就是在媒体工作期间,她创作了大量侦探小说,如《亲近的人》(2003)、《陪嫁的家—幻影》(2005)和《据传说,生活就是她》(2005)、《空旷之地的天才》(2006)、《天使飞翔》(2006-2008)、《始终说“永远”》(2010-2012)等50部之多。而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的安娜·马雷舍娃,从1995年开始发表作品,成为著名的情爱-侦探小说家,因与讽刺性长篇小说《戴帽子的身体》的作者同名,而在作品封面上注明全称安娜·雅诺夫娜·马雷舍娃(Анна Жановна Малышева, 1973-),她出版了《没有行李的旅客》、《你为何要证明自己不在现场》等20部作品,发行量超过三百万册,并且不少作品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据著名批评家楚普林宁(Сергей Чупринин, 1947-)的《今日俄罗斯文学》系列——“指南”(2003)、“详细指南”(2007)、“新指南”(2009)、“简明文学百科全书”(2012)等统计,在后苏联著名侦探小说家,有百余名之多。

(2) 整理出版历史上重要的大众文学遗产。从马特维科马洛夫等18世纪流行作家的作品,到扎果斯金、布尔加林、韦尔彼茨卡娅等19世纪大众文学家的名作,无所不及。尤其是,延续并扩大苏联时代重视科幻小说的传统,如继续出版“科幻小说文库”(Библиотека фантастики)并不断增加其容量,包括两卷本《20世纪80年代苏联科幻小说》(1994)、叶费列莫夫的《关键时刻》和《锐利剃刀》、别利亚耶夫的《空气销售商》(1929)、卡赞采夫的《比时间更有力量》(1973),以及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远方的虹》(1963)、《自杀事务,又名有受伤运动员入住的旅馆》(1970)、《好运》(1971-1982)、《第二次进攻火星》(1967)、《遭遇冰雹》(1988)等,让读者领略了不同时代和国度的科幻小说。在这种情形下,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外语学院的东方学家和史学家布雷切夫(Кир Булычѐв, 1934-2003),在后苏联时代继续创作

科幻小说，如《村镇》、《多余的素数》（1997）、《未来始于今天》（1998）、《市场上的灰姑娘》（1999）、《你家田地上的鼠疫》（1999）、《天才与残暴》（2000）等。

（3）帝俄和苏联时代的“高雅”和“低级”概念，在相当程度上被打破。由于苏联末期就废除了财政预算的作协制度，即不再有体制供养的作家，使得在后苏联，不管作家身份有怎样的差别，皆须通过图书市场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一来，一些后来被文学史家纳入后苏联文学史的作家，其实并非职业作家，甚至不少是业余从事写作的畅销书作家：作为俄联邦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别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962-），其《百氏一代》（1999）从第一版3.5万册，到2012年第四版、十二次印刷，发行量已近15万册，2001年被译成汉语和法语、2003年被翻译成英语和西班牙语。对此，文学史家梅日耶娃和康拉多娃合作的《世界之窗：当代俄罗斯文学》（2006），就把他列入神秘幻想类的畅销书作家行列。同样，在1980-90年代之交，获多项文学奖的哈萨克裔俄国作家卢基扬年科（Сергей Лукьяненко，1968-），崇敬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其名作《夜巡》（Ночной Дозор，1998）的每个章节都以夜巡者安东·戈罗捷茨基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深受读者青睐；后来他又推出《日巡查》（1999）、《最后巡查》（2005）、《学校巡逻》（2014）等，这些作品使作者成了后苏联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当然，最著名的打破文学高级和低级之分的作家是阿库宁（Борис Акунин）：出生于格鲁吉亚的齐哈尔基什维利（Григорий Чхартишвили，1956-），本是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日本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甚至获得过日本的文化奖），曾任《外国文学》杂志副主编多年（1994-2000），还写过严肃的文学理论著作，却拒绝在大型文学杂志发表作品，以“阿库宁”为笔名先后发表《排队》（1985）、《泉水》（1989）、《四颗心脏》（1994）、《蔚蓝色的油脂》（1999）、《宴会》（2000）等畅销作品，创作量巨大，包括“新侦探小说”（“艾拉斯特彼得洛维奇方多林历险记”）、“外省侦探小说”（“别拉吉雅姐妹历险记”）、“少女”、“儿童文学”等系列，以及以布鲁斯尼金（Анатолий Брусникин）为笔名的《第九次拯救》（2007）、《另一时代的主人公》（2010）等历史小说，它们大多直接由著名的埃克斯莫或行动出版社出版。作为声望赫赫的畅销书作家，他大胆创作历史

演义《俄罗斯国家史》(2013):以不断制造悬念的方式,重新叙述“俄罗斯国家历史”,使原本严肃的著名史学家卡拉姆津的同名作,成为被戏拟对象。这类创作,使阿库宁成为近30多年来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并且《阿扎泽利》(2001)、《土耳其棋法》(2004)、《五品文官》(2005)和《间谍》(2012)等被拍摄成电视剧。不过,2014年以来,他和妻子旅居法国。

(4)文学出版布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苏联时代的“国家文学”、“作家”、“青年近卫军”、“十月”等出版社统领文学生产的格局被完全打破,“埃克斯莫”(ЭКСМО)、“行动”等新私有出版社异军突起,这为大众文学的繁荣提供重要基础。埃克斯莫出版社,2005-2008年间刊行苏联科幻小说家布雷乔夫的18卷本文集,推出俄罗斯轻松文学(Русский бестселлер)系列(最初五年超过850种)和“黑猫”(Черная кошка)、“法外”(Вне закона)、“女性视野中的侦探”(Детектив глазами женщины)等系列;阿库宁的许多作品,大多经由该社问世。有些作家匿名出版大众文学作品,有的出版社则雇佣不同的作者用同一个笔名出版不同的作品,如当代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和诗人伊戈尔·沃尔金(Игорь Волгин,1942-),是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基金会创始人和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副主席,而埃克斯莫出版社自1998年以来居然盗用他的名字,出版《超级杀手》(1998)、《杀三个人不算多》(2000)、《卑鄙的法律》(2002)、《女人、金钱和权力》(2003)、《孤狼》(2003)等侦探小说。他愤而起诉,该出版社却辩解说,不知道存在这样一位实有的文学专家。由于这些作品深受读者青睐,官司不了了之,该社继续使用这个名字出版畅销书,如《为一欧元出卖自己的少女》(2004)等,共计18种之多。

大众文学在后苏联到来过程中以及在俄联邦时期的持续繁荣,促成文学批评界和学界积极正视这种文学现象,并对其进行理论讨论,包括对大众文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及相关诸多问题进行检讨,以澄清不同时代大众文学在俄国存在的真相,尤其是直视当代大众文学景观。具体说来包括:

新思维启动了对苏共查禁的十月革命前、即19-20世纪之交文学之再度发掘,期间大众文学也得到重视。苏联解体伊始,阿巴什娜(Марина Абашина)在圣彼得堡大学语言文学系通过副博士学位论文《1880-1890年代初的大众

文学：亚辛斯基和彼彼科夫》(1992)的答辩：以文学生产量巨大的亚辛斯基和彼彼科夫(Виктор Бибилов, 1863-1892)为案例，论述这一时期大众文学的发展情况：其导师正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史家穆拉托夫教授。这也就意味着，对白银时代文学的再建构，延续了苏联末期佐尔卡雅在《世纪之交：1900-1910年代大众艺术在俄国的起源》(1976)中提供的思路，不限于现代主义和宗教哲学，而是看到了文化市场的机制和大众文学在其中的作用。紧接着，科学院普希金之家教授格拉切娃(Алла Грачева)选编文集《韦尔彼茨卡雅的“时代精神”》(圣彼得堡西北出版社，1993年)，凸显这位白银时代著名女性作家的创作所传达的正面价值。格拉切娃后来又推出《20世纪初俄罗斯大众文学》(1995)和《二十世纪初的畅销书：论成功现象问题》(2000)，论述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1907)、韦尔彼茨卡雅的《时代精神》(1907)和《幸福钥匙》(1909-1913)、卡缅斯基的《人们》(1910)、纳戈洛斯卡娅的《根涅夫·吉奥尼斯》(1911)等著名作家的畅销书。1995年，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语文系教师车尔内雅克(Мария А. Черняк)发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大众文学》，对该时期大众文学进行文学史描述。2008年，西蒙诺娃(Ольга Симонова)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910年代女性杂志上的通俗文学》，讨论那个年代的《女性生活》、《女性导报》、《家庭女主人杂志》、《女性世界》、《妇女联盟》、《女性生活》、《妇女》、《妇女和家庭女主人》、《女性杂志》、《家庭女主人杂志》、《妇女世界》等杂志，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和性解放思想。

自此，发掘白银时代大众文学遗产，成为后苏联时代的重要文学景观。时任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白银时代文学部研究员的嘉科娃(Елена Дьякова, 1962-)，发挥其专业所长(曾在《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新报》等工作超过十年，具有新闻敏感性)，发表《1900-1910年间流行小说家阿尔志跋绥夫、卡缅斯基和韦尔彼茨卡娅》(2000)，论述阿尔志跋绥夫这位深刻反思俄罗斯革命问题的小说家，其作品《萨宁》使用当时流行的文学元素(性与革命)，从而产生和韦尔彼茨卡雅那些触及性心理之作一样的流行小说效应。时任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教授的列科曼诺夫(Олег Лекманов, 1967-)，长期致力于白银时代诗歌的研究，但其《俄罗斯现代主义与大众诗歌：<田

地>杂志上的诗歌, 1890-1917年》(《文学问题》2003年第4期)注意到, 所谓现代主义诗篇, 不少刊于当时流行杂志: 现代主义诗人也深受大众文学生产氛围感染, 在事实上突破同仁圈。国立彼得堡林业技术学院教师列别捷娃(Валентина Лебедева)的《大众文化在俄国的命运: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七十五年》(2007), 大量涉及白银时代的大众文学。加拉耶夫(Алексей Гараев)在喀山大学语文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阿尔志跋绥夫: 文学声望形成史》(2008), 以及此前他发表多篇关于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 都视之为畅销书作者, 积极讨论其文学声望与畅销书之关系: 论文《19-20世纪之交俄国大众文学特性》(2008)认为, “期间俄国社会变化是全方位的——遍及从哲学和艺术到社会道德。毫无疑问, 类似变化常是很激进的, 各种范式的变化不能不在文学中得到反应, 包括大众文学”, 虽然“大众文学”这一概念在当时文学研究中尚未有清晰的定义。尤其是, 在著名国际会议文集《商品崇拜: 当代俄国的大众文学现象》(2009)中收录有, 国立伏尔加师范大学副教授罗赞诺夫(Юрий Розанов)之《阿里克谢列米佐夫和20世纪初大众文学》、国立乌拉尔师范大学副教授巴尔科夫斯卡娅(Нина Барковская)之《韦尔彼茨卡娅和维索茨基小说中的女性幸福之钥匙》: 论述那些所谓经典作品的通俗文学特性。^①这些学术活动让人们了解到, 白银时代远不只是象征主义文学家和宗教哲学所能涵盖的, 还有着大量的大众文学。

与对白银时代文学再发掘过程相伴随的是, 持续热衷于探究大众文学在俄国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普希金之家”的著名俄英文学关系专家列文(Юрий Левин, 1920-2006)教授之《普希金与18世纪俄罗斯文学》(1995), 就注意到作为“经典”的普希金, 与18世纪流行文学之密切关系。后来任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的车尔尼雪娃(Елена Чернышева), 长期致力于研究俄国幻想小说, 其力作《“变形的世界……”: 1820-1840年代俄罗斯幻想小说中的社会和游戏主题》(1996), 不仅把幻想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更认为这种当时流行小说, 独特地表达着对俄罗斯认同问题的关切; 接着, 其博士学位论文《1820-1840年代俄罗斯幻想小说诗学问题》(2000)指

^① Савкина И. И. Черняк М. (сост.) Культ-товары: феномен масс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СПГУТД, 2009. С.186-191, 241-245.

出，当时那些浪漫主义小说畅销的原因在于，对历史进行极具丰富想象力的再叙述。2005年洛巴切娃(Дина Лобачёва)在国立托木斯克大学语文系罗曼—德文教研室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长篇小说与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俄国的理解与借用(18-19世纪)》，论述这部流行小说被俄译及被俄国人阅读和接受的情况；1992年就成为科学院院士的俄国图书学家巴伦鲍姆(И.Е. Баренбаум, 1921-2006)的《18世纪俄国译自法文的图书》(2006)，考察卢梭及其《新爱洛依丝》和费奈隆及其《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的俄译情况，探讨大众文学在18世纪俄国的起源问题。列别捷娃在彼得堡师范大学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大众文化在俄国的起源和形成(1860-1940)》(2008)，关注的到资本主义改革和红色共产主义，对大众文化在俄国发展问题上的不同作用。弗拉基米罗夫娜(Олес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在叶卡捷琳堡大学语言文学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8世纪末-183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书信体小说”现象》(2012)，专门研究期间书信体小说这一流行文类之发达起来的原因和诗学特点，还原了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卡拉姆津的《一位俄罗斯旅行者信札》，在当初作为流行文学的具体情形。至于下诺夫哥罗德大学教师拉伊科娃(Ирина Райкова)在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教研室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公正”沙皇的俄罗斯民间传说、传奇、故事、通俗读物、大众文学(传统情节、主题、诗学)》(1995)认为，18世纪作为俄国世俗化的最初百年，试图按贵族审美趣味推动城市化，但建城的农民工和新移民多不是贵族，这就导致翻译西欧流行文学的兴起，也催生了融入斯拉夫传统的通俗文学，并且在这种具有民间文学特点之作中，多活跃着“公平正义”的沙皇形象，而这正吻合民众的俄罗斯帝国意识！这就说明，大众文学在俄国虽是城市化产物，但俄罗斯大众文学充满着俄罗斯认同和斯拉夫-俄罗斯民间诗学，从而和欧洲大众文学区分开来。

在这个过程中，18-19世纪许多重要的畅销书作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尤其是布尔加林的文学遗产。曾是苏联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史家、后任塔尔图大学教授的萨卢别列(Малле Салупере)，其《作为史学家的布尔加林》(《新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论述了布尔加林创作中的史学价值和著作权问题。国立喀山大学教师费多洛娃(Жанна Федорова)的《作为历史文化

传统共生现象的历史叙事语言(以布尔加林<德米特里·萨摩兹瓦涅茨>为例)》(2002),探讨了布尔加林这部力作的历史叙事价值;阿吉莫娃(Наталья Акимова)在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在19世纪初文学语境中的布尔加林》(2003),对布尔加林作为那个时期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无论是声望还是作品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历史文献考据,其中的重要章节《布尔加林:文学声望与文化神话》正面论述作家在当时的影响力得益于大量运用俄罗斯民间诗学。布尔加林形象在后苏联变得亲切可爱,还与下列论著分不开:加钦克(О.Н. Дяченко)和普罗霍洛娃(И.Е. Прохорова)的《伊兹科夫和布尔加林(论“文学特权”与“文学商业潮流”之相互关系问题)》(2003)、帕克洛娃(А.А. Павлова)的《文学声望之于创建中的<北方蜜蜂>作用》(2005)、斯米尔洛娃(Ю.А. Смирнова)的《布尔加林的长篇小说与俄罗斯:论思维的修辞类型和现实主义类型》(2005)和《布尔加林作品的教诲诗学(以<伊凡维日金>为例)》(2005)、库佐夫斯基(Т. Кузовкина)的《布尔加林现象:文学策略问题》(2007)、杰尼森科(С.В. Денисенко)的《布尔加林的文学声望》(2007)等等,触及布尔加林创作的不同层面,还原了他的丰富面相。除布尔加林之外,其他19世纪初著名畅销小说家也得到积极正视:库奇金娜(Светлана Кучигина)在国立萨马拉大学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喜剧家的扎戈斯金:美学问题》(2007)、格尔巴托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тов)在国立萨拉托夫大学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820-1830年代俄罗斯历史长篇小说中的民俗学:扎戈斯金和波列沃依》(2009)、科佩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опылов)的《扎戈斯金的生平与创作:21世纪观点》(2011)等,对扎戈斯金畅销小说所及的复杂历史和诗学情况进行叙事学分析和文献考据的还原。

相应地,也就“重新发现”了苏联时代的大众文学。国立科斯特罗马技术大学教师叶弗斯特拉托夫(Алексей Евстратов)的《苏联社会的大众文化(1920-30年代)》(2001),着重讨论作为白银时代之部分延伸的苏俄最初岁月里大众文学的发展。著名科幻小说家帕拉什科维奇(Геннадий Прашкевич, 1941-)的力作《红色的斯芬克斯:俄罗斯科幻小说,从奥陀耶夫斯基到鲍里斯·什特尔恩》(2007),借用大仲马的畅销书《斯芬克斯胭脂》(Le sphinx

rouge, 1866)之名, 论述从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到 20 世纪末科幻小说在俄国的发展历程, 大量涉及苏联时期的科幻小说。^①同样, 乌里扬诺夫技术大学文化与历史教研室副教授西多洛娃(Галина Сидорова)的《1960–1980 年代大众文学中的俄国日常经济文化》(2010), 论述期间苏联大众文学所传达出的苏联日常生活信息——意识形态无法压抑城市化所带来的大众文学繁荣历史。这类重新发现苏联时代大众文学的论述, 不仅对认识大众文学在俄国发展历史有巨大意义, 而且对反思苏联历史也大有裨益。

当然, 随着时间的延伸, 当代大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 日渐成为俄联邦重要景观, 促使俄国批评界必须正视这一文学现象的存在及其价值, 这就是著名批评家杜宾(Сергей Дубин, 1972–)的《不害怕成为低级读物的侦探小说》(2001)所论述的, 俄罗斯侦探小说有其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 为以侦探小说为代表的大众文学之意义, 进行了深刻辩护。^②这种美学判断, 在苏联时代以研究俄罗斯大众文学著称的佐尔卡雅之《进入后改革时代的图书阅读》(1997)已显端倪: 大众文学把读者从文学中心论和所谓“高雅”标准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文学的娱乐性功能 and 产业化价值得到扩展和确认; 并且, 当时马祖琳娜(Мария Мазурина)在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语文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990 年代俄国大众文学: 对通常叙述形式的哲学社会学分析》(1997), 从对当代大众文学之叙述方式的哲学和社会学分析中, 多番揭示出俄国大众文学价值。在这个过程中, 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获得学士、副博士和博士学位的切尔德尼琴科(Татьяна Чередниченко, 1955–2003), 作为著名的艺术学家, 把 1990 年代的日常生活纳入大众文化范畴探讨, 其力作《1990 年代俄国的诸多口号、排行榜、形象: 文化史上的重要语汇》(1999), 讨论“自由主义”、“传统”、“金钱”、“理念”、“数字”、“物品”、“神奇”、“秘密”、“权威”、“权力”、“交换”、“战争”、“混沌”等关键词, 是如何频繁地出现在当代日常生活实践中, 并经由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学艺术而通俗化

① Геннадий Прашкевич. Красный сфинк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антастики от В. Ф. Одоевского до Бориса Штерн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виньин и сыновья, 2007.

② Дубин С. Детектив, который не боится быть чтивом// Новое лит. обозрение. 2000. №. 41.

地阐释之，从而变成当代大众审美判断的基础观念^①：用生活化的大众文化事实说明大众文学艺术价值。这样大众文化进程，使得致力于研究“低级读物”（китч）的国立布里亚特大学教师波廖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оляков），连续发表《作为艺术文化现象的低级读物》（2006）、《作为符号学体系的低级读物》（2007）、《低级读物：实质、概念、概念》（2008）、《低级读物的文化形式》（2009）、《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低级读物现象》（2011）等，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艺术文化现象的低级读物》（2012年在国立东西伯利亚文化和艺术学院通过答辩），从具体的审美功能上，而不是根据“高级”和“低级”之概念，充分揭示出所谓“低级读物”的艺术和文化价值。正是在这样正视大众文学价值的趋势中，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文献部主任列伊巴拉特（Абрам Рейтблат, 1949-）的《大众文学之俄罗斯消费：无人问津之页》（《新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在介绍西方斯拉夫学家对当代俄罗斯大众文学之论述后，讨论大众文学在俄国的案例，如白银时代的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反对把人当作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之手段；苏联建立或苏联解体意味着，历史发展充满着神秘和盲点，个人是难以把握的，但大量科幻小说则显示出人类对未来发展趋势，整体上又是能预测的：通过具体分析，深入分辨出“高级”、“中级”、“低级”之18世纪古典主义诗学理论，为后来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轻视大众文学奠定了基础，导致近三百年来俄国人在享受着大众文学的审美，却在文学观念上不承认其价值所带来的弊端。尤其是，2008年4月23-24日在圣彼得堡大学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商品崇拜：当代俄国的大众文化现象》（第二年出版同名论文集）、2012年国立叶卡捷琳堡大学组织国际会议《21世纪商品崇拜：价值查考（大众文化及其需求者）》、2013年在芬兰举行关于当代俄国大众文化的国际研讨会《流行文化的外在结构》，当代大众文学成为重要议题：车尔内亚克的《阿库宁：重新考察2012年形象（论价值考察问题）》论阿库宁的畅销小说创作之于2012年俄罗斯文学的意义，芬兰坦佩雷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俄侨学者萨福金娜（Ирина Савкина）的《20年历程：俄国女性侦探小说中的人物、价值、情节》论述近20年来

^① Татьяна Чередниченко. Россия 90-х. в слоганах, рейтингах, имиджах: Актуальный лексикон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9.

女性侦探小说的诗学表达,还有更多论文分别涉及马林娜政治侦探小说及其女性形象、当代流行诗歌、色情文学、智力小说和大众小说消费等具体的大众文学现象。自此,大众文学成为学术会议论题,已然成为常态:2015年别尔姆大学组织学术会议《爱国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政治概念》、2017年国立俄国师范大学和国家图书馆合作举办研讨会《商品崇拜:在字母和数字之间的当代俄国大众文学》等,分别探讨当代大众文学的政治诉求、对现实社会问题关切等话题。同样重要的是,21世纪以来,学界日益关注日趋活跃的网络文学,并把它视为大众文学的新形式:帕塞恩科夫(Никита Пасынков)在国立人文大学新闻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994-2006年间俄语网络上大众传媒信息中的文学批评》(2006)、勃列塔耶娃(Оксана Полетаева)在国立秋明大学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广告所掩饰的大众文学》(2010)、萨多弗尼科夫(Артем Садовников)在国立伊凡诺夫大学语言文学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网络上的文学与电视批评相互影响的特点、类型、原则》(2011)等,分别论述电子时代大众文学及其表现、认知的情况。可以说,正视当代大众文学之存在和不可替代价值,在俄罗斯学术界是大势所趋,这种趋势所及范围甚广,无疑扩大了认识大众文学的视域,也丰富了当代俄罗斯文学之多元性意义。

令人钦佩的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莫斯科大学外语和区域研究教授瓦申科(Александр Ващенко, 1947-)、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和著名的美国文学专家兹维列夫(Алексей Зверев, 1937-),就和当代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 1947-2013)——在苏联未解体时在《文学报》上大胆撰文《追悼苏联文学》(1990年7月4日),及时合作主编《美国大众文学的面相》(1991),直接介绍“何谓大众文学”、“美国大众文学史”和“畅销书的类型学”等。这一前瞻性学术行为意义重大:在后苏联到来及其延伸的过程中,伴随着大众文学及其研究之持续繁荣的是,不仅继续大量引进欧美大众文学和俄侨大众文学,如上文论及的24卷(30本)“科幻小说文库”(1986-1997),就包括美、法、英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科幻小说经典,而且加强对欧美大众文学研究,如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世界文学教研室教授扎里诺夫(Евгений Жаринов, 1954-)很快就发表《幻想与侦探小说:当代英

美文学的一种文类》(1996), 介绍和分析英美侦探小说的文类特点; 接着, 梅利尼科夫(Георгиевич Мельников)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室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纳博科夫创作中的大众文学类型和主题范式》(1998), 用别林斯基和洛特曼等关于大众文学的意见, 揭示纳博科夫在美国创作的《暗探》、《洛丽塔》和《地狱》等流行作品中的色情元素及其正面价值。尤其是, 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美国文学教授温涅季科多娃, 作为美国大众文学理论研究专家, 致力于探讨大众文学一般性特点: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 既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美学和社会学相互依赖关系, 又有各不相同的情节、风格等诗学, 因此, 古典和先锋、精英和大众的传统立场应该得到新的阐释, 大众文学的价值应在超越“低级”或“高级”范畴之限定下得到呈现。^①在此基础上, 她主编论文集《流行文学: 美俄文化神话创作经验》(2003), 比较研究美俄当代大众文学在运用文化传统资源之方式、目的上所表现出不同特点: 论述极富启发意义。当然, 我们必须注意到《商品崇拜: 当代俄国大众文学现象》(2009)文集大量涉及西方大众文学, 如国立萨拉托夫大学语文系教授卡巴诺娃(Ирина Кабанова)的《温柔的俘虏: 俄国的大众文学译作》, 论述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大众文学生产的数据、俄译美国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等情况, 以及俄国读者从热衷阅读言情小说向智慧和推理小说转移的趋势。^②更有甚者, 2011 年 10 月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学术会议《国外大众文学在俄国: 18-19 世纪》, 专门讨论这两个世纪对欧洲流行文学译介和讨论的历史。进而, 国立伊凡诺夫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安采费罗娃(Ольга Анцыферова)教授, 在长期研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和 19 世纪末英美文学的诗学基础上, 推出《侦探小说奠基人安娜·卡特琳娜·格林》(2015), 着力研究美国侦探小说家格林(Anna Green, 1846-1935)创作历程及其对大众文学的贡献。这些有关欧美大众文学及其俄译问题的探讨, 连同大量俄译西方大众文学作品, 进一步促成了当代俄国读者对大众文学的正面认知。

① Татьяна Венедиктова.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заметк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2. С.16.

② Савкина И. И Черняк М.(сост.). Культ-товары: феномен масс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204-210.

实际上，大众文学在俄联邦兴盛的过程中，学界对作为文学事实的大众文学现象之重视，更伴随着对大众文学理论问题之探讨。苏联末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高级研究员雅科夫列娃(Анна Яковлева)的《低级趣味之作与严肃文艺的文化》(1990)，就尝试在理论上说明大众文学具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它长期被忽视则因为文学观念所致。紧接着，1993年国立艺术学研究所成立由赫列诺维(Н.А. Хреновый)教授负责的娱乐性文化历史与理论研究小组，对当代重要大众文学和文化现象，持续深入地进行理论探讨。尤其是，古德科夫(Лев Д. Гудков, 1946-)这位后苏联公共知识分子——2006年以来任列瓦达舆情中心主任，在关于“文学中心论”之争的1990年代，发表《作为一种问题的大众文学：为谁？》(1996)，根据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论争所涉及的问题，认为俄国批评界客观上是不断正视文学生产和消费之事实的，即面向大众的文学日益得到重视。^①(要补充说明的是，11年后，依据此论，他和友人合作《今日俄国精英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辨识知识精英和大众社会关系问题)。自此，对俄罗斯大众文学进行理论分析，已然成势：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教授索科洛夫(Евгений Соколов, 1961-)在本系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大众文化分析》(2002)中，辨析大众文化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等基础性问题；国立喀山能源大学费多洛娃(Жанна Фёдорова)的《19世纪俄国大众文学：艺术与社会视点》(2003)，尝试在艺术社会学上澄清对19世纪大众文学的正面认知；扎里诺夫教授的《大众小说的历史文学根源》(2004)，着力探讨畅销小说在俄国的独特性，即题材和源自历史。与此同时，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扎利洛夫(Евгений Жаринов, 1954-)教授的《大众畅销书的历史—文学根源》(2003)、莫斯科人文大学文化学教研室主任柯西金娜(Анна Костина)的《作为后工业社会现象的大众文化》(2004)和《大众文化：由来已久抑或“新宗教”》(2005)、列别杰娃(В.Г. Лебедева)的《两种反思：欧洲和俄国对待“大众社会”及其文化现象的分析传统》(2008)等，分别从理论上探讨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化作为当代审美的重要话题，并对构成大众文学生产或消费主体的“大众”进行文化学分析。

^①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к проблема. Для кого?//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6. №.22. С.78-100.

自此，大众文学进入学位论文论题，也就水到渠成：克里莫娃(Людмила Климова)在国立斯塔夫罗波尔大学哲学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大众文化与个性：文化哲学视点》(2005)、萨姆卢科夫(Илья Саморуков)在国立萨马拉大学语文学文学理论教研室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大众文学：艺术反映问题》(2006)、季格兰(Амирян Тигран)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文类的侦探小说：布劳恩、列瓦佐夫、科丽斯杰娃》(2012)等，分别对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的不同关键问题进行理论辨析，甚至把侦探小说与颠覆正统美学观的后现代主义关联起来。尤其是，在著名文集《商品崇拜：当代俄国大众文学现象》(2009)中，讨论大众文学理论问题是重点，如莫斯科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索特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отников, 1960-)的《面向儿童的大众文学》、著名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及翻译家奥布霍娃(Ольга Обухова, 1941-)的《大众文学和/或“精英文学”》、著名文学批评家利托夫斯卡娅(Мария Литовская, 1958-)的《作为生活教科书的大众文学：适合少年阅读的图书》、著名文学批评家拉宁(Борис Ланин, 1961-)的《大众文学与俄国中学教学》等，均触及大众文学之教育功能、读者群等理论问题。这些活动表明，当代俄国对大众文学或文化的理论探讨，不同于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但因为所使用的案例多限于本土，也就造成俄国大众文化理论无法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力。

正是大众文学不断被正视、正名的过程，促使文学史家重新建构俄罗斯文学史。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当代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吉米娜(Светлана Тимина)教授与同仁编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2005)，第十章专论 20 世纪末的大众文学，认为“20 世纪末形成了多层次的政治文化空间，成为重要学术实践之进展的有意义征兆。文学进程所强烈显露出的‘高级’的、精英的，和‘低级’的、大众的之分化，日益变成文学研究者、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文化学者、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学术兴趣之焦点。读者大众之分层、文化主流符码之变化，不仅对美学而言是迫切的，对当代文学的社会特征而言，亦然。今日文学显而易见的多元并存，许多书摊上满是装帧醒目的出版物，许多人在地铁里阅读马林娜、阿库宁和东佐娃作品”，这类情形要求回

答大众文化在当代的地位以及何谓“大众文学”，^①进而把那些著名的畅销书作者纳入文学史框架进行严肃讨论。现在已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当代俄罗斯文学教授的切尔内克(Мария Черняк)，在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大众文学现象：起源与诗学问题》(导师为研究当代俄罗斯文学著名学者吉米娜教授)的基础上，推出《20世纪末大众文学》(2002)，系统论述期间大众文学不同景观；此后她主编《当代本土大众文学阅读预测》(2005)、著述《20世纪大众文学现象》(2005)和《当代俄罗斯文学》(2008)，着力肯定大众文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大众文学之繁荣，“当代文学常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转型文学，即从统一的被审查的苏维埃文学，转向当代创作自由条件下文学，作家和读者的角色皆发生变化，‘文学中心论’成为明日黄花”，^②大众文学的价值由此得到呈现，把1960年代著名作家阿克肖诺夫及其《莫斯科传奇》(2000)之类被文学史家所重视的力作，与阿库宁的《土耳其棋法》(1999)、《为白痴写的童话》(2001)、《死亡的情人》(2001)、《五品文官》(2001)等诸多畅销小说一道，视为同等重要的当代流行文学之作。先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和语文系的梅日耶娃(Марина Межиева, 1962-)，虽然1994年后旅居德国，却一直是活跃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她和俄国文化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康拉多娃(Наталья Конрадова, 1974-)合作的《世界之窗：当代俄罗斯文学》(2006)，重视研究神秘幻想小说、侦探小说和新感伤主义小说，论述图书市场上的流行作品，认为佩列文和阿库宁等创作的神秘幻想小说，深得不同阶层读者青睐，使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之分野变得模糊起来。^③尤其是，在格尔多维奇之《当代俄罗斯文学》(2007)中，后苏联俄国文学存在着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学三种潮流，而大众文学以布什科夫、托卡列娃、阿库宁等作家的创作最为著名，是构成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④这类著述，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编纂的惯例，

① Тимина С.И., Васильев В.Е., Воронина О.Ю. и др.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0-е гг. — начало 21 в.). СПб.: Академия, 2005. С.210.

② Черняк 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е изд. М.: ФОРУМ, САГА, 2008. С.198.

③ Межиева М., Конрадова Н. Окно в мир: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06.

④ Гордович К.Д.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б.: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печати, 2007. С.212-219.

使不为传统文学史家尊重的大众文学，进入了文学史叙述。

可以说，从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制度上保障大众文学的再度繁荣，成为苏联文学转化为后苏联文学的重要标志，包括生产了许多大众文学作品及其衍生产品、经常再版历史上重要的大众文学作品，由此使苏联特有的按意识形态要求生产的官方文学、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文学和境外文学之格局自动消失，也导致传统的“低级文学”和“高雅文学”或“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划分的标准变得模糊起来。如此情形促使学界放弃苏联时代只热衷于经典文学(классика)和官方认可的文学的格局，许多重要学者和著名批评家转而积极研究不同时期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大众文学(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现象。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中，俄罗斯近三十年来出现了近百篇涉及大众文学的(副)博士学位论文，论题遍及从18世纪至今各种大众文学现象或理论，大众文学也进入了文学史叙述框架。遗憾的是，这些情形却未能从理论上改变大众文学在国际继续被轻视的境遇、锻造出俄罗斯大众文学理论，这与俄国学界和批评界尚未全方位检讨帝俄-苏俄和俄罗斯联邦大众文学历史上诸多重大问题实质有关。

总之，18世纪开启的世俗化过程，核心是城市化、现代化和欧洲化，相应地，就大量引进体现欧洲世俗化和市民化诉求的流行文学作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俄罗斯通俗文学。随着俄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俄罗斯通俗文学日渐成熟，成为三百年来俄国文学中的最重要事实之一，形成了受益于欧洲却不同于西欧的大众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机制：不仅报刊审查制度是大众文学机制永葆生命力而不同于西方的关键性因素，而且在俄罗斯帝国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面向图书市场而出现的畅销书、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给文学经典之筛选奠定了扎实基础，文学教育转而逐步加大来自俄罗斯文学经典，这就促使国民在审美上日趋转向对俄罗斯的认同。在苏联时代，文学生产和消费与意识形态融合，把强制性建构的反映论文学观念，转化为普通民众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同，在相当程度上磨损了大众文学价值，却未能销蚀大众文学之存在。在俄罗斯文学消费中，被读者津津乐道的大众文学虽更浸淫于西方大众文化，却没有导致大众文学趋于和西方一体化，并且与

所谓精英文学经典序列在俄国的变化趋势相一致。这样的大众文学及其认知，与俄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深受西欧之影响相矛盾，但在俄国文学批评界看来，却是理所应当的：社会精英(包括政界、知识界、企业界和科技界等)热心于欧洲文化，在审美观念上不排斥包括欧美大众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学艺术，因而每个时代总有文学家和批评家，或创作，或出版，或评论大众文学，促使在文学经典机制之外给大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留下巨大空间，使每个时代各有诸多卓越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以及相应的出色批评家，如别林斯基、楚科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佐尔卡雅、洛特曼、车尔内亚克和杜宾等，但他们承认大众文学的观念，是基于对俄罗斯审美的认同。苏联解体，排斥大众文学的苏联反映论文艺学也就随之失效——它不及积极阐释大众文学价值的西方文论更具有效性，但俄联邦繁荣的大众文学创作和批评，是立足于对俄罗斯美学认同基础上展开的，因而和俄国社会经历艰难变革，未能创造出转型理论一样，也就没有催生出普世性的俄罗斯大众文学批评范式和理论。

【Abstract】 Popular literature is the product of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differ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popular literature does not have just the European or its extension---the American model. The urbanization initiated by Peter the Great, along with introducing popular secular literature in Europe and on the basis of translation and imitation, bega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in Russia. For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whether it was imperial Russia or the Soviet Union 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ue to the censorship system, popular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developed in Russia in a mode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r American model. It was developed as a whole of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not as a special category. Quite a lot of criticism questions the existence and value of popular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Russian classic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at is, concept chang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education are selected from best-selling works in various eras. Consequently, many officially advocated classics are not

so popular as so-called inferior popular literature.

【Key Words】 Russian Urbanization, Russian Popular Literature, Criticism of Russian Popular Literature, Russian Identity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пуля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 урбанизации. Процессы урбанизации отличны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а популя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модель Европы и её расширение — модель США. Процесс урбанизации, начатый Петром I, наряду с внедрением популярной с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 Европы, на основе перевода и подража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оложил начало процесс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опуля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более трехсот лет,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недрение системы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цензуры делало популярн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в России отличной от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моделей: она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как целостная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 не как её особый жанр, и множество из сопутствующей е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задавалось вопросо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ценности популя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популя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и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то есть изменения в концепци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отобранные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бестселлеры разных эпох, 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явившееся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родвигаем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лияние которой было зачастую меньше, чем у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популя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изкого уровн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Урбаниз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русская популя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итика популяр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李 恪)

阿尼奇科夫的民俗学遗产*

赵婷廷**

【内容提要】阿尼奇科夫是白银时代俄罗斯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和民俗学家。他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精要，其对歌谣和多神教的研究推动了俄罗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发展。阿尼奇科夫在俄罗斯民间文艺学中的贡献主要有四点：其一，基于翔实的欧洲民间文学资料，强调了春季仪式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中的作用，指出了春季仪式背后隐匿的原始宗教意识；其二，从美学层面出发，勾勒出春季仪式歌谣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其三，梳理了古罗斯书面文学中看待多神教的两种不同观点，尤其是指出宴席是保存多神教遗存的重要载体；其四，强调俄罗斯基督教歌谣的产生并不是完全自发的，而是与此前的多神教密切相关。阿尼奇科夫并未将民间文学的研究封闭在文学的狭窄圈子里，而是从民俗学的视角切入，将民间文学研究与文艺学和文化史结合在一起，大大拓宽了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畛域。

【关键词】俄罗斯民俗学 阿尼奇科夫 俄罗斯民间文化 俄罗斯歌谣 俄罗斯多神教

【中图分类号】D851.2/K890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4-0143(28)

在俄罗斯学术传统中，可用于表示“民间文学”的概念有“народ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народное уст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народная устная поэзия”和“фольклор”等。其中“фольклор”一词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在俄语

*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叶俄国民间文艺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6YJC752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赵婷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俄语系讲师。

中，该词源自英语中的“folklore”。“folklore”一词在欧美学术体系中指“民俗学”或“民间文艺学”。在俄罗斯学术体系中，狭义上“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表示“民间文艺学”，而民俗学则融于民族志学（этнография）当中。从广义上而言，“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在俄罗斯既包括民间文艺学研究，也包括研究民间舞蹈、民间风俗、民间信仰、民间医药等民间文化在内的民俗。由于俄罗斯的民俗学研究沿用的是欧洲民俗学的理论框架，俄罗斯学界使用“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时，更倾向于广义上的民俗学。我国对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集中在维谢洛夫斯基、普罗普、梅列金斯基和巴赫金等个别学者的著作研究，缺少对白银时代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作为20世纪初的一位重要的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阿尼奇科夫早期研究论著的勾勒能够丰富我国的外国民间文艺研究和外国民俗学研究。

引言

叶·瓦·阿尼奇科夫（Е.В. Аничков，1866-1937）出生于诺夫哥罗德

的贵族家庭，是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文学评论家和作家。这位涉猎广泛的民间文艺学家于1920-1937年间居住在南斯拉夫王国的贝尔格莱德。苏联解体后，随着对白俄群体研究的升温，这位学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与俄侨有关的专著中，如《欧洲地区的俄罗斯侨民历史学家》（1992）、《南斯拉夫的俄罗斯侨民》（1996）和《俄罗斯境外的文学研究》（2006）等。自2000年起，俄罗斯开始大量再版或重印19世纪和20世纪重要民间文艺学家的论著，这其中便包括阿尼奇科夫的研究成果，如《多神教与古罗斯》一书，分别于2003年、2009年和2014年重印。

目前，俄罗斯关于阿尼奇科夫的研究，聚焦在阿尼奇科夫研究方法

与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之间的关系上。关于这一点，在俄罗斯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康·马·阿扎多夫斯基（К.М. Азадовский，1941-）认为，阿尼奇科夫的民间文学研究是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的延续，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在《俄国民间文艺学史》（第二卷）中写道：“以维谢洛夫斯基学派

的观点为蓝本出版了诸多论

著,事实上,这些论著已经是对维谢洛夫斯基理论观点的修正,例如叶·瓦·阿扎多夫斯基的专著《西方和斯拉夫民族的春季仪式歌谣》。^①阿扎多夫斯基的这一论点在俄罗斯当代的民间文学研究中也有回应者。阿·列·雷奇科夫(А.Л. Рычков, 1974-)在文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叶·瓦·阿尼奇科夫对维谢洛夫斯基民间宗教文学观点的反思》中,立足于12-13世纪法国骑士文学中关于圣杯的传说以及游吟歌谣中关于新摩尼教教义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内容,对维谢洛夫斯基关于假借理论的“鲍格米勒派假说”进行了重新思考。然而,俄罗斯当代民间文艺学家塔·格·伊万诺娃(Т.Г. Иванова, 1953-)持不同观点,她基于阿尼奇科夫的两篇文章《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1907)和《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1922),认为阿尼奇科夫与维谢洛夫斯基对民间文学的看法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理论分野,她将阿尼奇科夫视作维谢洛夫斯基的忠实学生和维谢洛夫斯基理论的传播者。这一观点在她的著作《20世纪初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研究》(1993)和《20世纪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1900-1941》(2009)中均有明确体现,如她谈到,“阿扎多夫斯基和沙波瓦洛夫认为,阿尼奇科夫对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持修正主义的态度,这一指责是站不住脚的。”^②阿扎多夫斯基和伊万诺娃争论的焦点在于,阿尼奇科夫对于维谢洛夫斯基的民间文学观到底是革故鼎新,还是继往开来。本文作者认为,在学术思想上,阿尼奇科夫与其老师阿·尼·维谢洛夫斯基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但与尼·尼·特鲁比钦(Н.Н. Трубицын, 1876-1918)作为“维谢洛夫斯基著作与读者之间的‘中间人’”^③的身份不同,阿尼奇科夫并非仅是维谢洛夫斯基思想的传声筒。阿尼奇科夫虽在大学时代深受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方法的熏染,但他并未全盘接受其授业恩师的民间文学观。

《西方和斯拉夫民族的春季仪式歌谣》(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和《多神教和古罗斯》(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яя Русь)这两部专著奠定了阿尼奇科夫在20世纪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

① Азадовский М.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и. М.: Учпедгиз, 1963. Т.2. С.262.

② Иванова Т.Г.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и XX века: 1900-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1941 г.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9. С.162.

③ Там же. С.159.

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阿尼奇科夫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显示出自身的特点与个性，他对歌谣和多神教的研究站在了学科的前沿。歌谣是阿尼奇科夫在学术上成就最高的一个领域。20 世纪伊始，阿尼奇科夫就能够从文学史的发展着眼，借鉴当时西方的民俗学理论，对歌谣进行溯源，并论述歌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这是非常可贵的。与此同时，他在古罗斯书面文学中挖掘多神教信仰的遗存，并在民间文学层面阐释多神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这一论点在当时俄罗斯的民间文艺学中属于发人之所未发，占了学术研究的首倡之功。

一、春季仪式及其与原始宗教的联系

《上帝的侍者米库拉和圣尼古拉》(Микола угодник и св. Николай, 1892) 是阿尼奇科夫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试笔之作。从学术史上来看，这一著作稍显稚嫩。在这一论著中，阿尼奇科夫拥护外借理论，阐述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密切联系，并且表现出了他对春季节日和仪式的浓厚兴趣。1898 年，身处法国的阿尼奇科夫着手写作论著《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并于 1899 年顺利完成写作。此后，阿尼奇科夫便奔波于此部论著的出版事宜。第一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从仪式到歌谣》(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于 1903 年刊印。1903 年春，阿尼奇科夫由于携带 300 份禁运杂志《解放》^① 归国而被捕入狱，第二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从歌谣到诗歌》(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песни к поэзии) 的出版事宜被迫搁置。在被关押在彼得要塞的近两年时间里，阿尼奇科夫并未停止对该论著的校对和操持该书的出版工作。论著的第二部分最终于 1905 年面世。在第一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从仪式到歌谣》中，阿尼奇科夫基于欧洲各地关于春季仪式的资料，援引了同时期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观点，花费大量篇幅阐述了春季仪式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中的意义。

^① 杂志《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的创始人是俄罗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创办于 1902 年，1905 年停刊，共有 79 期。

实际功用是阿尼奇科夫考察春季仪式的基本出发点。围绕着每个季节，均有与之相关的节庆，这早已是大多数神话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的一个共识。在欧洲文化中，依据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来划分四个节庆仪式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划分，因为这种划分模式便于理论研究。阿尼奇科夫从不同民族对春季开始时间的界定不同出发，对上述划分模式提出了质疑。例如，奥维人将雪的融化和第一抹新绿的出现视作春天的开始，乌克兰人将河流的解冻看作春天开始的标志，而乌德穆尔特人眼中的春天是从冰的消融开始的。不难看出，不同地区春天开始的标志并不与日历时间完全吻合。那么春季节庆举行的时间又与什么相关？德国神话学家格林兄弟认为，各地对春季节日的庆祝与各地的自然气候条件相关。阿尼奇科夫指出，对于春季节日和仪式举行的时间，气候条件不起决定性作用。阿尼奇科夫推崇德国民间文艺学家欧根·莫克（Eugen Mogk, 1854-1939）在著作《神话学》（1898）中的观点，莫克认为，仪式产生的时间并不与太阳的位置直接相关，而是与太阳对大地产生的影响相关。^①莫克的这一观点对阿尼奇科夫影响重大，阿尼奇科夫在此基础上直接言明了四季仪礼与自然现象在民众心中的实际功用有关。

人们的生活条件与天气状况密切相关，贴近自然的生活条件是决定四个系列节日仪式最主要和最本质内涵的首要因素。如果人依存于自然经济，那么在他的意识中，一年工作周期里的每个时刻都会有与之相关的劳作，都会有不同的希冀和各自的担忧。在民众心中，自然现象首先与它的实际功用有关。^②

不难看出，阿尼奇科夫看重自然现象在民众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节日仪式。正是基于这一点，阿尼奇科夫认为，真实的生活条件是进行仪式研究的首要出发点。同时，研究仪式和与之相关的游戏、娱乐和歌谣，应当在考察其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从经济关系的视角来看，春季系列节日和秋季系列节日与经济关系结合得最为紧密。不论民众生活在何种气候条件下，只要靠自然经济生存，那么有两个时间节点在他们的生活中起

① 参见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03. С.60.

② Там же. С.61-62.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春季劳作的开始，包括覆土、播种和插秧等，这是第一个时间节点。第二个时间节点便是充满喜悦的秋收。这两个系列节日的经济生活基础是最显而易见的。

在自然经济的生产关系中，春天一方面与人们忍饥挨饿的凄惨生活境况联系在一起。同时，春天是繁重劳作的开始。在收获劳动果实前，庄稼人还需静待数月，还要为未来的收成忧心。春天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等待，而非赠予。从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春天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时节。为了证实这一点，阿尼奇科夫列举了欧洲国家俗语谚语中关于春天重要性的论述，如西班牙人将四月和五月称为一年中的关键时节，而在法国人眼中，四月和五月决定了未来一年的收成。在欧洲越靠南的地区，春天的重要性会愈发凸显。四月和五月的重要性在欧洲中部和北部让位给了夏天。比如，在俄罗斯一年收成的好坏更多取决于夏天，如俄罗斯谚语中所言“夏天多流汗，冬天吃饱饭”(День летний год кормит)、“夏天多储备，冬天多花费”(Лето-припасиха, а зима-подбериха)。

在分析完毕春季劳作与时令的关系后，阿尼奇科夫得出如下结论：“农耕作业越原始，人们便更加依赖自然的力量，而非自身的力量。”^①不利自然天气对原始人(первобытный человек)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春天到来后，为了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未来的福祉不被任何不利现象侵扰，他们会进行一些仪式。阿尼奇科夫将春天进行的仪式按照实际功用划分为两类：净化仪式(очищение)和祈愿仪式(заклинание)。净化仪式主要用来驱邪避秽、禳灾避祸。祈愿仪式意在祈求达成愿望。春季的净化仪式主要借助三个方式进行：洗礼(омовение)、用火洁净(очищение огнем)和声音驱赶(изгнание шумом)。也可以借助扇扇子和空气洁净两种方式进行净化仪式。在欧洲文化中，春季均会进行大扫除，并且欧洲的民间文学中也有诸多与清扫相关的片段。阿尼奇科夫借助这些传统习俗和民间歌谣，证实了净化仪式在欧洲的普遍性。

英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弗雷泽(J.G.Frazer, 1854-1941)在其著作《金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70.

枝》中，将巫医、巫术、净化仪式和祈愿仪式等均归入原始法术（первобытная магия），并认为原始法术的产生源自原始人心中的万物有灵论（анимизм）。在阿尼奇科夫看来，弗雷泽的结论未能触及原始法术产生的本质性原因。这位民间文艺学家认为，了解仪式产生的心理基础，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不论在净化仪式中，还是在祈愿仪式中，相似性是这两类仪式的共同特征。如原始人认为，疾病是进入人体内部的外来物，净化仪式中的咒语意在将异物驱逐到体外，故而在巫医中催吐是治疗疾病的第一要务。在祈愿仪式中同样如此，如人们用鲜花装点居所，希冀自己所播种的庄稼也能开花结果，收获满满。在相似性原则的基础上，阿尼奇科夫得出结论：原始人对自然的看法带有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эгоцентризм）。自我中心主义是原始人世界观中最基本和最显著的特点。在自我中心主义的心理基础上，衍化出了原始人看待周遭世界方式的合理性。原始人关注的并非自然界中主导他们生存的自然法则本身，而是这些法则带给他们的利与弊。大自然在原始人的世界中是为他们所用的。原始人借助净化仪式和祈愿仪式对自然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是超自然的。超自然力在原始人的世界观中至关重要，但这也是原始人世界观中最明显的错误：将理性与非理性，甚至是超自然力混为一谈。

在分析了仪式产生的心理基础后，阿尼奇科夫对弗雷泽的原始法力观做出了修正。弗雷泽将原始法力置于宗教的对立面，将原始仪式与科学的萌芽联系在一起。阿尼奇科夫驳斥了这一观点，指出民间仪式的基础并不是承认自然规则的不可逆性，而是试图对其加以干预。民间仪式的产生与多神教的宗教意识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与对神祇的认识有关。在原始人的意识深处，他们相信自身对自然的操控，认为自然臣服于他们，甚至他们自己就是神。比如，萨满教的巫师只是在召唤神灵的帮助，他们与神灵处在同一等级，也贵为神。无疑，基督教阻滞了多神教宗教意识的发展，甚至这一原始宗教意识不得不重新返回自身发展的最原初阶段。仪式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也随即再次进入萌发阶段。

阿尼奇科夫借助大量的民俗学资料和民间文学文本，敏锐地洞察出十分重要的一点：人的实际需要和意愿是多神教宗教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对以自然经济为生存方式的原始人而言，净化仪式和祈愿仪式受制于对祭司、国

王、雨神和太阳神等神圣性的认识。这些神圣个体的存在构筑了自我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合理性（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сть）。与此同时，多神教宗教意识也可用于阐释神祇认识中的二元对立：善与恶的对立，爱与怖的对立。例如，阿尼奇科夫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解读民间仪式，指出在祈愿仪式中可以寻觅善良神祇的影子，而在净化仪式中则可窥见邪魔的踪迹。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阿尼奇科夫认为春季仪式的产生与原始人在实际生活和生产中的真实需求有关。由于原始人确信超自然力的存在，他们借助净化仪式摆脱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和规避未来可能会出现风险，利用祈愿仪式来达成内心的愿望。这些仪式的心理基础是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主义的背后是多神教的宗教意识。与以费·伊·布斯拉耶夫（Ф.И. Буслаев, 1818-1897）和阿·尼·阿法纳西耶夫（А.Н. Афанасьев, 1826-1871）为代表的俄罗斯神话学派观点不同，阿尼奇科夫并不赞同对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解读，并不认为民间文学中折射出了民众对自然的诗意观，而是基于民众的实际需要来阐释民间仪式。阿尼奇科夫摒弃了神话学派对民间文学的唯心主义分析，强调民间仪式所具有的实际功能。在这一点上，阿尼奇科夫师承了自己老师维谢洛夫斯基的美学观。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美学现象是与日常的实际需求相关的。与此同时，挖掘春季仪式与宗教的深层次联系，是阿尼奇科夫对欧洲民间文学进行细致文本分析的出发点和重要落脚点。在这一论证中，依然可以看到维谢洛夫斯基关于民间文学现象混合主义（синкретизм）起源论的影子。

阿尼奇科夫凭借他对欧洲民间文化了解和研究的丰厚素养，吸取了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和弗雷泽文化人类学的精华，以一个文艺学家的思维方式，对春季仪式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在理论层面上予以深入探讨。他对春季仪式的探究，以物质生活为切入点探求隐藏在仪式背后的心理基础，进而肯定了春季仪式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中的作用。

二、从仪式到诗歌

《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第一部的副标题为《从仪式到歌谣》，

而第二部的副标题为《从歌谣到诗歌》。从两部著作的标题设置来看，阿尼奇科夫旨在探究春季歌谣的缘起和春季歌谣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可以说，阿尼奇科夫并非仅在民间文学层面或者民族志层面论述春季仪式，而是将其上升到美学层面加以阐释。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从仪式到歌谣》的前言中，阿尼奇科夫便直言，十分有必要研究历史文学现象与民间生活和仪式的关系。同时，这位民间文艺学家明确指出了该著作的研究任务：

有两项任务同时摆在我面前。研究宗教历史学家对春季仪式的研究能得出何种结论，这是其一。与春季仪式有关的歌谣对文学史研究，甚至对美学研究有何助益，这是其二。我的研究工作在这双重任务的指导下进行。^①

阿尼奇科夫收集了大量欧洲民间文学中关于春季节日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几条关于歌谣起源的假设，进而做出了关于美学意识产生过程的假设。在他看来，美学意识的产生与宗教意识（*религиозное сознание*）密切相关。

（一）从仪式到歌谣

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一书中，阿尼奇科夫所言的仪式（*обряд*）指的是伴随季节变换而举行的节庆仪式，尤其强调对原始人生活万分重要的春季仪式和秋季仪式。在这一著作中，阿尼奇科夫虽然未对歌谣（*песня*）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但从全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歌谣指的是民众借以抒发情感的、带有韵律性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在阿尼奇科夫看来，歌谣是原始人表达喜、怒、哀、乐等情感的重要工具。划分歌谣类型时，阿尼奇科夫指出，劳动歌谣和仪式歌谣是最为主要的两类歌谣。阿尼奇科夫将所有的歌谣类型均归入这两类歌谣，如军旅歌谣和爱情歌谣可以被直接划分到仪式歌谣这一类别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佐证是，军旅歌谣和爱情歌谣的咏唱时间与仪式举行的时间是吻合的。

阿尼奇科夫将仪式和歌谣视作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他认为，由研究仪式过渡到分析歌谣，不过是转向同一个现象的另一面。伴随着仪式的举行，会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6.

咏唱很多的歌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剖析仪式与歌谣的联系，如果仅仅流于表面是缺少说服力的。阿尼奇科夫借助仪式背后隐藏的心理本质，试图在仪式和歌谣之间架起一座坚固的桥梁。阿尼奇科夫指出：“在我们看来，仪式中咒语的心理本质是将意识集中到某一具体的愿望上，而这一愿望能够将人们带入兴奋状态，也就是狂喜状态。”^①而带有咒语的仪式中，每个行为（действие）均是在塔姆布森长鼓伴奏的歌舞中完成的。歌谣在仪式中是有特定功用的。歌谣一方面能够营造产生狂喜状态的氛围，另一方面，歌谣直接用语言传达愿望的具体内容。因此，歌谣的韵律（ритм）与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维谢洛夫斯基在《历史诗学中的三个章节》中指出，古老的歌舞“能够借助有节奏的声音和动作为积聚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能量寻找一个突破口，能够将其释放出来，给人以轻松感。”^②维谢洛夫斯基将歌舞的功用归结为生理和心理上的自我娱乐。这是席勒和斯宾塞的艺术“游戏说”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阿尼奇科夫并不赞同歌舞的游戏起源论，他推崇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比歇尔（Karl Bücher, 1847-1930）的观点。比歇尔在研究劳动歌谣（рабочие песни）时，得出如下结论：劳动歌谣中的韵律是由劳动本身所赋予的，劳动、音乐和诗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这三者之间最为根本的是劳动。比歇尔在《劳动与韵律》中将劳动直接称为“有节奏的身体运动”^③，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充满力量的、有节奏的身体运动是诗歌产生的根源。比歇尔在韵律中看到了强制和力量，而这些力量能够将人带入癫狂和狂喜的状态。比歇尔的诗歌起源观与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宣泄观有着明显的不同。比歇尔认为，歌谣并不是劳动过程中的一种慰藉，而是助益于提高劳动强度。如同在歌舞中音乐能够很好地激发舞者肌肉的潜在力量，劳动中咏唱歌谣也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因为生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的紧张度。阿尼奇科夫发展了比歇尔的劳动歌谣实用论，认为不仅劳动歌谣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380-381.

②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Н. Три главы из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С.2. http://az.lib.ru/w/weselowskij_a_n/text_0080.shtml

③ Бюхер К. Работа и ритм. Рабочие песни, их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эстетическ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ер. с нем. И. Иванова. СПб.: Изд. О.Н. Поповой, 1899. С.70.

具有实际功用，爱情歌谣、军旅歌谣和讽刺歌谣均有其各自的实际功用。在各类歌谣中存在一个共同的心理过程：歌谣能够激活心理的紧张感和激发肌肉的能量。如军旅歌谣可以提高军人的战斗热情。阿尼奇科夫分析完歌谣的作用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歌谣是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有用的手段。^①

分析完韵律在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实际功用后，阿尼奇科夫认为，咒语的最基础内容是借助韵律表达的意愿。正如康德在《快乐的科学》中所说：“韵律是一种强制，它迫使人产生不可遏制的乐趣，一种协和的乐趣；非但脚步，而且心灵也紧随节奏。”^②与仪式紧密相关的歌谣，不论歌谣的存在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纯粹是美学的，还是与宗教有关，将歌谣和舞蹈从仪式中剥离，那么从心理分析上来看，仪式是不可完成的。在此基础上，阿尼奇科夫又做出了一个大胆假设：“仪式中的咒语歌谣是自发产生的，并且是民间歌谣的原初形式。”^③集中注意力需要一个外在的作用力，阿尼奇科夫认为，这个作用力正是富有节奏的叙述。作为歌谣的核心，韵律能够营造生理上和心理学上的紧张感，这一紧张感是激发情感的绝佳手段。

不难看出，韵律是阿尼奇科夫“从仪式到歌谣”这一理论体系架构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原始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自我和非我。“自我”中最为核心的是人的意愿和意志。为了实现“自我”和满足“自我”的需求，人需要战胜那些被他称作是“非我”的一切。劳作时，在韵律的带动下，人的自我意识会不断高涨。“韵律在他（指原始人—作者注）的手中是进行斗争的有力工具，并且是斗争胜利的首要保证。”^④阿尼奇科夫认为，原始人正是借助韵律来操控自己犹疑不定的精神世界。人遇到的阻力越大，就愈发紧张，在此情境之下，韵律的调节作用（внушение）会更加明显。韵律是调和自我世界和非我世界这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最为基本的手段。当人与自然发生冲突时，人会借助歌谣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愿望。原始人在旋律的助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389.

② [德]康德：《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

③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382.

④ Там же. С.390.

力下，将神秘的非我世界为己所用。为了更好地阐明旋律是如何作用于非我世界的，阿尼奇科夫强调了意愿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两点：其一，没有意愿便不会有意识；其二，人的意愿越全面，越是强烈，那么人的意识便越是丰富，意识所牵及的生活覆盖面就会越广。无疑，在宗教和艺术中都是存在意识的。而科学则是在意识产生很久后才出现的。显然，这一论断反驳了弗雷泽在《金枝》中关于巫术与科学关系的论述。即便在分析歌谣与仪式之间的关系时，阿尼奇科夫的落脚点也总是回溯到仪式与原始宗教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阿尼奇科夫关于春季仪式的分析中已经提及，在此不作赘述。强调仪式的历史文化意义，能够很好地说明仪式是宗教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尼奇科夫试图通过分析咒语歌谣（песня-заклинание）来窥探仪式与更高级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即仪式与诗歌的关系。

（二）从歌谣到诗歌

阿尼奇科夫的《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从歌谣到诗歌）一书的出版得到了俄罗斯皇家科学院的资助，同时得到俄国科学院院士、俄国东方学家谢·费·奥尔登堡（С.Ф. Ольденбург，1863-1934）的支持。在这一著作中，诗歌（поэзия）指的是广义上的作家文学作品。从“从歌谣到诗歌”这一副标题来看，这一著作意在揭示作家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并且强调作家文学的生成与民间文学作品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从仪式到歌谣）在民间文学的框架下阐述民间歌谣与春季仪式之间的演化关系，那么第二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从歌谣到诗歌）已非单纯的民间文学研究，而是从美学角度探讨由民间歌谣到作家诗歌的演化过程。著作的第二部分为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围绕春季圆圈舞的起源和主题，分析春季的娱乐活动；第二个章节从圆圈舞中的爱情情节、中世纪抒情诗歌中关于春季的领唱引子和春季节日中的爱情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春季歌谣和游戏中的爱情主题；第三个章节立足于大量民俗事例，阐述春季仪式与婚姻之间的关系；第四个章节讨论诗歌的起源。

在正式展开诗歌的起源这一论题前，阿尼奇科夫再次强调了他的理论建

构基础是承认宗教意识与歌谣起源的密切关系，除了重申在第一部中已经出现的这一观点外，阿尼奇科夫指出：“咒语歌谣是宗教意识的首要单位。”^① 这一论点是理解阿尼奇科夫的理论架构的一个关键点。

艺术是如何产生的？这是阿尼奇科夫解答诗歌起源问题前亟须明确的一个问题。阿尼奇科夫认为，在最初的建造房屋和缝制衣物等活动中，已经出现了艺术的萌芽，而艺术的产生是为人们实际的日常生活服务的。阿尼奇科夫以人体的饰品为例佐证了上述论点。在这位民间文艺学家眼中，人体上的装饰物是个人身份和性别的假定性符号，例如文身并非是装饰，而是一些神圣性的符号，身体上没有这些符号的人就得不到群体的认同。假如婴孩是由没有文身的女性生产的，婴孩便会被杀死，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不洁净的。阿尼奇科夫关于个体在群体中的认同问题，与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 1920-1983）在著作《庆典》中所言的“文化性新生”有暗合之处。装饰是权力和个人身份的象征性符号，这正是为什么部落中的长者、部落首领或者军事首长等身上带有夸张性的装饰。军人穿着军装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让自己变得勇猛，吓退敌人。饰物的美学功能是第二位的，而饰物的实际功用则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此点，阿尼奇科夫才大胆地得出结论：艺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活需要艺术，在艺术的助力下，人们的生活不断发展和丰富。^②

阿尼奇科夫对诗歌起源的论述颇有见地。他认为，从歌谣发展到诗歌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前美学阶段的宗教生活歌谣（доэстетиче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о-бытовая песня），这类歌谣具有很强的合目的性，具有实际效用。第二个阶段为具有美学价值的歌谣诗歌（эстетическая песня-поэзия），这类作品虽然没有直接的生活功用，但是却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сть без цели）。第三个阶段为个人创作的诗歌（личная поэзия）。这类作品的艺术性与民间文学的艺术性有很大的不同。同前美学阶段的宗教生活歌谣一样，个人诗歌创作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整体而言，阿尼奇科夫将诗歌的产生过程归结为两个创造性的阶段和一个中间的过渡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313.

② Там же. С.318.

阶段。在过渡阶段，诗歌在等待诗人的诞生，并赋予它生命和活力。

在做出关于从歌谣到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假设时，阿尼奇科夫使用了康德的概念“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当对象的概念在概念里同时包含着这个对象的现实性的基础就叫目的；物体只是按照目的而成为可能时，就称为该物体的形式的合目的性。”^①也就是说，无目的性指的是审美与特定的目的无关，同时，审美客体的外在形式又与审美主体的审美相吻合，带来了审美的愉悦，这是一种合目的性。在康德看来，艺术的美是客观的，是被广泛认可的。在认可康德对美的分析的同时，阿尼奇科夫并未全盘接受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一审美分析原则，而是在美学心理学的层面对康德的这一观点予以审视。阿尼奇科夫关注的不仅是“什么是美”，而且更为看重美如何被接受为美。如此一来，阿尼奇科夫所言的美已经是审美意识，而非单纯的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他这里已经被看作是由艺术愉悦带来的特殊的意识状态。关于美的快感（эстетическое наслаждение），阿尼奇科夫认同法国思想家居友（Jean-Marie Guyau, 1854-1888）的观点，认为好感（симпатия）是产生美的快感的基础。好感能够激发人共同感受的能力，这一能力能够将人从令人作呕的日常生活中释放出来，将人带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阿尼奇科夫与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利普斯（Theodor Lipps, 1851-1914）的“移情论”是不谋而合的。在康德和居友美学论述的基础上，阿尼奇科夫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同情性体验（симпа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живание）。他用“同情性体验”来解释从歌谣发展到诗歌的三个阶段的内在联系。

在转向分析诗歌的美学思想前，阿尼奇科夫指出了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弊端。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仅是在审美接受的层面对美展开分析，但是如果转向审美创作，那么这一审美原则是不适用的。于是康德借助艺术的天才观来解释艺术创作。个人诗歌创作的诗人也是天才，内心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阿尼奇科夫指出，在美学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寻求

① 杨承纮：“论康德的目的论及其两大领域的过渡”，《康德黑格尔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искание)。这个“寻求”，被黑格尔和叔本华定义为天才的“形象性思维”(образное мышление)。与黑格尔和叔本华对“形象性思维”的看法不同，阿尼奇科夫认为这一思维不具备组建的能力，而是具备预感的能力。他将天才的艺术家视为永远的寻求者。而寻求也同样是原始宗教意识中最为基本的要素。

受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象征主义流派的影响，阿尼奇科夫认为，当前艺术与原始人艺术最大的不同在于象征手法的不同。原始人艺术中的象征是单一的、天真的，象征带有传统性和常规性。在歌谣中，象征是在相似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其隐喻是可以预知的。如在歌谣中会咏唱航海家、桥梁和年轻的射箭手，在听众潜意识中这些形象会与婚姻联系在一起，即象征符号是宗教和日常生活中某些熟知的事物，只是更具表现力。然而，在从阿赫诺·达尼艾尔^①到象征主义诗人的诗歌作品中，象征符号的所指是不确定的。阿尼奇科夫认为，即便是创作作品的诗人，他也不能够准确说出他所使用象征符号的所指，诗人只是预感到某一象征符号能指的可能性，希冀借助某一象征符号将模糊不定的预感传达给读者，而这一预感又是没有等价物的，无法用某一具体的概念准确传达。阿尼奇科夫这一观点的产生与他本人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有关。

与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民间文艺学家不同，阿尼奇科夫涉猎广泛。他对法国古代文学、游吟诗人、莎士比亚、拜伦、爱伦坡、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密切关注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诸如巴尔蒙特、伊万诺夫、索洛古勃、安德烈耶夫、库普林、布宁等。他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如戏剧作品《金发的苏珊娜》(Белокурая Сусанна)和小说《长舌妇》(Язычница)。阿尼奇科夫的研究视域超出了民间文学的界限，而是将民间文学的研究上升到艺术美学的层面加以论述，这与阿尼奇科夫涉猎广博不无关系。

谈到阿尼奇科夫在文学领域和民间文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阿尼奇科夫与诗人布洛克的关系是不可绕过的一个话题。阿尼奇科夫与诗人布洛克的私交甚密，在布洛克的藏书中有阿尼奇科夫所有大部头的论著。在藏书《多神

^① 阿赫诺·达尼艾尔(Arnaut Daniel)是 12 世纪法国普罗旺斯的著名游吟诗人。

教与古罗斯》的扉页上写着阿尼奇科夫的如下赠语：亲爱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洛克惠存。同为语文学家，二人均对民间文学感兴趣。布洛克的文章《咒语的诗学》（Поэзия заговоров и заклинаний）是在阿尼奇科夫的襄助下完成写作的。而且，布洛克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原始材料也源自阿尼奇科夫的著作。布洛克在创作剧本《玫瑰与十字架》时，借鉴了阿尼奇科夫的专著《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中的一些民俗资料。例如，剧本的第四幕明显受到了阿尼奇科夫关于春季节日描述的影响。剧本中的诸多歌谣参照了阿尼奇科夫这一著作中的民间歌谣，如第一幕中阿里斯坎所唱的歌谣、第四幕中姑娘们所唱的歌谣、第四幕中第一位流浪歌手和第二位流浪歌手所咏唱的歌谣。阿尼奇科夫与布洛克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说明了20世纪初民间文艺学研究与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阿尼奇科夫十分推崇民间歌谣，认为但凡有一点艺术审美能力的人都不会忽视民间歌谣独特的美，如他所指出的：“在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不论从遥远的歌德时代到当下的象征派诗人，诸如法国的维莱-格瑞芬和俄罗斯的勃留索夫，民间歌谣如同大地母亲赋予安泰^①力量一般，可以赋予诗人新的力量，正如同大自然之于绘画的作用一样。”^②阿尼奇科夫指出，歌谣能够激发“同情性体验”，这一体验恰好能够唤醒情感，起到净化心灵的功用。

《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这一著作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大量关注，如俄国语文学家弗·尼·佩列茨（1877-1960）就高度评价阿尼奇科夫的民间文学研究，认为阿尼奇科夫“触及了历史诗学中最为敏感和重要的问题——歌谣的起源问题和抒情诗的起源问题”^③。但也有学者指出了该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俄国民族志学家尼·费·苏姆佐夫（1854-1922）认为，歌谣中的美学要素并不与功利性的目的相关。他指出：“歌谣是源自心灵的声音，它的产生可以完全与仪式无关，也可以作为仪式的补充，与仪式同时

① 安泰（Антей）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是大地母亲的儿子。在与敌人战斗时，如果离开地面就会被敌人打败，而触及大地就会获得战斗的力量。

②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373.

③ Перетц В.Н. Обзор важнейших новых трудов по народ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Киев, 1904. Вып.2. С.1.

产生。”^①阿尼奇科夫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一书中提出的诸多结论具有创新性，为很多语文学家所不能接受。尽管如此，阿尼奇科夫还是因该著作于1907年获得了罗蒙诺索夫奖。^②事实上，阿尼奇科夫关于仪式功用性起源的论述具有超前性。阿尼奇科夫的这一观点在普罗普的著作《俄国的农业节日》（Русские аграрные праздники, 1963）中得到延续。阿尼奇科夫呼吁研究一年中的民间仪式，而普罗普在这一著作中所做的正是此项工作。普罗普甚至得出了与阿尼奇科夫相近似的结论：“所研究的节日与农业效益和农民的意愿密切相关，这也证实了一点：这些节日起源于劳动。”^③尽管普罗普仅仅将阿尼奇科夫视作外借论的拥护者，没有意识到自身与阿尼奇科夫思想观点存在内在的一致性，阿尼奇科夫从民众实际需求考察民间仪式的方法在普罗普的研究中得到延续，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普罗普坚信，民间文学的研究离不开民俗，而民俗的深处是宗教意识^④，而这正是阿尼奇科夫所秉持的观点。

尽管阿尼奇科夫关于歌谣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可供商榷之处，但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歌谣研究范式，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阿尼奇科夫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中收集和保存了欧洲大量的春季歌谣，不论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史研究，还是对民间文学本身的研究，这些民俗资料都弥足珍贵。在对待歌谣的问题上，阿尼奇科夫既推崇人类学派的理论，又推崇歌谣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在关于歌谣的起源问题上，这位民间文艺学家更倾向于将其视作民俗资料，而非单纯的民间文学作品。而在讨论歌谣与诗歌的关系时，阿尼奇科夫更倾向于从文学研究的视角进行探讨，已远远超出了民间文艺学的畛域。同时，阿尼奇科夫参考和汲取了康德的美学观，对从仪式到诗歌的两个发展阶段的阐释，跳出了民间文学文化研究和民间文学民俗研究的藩篱，在俄罗斯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带有拓荒性质。

① Сумцов Н.Ф. Отзыв о сочинении Е.В.Аничкова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Сборник отчетов о премиях и наградах, присуждаемых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ей наук. СПб, 1909. С.225.

② 罗蒙诺索夫奖是俄国政府于1865年3月8日创办的一个奖项，为了纪念罗蒙诺索夫逝世100周年而设立，用于奖励每年在科学研究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

③ Пропп В.Я. Русские аграрные праздники. Л.: Рыбацкая Академия, 1963. С.136.

④ 参见 Пропп В.Я. Фольклор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М.: Наука, 1976. С.25-27.

三、古罗斯书面文学与多神教

古罗斯书面文学的产生与基督教的传播紧密相关，自公元 988 年基督教成为罗斯的国教后，用以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书面文学作品对此前的多神教未多加记录，但书中仍不可避免提及基督教之前的宗教信仰体系。古罗斯书面文学作品中是如何记录和描述多神教的，这是阿尼奇科夫在《多神教与古罗斯》一书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阿尼奇科夫关注多神教信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环境和人共同缔造的产物。20 世纪初，俄罗斯的民间文学研究百花齐放，进入繁荣期，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社会思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间文学研究，尤其是神话传说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热点，因为“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①。

《多神教与古罗斯》（*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1914）是阿尼奇科夫第二部大部头的论著，阿尼奇科夫于 1907-1908 年被监禁期间完成了这一著作。1907 年，阿尼奇科夫因参与农民协会^②举行的集会而被捕入狱，被监禁 13 个月。监禁期间，阿尼奇科夫一直在研究古罗斯的多神教问题。1908 年，阿尼奇科夫关于古罗斯神祇的文章在第三届宗教历史国际会议上用英文刊发^③，阿尼奇科夫虽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阿尼奇科夫意义重大。阿尼奇科夫在文章中指出，弗拉基米尔大公创建的万神殿更多是为政治服务的，万神殿中的神祇大抵与军事和贸易相关，与日常宗教和自然力无关。这一观点是《多神教和古罗斯》一书中的重要论点之一。

《多神教和古罗斯的布道演说》（*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ие проповеди*）是《多神教与古罗斯》一书的雏形。《多神教和古罗斯的布道演说》共设七个章节，研究的重点是古罗斯抨击多神教的重要书面文学作品，

① 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年，第 311 页。

② 农民协会（*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союз*）的全称是全俄农民协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союз*），是一个底层民众在 1905 年革命期间创建的一个革命组织。

③ 参见 E. Anitchkov, “Old Russian Pagan Cults”, *Transactions of 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Oxford, 1908.

这一著作虽然获得了阿赫玛托夫奖^①，但是未能正式出版。1914年，阿尼奇科夫对这一著作进行了增补，研究重心转向古罗斯的神祇，著作随即更名为《多神教和古罗斯》。

在《多神教和古罗斯》中分析民间文学时，阿尼奇科夫从阶级分化的角度审视民间文学作品。阿尼奇科夫认为，弗拉基米尔大公于公元988年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弗拉基米尔大公试图借助这次宗教改革，“将信仰和国家糅合在一起。”^②

阿尼奇科夫的阶级观点，与苏联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无产阶级化不同，指的是公元十世纪有两个不同的宗教体系共存：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神祇体系是为公爵亲兵服务的，而民间宗教神祇体系是为农业崇拜服务的。阿尼奇科夫强调了不同阶层宗教意识和阶级利益的差别，将当时城市和乡村这一流行的对立观整体迁移到罗斯的神祇体系研究当中。阿尼奇科夫的这一观点得到苏联民间文艺学家勃·阿·雷巴科夫（Б.А. Рыбаков, 1908-2001）的赞许，他在《古罗斯的多神教》一书中谈道：“阿尼奇科夫认为，佩伦并非罗斯自古以来的最高神祇，而是公爵亲兵这一团体的神祇，这一神祇与国家体制的出现紧密相关。应当完全赞同阿尼奇科夫的这一观点。”^③将雷神佩伦从全斯拉夫的神祇降为公爵亲兵的神祇，有悖于传统的民间文化观，遭到诸多民间文艺学家的非议。苏联时期，一些民间文艺学家继续维护传统文化观，将佩伦列为斯拉夫民族的最高神祇。这一传统观点的维护者包括维·弗·伊万诺夫（В.И. Иванов, 1924-2005）、弗·尼·托波罗夫（В.Н. Топоров, 1928-2005），以及博·安·乌斯片斯基（Б.А. Успенский, 1937-）等，他们立足于印欧民族中关于雷神与其敌手的神话，将斯拉夫民族中雷神佩伦与其敌手沃洛斯的对立，视为斯拉夫神话的轴心。

阿尼奇科夫认为，在基督教的圣徒传中常常记录圣徒们是如何铲除多神教庙宇的，编年史中提及多神教时也是如此，花费笔墨描述受洗时“新人们”

① 阿赫玛托夫奖是俄国的科学研究奖项，创建于1909年，每年评选一次，用以奖励全年中最好的科学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阿赫玛托夫奖是为了纪念米·尼·阿赫玛托夫（1823-1891）而创建的。

② Иванова Т.Г. Русская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в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черках.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3. С.28.

③ Рыбаков Б.А. Язычество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Наука, 1988. С.437.

（指基督教徒——作者注）是如何破坏多神教神像的。此前的多神教庙宇和神像被替换为十字架和基督教教堂。显然，在古罗斯的书面文学中，罗斯受洗伴随着对多神教的大肆破坏。阿尼奇科夫认为，古罗斯书面文学的书写者在对待多神教时存在两种观点：持第一种观点者将多神教的神祇视作魔鬼；持第二种观点者将多神教看作生灵崇拜的信仰体系，而非信仰创造万事万物的造物主的信仰体系。

第一种观点的精髓在于，认为多神教的神祇改变了原来的身份，进入基督教所言称的魔鬼体系。在古罗斯的书面文学中鲜有提及多神教神祇的名字，但是多神教的神祇并未完全消失。编年史家将多神教神祇视作魔鬼。在编年史家意识深处出现这一观点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基督使徒的世界观中存在着上帝和魔鬼的对立。相较于新信仰的获得，旧的信仰在意识深处的遗忘过程更为缓慢，当新旧两种信仰相遇时，便会出现对彼此的借用。这是多神教神祇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正如阿尼奇科夫所言：“被推翻的神祇已经不再被奉为神，但是对超自然秩序的信仰依然存在，与这一信仰相抗衡是尤为艰难的。”^①古罗斯书面文学的书写者深谙此理，于是他们试图告诉普通民众，此前的神祇是不友善的，是邪恶的，充满污秽之气，即此前的神祇是魔鬼。基督教书面文学的书写者意在根除的，并非是多神教的偶像崇拜，而是古老的宗教信仰体系。于是，在基督教成为罗斯国教后，斯拉夫魔鬼体系中出现了魔鬼佩伦、魔鬼霍尔斯、魔鬼沃洛斯等。可以说，多神教的神祇被列入基督教的魔鬼名单，多神教神祇的身份转换反倒使部分多神教神祇的名字得以保留下来。

第二种观点的精要是坚信多神教将生灵奉为神明。与基督教将创世主奉为神明不同，也与古罗斯书面文学书写者对多神教的第一种看法不同，另一些书面文学的书写者认为，多神教信奉的并非超自然的神力，而是自然宗教。对多神教的第二种看法在使徒行传中流传甚广。第二种看法并非形成于多神教与基督教对抗的白热化阶段，而是在基督教成为罗斯的主流宗教之后。

在阿尼奇科夫看来，古罗斯书面文学撰写者对待多神教的两种看法均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第一种看法偏重突出多神教与基督教的斗争。阿尼奇科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зд. 3-е. М.: ЛЕНАНД, 2014. С.110.

夫认为：“与多神教的斗争，如同与魔鬼和恶势力的斗争，更像是摩尼教宣扬的二重论，而非是为了维护东正教的统一。”^①第二种看法强调多神教为自然力服务，而非为创世主服务，这是在东正教的框架体系内对多神教的一种界定。

可以看出，持第一种观点的书面文学书写者将多神教的神祇称作魔鬼，在行文中禁止提及多神教神祇的名字。但是正是在这类书面文学资料中，很好地保留了多神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持第二种观点的书面文学的书写者将多神教视作自然力的神化。在对待多神教的两类观点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两类观点中均有双重信仰（двоеверие）的影子。在基督教的书面文学中，多神教是返回到受洗前某个时间节点的代名词。而罗马神学家和诗人叶夫列姆·希林（Ефрем Сирийский, 306–373）在最初提及“двоеверие”之时，意为“回溯”（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вспять）。基督教会禁止某些行为，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会沿用多神教的一些风俗习惯，这是对宗教意识的一种回溯，而非对多神教的回溯。在希腊，由于民间戏剧演出中保留了很多多神教的宇宙观，这一演出形式遭到基督教的非难。尽管在斯拉夫民族中戏剧演出传统相对薄弱，包括民间游戏、舞蹈、歌谣等形式的民间娱乐活动仍成为基督教的对立面。阿尼奇科夫指出，在斯拉夫民间文化中，宴席是保存多神教信仰体系的重要载体。

在古罗斯的教会文学作品《一位虔诚教徒的手记》（Слово некоего Христолюбца）中，描述了很多宴席和与宴席相关的游戏、歌谣和娱乐活动。作为一部将批判矛头对准民间习俗、多神教信仰和多神教仪式的作品，《一位虔诚教徒的手记》花费笔墨记录多神教游戏、游吟诗人、古斯里琴、歌舞等娱乐活动的目的仅有一个：与多神教进行斗争。教会把批判矛盾指向宴席、歌谣和游戏，是因为歌谣、各类宴席（婚宴、追悼死者的酒宴、节日宴饮等）和游戏是多神教最后的“隐匿”之所，在这些民间习俗中会有多神教的遗存。故而，在教会文学作品中，歌谣和游戏常常与形容词“魔鬼的”一起出现。

通常认为，基督教是宣扬禁欲主义的。民间习俗的拥护者认为，基督教的道德准则过于严苛，那么基督教与以宴席为代表的多神教习俗是否相融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зд. 3-е. С.116.

呢？阿尼奇科夫的观点如下：罗斯的基督教布道演说中虽然抨击饮酒，并指出了醉酒带来的各种恶果，但是布道演说中并未明令禁酒，即饮酒本身并非污秽之举。阿尼奇科夫借助编年史中对弗拉基米尔大公宴席的记载，佐证了这一观点。罗斯受洗后，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督教不支持多妻制，于是成为基督徒后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立即与他的妻子们断绝了关系，他的妻子只剩下安娜一人。然而，成为基督徒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并未舍弃宴席。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宴席上十分随和，宴席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为“光荣无畏的勇士”饯行、接风洗尘和庆功的场合。可见，罗斯受洗后，教会并未禁止酒宴，而是反对无节制酗酒带来的丑态。

修道院举办的宴席带有慈善性质，面向贫苦的非基督教徒开设。但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只有在收到邀请后，才能出席此类活动，而基督教徒是禁止参与的。保留下来的与多神教相关的宴席均与献祭有关。祈祷、献祭、节庆或仪式都有宴席相伴随。阿尼奇科夫通过分析基督教书面文学，指出在基督教文学作品中谈及的多神教祈祷宴席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澡堂向先祖们举行的献祭，另一类是向生命始祖罗德（Род）和罗热尼察（Рожаница）进行的祝祷。在第一类献祭仪式中，人们会烧热澡堂，在澡堂里放上诸如肉食、蛋类和黄油之类的祭品，等待自己的先祖来澡堂洗澡，人们甚至会根据澡堂里灰烬的形态来判断先祖们是否来过。第二类的献祭仪式主要与东斯拉夫民族中关于命运之神的观念有关。俄罗斯民族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对罗德和罗热尼察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倾向于将罗德视作类似于家神（домовой）的家庭守护神，另一类学者在研究斯拉夫民族的神祇时对罗德和罗热尼察缄口不言。斯拉夫学家伊·伊·斯列兹涅夫斯基（И.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 1812-1880）于1855年在著作《斯拉夫民族和其他多神教民族中的罗热尼察》中，首次系统分析了罗热尼察这一神话人物形象。这位学者将罗热尼察视作同希腊神话中摩伊拉一样的命运女神。维谢洛夫斯基在《斯拉夫民间观念中的命运观》（Судьба-доля в народн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х славян）中继续发展了斯列兹涅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并予以补充。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斯拉夫民族中对罗德的崇拜与祖先崇拜有关。在谈及斯拉夫民族的命运观时，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 500-565）认为，斯拉夫民族不相信天命观。阿尼

奇科夫并不赞同普罗科皮乌斯的看法。斯拉夫民族的民间故事有两类关于命运的故事：一种是相信人的命运是既定的，另一种是相信一些偶然事件会改变人的命运轨迹。在斯拉夫民族的宇宙观中，关于命运的两种信仰是并存的。斯拉夫民族既相信命数，同时也赞同命数是可以改变的。而关于罗热尼察，阿尼奇科夫将其视为“产妇生产时的守护神”^①，所以以罗热尼察名义举办的宴席十分讲究。

阿尼奇科夫通过对中世纪俄罗斯书面文学的深入分析，得出结论：宴会和游戏是保留多神教世界观的重要载体，故而宴会和游戏便成为基督教的指责对象。基督教对宴会和游戏的谴责越强烈，越是从侧面说明这些所谓的异教传统和习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基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受制于地理分布，如12世纪时基辅地区盛行基督教，而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罗斯东北部地区依然是多神教的统治区。同时，它的传播又受制于阶层分化，基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路径是由上到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时期的受洗并不是“在地理层面上进行的，而是在种族和阶级层面上进行的”^②。基督教首先是在基辅地区传播，后又扩展到诺夫哥罗德地区，此后才在更为偏远的地区和民众中传播。

包括民间文学、民间仪式和民间习俗在内的民间文化在基督教和多神教的共同影响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阿尼奇科夫借助分析中世纪俄罗斯书面文学作品，认为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部分异教文化的基督教化过程。宴会和游戏等娱乐性的多神教文化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已经成为民众深层宗教意识中的一部分，无法从民众意识中根除，将其纳入基督教的道德规范是基督教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宴会的设置需要符合基督教的行为规范。然而，基督教化的过程并不能完全符合预期。由于婚宴中伴随有大量的歌舞，并遵从古老的仪式规范，基督教的传道中将此类婚礼视为偶像崇拜，因而“教规不允许神职人员出席带有歌谣的宴会”^③。与宴会基督教化同时进行的还有歌谣的基督教化过程。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出现了“基督教的日常宴席”（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дружинное пиршество）。另一个趋势是基督教诗歌的民间化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зд. 3-е. М.: ЛЕНАНД, 2014. С.162.

② Там же. С.170.

③ Там же. С.185.

过程。在民间歌谣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文体——宗教诗（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与传统的民间文学体裁不同，宗教诗并非纯粹的民间创作。俄国神话学家费·伊·布斯拉耶夫在《民间文学》一书中指出：“宗教诗的内容明显受到书面文学的影响。应当承认，宗教诗的创作者并非普通的民众，而是一个精英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并非所有人都识字，因为直到现今不认识字的盲歌手在传唱宗教诗。”^①宗教诗的产生与教会没有必然的联系，宗教诗是自发产生的。在基督教文学和民间歌谣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带有双重宗教信仰性质的歌谣（поэзия двоеверия）或基督教神话（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在阿尼奇科夫看来，出现这类民间文学体裁，并非基督教的让步、妥协或者调整，而是“受到来自人民大众本身的间接影响”^②。人民大众借用歌谣来看待生活中新出现的基督教教义，而这种歌谣便是宗教诗。

四、基督教歌谣与多神教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神话学派的学者们便开始讨论基督教歌谣与多神教之间的关系。阿·尼·佩平（А.Н. Пыпин，1833-1904）认为，在宗教诗和伪经中寻找多神教的遗存是错误的。他在《由来已久的争论》（Старые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я）一文中指出：“在这些作品（指宗教诗和伪经——作者注）中极少有真正的民间神话，因为他们对我们所说那些编年史和教会批判中所言的那些古老神话所知甚少。”^③维谢洛夫斯基在《札记与疑问》（Заметки и сомнения）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将神话的缔造过程视为如同心理机能一般的人类自然天性。在中世纪的第二次神话创造活动中，人类也可以独立创造出新的神话，“他（指人类——作者注）可以缔造基督教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可以独立地再现同多神教迷信中近似的形象和艺术手法”^④。维谢洛夫斯基以咒语为例，佐证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世纪的基督教咒语与

① Буслав Ф.И. Народная поэ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Пб.: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1887. С.455.

② Аничков Е.В. 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зд. 3-е. М.: ЛЕНАНД, 2014. С.194.

③ Пыпин А.Н. Старые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Соч. А.Галахова. Т.1. СПб., 1863. С.17.

④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6. М.-Л., 1938. С.11.

古老的多神教咒语相近，并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在基督教土壤中自发产生的新神话的缔造过程。不难看出，佩平和维谢洛夫斯基均在强调基督教神话的自生性，割裂基督教神话与多神教偶像崇拜的关系。与自己的老师维谢洛夫斯基不同，阿尼奇科夫则强调基督教神话的产生受到了多神教的影响。

“人民群众依据历史事实创作了史诗。”^①阿尼奇科夫的这一论断言明了人民大众是史诗的创作者，这肯定了人民大众是史诗创作的主体。在史诗创作伊始，这些歌谣是接近历史史实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民群众将一些历史事件混淆在一起，并加入了诸多具有传说性质的内容。尽管这些史诗歌谣中的历史事件交叠在一起，阿尼奇科夫认为，可以根据史料再现史诗歌谣的叙事轴心。从阿尼奇科夫的这一观点来看，他将俄国神话学派的创作集体观和俄国历史学派的观点糅合在了一起。历史事件在原初的史诗歌谣中得到呈现，但史诗歌谣是发展变化的，探究这些歌谣之后的“命运”轨迹十分重要。在分析歌谣的发展变化时，阿尼奇科夫推崇法国语文学家约瑟夫·贝迪埃（Joseph Bedier, 1864-1938）和俄国语文学家阿·阿·沙赫马托夫（А.А. Шахматов, 1864-1920）对民间歌谣与基督教内在关系的论述。

19世纪下半叶，包括保罗·梅耶（Paul Meyer, 1840-1917）在内的法国学者们认为，《罗兰之歌》作为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与宗教的朝圣密不可分。约瑟夫·贝迪埃甚至将民族的英雄史诗比作诗意化的朝圣指南，并进一步指出，史诗歌谣是为教会服务的，或者说，教会利用史诗歌谣传播使徒行传。而俄国学者沙赫马托夫在分析科尔孙传说时，认为这一基督教传说的情节，母题来自俄国的壮士歌。沙赫马托夫所说的科尔孙传说，指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到科尔孙地区受洗的传说故事。在这则传说故事中，弗拉基米尔大公到科尔孙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寻找妻子。很显然，这是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典型母题。传教士在编写这一传说时，使用了壮士歌的内容。沙赫马托夫通过比较科尔孙传说和关于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壮士歌，得出结论：弗拉基米尔大公到科尔孙寻找未婚妻，源自壮士歌中关于弗拉基米尔求娶罗格涅达公主的故事。

梅耶、贝迪埃和沙赫马托夫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强调教会圣地与民间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зд. 3-е. М.: ЛЕНАНД, 2014. С.196.

史诗之间的关系。阿尼奇科夫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基督教歌谣化用了多神教歌谣中的人物形象，但是这些人物形象“已经不再是多神教歌谣的主人公，而是成为基督教歌谣中的主人公。”^①这是阿尼奇科夫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基督教和民间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阿尼奇科夫之前的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民间文学中的多神教思想是自发产生的，而基督教思想是外来的，基督教中的相关情节是被强行嵌入民间文学作品的。民间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得益于多神教，而基督教则阻滞了民间文学的发展。阿尼奇科夫指出，持这一观点的民间文艺学家忽视了壮士歌、民间故事和史诗等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意识。在这位民间文艺学家看来，正如基督教为建筑、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类型带来了新的形式一样，基督教对民间文学作品也进行了再创造，为民间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在《西方和斯拉夫的春季仪式歌谣》一书中，分析春季仪式与基督教的关系时，阿尼奇科夫便已经指出了基督教对于民间仪式发展的积极作用。

基督教并未阻滞古老仪式的发展，而是为仪式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形象和新的思想。得益于基督教，歌谣未沦为低端的笑话，仪式的严肃性得以保留，然而歌谣原初的风格不复存在了。^②

在《多神教与古罗斯》这一论著中，阿尼奇科夫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将基督教对民间仪式的影响推及基督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

阿尼奇科夫强调基督教歌谣对多神教歌谣的借用，同时指出，基督教为民间歌谣提供了新的形象、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体裁。实际上，阿尼奇科夫指出了两个不同的过程：民间歌谣的基督教化过程和基督教歌谣的自生过程。基督教歌谣与传统民间文学的关系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基督教歌谣“改装”传统民间文学中的形象和情节，用来传播教义。另一方面，基督教为传统的民间歌谣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在俄罗斯民间文学研究史上，阿·尼·阿法纳西耶夫在《斯拉夫的自然诗意观》中，试图用原始人的眼睛观察世界，这是对多神教的宏观化研究。阿尼奇科夫认为，这种研究是教条式的研究，脱离民众的真实情感和真实的活形态信仰，转向研究信仰的外在

① Аничков Е.В. Язычество и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зд. 3-е. М.: ЛЕНАНД, 2014. С.203.

② Аничков Е.В. Весенняя обрядовая песня на западе и у славян. От обряда к песне. С.383.

表现形式。阿尼奇科夫将诸如信仰的内容、宗教诉求以及宗教仪式等信仰的外化形式统称为“信仰要素”（элементы веры）。阿尼奇科夫对信仰要素的研究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勾勒，而是试图明确信仰要素流变与民众深层宗教意识的内在关系。

20 世纪初，阿尼奇科夫能在古罗斯书面文学作品中寻找多神教信仰的遗存，梳理古罗斯书面文学记录者对待多神教的两种不同观点，特别是指出了宴席和游戏在保存多神教世界观中的作用，在对书面文学的民俗学研究中，不失为较为深刻的民间文艺学见解。

【Abstract】E.V. Anichkov is a famous Russian folklorist in the Silver Age, who inherited theories of A.N. Veselovsky's historical poetics. His research on folk songs and polytheism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folk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Anichkov has made four major contributions in Russian folklore. Firstly, based on rich materials of European folk poetry, he emphasizes the role of spring ritual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spiritual development, pointing out the original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hiding in spring rituals. Secondly, he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spring ritual songs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from the aesthetics perspective. Thirdly, he concludes two different views on polytheism in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hasizing that feast is a main repository for remnants of polytheism. Fourthly, Anichkov emphasizes that not all Christian songs come into being completely spontaneously, but instead they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olytheism. Anichkov has not limited his folklore studies within literature, but instead he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study of folklore with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which greatly expanded the boundary of Russian folklore studies.

【Key Words】 Russian Folklore Studies, E.V. Anichkov, Russian Folk Culture, Russian Ballads, Russian Polythe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Е.В.Аничков - известный 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ист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Он унаследовал теори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А.Н.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 Е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песен и язычества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развитию русской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ую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у включает следующие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во-первых,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богатых материалах народной поэзии Европы, он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 роль весенних ритуалов в процессе духо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ка, и подчеркивал важность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скрывающегося в весенних ритуалах. Во-вторых, он анализировал значение весенних ритуальных песен в процесс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рамках эстетики. В-третьих, он полагал, что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два взгляда на язычество, и представлялся главным хранилищем остатков языческ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В-четвертых, Аничков придерживался того, что созда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песен не совсем спонтанно, а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м ему язычеством. Изучение фольклора Аничкова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лось узким круго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основе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и он пытался совместить изучение фольклора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м и историей культуры, ч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 предметное поле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ая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 Аничков,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русское язычество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民间东正教的“圣经”

——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鸽书》的结构与思想分析

刘雅悦*

【内容提要】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流浪歌手是其创作主体，民间东正教是其所承载的主要思想内容。《鸽书》在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占据着堪比民间东正教“圣经”的特殊地位。其“创世—世界秩序—末世”的主体结构可与《圣经》相类比。《鸽书》蕴含着鲜明而丰富的俄罗斯民间东正教的思想特征：在神知论上表现为朴素的否定神学思想，在宇宙论和人类学上表现为索菲亚性，在末世论上表现为强烈的末世期待与“翻转世界”的动机。《鸽书》以及整个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所承载的民间东正教思想，是一种有别于官方东正教的、广博深邃且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值得更多地探究与发掘。

【关键词】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 《鸽书》 民间东正教 俄罗斯东正教

【中图分类号】D851.2/I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4-0171(38)

宗教弹唱诗歌(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是俄罗斯民间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与罗斯受洗之后的俄罗斯基督教化(христианизация)相伴而生，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得以繁荣和广泛传播，并在二十世纪逐渐衰落。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将东正教典籍作为主要素材来源，并糅合了俄罗斯多神教以及其他民间文学的内容，表现出有别于官方东正教的民间东正教(народное

* 刘雅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православие)的思想特征。流浪歌手(калики переходные)是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的创作和演唱主体,他们将东正教学说改编为人民更易接受的诗歌形式,云游四方将其广泛传唱,成为启迪和丰富民间东正教思想的重要群体。

俄罗斯学界自十九世纪中期起便开始了对宗教弹唱诗歌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基列耶夫斯基(П.В. Киреевский)、别松诺夫(П.А. Бессонов)、费多托夫(Г.П. Федотов)、索罗先科(Л.Ф. Солощенко)和普罗科申(Ю.С. Прокошин)等学者,都先后就宗教弹唱诗歌出版过系统的诗集和研究专著。遗憾的是,我国国内学界无论从文本方面,还是从音乐方面,至今都尚未对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有过专门的研究,对于其承载的民间东正教思想也未能有充分的重视。鉴于此,本文拟从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鸽书》(«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入手,通过分析其文本结构与内容,以窥见俄罗斯民间东正教思想特征之一斑。

本文首先概述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的发展过程和研究状况,其弹唱者的形象特征,及其与民间东正教思想相互依托的关系;其次,分析《鸽书》在整个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堪比“人民圣经”的特殊地位;再次,阐述《鸽书》的文本内容,并将其“创世—世界秩序—末世”的主体结构与《圣经》的结构进行类比;最后分析《鸽书》的宗教思想,从神知论、宇宙论和人类学、末世论三个方面,勾勒出《鸽书》所表达的民间东正教的基本世界观。

一、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与民间东正教

(一) 宗教弹唱诗歌的发展与研究状况

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①是在东正教典籍与民间神话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由俄罗斯流浪歌手创作传唱,并成为民间东正教思想的主要载体。这是一种介于书面和口头文学之间的民间文学体裁。宗教弹唱诗歌最早进入俄罗斯学者研究视野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彼时,以斯拉夫派为代表的、

^① “духовный стих”一词在国内学界尚未有标准的译法,若直译应为“宗教诗歌”。但因这种表述过于宽泛恐有歧义,似乎可泛指一切口头或书面的与宗教有关的诗歌,故本文遵循北京大学赵桂莲教授的提议,结合该体裁的创作和表现形式,将其译为“宗教弹唱诗歌”。

致力于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找寻国家历史根基和未来指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深入到民众中，搜集并出版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民俗学家彼得·基列耶夫斯基于1848年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歌曲》中，便包含了许多宗教弹唱诗歌；1861年，彼得·别松诺夫出版了六卷本的《流浪歌手》诗集。这套诗集收录了数目庞大且版本众多的宗教弹唱诗歌，至今仍可作为研究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的权威资料；而“宗教弹唱诗歌”作为一种特定的民间文学体裁得到正式命名和界定，是在1912年由民俗学家叶甫盖尼·里亚茨基(Е.А. Ляцкий)编纂的《宗教弹唱诗歌》中。

如果说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研究者主要从事的是对宗教弹唱诗歌的搜集整理工作，那么从二十世纪开始，研究者们就开始致力于发掘宗教弹唱诗歌中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并试图通过它们揭示人民心灵的真谛和俄罗斯思想的本源。他们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便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格奥尔吉·费多托夫。他在1935年出版的著作《宗教诗歌》(«Стихи духовные»)中，不仅叙述了这些诗歌的内容，并且用神学和哲学概念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阐释和解读。

曾经不为俄罗斯上层社会所熟知的宗教弹唱诗歌，似乎在斯拉夫派、土壤派和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相继努力下，得到了应有的发掘和呈现。然而，对这种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而言，学界的发现或许还是迟来了一些。正如学者索罗先科和普罗科申所指出的：“关于早期宗教弹唱诗歌的演唱和创作过程，不存在任何可以确信的历史见证……现今已知的全部宗教弹唱诗歌都是在十九世纪被记录的，而那时人民宗教诗歌创作的传统早已成形。”^①显然，在漫长的时间里，宗教弹唱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必然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发生过改变，可惜其先前的形态和变化过程已经不得而知，只能靠间接推测了。

正因如此，对于宗教弹唱诗歌最初的产生时间，学界颇有争议。比如索罗先科和普罗科申认为，宗教弹唱诗歌在罗斯受洗后不久的十一世纪初便已出现。^②而俄国历史学家米留可夫(П.Н. Милюков)则认为，直到罗斯基督教

①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Москва: Моск.рабочий, 1991. С.11-12.

② 详见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12-13.

化基本完成后，宗教弹唱诗歌才在十六世纪产生。^①总的来说，综合学界的观点，可以大致将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的产生与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十一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这是宗教弹唱诗歌萌芽和初步成形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宗教弹唱诗歌起初与多神教背景的壮士歌(былина)相互混杂，并随着基督教化的进程、莫斯科国家的独立和“神圣罗斯”理念的萌发，逐渐自成一体，确立和表达了相对独立的世界观和宗教理念。

第二个时期是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末，这是宗教弹唱诗歌最为繁荣和广泛传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宗教弹唱诗歌具有了十分成熟的形态，并取代了壮士歌，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形式。通过这一时期的宗教弹唱诗歌，民间东正教的基本信仰体系得以建立。

第三个时期是十八世纪初至二十世纪，这是宗教弹唱诗歌竭力抗衡世俗化浪潮，而后却由于意识形态原因逐渐式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旧礼仪派成为继承、传播和丰富宗教弹唱诗歌思想内容的主要群体。然而在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宗教弹唱诗歌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几乎销声匿迹。

相应地，宗教弹唱诗歌的研究工作在苏联时期也趋于停滞。直至苏联解体前后，一批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诗歌合集才又涌现，譬如索罗先科和普罗科申在1991年搜集并出版的、内容丰富而完整的诗集《鸽书：十一至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民间宗教弹唱诗歌》(«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而俄罗斯作家、文学评论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А.Д. Синявский)的《傻瓜伊万：俄罗斯民间信仰概要》(«Иван-дурак: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1991年)、文化学家安德烈·尤金(А.В. Юдин)的《俄罗斯民间宗教文化》(«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1999年)等专著中，也设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和分析宗教弹唱诗歌。

在当代俄罗斯，伴随着东正教的复兴，宗教弹唱诗歌得以继续被学者和艺术家们搜集、演唱、研究、创作，并以书面和口头形式流传和延续。但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的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载体，不如

^① 详见 Миллюков П.Н.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3 т. Т.2, ч.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 1994: С.269.

说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其创作动机和文化功能较十月革命之前的宗教弹唱诗歌而言，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若要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先需认知，历史上的宗教弹唱诗歌是怎样创作、传播，并对俄罗斯民间信仰产生影响的。

（二）流浪歌手的形象特征

流浪歌手是宗教弹唱诗歌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播者。自宗教弹唱诗歌成熟并繁荣的十六至十七世纪起，他们往往以残疾（其中以盲人居多）的乞丐形象出现，由领路男孩牵引，在教堂和修道院周围、广场、市场和驿站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流浪，以古斯里琴(гусли)、轮式里拉琴(колёсная лира)等俄罗斯民族乐器为伴奏，向围观人民演唱宗教弹唱诗歌。

根据词源学的考证，“калика”一词或可追溯到拉丁语的“caligae”（俄语为калиги），指罗马帝国时期战士行军时所穿的一种半筒军靴“卡利古拉”。这一词源与流浪歌手长期在各地徒步云游的形象是相吻合的。而在罗斯，这一词汇的语义很快和另一个俄语词汇“калека”混为一谈，后者所表示的身体残疾之意也在俄罗斯流浪歌手身上得以体现。^①

尽管对于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的系统研究直到十九世纪才展开，但早在十八世纪，拉吉舍夫(А.Н. Радищев)便在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的《克林》一章，描述过一位流浪盲歌手的形象。拉吉舍夫不愧被别尔嘉耶夫(Н.А. Бердяев)称赞为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部旅行笔记中，他虽然并未完整记录和分析宗教弹唱诗歌的内容，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俄罗斯人民的深刻感情，为我们生动再现了流浪歌手的弹唱画面：

“‘古时有个罗马城，城中有位大公，名叫叶夫菲米恩……’这首民歌叫作《圣徒阿列克赛》，唱歌的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他坐在驿站大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其中多数是孩子和青年。他那苍苍的白发，紧闭的双眼，脸上的安详神情，使围观的人对这个歌手肃然起敬。他的曲调虽然简朴，但歌词柔和，扣人心弦，使听众深受感动。他们比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居民更能领略自然的声音，首都的居民习惯于听华美的曲

^① 详见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Москва: Аграф, 2001. С.298;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14.

调，常常听加勃丽耶莉、玛尔克齐和托季的花腔。当克林的歌手以欲断还续的声音唱到主人公的离别时，听众无不心情激动。由衷的悲哀使歌手的眼窝里充满了泪水。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滚滚而下……看到老人落泪，女人们都痛哭失声；青年嘴边常有的微笑消失了；少年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甚至男子汉大丈夫，虽然对于残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脸色也变得严峻起来……这种并不伤人的悲痛感情是多么甜蜜！它能使心灵及其感情复苏。我随着驿站的人群一起痛哭……一曲既毕，围观的人纷纷向老人送东西表示奖励。他相当平静地收下所有的四分之一戈比和半戈比的铜币，以及大大小小的面包。他对每个施舍者都鞠躬致谢，画着十字说：‘上帝保佑你健康。’在没有得到这位上帝喜爱的老人的祝福之前，我不想动身上路。”^①

在回顾流浪歌手的词汇来源和文学形象时，我们不禁会产生两个疑问：其一是，曾经与长途跋涉、徒步行军的壮士形象相联系的流浪歌手，为何在后来普遍呈现为瞎眼或跛脚的残疾形象？其二是，看似如此羸弱卑微的流浪歌手，是如何赢得几乎所有人民的悉心聆听和崇高敬意的呢？通过总结和阐释流浪歌手的以下四个形象特征，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解答这两个疑问。

第一，流浪歌手是追求神圣的虔诚云游者。云游(странничество)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宗教现象。“在俄罗斯曾经有，也永远将有宗教云游，这永远是一种对于终极状态的追求。”^②“激励俄罗斯人动身上路的关键，当然是对于宗教神圣性的寻找。”^③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云游者或称朝圣者(паломник)，漂泊在俄罗斯大地上，他们对现实世界并不青睐留恋，而是决意寻找心中终极的圣地——真正的神圣罗斯。在宗教弹唱诗歌的第一个发展时期，俄罗斯就不乏对于神圣罗斯身体力行的寻找者。而在十七世纪教会分裂之后，旧礼仪派中的云游派更是极大地推广了这种宗教现象。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流浪歌手，也是众多俄罗斯云游者中的成员，宗教性永远是他们

① 拉吉舍夫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汤毓强、吴育群、张均欧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01-202页。

②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рель, 2010. С.226.

③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Москва: Аграф, 2001. С.300.

身上最根本、首要的特征。

第二，流浪歌手常与乞丐团体相融，赤贫，以行乞为生。流浪歌手的形象在历史中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起初，只有身体强壮，或者非常富有的人，才有条件进行长途远足的朝圣。在宗教弹唱诗歌《四十个流浪歌手和卡利古拉》中力大无穷的壮士形象^①，以及《圣徒阿列克赛》中家境优渥的贵族形象^②，都是符合“caligae”词源的流浪歌手的早期形象。然而，这些天生强壮或富有的人，却都因自己虔诚的信仰而选择云游，他们强壮却不建军功，富有却甘愿贫穷，背负上修行的十字架，为了基督信仰而行乞流浪，并最终在漫长的岁月中彻底抛弃了外表的力量与财富，以最为卑微的乞丐形象示人。众所周知，“整个民间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无疑对行乞和赤贫具有高度的评价。”^③虔诚的俄罗斯人相信，在获得上帝恩典与拯救的过程中，最末后的也是最先的，“在常人眼中最末后的和最令人轻视的乞丐，在上帝面前便是最先的和最美好的。”^④流浪歌手抛弃一切尘世间的金钱、地位乃至尊严，既是盼望能如圣经中所描写的乞丐拉撒路般终入天堂^⑤，也是一种对耶稣基督虚己的效仿和自我苦修。正如马可福音中所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⑥（可 9：35）

第三，流浪歌手博闻强记，是作为教会与人民中介的人民知识分子（народ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或称“半知识分子（полу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⑦。在文盲率极高的俄罗斯民间，东正教典籍和教堂神职人员的布道，对于广大人民而言是费解和枯燥的。而流浪歌手将神学教义和宗教典故改编为简单易懂、耳熟能详的宗教弹唱诗歌，以更好的效果进行传道与说教，既不拘泥于

① 详见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66-77.

② 详见 Там же. С.128-141.

③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3. С.362.

④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89.

⑤ 详见圣经路加福音 16：19-31。圣经中的这一故事也被流浪歌手改编为宗教弹唱诗歌《拉撒路两兄弟》，可见于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119-127.

⑥ 本文所引用的《圣经》内容均为中文和合本的圣经译文，详见《圣经·中英对照》，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

⑦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361;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68.

教会书面文学，又不完全脱离典籍的思想，充当了人民与教会之间的桥梁。正如十九世纪著名的民俗学家布斯拉耶夫（Ф.И. Буслаев）所指出的，在俄国民间，“宗教弹唱诗歌被作为教会典籍，教导不识字的人们以信仰，以圣传，以善与真。它甚至取代了祈祷文。”^①这种行为在罗斯基督教化的早期受到了官方教会的鼓励与支持（甚至初期的流浪歌手很可能是从教会神职人员中走出的）。而在十七世纪教会分裂后，官方教会对于宗教弹唱诗歌中的旧礼仪派教义和大量多神教内容就不那么包容了。流浪歌手常受到官方教会的打压和迫害，但在人民之中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声誉。十月革命前，在文盲率普遍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俄国农村地区，这些“半知识分子”创作的宗教弹唱诗歌，对于东正教教义在民间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流浪歌手多为盲人，或有跛脚等其他残疾特征。残疾的形象，显然更能引发围观者的同情，从而更易获得施舍，聊以生计。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人民的传统世界观中，流浪歌手的残疾形象具有更深层的神秘意义。人民能够在盲歌手的身上看到三个世界：首先，他们低于这个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作为乞丐处于世界最底层和最边缘的身份，另一方面是因为双目失明，“在传统认知中是死者的症状和完全另一界的本质”^②。冥冥之中，他们一定能够看到此世之人无法看到的神秘图景。其次，他们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大隐隐于市，出现在现实世界的各处，为熙攘的人群带来讯息与思想。最后，他们高于这个世界。他们歌唱着神圣的诗句，追求着神圣的土地，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替代他们此世视力的，是来自天国的特殊奖赏——宗教洞见的天赋和对基督真理的接近。”^③这使得盲歌手们更能获得人民的敬畏与信任，他们所演唱的诗歌文本，也被赋予了格外的权威性、神圣性和神秘性。

如此，我们更能明白，拉吉舍夫的小说主人公面对贫穷卑微的盲歌手，为何最后会诚惶诚恐地献上自己贴身的围巾，以求得到“这位上帝喜爱的老

① Буслаев Ф.И. Народная поэ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Пб., 1887. С.451.

② Юдин А.В.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9. С.211-212.

③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26.

人的祝福”。同时，我们也更能认识到，流浪歌手所创作的宗教弹唱诗歌于旧时的俄罗斯人民而言，不亚于《圣经》等东正教正典对于虔诚教徒的分量与意义。

自十月革命至当代俄罗斯，随着俄罗斯人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人民和知识分子间鸿沟的逐渐消解，信教大众已能够自行阅读圣经，而无须作为中介的流浪歌手以宗教弹唱诗歌的口头形式普及教义。流浪歌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宗教弹唱诗歌的创作群体由当代的艺术家和教会人士取代。加上当代官方东正教与旧礼仪派的和解，新时期的宗教弹唱诗歌所承载的宗教思想已与官方教义无甚出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掩盖和忘却宗教弹唱诗歌曾经承载过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并非全然被当今官方教会所承认。从拉吉舍夫、基列耶夫斯基，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多托夫等一批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将俄罗斯民间的精神遗产作为俄罗斯文化之瑰宝、俄罗斯思想之基石的态度，也是我们在研究和评价宗教弹唱诗歌及其所承载的民间东正教思想时，所必须参考的。透过这些思想，不仅能够窥见中世纪与沙俄时期俄罗斯民间信仰的风貌，更能寻迹后世俄罗斯一系列哲学、社会思想的潜在原型。

（三）作为民间东正教思想载体的宗教弹唱诗歌

在描述和总结宗教弹唱诗歌的思想内容时，俄罗斯学者们经常会用到“民间神学”、“民间东正教”，乃至“民间圣经”等说法。譬如尤金就曾指出，在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阐述了东正教在人民中的变体，它与官方教会的东正教大有不同”^①。那么这种被称作“民间东正教”的宗教信仰应当如何界定和理解呢？

提到俄罗斯的民间信仰，惯常而普遍的一种形容方式是“双重信仰”。的确，基督教和多神教是俄罗斯民间信仰的两大来源，也是罗斯基督教化的进程中长期共存的两种宗教。但我们在此基础上认为，在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业已成熟的时期，一种新的宗教信仰——民间东正教已经形成。换言之，此时的双重信仰并非基督教（东正教）与多神教“1+1=2”式的简单叠加，

^① Юдин А.В.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212.

而是相互交融并发展为一种“1+1=3”的新信仰。正如文化学者涅克雷洛娃(А.Ф. Некрылова)所说的：“民间东正教不是两种世界观的机械结合，即可以不费力地分离出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各自元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现象更像是不可逆的化学反应，两种物质相结合的产物是第三种物质，它具有自己所独有的特征。”^①这也是为什么学者切尔涅佐夫(А.В. Чернецов)认为，“双重信仰”不应当作为概括俄罗斯民间信仰的科学术语。他提出，这种表述(“双重信仰”)指的是同时信仰两种宗教，而不能用于作为一种“统一的、整体的世界观”的民间东正教。^②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俄罗斯著名民俗学家达吉娅娜·伯恩施塔姆(Т.А. Бернштам)，她的学说在西方学界也得到了传播和认同。在集体专著《俄罗斯传统文化：宗教，性别，与习俗法》中，伯恩施塔姆谈道：“在十九世纪的学术界和教会，俄罗斯民间宗教被用两种指称来形容：基督教和多神教的双重信仰……‘双重信仰’这一术语至今仍在学术界被使用，并被一些学者理解为一种直接的、形式上的、浅表的、‘两种信仰’在民间宗教中的混合。”她继而明确指出，当代学界应当将“俄罗斯民间宗教的现象作为一种完整的统一体”^③来研究和考量。

这种作为“统一的、整体的世界观”的、十月革命前普遍存在于俄罗斯民间的宗教信仰，便是我们所称的“民间东正教”。它也是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所表达和承载的主要思想。在其著作《宗教诗歌》中，费多托夫正是凭借宗教弹唱诗歌的内容，分析了这种“民间东正教”的基本教义。该著作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最可贵之处在于，费多托夫完全承认并尊重俄罗斯民间东正教的自足性和独特价值。特别是在与官方东正教教义的对比中，费多托夫并不认为民间东正教是一种简化、肤浅的东正教，抑或是一种异端。尽管它在内容上孳杂了诸如多神教、诺斯替主义(гностицизм)等元素，但费多托夫仍然认为其内核是东正教的，且其教义和世界观颇具深度和复杂性。这一点

① Некрылова А.Ф. Круглый год: Русский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1989. С.7.

② 详见 Николаева Т.В, Чернецов А.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ие амулеты-змеевик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1. С.3-4.

③ Т.А. Bernshtam, “Russian Folk Culture and Folk Religion”, in M.M. Balzer edit, *Russian Traditional Culture: Religion, Gender, and Customary Law*,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1992, p.35.

也得到了著名斯拉夫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尼基塔·托尔斯泰(Н.И. Толстой)的认可：“为什么费多托夫所复现的这种宗教的世界图景，可以被称作是基督教的？若要这么说，这种图景里就必须存在基督教学说的基本原则。果真，我们在宗教弹唱诗歌中看到了全知全能的、无处不在的上帝-耶稣基督，天国的王。我们同样看到了，作为基督教基本理念的罪之理念，在宗教弹唱诗歌中是何其重要。基督教伦理层面所传递的怜悯、同情和仁慈的氛围，也贯穿于宗教弹唱诗歌的内容中，尤其是那些用于纪念圣徒苦修者的宗教弹唱诗歌。”^①

而通过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的素材来源，我们得以对民间东正教作进一步的理解。

总的来说，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的内容和主题来自以下四个方面：（1）东正教伪经；（2）东正教正典、礼拜仪式、圣像画；（3）多神教神话传说、童话故事；（4）其他外来民族的神话。其中，东正教伪经是宗教弹唱诗歌最主要的素材来源，也构成了民间东正教最主要的思想内容。民间东正教对于伪经的青睐不难理解。伪经往往针对正典并未提到，或未能完全解答的一些人们所好奇和关心的问题，以引人入胜的传奇内容进行答疑解惑，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迷信心理。甚至可以说，“伪经本身就是基督教透过多神教世界观棱镜折射的产物……是‘日常’基督教。”^②不仅集中于民间东正教，伪经的影响甚至还渗透到了官方东正教中，以至于官方东正教会所承认的圣传中也包含了部分伪经的内容。

相比较而言，东正教正典在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很少被运用。即使是宗教弹唱诗歌中有关亚当、约瑟等圣经人物的主题，也不是直接取材于《圣经》，而是来自于相关的伪经。而东正教礼拜仪式、圣像画中的素材却更多地出现在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显然，这与我们上一节所提到的彼时俄罗斯人民极高的文盲率有关。从这一角度看，费多托夫所言极是：“圣经从来

① Толстой И.Н.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новой серии и книге Г. П. Федотова «Стихи духовные»// Федотов Г.П. Стихи духовные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вера по духовным стихам).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Гнозис, 1991. С.7.

②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16.

就不是俄罗斯人的日常书籍。”^①即使是针对他们所听到的教堂布道内容，俄罗斯人民也有着自己的筛选方式。“人民能够懂得的斯拉夫语不多，且礼拜仪式的神学内容本身远远超过了人民的理解。人民会自己做出无意识的挑选。有的过耳即忘，其他的——铭记于心。”^②

在这样的条件下，宗教弹唱诗歌成为人民与流浪歌手共同加工的产物。一方面，宗教弹唱诗歌是流浪歌手对于人民趣味的妥协。据米留可夫考证，十五至十六世纪，曾经创作和表演多神教内容的百戏艺人(скоморохи)在政府基督教化的打压下逐渐消亡，随后兴起的宗教弹唱诗歌开始取代古老的壮士歌，成为民间文学的主要形式。此时，很多底层人民仍喜爱有趣的表演胜过教会的说教：“当有人来跳舞或者唱歌时……所有人都乐意地跑去……一整天都站在那里看，尽管那里既没有屋顶，也没有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教堂里有屋顶，能避风，——但人们不愿去听布道，都在偷懒。”^③流浪歌手在某种程度上便接替了百戏艺人娱乐人民的功能：“在没有了百戏艺人的情况下，流浪歌手开始穿上‘百戏艺人的衣裙’，去婚礼酒宴上弹唱歌曲。”^④而他们所弹唱的歌曲，既是具有宗教意味的布道，也是节奏分明的诗歌——“对于致力于引起人民大众注意的民间创作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印记。在人民不识字和没有书籍的情况下——这是在人民记忆中传递和加固知识的唯一方式。”^⑤

另一方面，人民对于流浪歌手愈发喜爱和敬重。宗教弹唱诗歌成为丰富和坚定民间东正教信仰的有力手段，它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面对教会分裂和彼得改革所带来的两大冲击——官方教会的打压和世俗化浪潮——侵袭时，由于旧礼仪派的坚守抗争，以及西化的上层贵族文化同传统的底层人民文化之间的鸿沟，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得以发展，民间东正教的思想也得以延续。

①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367.

② Там же. С.491.

③ Миллюков П.Н.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3 т. Т.2, ч.1. С.267.

④ Там же. С.271.

⑤ Там же. С.268.

二、《鸽书》在宗教弹唱诗歌中的特殊地位

根据索罗先科和普罗科申的考证,《鸽书》的创作时间不晚于十五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人民彻底从鞑靼蒙古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俄罗斯展开了自己国家性的发展前景,基督教化了的文化全面显现。”^①在该时期的宗教弹唱诗歌中,诞生了基督教英雄和殉道者的传奇史诗,建立了以基督教为基准的世界秩序。《鸽书》便是首批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奠定了民间东正教思想基础的一部作品。它也是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首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鸽书》的创作素材主要取自《三圣人谈话》(«Беседа трёх святителей»)、《他泊山上神学家约翰向上帝的求问》(«Вопросы Иоанна Богослова Господу на горе Фаворской»)和《亚当由几部分被创造》(«От скольких частей создан был Адам»)等伪经,当然,其在流传过程中也经历了俄罗斯民间神话的加工整合。由于其历史悠久、传唱广泛,《鸽书》的版本众多,比如仅在1861年别松诺夫所搜集整理的《流浪歌手》诗集中就记录了多达十五个不同的版本。^②这些版本尽管在篇幅和细节上皆有不同,但其主要内容和结构都颇为一致。本文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统一选用1991年索罗先科和普罗科申在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集选中所收录的第一个版本。^③

《鸽书》在整个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的特殊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当代出版的《东正教百科全书》(«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中的“鸽书”词条定义道,《鸽书》是“处于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心的典型作品,是重塑民间基督教观念的重要源头”^④;西尼亚夫斯基指出,《鸽书》“在重要性上占据第一位,且独立于其他宗教弹唱诗歌”^⑤;当代学者罗日科娃(А.А. Рожкова)则认为,“没有对于《鸽书》的了解和认知,就不可能完整解读和

①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19.

② 详见 Бессонов П.А., Калики переходящие. Вып. 2. Москва: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А. Семена, 1861. С.269-378 (№.76-92).

③ 详见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34-42.

④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Москва: Церковно-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4.

⑤ Сиян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68.

领会俄罗斯人民，及其文化和历史。”^①

早在十九世纪末，文学史家莫楚尔斯基(В.Н. Мочульский)便提出了《鸽书》是“诗意而简明的民间圣经”^②这一观点。在后世学界的研究过程中，这一观点不断地被俄罗斯学者们引用和认同。譬如学者索罗先科和普罗科申认为，在这一“民间圣经”中，“简要而概括地汇集了几乎一切最广为流传的伪经主题，这些主题在后来的其他宗教弹唱诗歌、传说、歌曲中不断地重复和演变”^③；学者多波尔科夫(А.Л. Топорков)强调，《鸽书》是“不识字的人民的独特圣经”^④；而西尼亚夫斯基更是在自己的专著《傻瓜伊万：俄罗斯民间信仰概要》中，详细分析了俄罗斯人民为何会把《鸽书》当作民间东正教的“圣经”。

《鸽书》的重要性，从其题目的含义便可了解。“голубиная”一词的含义有两种解读方式：(1)“голубиная”的名词形式“голубь”——鸽子，是圣灵的象征。这意味着诗歌中所描述的这本圣灵之书，是上帝启示与上帝恩典，是充满奇迹和预言的。(2)“голубиная”与形容词“глубинная”词形相近，这意味着该书是深刻的书，书中蕴含了智慧的深度，汇集了天地间的深邃奥秘。无论是哪种解读方式，都能够凸显出这本书近似于“万书之书”的地位，也都能在该书的诗句中得到佐证。《鸽书》开篇便强调：

“浓厚、威严的乌云升起了，/鸽书落下了，/……书长四十俄丈，
/宽二十俄丈。/……‘耶稣基督本人书写了这本书，/耶稣基督，天国的王；
/先知以赛亚本人读过这本书，/这本书他读了大约三年，/书中他读完了大约三页’。”

这样一本从天而降、卷帙浩繁的圣书，在俄罗斯人民的认识中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内容和外形两个方面。其一，鸽书的内容多得惊人，似乎连先知以赛亚都无法读完。西尼亚夫斯基对此解释

① Рожкова А.А. Языков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Голубиной книги». Тольятти: Тольятт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6. С.76.

② Мочульский В.Н.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анализ о голубиной книге. Варшава: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Михаила Земкевича, 1887. С.15.

③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22.

④ Топорков А.Л.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из грозовой тучи// Журнал «Родина». 2001. №.04

道：“这是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一本书，内容是所有的事物，或者至少是所有最重要的事物。毫无疑问，作为书中之书的、绝对而神圣的圣经的形象对理解鸽书产生了影响。”^①其二，鸽书的尺寸大得惊人。“鸽书这种难以置信的、极为夸张的尺寸告诉我们，人民认识中的真理之书是什么样的……除了极少数特例，人民没有读过教堂里的书，而仅仅是看到过，于是在自己的想象中他们创造了更加伟大和神秘的鸽书形象。”^②目不识丁的俄罗斯底层人民接触最多的一本书，恐怕就是教堂里的《圣经》了。《圣经》的内容他们无法读懂，但《圣经》的外形却令他们印象深刻。旧时俄国教堂中的《圣经》都有着较大的尺寸、厚重的外皮和表面华丽的装饰，其大小和重量都超过了其他普通书籍。因此在俄罗斯人民的想象和演绎中，外形最巨大的书，一定就是如《圣经》般的、最接近上帝真理的书。从这个意义上讲，将《鸽书》比作民间东正教的“圣经”，是不为过的。^③

然而作为一首宗教弹唱诗歌，《鸽书》即便是众多宗教弹唱诗歌中篇幅最长的诗歌之一，其内容也终究是有限的。这有限的内容又如何能概括“长四十俄丈、宽二十俄丈”的鸿篇巨著呢？对此，《鸽书》作了一种巧妙而富有深意的处理。它借大卫王之口说出了这本书无法读完的事实，并强调诗中的内容都仅仅是大卫王凭借自己记忆的口述，而非真正的鸽书内容本身。这使得作为宗教弹唱诗歌的《鸽书》既有可信性和权威性，又有篇幅上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鸽书》传递了一种典型的东正教神学思想——上帝的神圣书写是永远无法完全知晓的。关于这一思想，我们在下文中也将会有专门的讨论。

①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69.

② Там же.

③ 如果说，我们可以将莫楚尔斯基、索罗先科和普罗科申等学者所判定的，《鸽书》是民间东正教的“圣经”，理解为狭义上的说法，那么，从广义上讲，《鸽书》所代表的、其背后富有的俄国民间宗教文学——包括宗教弹唱诗歌、基督教传说(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легенды)、礼仪诗歌(обрядовые поэзии)等——作为一个合集，亦可作为广义上的民间东正教的“圣经”。持此观点的有当代学者别洛娃(О.В. Белова)、彼得鲁辛(В.Я. Петрухин)等。详见 Сост. и коммент. О.В. Беловой; Отв. ред. В.Я. Петрухин. «Народная Библия»: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е легенды.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04.

三、《鸽书》的主体结构与内容：创世—世界秩序—末世

大部分版本的《鸽书》都由三组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和大卫王之间展开的问答组成，一些版本还会有长短不一的序幕和尾章。序幕一般会追溯鸽书的来源，强调这本书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在上一部分所引诗文中的内容。而尾声一般是对上帝的祈祷和赞美。文中所举例的这一版本并没有尾声。

三组问答的提问者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回答者则是“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即《圣经》中以色列的大卫王。除此之外，问答的见证者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者。诗中描述了四十位沙皇和皇子、大公与公子，神父、辅祭，以及众多人民和基督徒，纷纷汇聚到从天而降的鸽书旁，聆听弗拉基米尔大公和大卫王之间对话的盛大场面，意在显示这是一场面向天下所有人的布道。

第一组问答的主题是创世。这组问答又分为两个部分——宇宙论的和人类学的。第一部分被问及的是整个自然世界的起源，即宇宙起源。弗拉基米尔大公向大卫王询问了“我们白亮自由的世界从何而来？/我们的红色太阳从何而来？……”以及自然界的月亮、星辰、夜晚、清晨、风雨的来源。第二部分被问及的是人类起源。在这里，弗拉基米尔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心智理性的源头。其次则是人的身体，以及作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由来。

大卫王对此的回答是一一对应的。索罗先科和普罗科申指出，“人民自己的宇宙起源学偏好于具体的‘什么是什么’。”^①这种对应不经过复杂的逻辑解释，而是简单明了，一针见血。不同于官方东正教教义认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宇宙，民间东正教同多神教神话紧密结合，认为宇宙来自于上帝自己身上的各个部分（面庞、胸膛、衣袍、沉思、双眸等）。同时，全知全能、自由裁断的上帝并没有如同一些多神教神话中开天辟地的巨人那样牺牲消失，而是毫发未损地以三种位格继续存在。诗句中“上帝”、“基督”、“圣灵”三个概念既可区分又可合一的关系，也反映了人民对于三位一体的基本认识。这一部分的诗句内容表明，整个自然世界都起源于上帝意志和身

^①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23.

体。于是，自然世界相应地具有了神性和上帝形象。

人的起源同样来自上帝。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心智理性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我们的心智理性来源于基督本人”。而人的身体则是来自于自然世界：“健壮骨骼来源于磐石，/敦实身体来源于润土大地，/殷红血液来源于深黑海洋。”可以看出，民间东正教的人类学具有二元论的倾向，人的上帝形象被分为心智和身体两部分，前者是直接源于上帝的，而后者则是通过自然的神性而间接获得的。

第二组问答的主题是世界秩序。在这组问答中，确立了世间万物的秩序等级。弗拉基米尔大公向大卫王询问了十四件世界上最首要、最原初的事物，大卫王对此一一作答，并解释。这十四件事物分别是：万王之王白王、万土之母神圣罗斯大地、万首之母亚当的头颅、万城之父耶路撒冷、万堂之母普世教堂、万河之母约旦河、万山之母他泊山、万石之母白色的灵石、万树之母香柏树、万草之母千屈菜、万海之母汪洋大海、万鱼之母鲸鱼、万鸟之母美人鸟和万兽之父巨犀兽。

从这组问答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因素与多神教因素是如何相互交融，从而共同奠定俄罗斯民间东正教观念中的世界秩序的。基督教因素是决定世界秩序的基础性因素，几乎所有十四件事物都是从东正教典籍和教义中获得自己的权威性和正当性的。正如西尼亚夫斯基所指出的：“民间文学比官方书面文学要不受拘束得多。但即使是民间文学，在处理世界秩序的问题时，正像《鸽书》中那样，也是尽力地少些幻想，多些关注自己的推论逻辑。不同于书面文学，这里没有对于《圣经》的直接引用。但即使是对这些神话生物，人民也尽力赋予其合理性，以使它们可以占据最重要生物的地位。”^①除了很容易以圣经典故作出解释，或具有明显基督教色彩的白王、神圣罗斯大地、耶路撒冷、约旦河、他泊山、香柏树等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千屈菜、鲸鱼、美人鸟和巨犀兽这四件具有更多多神教神话色彩的事物。其中，千屈菜(плакун-трава)因其与俄语动词“плакать”的同源，被认为是因圣母为耶稣基督痛哭时留下的眼泪所滋润而生长出的神草。而美人鸟(стратим-птица)尽管与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塞壬十分相似，但在《鸽书》中它的行为

^①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80.

服从的是上帝的命令：“根据上帝的命令 /美人鸟抖动羽毛，/汪洋大海便动荡起来”。巨犀兽(индрик-зверь)生活在圣山中，且在一些版本的《鸽书》中会“向上帝膜拜”^①。以上事物都几乎说明了上帝在所有宇宙秩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背负起大地的万鱼之母鲸鱼，却有力地说明了传统多神教神话对于民间东正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关于整个世界是由三条鲸鱼所支撑，从而漂浮在巨洋中的多神教意象，成为由圣灵奠基的整个大地的“基础之基础”。

可以说，“正是在《鸽书》中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基督教义’与古老氏族传说的互不冲突的结合：‘大地由圣灵建立，/由上帝之道供养’，但她，大地母亲，坐落在‘三条鲸鱼之上’。”^②这样的世界秩序，既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严肃推论，也不乏民间信仰的神秘与奇幻。在这样的秩序之上，建立了俄罗斯人民对于整个世界神圣性的设想与期待。

在关于创世和世界秩序的宏大讨论之后，第三组问答的格局似乎一下子缩小到了对于弗拉基米尔大公之梦的解析，以及相应的对于尘世局势和道德伦理的影射与评价。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梦中出现了两只兽（一些版本中为兔子）的相互争斗。大卫王将其解析为非真理(Кривда)与真理(Правда)的角力。关于两者间的胜负，一些版本认为“真理驳倒了非真理”，而另一些版本则断定非真理取得了胜利。但无一例外，在这场争斗过后，非真理取代了真理横行于世：“真理走向了天空 /走向基督本人，天国的王；/而非真理踏遍了我们的全部大地，/踏遍了神圣罗斯的全部大地，/踏遍了整个基督教人民。”于是，在前两组对话与第三组对话间，产生了一种疑似的逻辑断层：“我们罗斯的王是白王，是比所有的王都要崇高和纯洁的王。神圣罗斯是万土之母，因为她信奉‘受洗的信仰’，到处都‘装点有上帝的教堂’。而突然间在全部神圣罗斯和全部基督教人民中，不知怎么好像一个黑色的影子，非真理到来了。”^③世界的神圣性陡然消失了，非真理侵袭下的世界变得动荡，人民变得邪恶。

① Си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79.

② Солощенко Л.Ф, Прокошин Ю.С.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XI-XIX вв. С.24.

③ Си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82.

而这恰是《鸽书》所持有的具有启示录特征的悲观历史观。俄罗斯民间东正教的历史观不是线型的，而是环型的。不同于线型历史观对于历史不断上升、越来越好的期待，环型历史观中的人类历史，永远在从太初的黄金时代不可逆地衰落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直至世界末日。只有在末日的大火后，世界才会重生为新天新地，复现太初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民深知，自己不是生活在历史的起点，而是在奔向历史的终点。世界的格局本就在越来越狭小、越来越逼仄，越来越丧失了宏大的神话、伟岸的英雄。光明的白王和神圣的罗斯终将渐行渐远，非真理统治下的末日图景愈发清晰可见。《鸽书》看似的逻辑断层，其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向了末世主题。同时，可怕的末日预言的结尾，也即全诗的结尾，点明了人民得救的希望：“有谁不与非真理共生，/谁就期盼着上帝，/他的心灵就有望/进入天国”。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民间东正教“圣经”的《鸽书》，在其主体结构和内容上也可与《圣经》相提并论。“《鸽书》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圣经。起初是——《创世纪》，世界的起源——最美好的。而结尾——启示录，世界末日——对于尘世人类而言是最可怕的。”^①然而，最末的也是最先的，最可怕的场景之后也是最美好的、最幸福的，是走向天国、走向永恒真理的愿景，是最值得期待的新天新地。

四、《鸽书》的宗教思想特征

由于我们上文所论述的、民间东正教自成一体的教义及其与官方东正教的显著差异，《鸽书》的宗教思想显然既有与官方东正教思想的契合之处，又有不同于、甚至“背离”官方教义的某些特征。而这，恰是我们研究《鸽书》与民间东正教思想的意义所在。《鸽书》所蕴含的宗教思想是如此广博而深邃，以至于它们不仅涉及基督教神学，更涉及诸多的宗教哲学、社会政治等概念。

（一）朴素的否定神学思想

^①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83.

否定神学(апофати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是东正教神秘主义神学的传统与特征。否定神学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不晚于公元六世纪的伪狄奥尼修斯(Дионисий Ареопагит)所著的《论神秘主义神学》(«О мистическом богословии»)。伪狄奥尼修斯,又称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其真实身份一直难以确认。一说他就是使徒圣保罗的学生——首任雅典主教、亚略巴古的大法官、圣徒苦修者狄奥尼修斯。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是公元五世纪末隐修于叙利亚的一位无名氏神学家,其神学著作在中世纪广为流传时,借署了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的姓名,因此当代学界称其为“伪狄奥尼修斯”。但无论如何,其包括《论神秘主义神学》在内的一系列神学著作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的权威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这些著作对后世很多东方教会教父、东正教神学家,以及官方东正教教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东正教神学家弗拉基米尔·洛斯基所指出的,“现代批评家很难就伪狄奥尼修斯的真实身份及其作品的写作时间达成一致,……但无论这些研究的结果怎样,它们都丝毫不能削减‘亚略巴古文集’的神学价值。从这一点看,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教会对这些著作内容的判断,以及教会是如何运用它们的。正如使徒保罗引用先知大卫的圣诗时所言:‘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从而说明了,当论及有圣灵授意的文本时,著作权的问题是何种程度地次要。而对于圣经来说正确的事情,对于教会神学传统来说也同等正确。”^①

伪狄奥尼修斯对于基督教神学思想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明确区分了肯定神学(катафати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与否定神学——这两种不同的认知上帝的途径。前者普遍存在于后世的天主教神学,如托马斯·阿奎纳的学说中,而后者则普遍存在于东正教神学中。在东正教神学家看来,“肯定神学的途径——通过肯定,否定神学的途径——通过否定。第一种将我们引向某些关于上帝的知识,但这是不完善的途径。第二种将我们引向完全的不知——这是完善的途径,也是唯一适合于在本质上不可知的上帝的途径。”^②否定神学是一种以否定、摒弃的方式认知上帝的神秘途径。其核心是上帝本

① Vladimir Lossky,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 Translation of Essai sur.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2, pp.24-25.

② Ibid, p.25.

性的不可知性(непознаваемость),其目标是个人与上帝的神秘合一。与以肯定、确认的方式提供关于上帝知识的肯定神学不同,否定神学认为上帝是超越包括人类理性认知在内的所有事物的。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上帝的知识,“不是上帝本身,而是理性认知的某物;低于祂的某物。”^①因此,上帝是无法用受造的知识来理解的,“只有通过无知的途径才能认知超越一切可能的认知客体的祂。在否定之路上,我们从存在的低级阶梯攀登向它的顶峰,逐渐地摒弃所有可以被认知的事物,以便在绝对无知的幽暗中接近不可知者。”^②而即使用这种方式,上帝的本质也只能接近,不能抵达。上帝的不可知性是永恒的。

在《鸽书》中,关于《鸽书》的来源和内容,诗中的描述颇具神秘主义的意味。这本书从天而降,但是谁降下了这本书,诗中并未记述。甚至《鸽书》的下落地点也被浓厚的乌云所遮挡,无从知晓:“浓厚、威严的乌云升起了,/鸽书落下了”。这本书是基督本人所书写的上帝之书,比起由上帝所默示、却并非由他亲自执笔的《圣经》而言,《鸽书》似乎更能代表上帝的话语乃至其本身。来自各方的人们都因此而汇聚,然而“没有人能走近那本书,/没有人能勉强靠近上帝。”只有大卫王能够来到《鸽书》的旁边——“他走近了上帝之书”。继而,人群才从大卫王那里间接得知了《鸽书》的内容。《鸽书》开头的这段描写与《圣经·出埃及记》中摩西从上帝那里获得“十诫”的典故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甚至可以相应地将大卫王类比摩西,将鸽书类比由上帝刻在石碑上的“十诫”。“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出19:9)”果然,上帝降临在西奈山顶时,被漫山的烟云遮蔽,摩西并未见其真容,而只闻其声。此时除了摩西的其他人更是连西奈山都无法登上:“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出20:18,21)”而当摩西终于进入上帝所处的云中,在山上四十昼夜后终获“神用指头写的石版(出31:18)”后,众人才从摩西那里得到了上帝的规诫。

① Лосский В.Н. Очерк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Пер.с фр. мон. Магдалины,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2012. С.33-34.

② Там же. С.34.

巧合的是，伪狄奥尼修斯在《论神秘主义神学》中，正是用摩西为见上帝登上西奈山的过程，来举例阐释其否定神学思想的。“他听到角声甚大，看到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然后，远离人群，他与被选中的神职人员抵达了神性上升的顶峰。然而就算到这种程度，他也还是没有与上帝会面，他没有直观到祂，因为他看见的不是上帝，而只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伪狄奥尼修斯认为，“可见的、理性可达到的最神圣最崇高的对象仅仅是关于某些性质的假定的依据，……这些依据仅仅揭示了神的在场，而神超越了一切思想理解，他比理性所能到达的神所处的最神圣的地方还要高。”而摩西想要进入上帝的神秘幽暗，就只有“跨越了被观者和观者的世界的边界，……强迫自己缄默了一切肯定的知识；……完全从一切理解和认识中解放出来”，从而“得益于这种无知而得到了超越一切理性的认知。”^①

可以看出，即使是摩西，也无法轻易得到上帝启示，而是通过神秘主义的合一路径才得以进入幽暗的云中，获得上帝的神圣书写。相似地，当《鸽书》中的人们向大卫王询问上帝之书的内容时，大卫王坦言了上帝话语对于人类一切阅读认知和思想理解的超越：“我无法读完上帝之书。/我能够读书——但却不能读完上帝之书：/……我们的心智无法理解这本书/我们的双眼无法察看这本书”。对于大卫王的这种困境，很容易产生与西尼亚夫斯基相似的疑问：“如果他无法阅读《鸽书》，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阅读它，那么大卫王是怎么知道《鸽书》中的内容的呢？”西尼亚夫斯基继而发现，“关于这一点，在某一版本里是这样解决的：没有人能阅读这本书，/这本书自己打开了/书页自己摊开了，/话语自己诵读了出来……换言之，《鸽书》自我宣读，或以其他神奇的方式向大卫·叶弗塞维奇揭示了自己的内容，后者则凭记忆进行了阐述，回答了沙皇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②而在《鸽书》的其他许多版本中，大卫王获知《鸽书》内容的方式则是隐而未见、没有加以说明的。

① Дионисий Ареопagit. О мистическом богословии, I, 3.—творения. СПб., 2002. С.743-745. 转引自 Лосский В.Н. Очерк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Пер.с фр. мон. Магдалины,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2012. С.37-38.

②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70.

承接西尼亚夫斯基的设问，我们可以继续作如下解读：对于上帝的认知不是人们自己可以取得的，而是要靠上帝启示的降临（《鸽书》落下/上帝降临西奈山）；进一步讲，上帝启示的获得、神显的体悟也不是靠众人皆知的手段，而是以神秘的方式进行的（大卫王获知《鸽书》内容/摩西获得十诫）；且继而，即便获得了关于上帝的知识，所得知的也不是上帝的本质，而是上帝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可理解为帕拉马斯（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等人所说的上帝所发出的能量。而真正的上帝本质，即书写和降下《鸽书》的上帝，则是永远不可知的。我们有理由认为，《鸽书》在神知论上对于上帝不可知性的强调，与自伪狄奥尼修斯以来的否定神学传统是十分契合的。

《鸽书》中描述了创世的方法、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诞生和世界末日的景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却恰恰没有谈到，什么是上帝。这或许是因为上帝无须解释，也抑或是因为上帝无法解释。当然，《鸽书》对于上帝本质、认知上帝的方法等问题的缄默，也可以被认为是其宗教思想体系的不完整和不成熟。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民通过盲歌手对《鸽书》的传唱，至少能够懂得，《鸽书》的原文，是永远无法确凿地知晓和理解的，而只能通过大卫王的口述来接近。

而在致力于接近上帝真理的人群中，双目失明、对此世图景和可见知识一无所知的盲歌手，无疑是最值得人民相信的人。“正像光（尤其是大量的光）会驱散潜在的幽暗，同样地，受造物的知识（尤其是多余的知识）会消除无知，而无知正是通向上帝本身的唯一途径。”^①弃绝了可见光和知识的盲歌手，或许更能接近上帝的幽暗，传递上帝的启示。他们也赋予了整个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以朴素的否定主义特质。

（二）宇宙论和人类学的索菲亚性^②

① Лосский В.Н. Очерк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С.34.

② 关于《鸽书》宇宙论和人类学中所蕴含的索菲亚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于后世俄罗斯哲学（尤其是白银时代的索菲亚学）的潜在影响，亦可参见笔者拙文：Лю Яю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духовного стиха «Голубиной книги» и его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усскую софиологию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Отв. ред. и сост. Е.А. Тахо-Год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ая мысль конца XIX –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Водолей,

“索菲亚”(София)的希腊语原意是“智慧”，索菲亚崇拜自古希腊的多神教文化，至拜占庭、再至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由来已久。在基督教语境中，智慧通常指的是耶稣基督，但在东正教语境中，索菲亚更多地与永恒女性的形象尤其是圣母联系起来，以对应基督即逻各斯的男性形象。在这一点上，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有着显著的差异，而与基督教的早期教派——诺斯替教^①颇为相近。正如我国学者梁坤所指出的，“基督教文化中女性本源的思想在东正教中被发挥到极致。……圣母是东正教面对外敌和严峻的圣父的守护者，是上帝与人的中介。……圣母兼具神人二性，这种整合理解正是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的一大区别。天主教拒绝承认圣母与人类的联系，人与神是截然分开的；新教对圣母的忘却使其带有强烈的父性色彩”^②。

索菲亚学(或称智慧学)也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索洛维约夫(В.С. Соловьёв)、布尔加科夫(С.Н. Булгаков)等许多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都对索菲亚主题有过专门的研究。索菲亚被诸多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认为是世界的永恒女性本源，在创世中充当上帝与世间万物的纽带。譬如索洛维约夫强调索菲亚是“神的统一性与万物自然存在多样性的中介”，是作为“可感知的宇宙事物”的“宇宙本原”^③；弗洛连斯基(П.А. Флоренский)将索菲亚的概念与教会和圣母紧密相连，认为索菲亚是“在世界之先的、最初的受造自然”，甚至判定索菲亚为“第四位格(четвёртая ипостась)”^④。

2018. С.380-390.

① 诺斯替(或诺斯底)教是公元1-3世纪流行于罗马帝国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宗教派别，表面上与基督教相关，实则不然，其出现之际就被使徒和教父定为异端，至今基督教正统派别仍认为其是异端。但诺斯替主义思想在后世西方的宗教、哲学中继续发展，并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十九、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和宗教哲学。诺斯替主义认为拥有永恒女性形象的智慧，是上帝创世的开端和起始。这种生发和创造的女性智慧即是索菲亚。而圣经中的智慧，很明确就是耶稣基督，并非某种神秘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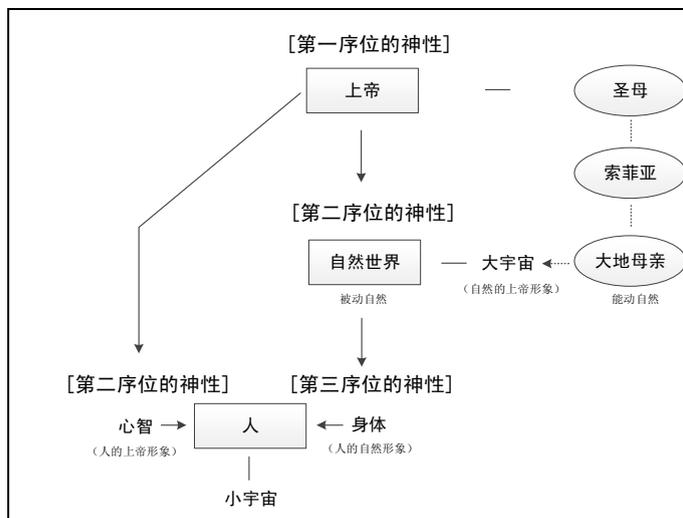
② 梁坤：“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40页。

③ 徐凤林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④ 详见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1. С.834-835. 弗洛连斯基认为，索菲亚作为宇宙的神秘本原，既是受造物，又不是一般的受造物。其他受造物皆靠索菲亚与上帝相连，而索菲亚依上帝的厚意(по благоволению Бога)得以参与三位一体的神性生命，进入到三位一体的内核中，成为第四位格。这是第四个、受造的位格，她既与其他三个位格不同质，又因上帝的厚意而得以与其他三个位格合为一体。

布尔加科夫延续了弗洛连斯基将索菲亚作为“第四位格”的说法，并进而认为索菲亚是“创造自然的自然”，“既把上帝和世界联结起来，又把它们分隔开来”^①。

而同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费多托夫，则致力于从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寻找民间东正教的索菲亚性。他认为，“如果那种密不可分地联结神性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基督教宗教性的一切形式，都可称作索菲亚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民的宗教性就应当被称作是索菲亚的。”^②费多托夫将索菲亚定义为“自然在本体论上的神性”^③，并具体针对《鸽书》思想的索菲亚性解释道：“在世界和人之间，有着如同母亲和儿子的有机体之间的那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世界具有神圣来源的话，那么人也具有神的本性，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继续歌手的思路，——只是他的神性不是第二序位的，而是第三序位的。他不是大地的沙皇，而是大地的儿子。只有通过自己的母亲他才带有了神性的印记。如此，他的眼睛不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眼睛，而是来自于太阳，而太阳本身是来自上帝的眼睛。人民的人类学是从属于宇宙论的。”^④



① 徐凤林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 148-149 页。
 ②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н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421.
 ③ Там же. С.487.
 ④ Там же. С.423-424.

费多托夫所提出的民间东正教宇宙论和人类学的索菲亚性，为我们对《鸽书》宗教思想特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在此基础上，结合《鸽书》文本和其他学者的论证，总结并梳理了如上图所示的《鸽书》所反映出的上帝、自然世界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图中的三条线索来做进一步的理解。

第一条线索是上帝→自然世界→人（身体）。这是《鸽书》中关于宇宙论和人类学的最明显的一条线索，也是上文所引的费多托夫主要谈论的内容。在这条线索中，自然世界从第一序位的神性那里获得了第二序位的神性，而人的身体从自然世界那里获得了第三序位的神性。关于这条线索，西尼亚夫斯基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解释道：“整个世界，以及人，都不仅是上帝的作品，也是上帝的形象或者是他的圣像。从这里延伸出小宇宙（人）和大宇宙（全世界）之间的联系，基督教神学和从古至今的众多哲学家对于这种联系都予以重视。”^①这种联系便是自然的上帝形象与人的自然形象之间的联系，自然的神性充当了人与上帝间的纽带，在这个关系中，人的上帝形象是间接的，而自然世界的神性是直接的，或者用费多托夫的话来说，是“在本体论上的神性”，即索菲亚。与布尔加科夫所认为的——索菲亚“虽然是受造的，但它不是受造物”，同时索菲亚“也不是绝对者，因为它是有别于神的”，但“以绝对的方式从神那里得到一切”^②——这一宗教哲学思想异曲同工的是，费多托夫发现“在《鸽书》中关于宇宙起源的诗句从未谈论过‘创造’（творение）。问题都是关于世界‘来源’（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的……其他的版本有：世界被照料、被发动、发生……但唯独没有被创造。”^③的确，诗句中的相关问答都以类似于“我们的红色太阳从何而来？/我们的次星月亮从何而来？/……红色太阳来源于上帝的面庞，/基督本人，天国的王；/次星月亮来源于上帝的胸膛……”的方式进行的。这意味着自然世界不是从虚无中被创造的受造物，而是神的一种“放射（эманация）”^④。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宇宙是可以被看作受造物人和上帝之间的索菲亚的。

① Си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72.

② 徐凤林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149页。

③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421.

④ Там же.

第二条线索是上帝→人（心智）。这是一条不太明显、却在诗中有确切呈现的线索：人的心智从上帝那里直接获得了第二序位的神性。关于人类起源，在人的身体构成（骨骼、身体、血液）和社会阶层（沙皇、贵族、农民）之前，《鸽书》首先讨论的是：“我们的心智理性从何而来？/我们的思想意念从何而来？/……我们的心智理性来源于基督本人，/我们的思想意念来源于天上的云”。而随后阐述的才是人的身体的来源：“健壮骨骼来源于磐石，/敦实身体来源于润土大地……”在这里，灵与肉的二元论显而易见。鉴于《圣经》中云的形象常被用来形容上帝的荣光，或上帝的降临之处（如上一小节中的圣经引文），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人的心智理性和思想意念都是直接来源于上帝的。于是，在作为小宇宙的人的身上同时出现了上帝形象和自然形象、第二序位的神性和第三序位的神性。可以看出，在《鸽书》的人类学中，兼具了万物有灵的多神教、一神论的基督教和二元论的诺斯替主义的特征，而它对于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又都不是完全照搬。这三种特征并非叠加，而是相融为一种有机而完整的民间东正教的人类学。

第三条线索是圣母/索菲亚/大地母亲→自然世界。这是一条隐含的、可推测的线索。我们认为，在《鸽书》的世界秩序中存在着两种自然。我们借助布尔加科夫的索菲亚学说^①，将这两种自然划分为能动自然——永恒女性索菲亚，以及被动自然——自然世界。《鸽书》中的自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在其世界秩序中有原初的和后生的鲜明分野，即“万土之母、万首之母、万堂之母……”等创造自然的自然，和除她们以外的被自然创造的自然。在我们所提供的《鸽书》版本中，十四件世界上最原初的事物里有十一件都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的，而在其他版本中，这十四件事物往往都统一被称为母亲。这也是为什么费多托夫所断言的：“所有宇宙和社会等级之首都被称作母亲。不是父亲也不是王，而恰恰母亲是等级序列的核心。”^②这十四位母亲共同孕育和降生了自然世界的一切其他事物，确立了世界的秩序。她们便可以被视为“创造力的索菲亚原则”，赋予了被创造的自然世界以“有序

① 参见景剑锋：“传统俄罗斯宇宙观中的两种自然及索菲亚——以谢·布尔加科夫的自然哲学为例”，《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0-124页。

②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я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426.

性、聚合性，及至精气神”^①。而“在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索菲亚崇拜、圣母崇拜以及俄罗斯的大地母亲崇拜总是交织在一起。”^②在《鸽书》中，圣母和大地母亲似乎都可被看作是三位一体之外的“第四位格”。例如，西尼亚夫斯基发现，在一些版本中，“白王信仰的是‘圣母’和‘不可分割的圣三一’，且排在第一位的是圣母，然后是圣三一。”^③又如“大地由圣灵建立，/由上帝之道供养”。大地母亲几乎获得了三位一体之下、万物之上这样的特殊而神圣的地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鸽书》中的众多永恒女性形象——圣母、大地母亲、十几位万物之母，皆可统一借助“能动自然索菲亚”的概念来形容。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鸽书》中的索菲亚思想确有迹可循，它与圣母崇拜和大地母亲崇拜相互依托，也与多神教传统和诺斯替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由此看来，费多托夫认为白银时代围绕索菲亚问题的宗教哲学争论有着近千年的民间东正教的思想基础^④，不是没有道理的。具有索菲亚性的宇宙论和人类学，或许一直都是俄罗斯思想的潜在主题。

（三）强烈的末世期待与“翻转世界”的动机

我们在讨论《鸽书》的结构与内容时，已经提到过《鸽书》所反映出的启示录特征的悲观历史观。《鸽书》中从神圣罗斯到非真理横行的疑似逻辑断层，实则是黄金时代的理想与临近末日的现实所产生的鲜明对比。理想的、应有的罗斯形象，在《鸽书》中并不会与罗斯的社会现状相混淆。“赋予俄罗斯大地‘神圣’的修饰语，并没有引诱着歌手将俄罗斯王国理想化。俄罗斯王国对于歌手而言绝不是真理的国家。”^⑤人类历史的悲观走向、非真理的必然入侵，对于《鸽书》的创作者而言是可叹可悲却又无能为力的。“自然是无罪的和神圣的。但人却污染了大地，使她背负上了沉重的罪恶。人世

① 景剑锋：“传统俄罗斯宇宙观中的两种自然及索菲亚——以谢·布尔加科夫的自然哲学为例”，第124页。

② 景剑锋：“东正教文化中的索菲亚与圣子、圣灵、圣母——以谢·布尔加科夫的神学著述为据”，《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3期，第100页。

③ С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75.

④ 详见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493-494.

⑤ Там же. С.462.

间的生活沉重、无望；痛苦无休无止。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当歌手口中谈及纯洁的美时，他的眼中依然会流出泪水。歌手对于人类生活的评价是断然的、充满深刻的悲观主义的，《鸽书》的宇宙论以关于真理与非真理的悲伤寓言为结局不无原因，在其中我们应当看到人民社会哲学的主要经验。”^①俄罗斯广大的底层人民，时常会对现世生活产生怀疑与失望。而俄罗斯动荡的历史往往加深了社会不公和人民的苦难，致使人们断定，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梦境已成现实，真理远去，非真理遍布了大地。而对于非真理的公正惩罚恐怕只能等到基督二次降临和最后审判之时，由此便引发了俄罗斯人民对于末日的强烈期待。俄罗斯人民相信，此世的终点便是新天新地的起点，全体得救与复现罗斯神圣性的愿望，同俄罗斯人民的末世期待如影随形。

值得注意的是，在《鸽书》中我们能够隐约看出俄罗斯在这场末日变革中所担当的首领角色，换言之，即俄罗斯的宇宙性意义和弥赛亚使命。在非真理与真理的寓言中，尽管解梦者是耶路撒冷的大卫王，但做梦者，也即关于末世图景的第一个先知和预言者，是罗斯的施洗者弗拉基米尔大公。可以对比《鸽书》的前两部分：弗拉基米尔大公几乎都只提问题，不做自己的陈述，而听从大卫王的布道。然而在末世部分，弗拉基米尔大公向大卫王说出了自己的预见。通过这种弗拉基米尔大公权重的提升，我们多少能够看到伊拉里昂（митрополит Иларион）《论法与恩典》（«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中的“罗斯—第三耶路撒冷”，以及后来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影子。

弥赛亚意识还出现在《鸽书》的第二部分：“我们的白王——是万王之王。…神圣罗斯大地是万土之母…耶路撒冷城是万城之父”。“白王”通常会使人联想起《圣经·启示录》中作为救主和审判者二次降临的基督形象：“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启 1: 13-14）除此之外，白色的意象在《启示录》中也用于指追随基督、并已经得救的圣徒们：“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

^①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439.

(启 19: 8, 14) 在俄罗斯民间信仰中, “白王”的称号则尤其和常胜者圣乔治(Георгий Победоносец)联系在一起。这位生活在公元三至四世纪的小亚细亚地区、以屠龙事迹著称的基督教圣徒, 在俄罗斯民间受到极高的尊崇, 被俄罗斯人民亲切地称作“勇敢的叶高里伊”(Егорий Храбрый)。显然, 圣乔治的形象与“勇者斗恶龙”的古罗斯多神教原型一拍即合, 俄罗斯人民遂将圣乔治作为俄罗斯国家、俄罗斯信仰的守护者, 其神圣地位甚至可与基督相提并论。文化学家玛丽娜·弗拉索娃(М.М. Власова)所考据的、在俄罗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些符咒(заговор)皆可印证这一点: “圣徒叶高里伊全身白, 白马白帽白手套”, “向真理基督和勇敢的白王叶高里伊祈祷吧。”^①因此, 在俄罗斯人民的宗教观中, 白王首先是守护和统领俄罗斯的王、东正教的王。而在《鸽书》里, 俄罗斯的白王也是普天下所有王的王。于是, 俄罗斯国家的规模具有了宇宙性的意义, 而神圣罗斯大地作为万土之母, 也理所当然地涵括了全天下的神圣之地。正如费多托夫在谈到人民的世界地理观时所指出的, “没有什么国家, 或至少是基督教国家, 对于流浪歌手而言不是‘罗斯大地’的。……俄罗斯的王与耶路撒冷的关系, 就如同与自己的城市一样, ……世俗政治地理的名称与宗教地理相互交错, 而根据后者, 真理信仰所在的地方, 就是罗斯所在的地方。”^②因此, 神圣罗斯的重现、真理的回归, 不仅被理解为俄罗斯人的愿景与使命, 也具有普天下、全宇宙的规模和意义。

关于《鸽书》的末世论, 还有一处令人生疑、需要解释的地方。它单独出现在《鸽书》的第二部分: “大地建立在三条鲸鱼之上。/鲸鱼纹丝不动——不会摇晃; /而当鲸鱼翻转之时, /就是大地母亲动荡之时, /就是我们的白亮世界终结之时”。第三部分中, 非真理的到来是末日来临的征兆, 因为“由于非真理大地动荡了”; 而这里所描绘的鲸鱼翻转, 同样可以造成大地的动荡、世界的终结。这两种分别建立在基督教和多神教基础上的末世论, 会不会是一种前后的矛盾? 抑或是两种并不相悖的思路? 我们更

① 详见 Власова М.М. Русские суевер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Пб.: Азбука, 1998. С.39-40; 赵桂莲著:《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7页。

② Федотов Г.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460-461.

倾向于认为，翻转的鲸鱼形象，可能为民间东正教的末世论提供了另外一条潜在的出路。作为十四件最原初的“母亲”之一的万鱼之母，鲸鱼在俄罗斯民间宗教思想中充当着大地的神圣载体。在《三圣人谈话》等伪经中，生动描述了三条大鲸鱼背负大地、游在巨洋中的场景。而当末日来临、非真理横行时，世界根基——鲸鱼却不得不翻转，相应地，其所背负的神圣大地也遭遇动荡和颠覆。于是，我们可以在此做出猜想，如果再次翻转现有的世界根基，使非真理随着鲸鱼的回转沉入大洋，就很可能成为期待基督二次降临以外战胜非真理、使大地重归神圣的另一种可靠方式。而这种“翻转世界”——推翻非真理的世界、重迎真理世界的动机，在俄罗斯农民的乌托邦思想中，乃至在十九、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中，其实都能见到端倪。

五、结语

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既是俄罗斯民间文学的重要成分，也是民间东正教思想的有力载体。本文从众多的宗教弹唱诗歌中选取了《鸽书》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诗歌，对其内容和思想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与民间东正教相互依托与映照。宗教弹唱诗歌兴起于十一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繁荣于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末，并逐渐式微于十八世纪初至二十世纪。流浪歌手是宗教弹唱诗歌的创作主体。他们多为盲人，在云游过程中往往与乞丐团体相融，通过传唱宗教弹唱诗歌成为教会与人民的中介，可称为半知识分子。在人民与流浪歌手的共同影响下，宗教弹唱诗歌塑造并承载了作为统一的、整体的世界观的民间东正教。

第二，《鸽书》在整个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其重要性堪比民间东正教的“圣经”。

第三，《鸽书》的主体结构可与《圣经》类比。在“创世—世界秩序—末世”的结构下，其内容涵盖了宇宙起源与人类起源、世界秩序中的首要事物、环型历史观下的末世预言等俄罗斯人民最为关切的宗教主题。

第四，《鸽书》的宗教思想特征鲜明而深刻。在神知论上，《鸽书》对于

上帝不可知性的理解，表现出朴素的否定神学思想；在宇宙论和人类学上，《鸽书》中上帝、自然世界和人之间或明或暗的三条线索，显现出其思想的索菲亚性，并为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的索菲亚学说提供了潜在的思想依据；在末世论上，《鸽书》反映出俄罗斯人民对于末世的强烈期待、对于俄罗斯弥赛亚使命的认知、以及在多神教神话影响下所产生的“翻转世界”的潜在动机。

对《鸽书》的研究过程时常会给人这样的感受：我们仿佛既高估了民间东正教，又低估了民间东正教。一方面，人民对于东正教典籍和官方教义在接受程度和能力，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高。俄国居高不下的文盲率和社会阶层间的巨大鸿沟，使人民往往对于一些很基本的教义和宗教人物产生混淆和错用，对于复杂的教义解释充耳不闻，更不用说多神教因素对民间东正教学说无处不在的渗透。另一方面，人民看似随性而天马行空的宗教思想自成一体，正如西尼亚夫斯基所承认的，“在这里展开了一些含混不明的幻想，而这是我们的科学逻辑所很难驾驭的。”^①这种科学逻辑所难以厘清的思想体系，或许可以用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所说的“前逻辑（prelogique）”^②来形容。我们应该意识到，民间东正教未必就是低级简单的，相反，它具有宏大的视野、深邃的思想，以及独特的价值。本文借《鸽书》所呈现的俄罗斯民间东正教的思想内容实乃冰山一角，且以我们所熟知的科学论证和逻辑思维，恐怕很难勾画和复现民间东正教的真正面貌与精髓。尽管如此，试图接近它的努力，仍然是所有致力于探究俄罗斯思想之奥的人们所值得做出的。

① Снявский А.Д.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веры. С.277.

② 参见列维-布留尔著：《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3-72，452-454页；郭齐勇著：《文化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39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1922年）等专著中通过对原始部落和民族的研究，发现并提出了一种与西方现代思维迥然不同的“前逻辑（又译为原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无法用现代人所熟知的逻辑或理性来理解，但又不是反逻辑或非逻辑的，更不是西方逻辑思维的低级形式，而是与逻辑思维平行、并列的另一种思维模式。前逻辑自有“互渗律”等特殊而有效的思维方法与规律。

【Abstract】 Russian religious poesies,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minstrels as their authors, are main carrier of Russian Folk Orthodoxy. Among Russian religious poesies, *the Dove Book* holds a special status as the “Bible” of Folk Orthodoxy. Its major structure of “Creation-World Order-Eschatology”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Bible*. *The Dove Book* has distinct and rich features of Russian Folk Orthodoxy,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plain Apophatic theology in recognition of God, character of Sophia in cosmology and anthropology, strong eschatology expectation and motivation of “overturning the world”. *The Dove Book*, together with other Russian religious poesies, contains profound and original thoughts of Russian Folk Orthodoxy.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fficial Orthodoxy, yet worthy of mor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Key Words】 Russian Religious Poesies, *the Dove Book*, Folk Orthodoxy, Russian Orthodoxy

【Аннотация】 Русски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с длинной историей развития, созданные и исполненные каликими переходжими, служат главным носителем идей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как «Библ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занимает особое место в русских духовных стихах. Её основ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смогон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 миропорядок — эсхатология», аналогична Библии.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наполнена яркими и богатыми чертам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мысли, в том числе скромной апофатической теологией в познании Бога, софийностью в косм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им ожиданием и мотивами переворота мира.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и русски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содержащие широкие, глубокие и своеобразные мысли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явно отличающегося от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ие 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 «Голубиная Книга», 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责任编辑 肖辉忠)

附录：《鸽书》译文

鸽书

浓厚、威严的乌云升起了，
鸽书落下了，
鸽书不小也不大：
书长四十俄丈，
宽二十俄丈。
人们远道聚集而来
到那本上帝之书处
有四十位沙皇与皇子，
四十位大公与公子，
四十位神父，四十位辅祭，
许多人民，小人物，
东正教的基督徒，
没有人能走近那本书，
没有人能勉强靠近上帝。
智慧的王来到书旁，
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他走近了上帝之书，
书展开于他的面前，
所有上帝的书写出现在他眼前。
还有弗拉基米尔大公来到书旁，
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维奇：
“你，智慧的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王公，请向我们布道，
是谁书写了这本书，
智慧王回答了

是谁印刷了鸽书？”
他们，
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耶稣基督本人书写了这本书，
耶稣基督，天国的王；
先知以赛亚本人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他读了大约三年，
书中他读完了大约三页”。
“啊，你好啊，我们的智慧王，
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王公，请读完上帝之书，
王公，请宣告上帝之事，
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神圣罗斯，
关于我们自由世界的生活：
我们白亮自由的世界从何而来？
我们的红色太阳从何而来？
我们的次星月亮从何而来？
我们的繁密星辰从何而来？
我们的幽黑夜晚从何而来？
我们的清晨霞光从何而来？
我们的强劲流风从何而来？
我们的细碎雨滴从何而来？
我们的心智理性从何而来？
我们的思想意念从何而来？
我们的米尔人民从何而来？
我们的健壮骨骼从何而来？

我们的敦实身体从何而来？
我们的殷红血液从何而来？
我们大地上的沙皇从何而来？
我们的大公贵族从何而来？
我们的东正教农民从何而来？”
智慧王开口说道，
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啊，你好啊，弗拉基米尔大公，
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维奇！
我无法读完上帝之书。
我能够读书——但却不能读完上帝
之书：
这本书非同小可，
这本书伟大异常；
若用手拿——则无法拿住，
若放在圣读经台上——则无法放
下。
我们的心智无法理解这本书
我们的双眼无法察看这本书：
伟大的鸽书！
我根据自己旧有的记忆
向你们口述文书的内容：
我们白亮自由的世界来源于上帝的
裁断，
红色太阳来源于上帝的面庞，
基督本人，天国的王；
次星月亮来源于上帝的胸膛，
繁密星辰来源于上帝的衣袍，
幽黑夜晚来源于上帝的沉思，

清晨霞光来源于上帝的双眸，
强劲流风来源于圣灵，
细碎雨滴来源于基督的眼泪，
基督本人，天国的王。
我们的心智理性来源于基督本人，
我们的思想意念来源于天上的云，
我们的米尔人民来源于亚当，
健壮骨骼来源于磐石，
敦实身体来源于润土大地，
殷红血液来源于深黑海洋。
我们大地上的沙皇来源于此：
来源于亚当的神圣头颅；
我们的大公贵族来源于此：
来源于亚当的神圣躯骨；
我们的东正教农民来源于此：
来源于亚当的神圣膝盖”。
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口说道，
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维奇：
“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请向我们布道：
什么王是万王之王？
什么土地是万土之母？
什么头颅是万首之母？
什么城市是万城之父？
什么教堂是万堂之母？
什么河流是万河之母？
什么山丘是万山之母？
什么磐石是万石之母？
什么树木是万树之母？

什么草本是万草之母？
什么海洋是万海之母？
什么鱼类是万鱼之母？
什么鸟类是万鸟之母？
什么兽类是万兽之父？”
智慧王开口说道，
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我们的白王——是万王之王。
为什么白王是万王之王？
因为他坚守受洗的信仰，
受洗的，虔诚的信仰，
他捍卫基督教的信仰，
捍卫圣洁圣母的家园，——
因此白王是万王之王。
神圣罗斯大地是万土之母：
在其上建立有使徒的教堂；
他们向十字架上受难的上帝祈祷，
向基督本人，天国的王，——
因此神圣罗斯大地是万土之母。
而万首之母——亚当的头颅，
因为当基督在世时
被在额头处钉住，
于是十字架钉放于亚当的神圣头
颅。
耶路撒冷城是万城之父。
为什么这座城是万城之父？
耶路撒冷是万城之父，是因为：
在这座耶路撒冷城里
是我们大地的中心。

普世教堂是万堂之母。
为什么普世教堂是万堂之母？
普世教堂坐落于耶路撒冷城中央，
在普世教堂里
坐落着神的宝座
坐落着白石坟墓；
在白石坟墓里
安息着基督本人的衣袍，
基督本人，天国的王，——
因此普世教堂是万堂之母。
伊尔门湖是万湖之母：
不是新城的伊尔门湖，
不是君士坦丁堡的伊尔门湖，
而是土耳其大地上的伊尔门湖
在起初的耶路撒冷城之上。
为什么伊尔门湖是万湖之母？
从它流出了母亲河约旦河。
约旦河是万河之母。
为什么约旦河是万河之母？
耶稣基督本人在河里受洗
同天上的力量一道，
同天使和保护者一道，
同十二使徒一道，
同约翰，光，同施洗者一道，——
因此约旦河是万河之母。
他泊山是万山之母。
为什么他泊山是万山之母？
耶稣基督本人在山上显容，
耶稣基督，天国的王，光，

同彼得，约翰，雅各，
同十二使徒一道，
向自己的门徒展现荣耀，——
因此他泊山是万山之母。
白色的灵石是万石之母。
在白色的灵石上
交谈和休息过
耶稣基督本人，天国的王，
与十二使徒一道，
与十二门徒一道；
在灵石上他确立了信仰，
他散放了鸽书
到整个大地，整个宇宙，——
因此灵石是万石之母。
香柏树是万树之母。
为什么那树是万树之母？
从香柏树上
出现了唤醒心灵的十字架。
在唤醒心灵的十字架上
被钉上了耶稣基督本人，
耶稣基督，天国的王，光，——
因此香柏树是万树之母。
千屈菜是万草之母。
为什么千屈菜是万草之母？
当犹太人把基督钉上十字架，
他的圣血滴落，
圣洁的母亲圣母
为耶稣基督痛哭，
为自己心爱的儿子，

圣洁的眼泪落下
落在润土大地母亲上；
从这圣洁的眼泪中
长出了千屈菜，——
因此千屈菜是万草之母。
汪洋大海是万海之母。
为什么汪洋是万海之母？
在汪洋大海的中央
从水中升出了普世教堂，
普世的，虔诚的，
罗马神父圣克莱孟的：
教堂圆顶是大理石的，
圆顶上的十字架是金子的。
从这座普世教堂中，
从普世的，虔诚的教堂中，
升出了天国的女皇；
在汪洋大海中她自我洁净，
她为了上帝向普世教堂祈祷，——
因此汪洋是万海之母。
鲸鱼是万鱼之母。
为什么鲸鱼是万鱼之母？
大地建立在三条鲸鱼之上。
鲸鱼纹丝不动——不会摇晃；
而当鲸鱼翻转之时，
就是大地母亲动荡之时，
就是我们的白亮世界终结之时——
因此鲸鱼是万鱼之母。
大地由圣灵建立，
由上帝之道供养。

美人鸟是万鸟之母。
为什么她是万鸟之母？
美人鸟生活在汪洋大海上
且产子在汪洋大海上。
根据上帝的命令
美人鸟抖动羽毛，
汪洋大海便动荡起来；
她使商船沉没
商船载满了贵重货物，——
因此美人鸟是万鸟之母。
我们的巨犀兽是万兽之父。
为什么巨犀兽是万兽之父？
他行走于地下，
疏通小溪与支流：
巨犀兽的所经之处，——
就是泉水喷涌之处；
巨犀兽转过身来，——
全体野兽向其膜拜。
他生活在圣山中，
在圣山中饮水和进食；
不论到哪，都行走于地下，
如同云端的太阳，——
因此我们的巨犀兽是万兽之父”。
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口说道：
“啊，你好啊，智慧王，
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王公，我昨天夜里睡得很少，
我在梦中看到了很多：
一个来自东方，

另一个来自南方，
两只兽相遇了，
两只凶猛的兽跑到一起，
它们之间展开了争斗，
一只想把另一只战胜”。
智慧王开口说道，
智慧王大卫叶弗塞维奇：
“这不是两只兽相遇了，
不是两只凶猛的兽跑到一起，
这是非真理与真理相遇了，
它们之间展开了争斗，
非真理想要战胜真理。
真理驳倒了非真理。
真理走向了天空
走向基督本人，天国的王；
而非真理踏遍了我们的全部大地，
踏遍了神圣罗斯的全部大地，
踏遍了整个基督教人民。
由于非真理大地动荡了，
由于非真理全体人民愤愤不平；
由于非真理人民变得不正确了，
变得不正确，爱记仇：
他们想要相互欺骗，
想要相互蚕食。
有谁不与非真理共生，
谁就期盼着上帝，
他的心灵就有望
进入天国